

社  
會  
叢  
書



# 馬克思主義 新論

蘇紹智 著

吾將上下而求索，雖九死其猶未悔……共產黨背叛了革命，老一輩左翼知識分子在飽受屈辱、折磨之餘，却未必改變當年追求理想的初衷。

本書是前中國社科院馬列毛研究所所長蘇紹智教授，在經歷文革與六四的磨難後，回歸馬克思的原典，批駁現實庸俗社會主義，重新思考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民主化前景的成果。

社會叢書①

## 馬克思主義新論

著者——蘇紹智

發行人——臧遠侯

出版者——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10696和平西路二段二四〇號四樓

發行專線——(〇二)三〇六六八四二一

讀者服務專線——(〇二)三〇二四〇九四

(如果您對本書品質與服務有任何不滿意的地方，請打這支電話。)

郵撥——〇一〇三八五四〇時報出版公司

信箱——台北郵政七九〇九九信箱

校對——黃加興·呂凱文

排版——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製版——成宏照相製版有限公司

印刷——華展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六月十日

定價——二五〇元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〇二一四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ISBN 957-13-0449-2

Printed in Taiwan

000  
A16  
855

社會叢書 ①

# 馬克思主義新論

蘇紹智／著

ISBN 957-13-0449-2



# 目錄

## 序

——廓清史達林主義在中國之遺毒

李金銓

5

## 自序

9

對馬克思主義的再認識

17

對資本主義的再認識

33

對社會主義的再認識

53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歷史命運

79

編寫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若干問題

93

馬克思主義：堅持什麼？發展什麼？

115

馬克思主義的國際挑戰及其意義

127

馬克思主義與自由

157

馬克思對訊息時代的預見

175

對外開放政策和馬克思主義

187

馬克思主義與保衛和平運動

191

——為國際和平年而作

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的社會發展階段問題	205
各種現實社會主義體制的比較和分類	217
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自治制度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關係	233
布哈林國際學術討論會側記	247
布哈林《過渡時期經濟學》評述	263
布哈林的再評價	
——寫在為布哈林平反之際	275
誰有權判決誰是馬克思主義者？	
——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十週年理論討論會上的發言	303

## 附錄

反社會主義反馬克思主義面目的大暴露	
——評蘇紹智在海外的若干言論	315
馬理銘	
「還是老實些好」	329

# 序

——廓清史達林主義在中國的遺毒

李金銓

面臨蘇聯帝國的解體與東歐諸國未有的巨變，不禁想起假如馬克思從墳墓裏翻身再世，一定要撫然會心一笑。馬克思年輕時與普魯士的新聞檢查官堅決抗爭，毫不妥協——他根本就藐視穿制服的寫作班子；新聞自由就是新聞自由，在他來講是絕對不許有附帶條件的。馬克思最終的目的也就是要以自由民主來獲取人類徹底的解放。蘇聯、東歐和中國共產黨的所作所為，與馬克思的激進人道主義背道而馳，其間相差何止十萬八千里？

六十多歲那一輩的左翼知識分子，曾經死心塌地追隨毛澤東，為的是反獨裁、反封建，跟蔣介石的「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一個黨」進行鬥爭。毛澤東明白地說過：民主就是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自由就是羅斯福所提倡的言論、宗教、免於恐懼和免於匱乏的四大自由。焉知毛澤東抓到政權以後，翻臉不認人，把中國搞得天翻地覆，幾乎瀕於萬劫不復之境。他背叛了馬克思，建立起「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一個黨」的毛澤東帝國<sup>①</sup>。而一九八〇年代的開放改革期間，鄧小平的中國竟也始終在「政治反右，經濟反左」的矛盾圈中跳不出來，於是隔些時就穿插節目，先是「清除精神污染」（一九八三），又是「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一九八七），結果終於以「六四慘案」（一九

八九)收場。其實，中共當局當真要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首先得揪出尙未奪權以前的毛澤東來審問一番呢。

上一代這些卓越的知識分子，因為毛澤東背叛革命，背叛理想，背叛馬克思，讓史達林主義在中國神州大地肆虐四十年，以致自己的身心備受折磨，但他們對當年的初衷似乎無悔無尤。

蘇紹智教授的這本宏著《馬克思主義新論》，正表現了這種堅持理想和追求「真理」的精神。蘇教授視野宏富，引經據典，公認是中國大陸學者中研究馬克思主義最卓然有成者。他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所長，終因見解觸逆於當權教條派，被迫在「六四事件」後放逐海外。但他身在海外，心在中國，在知識與道德上承擔中國的苦難。知識分子手無寸鐵，造不了什麼反，但思想的滲透力却遠比槍桿子來得深遠。本書匯集了蘇教授近年來在思想領域的碩果。

本書既然名為《馬克思主義新論》，自然有別於舊論。所謂舊論，便是毛澤東在中國實行的專制左傾冒進「史達林主義」。而新論乃是企圖從馬克思本人的原始著作裏尋找豐富的精神資源，庶幾批判性地繼承，創造性地發展，為中國的民主改革引導到一條康莊的理論大道。

馬克思曾經否認他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尤其反對人家死抓住他的若干觀點片面地大作文章。但馬克思的理論原來就不是為學術而學術的，而在為革命實踐提供行動綱領。由於國情殊異，時代遞嬗，馬克思主義在全世界各地發展出各種風格與論述，無法定於一尊。這不僅不足為奇，根本也是無可避免的，難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常常在爭吵誰是「真的馬克思主義者」。

我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粗有涉獵，主要還是靠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文獻帶路。我想到阿爾土塞(Althusser)的論斷說，馬克思在年輕和晚年之間經歷了一場「知識論上的斷裂」，年輕馬克思深受黑



格爾哲學的薰陶，晚期的馬克思則以發展唯物辯證論的政治經濟學爲重心。果如是，則西方馬克思主義自德國法蘭克福學派以降，乃至義大利葛蘭西學派，以及法國的結構學派和英國的文化學派，其主流殆爲致力於「年輕馬克思的再發現」。他們站在西歐的邊緣格局，堅持馬克思的「激進人道主義」，強調上層建築的相對獨立性，一方面撻伐資本主義制度的不人道，一方面更嚴厲批判專制的「列寧—史達林主義」以及由之所引伸的現行庸俗社會主義。他們企圖在這兩條道路之外，另闢第三條充滿人道主義的蹊徑。

由於中國的歷史情境不能和西歐相提並論，蘇紹智教授的學術取徑也與西方馬克思主義迥然異趣。蘇教授在字裏行間十分推崇毛澤東在民主革命時期所提倡的「新民主主義」，也就是中國第一步先要反帝、反封建和反資本官僚主義，第二步才談得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而且中間要過渡數十年。想不到毛澤東掌權後異想天開，專斷獨行，把中國搞成一個史達林加秦始皇的制度，歷萬劫而不復。當今中國首要之急不在搞血腥的階級鬥爭，而在於從事和風細雨的經濟建設，努力提高生產力（下層建築），並且要落實民主生活（上層建築），使兩者齊頭並進。蘇教授基本上是從馬克思本人的政治經濟學出發，力圖廓清史達林主義這四十多年來在理論與實踐上帶給中國的遺毒。本書內所收的〈馬克思主義的再認識〉、〈資本主義的再認識〉和〈社會主義的再認識〉等三篇文章尤其擲地有聲，發人深省。其他各文對於馬克思主義亦皆有堅持，有發揮，有批判，莫不擊中要害。

本書的出版，正當大陸青年紛紛揮手告別馬克思主義之際，台灣青年則因受到資本主義情境的衝擊而對馬克思主義產生濃厚的興趣，說來未始不是一場歷史的諷刺。

蘇教授是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權威學者，我原無任何資格置喙。只因爲從中爲本書和台灣讀者接

緣，乃奉命略綴數語以助其興，固辭不獲，只好畫蛇添足一番。好在本書不會因而減色，何況蘇教授即將來明尼蘇達大學擔任希爾訪問教授，我借機聊表歡迎之忱，諒亦頗為恰當。

一九九二年二月廿六日

### 註釋

①見Ruān Ming, "Press Freedom and Neauthoritarianism: A Reflection on China's Democracy Movement," in Chuan Lee (ed), *Voices of China: The Interplay of Politics and Journalism*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90).

阮銘原任中共中央黨校理論部副主任，曾為胡耀邦撰寫許多重要文稿，一九八三年被開除黨籍。

# 自序

「思考、認識、再認識是令人痛苦的，但不要怕這樣做」

——米·謝·戈巴契夫

持續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國歷史上乃至世界歷史上的一種異常現象。它給中國人民帶來嚴重的災難。它幾乎把所有的中國人都捲入了這個漩渦，同時卻也使更多的人開始用自己的頭腦來思考問題。

在思考中，應該有一個認真剖析自己的科學態度。自己寫的文章，都擺在那裏。如果其中有賬，應該認賬，不能賴賬。賬是賴不掉的，無論在讀者面前還是在自己的心靈上，都賴不掉。剖開來清理一番，是對讀者負責，也是給自己今後的工作尋求新的起點，更好地為祖國的現代化事業增磚添瓦，避免重蹈覆轍。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由於被「揪出來」，靠邊站，沒有能夠寫什麼東西，看似無賬。但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寫的東西，對於推動「左」的思潮，宣揚個人迷信，究竟起了什麼作用呢？重讀那些曾被「革命小將」抄繳了去的舊作，再回想在大學講課的內容，不由得深感汗慚。那裏面簡直可以說很少表現知識份子的獨立人格，幾乎沒有獨立思想。那些作品往往是馬克思主義古典著作的引證和註解，黨的政策的詮釋或首長講話之類的闡述或發揮，不但未能擺脫個人崇拜和教條主

義的束縛，而且還促進了它，很難說是科學，沒有什麼保留價值。

我想舉一個例子，當然不是唯一的例子，但卻可以作為不應該忘記的教訓。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當我在上海「解放」雜誌社工作的時候，人民公社正在推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開始時，「隊」指的是生產大隊，我奉命寫一篇文章，闡明生產大隊作為基礎是符合生產關係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的。不久，上面又說「隊」是生產隊了。於是，我又奉命寫另一篇文章，闡明生產隊作為基礎是符合這條規律的，好像前一篇文章根本沒有寫過一般。這種唯上是從，以致觀點出現多次大轉彎，卻似乎一切都沒有發生。自己一貫正確的態度，是我國學術界的一種不良作風，浸淫至今，猶有存者。「六四」以後，更有甚焉。不過，也不能說我過去的文章都是奉命之作，而是和自己當時的「左」傾思想有關，一九五九年我會主動寫過一篇文章：「人民公社運動是創造性地運用生產關係適合生產力性質規律的範例」（載《解放日報》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四日）。文中大肆宣揚主觀能動性，政治掛帥，大搞群眾運動，毛澤東是創造性地運用生產關係適合生產力性質規律的大師，等等。實踐證明，無論是以大隊為基礎還是以生產隊為基礎，甚至連人民公社本身都是不符合生產關係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的，它們只能使得我國的農業生產一蹶不振，而我當時卻把它們闡述為「規律」。既是規律，便屬科學。但是，這種「科學」的解釋為什麼不能經受社會實踐的考驗！這種「科學」的生命為什麼那樣短暫！根本的原因是沒有把馬克思主義當作科學，沒有用科學的態度去對待它，反而把馬克思主義當作政策或某一首長講話的註腳。事實上是把科學當作了政治的婢女。就我個人來說，恰如巴金先生在「隨想錄」中所剖析的，是「跟著上級講，跟著大家講」。宜乎其結果是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的了。

我國學術界的某些狀況，包括我在內，都是和中國知識份子的缺點分不開的。當然，中國知識份子是有優點的，如思想敏捷，憂國憂民，安貧樂道，潔身自好等等。歷史上和在今天也不乏直道而行之士，高風亮節之人，然而等待着他們的往往是坎坷的歷程，甚至是棍子、帽子，乃至牢獄。但是他們的優點往往和缺點糾纏在一起。中國知識份子的缺點又是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主義思想影響和建國以來史達林主義思想的影響，特別是其文化專制主義的影響。中國知識份子的缺點，以總體上說，就是軟弱性，在良知（用現代說，就是追求與維護真理）與當官或唯上的矛盾中往往唯上是從，唯當官與保官是從，而泯滅良知，難以有真正獨立的人格和獨立的思想，更難以形成社會上獨立的階層，更不要說成爲社會上的主體力量之一了。

在舊社會，「學而優則仕」，知識份子往往以「仕」爲目的。有一位青年理論工作者告訴我，他用電子計算機統計「二十五史」中所提到的著名的知識份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當過官，儘管有的只是「七品芝麻官」，或者最後「不爲五斗米折腰」而退居林下。「士」（知識份子）和「大夫」（官）結了不解緣，形成「士大夫」階層。這個階層不是獨立的，而是人身依附於皇帝和政府的。

到了本世紀，封建王朝被推翻，但是沒有經過過資產階級民主的洗禮，沒有商品經濟的發展，沒有文藝復興、啓蒙運動那種「人的發現」和思想解放。五四運動雖然舉起了民主與科學的大旗，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但卻是個「未竟之業」。這是因爲，第一，不能期望當時的統治者會允許繼續推進和發展這個運動，對此不必多費筆墨。第二，原來期望中國共產黨會推進和發展這個運動，卻因爲在封建專制主義思想的殘餘尚未被肅清的時候，史達林主義及其體制又被接受和推行，在意識形態領域深受日丹諾夫主義（實即文化專制主義）的影響，加以中國共產黨在指導思想

上出現「左」傾錯誤。這種「左」的指導思想在知識份子政策上表現得特別嚴重，致使思想解放多方受到阻礙，在建國以後，知識份子又陷入新的「唯上」狀態。

對知識份子來說，在建國之初，已經在以思想改造運動為開端的政治洗禮中進行過多次以扣政治帽子告終的「學術大批判」，它們打掉了知識份子所僅有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其後一個運動接著一個運動，並伴之以顛倒是非，政治圍攻，無限上綱，不容答辯的「學術大批判」，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運動，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傾鬥爭，直到一九六五年開始的為期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在這些政治運動中，先是黨外的，然後是黨內的，最後是全體知識份子的精英被打倒。中國的知識份子歷經磨難，到「文化大革命」中，知識份子被貶低到「臭老九」的地位。在「全面專政」的口號下，知識份子也成為專政的對象，文化專制主義達到極端，理論界只聽到「梁效」、「羅思鼎」、「洪廣思」（按：均「四人幫」所操縱的寫作組的筆名）之流的聲音，戲劇界只剩下八個「樣板戲」。真是黃鐘毀棄，瓦釜雷鳴，在極度個人迷信的狂潮下，每一個人被要求成為「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的「一忠」字的工具。

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團被粉碎之後，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打破了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是又一次思想解放運動。廣大知識份子汲取過去的教訓，本身開始認真反思。有一部份知識份子開始拋棄了「唯上」、「當官」、「聽話」的束縛，敢於「致良知」，追求和維護真理，試圖建立獨立的人格和獨立的思想，成為思想解放的先驅，如黎澍、胡績偉、于光遠、王若水、李洪林、于浩成等較老的一輩，劉再復、李澤厚、嚴家其等中年一輩，還有大批青年一代，絕大多數知識份子都不願跟著權勢的指揮棒而轉了，出現了可喜的局面。

但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開展學術思想自由並不盡如人意，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不叫運動的運動，不叫學術大批判的學術大批判還是有的。其中大的兩次是「清除精神污染」（一九八三年）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一九八七年）。這實質上仍是理論界少數領導人以黨的化身和馬克思主義純潔性自封，主觀判斷是非，憑藉行政的強制和「謊報軍情」，把不同學術觀點乃至正確的觀點上綱為政治錯誤，對一些知識份子進行處分，妄圖滅天下人之口，實行輿論一律，不少正直的知識份子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所幸的是，現在的學術理論界和知識份子，絕大多數已經不再是「文化大革命」以前，唯上是從，聽話的馴服工具，更不是「文化大革命」中日夜原罪，任人宰割的奴隸。學術理論界和社會輿論決不在打棍子的人那一邊。手裏有真理的人不會打棍子，手裏有真理的人也不怕打棍子，一個俱有獨立人格和善於獨立思考，「臨到觸犯當權者時也不退縮」的新知識份子階層正在形成。雖然他們在「六四」之後遭到迫害，處境極為困難。新知識份子階層是中國改革和開放、民主化和現代化的重要力量。

對於我來說，也是通過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思，變「唯上」為獨立思考，信條是「只向真理低頭，不向權勢屈服」。對於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前途，對於祖國民主化和現代化的前途，「吾將上下而求索」，「雖九死其猶未悔」。當然，由於中國知識份子背負的軟弱性的歷史包袱過於沉重，要求一下子擺脫這個局限性是不現實的。但是，儘管如此，「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將近半個世紀以來，中國是在共產黨領導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國家。如何正確認識馬克思主義事關國家的興衰續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現實社會主義國家，包括中國所出現的一系列問題、危機和失敗，要求對馬克思主義進行再認識，而不是輕易的否定和拋棄。決不能再把馬克思

主義當作盲目信仰的教條，而要真正用科學的態度對待它。

但是，在現實社會主義國家，由於蘇聯式高度集中統一的政治模式和經濟模式的影響，一黨專政和文化專制主義的影響，特別是經過史達林的無以復加的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本來是促進思想解放的馬克思主義被變成僵死的教條和束縛人們思想的緊身衣，把最高領導人的言論和解釋視爲具有絕對權威的經典，學者們只能據此論證，不能獨立思考，思想束縛莫此爲甚。一九八七年蘇聯《哲學問題》雜誌主編B·C·謝苗諾夫在「哲學與生活」會議上的發言中，坦率地分析了蘇聯三十年代開始就影響蘇聯哲學發展，並決定其當今狀況和面貌的五種弊病：簡單化、專橫性、隨風倒、重條文和說教性。這五種弊病在我國「文化大革命」以前就早已存在，後來也未能排除其影響，到今天「六四」以後則變本加厲。

我通過「文化大革命」後對中國、對世界、以及對自己的思考，在研究民主化和改革的同時，研究和寫了若干對馬克思主義再認識的文章。這些文章在一九八八年思想比較自由的時候，已經付梓，因「六四」而作罷。我在「六四」以後來到美國，又寫了若干對馬克思主義再認識的文章，大多數文章曾在美國幾所大學和研討會上作過報告，明尼蘇達大學李金銓教授建議編輯出版，現在選出若干自認爲比較可讀的文章，因爲寫作的時間和背景不同，行文因之有異，讀者也不難從中看到我是如何在思想解放的道路上蹣跚前進，不時透露出舊的痕跡。

一九八八年年底在北京舉行的「紀念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十周年理論討論會」是中共中央在近年來舉辦的一次規模較大的理論討論會，我在會上的一個發言引起軒然大波，「六四」以後被列爲我的罪狀之一，因其具有歷史意義並希望讀者能知道我究竟講了什麼，講的是不是實情，所以選入本



書。另外，將《人民日報》以馬理銘爲筆名的一篇批判我的文章，以及爲澄清某些個別事實，我寫的一篇短文也作爲附錄；有比較才有鑒別，我相信讀者會從中得出正確的判斷，我相信：

真理必將戰勝強權

正義終於掃除邪惡

我這裏應感謝美國馬凱特大學民主與公共價值研究所給我提供研究的機會，感謝時報出版公司孟樊先生安排本書的出版，各種形式的批評和評論都將受到我的重視和感謝。

蘇紹智於美國馬凱特大學，一九九〇年歲尾



## 對馬克思主義的再認識

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都是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的。如何對待和認識馬克思主義，不能不對社會主義的發展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產生重大的影響。由於相當長的時期以來。大約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開始，馬克思主義被簡單化、僵硬化和教條化。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精神和創造活力受到破壞，從而不僅使社會主義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受到損失，而且使馬克思主義理論大大地落後於實踐，甚至無力向前發展，導致當代馬克思主義的危機。

在中國，由於「文化大革命」帶來的災難，人們對馬克思主義失去信仰，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威信掃地。「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要求人們用馬克思本人的觀點來對待和認識馬克思主義，要求人們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和基本方法，不斷結合變化著的實際，探索解決新問題，從而發展馬克思主義本身。實現這個要求當然要有個過程，要經過曲折，甚至失誤。但是，堅冰已經開始溶化，精神枷鎖已被打開。在中國馬克思主義正開始有復興之可能，不幸在一九八九年，北京發生對民主運動的軍事鎮壓，馬克思主義又陷入新的危機。目前，還未能進行總結，本文著重講北京軍事鎮壓以前的新認識。

## 一、「文化大革命」以後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認識的發展

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的再認識是以十一屆三中全會在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一九七八年五月）的基礎上，恢復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學風，即堅持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為契機的。

三中全會提出：

「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況新事物新問題，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繫實際的原則。」<sup>①</sup>

還提出：

「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按：「本本」是毛澤東喜歡用的俗話，即「書本」）出發，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sup>②</sup>

這就是公開號召把馬克思主義從被簡單化、僵硬化和教條化的錯誤傾向中解放出來。長期存在的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既已被打破，在改革和開放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一反過去把馬克思主義神聖化的傾向，越來越採取實事求是、按照馬克思主義本來面目來理解的科學態度。這種態度在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七日《人民日報》的一篇題為〈理論與實踐〉的重要文章中表

述得最爲大膽、鮮明、準確。文章寫道：

「馬克思逝世已經一〇一年了，他的著作是一百多年前寫的。有的是當時的設想，後來情況起了很大的變化。有的設想不一定妥當，很多情況，馬克思、恩格斯沒有經歷過，列寧也沒有經歷過，他們沒有接觸到，不能要求馬克思、列寧當時的著作解決我們當前所有的問題。」<sup>③</sup>

這就是說，不能從革命領導人的著作出發，馬克思主義者的著作不是萬應靈藥，不能企圖從他們的著作中尋求解決當代所有問題的現成的答案。

十二屆六中全會《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定》（一九八六年九月）又說：

「只有從實際出發，以實踐作爲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勇於突破那些已被實踐證明是不正確的或不適合變化了的情況的判斷和結論，而不是用僵化觀念來裁判生活，馬克思主義才能隨著生活前進並指導生活前進，這既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又是發展馬克思主義，兩者統一在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之中。離開實踐的觀點，發展的觀點，創造的觀點，就談不上堅持馬克思主義。」<sup>④</sup>

這一指導方針、明確地用實踐、發展和創造的觀點回答了那些以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純潔性」相標榜，片面強調堅持而實際上反對發展馬克思主義的人們。

一九八七年十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在肯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方針給中國的理論和實踐帶來一系列新發展的同時，再次強調“馬克思主義是在實踐中不斷發展的科學”<sup>⑤</sup>。趙紫陽在十三大報告中進一步指出：

「在這個結合（按：指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同各國實踐和時代發展的結合）過程中，必然要拋棄前人囿於歷史條件仍然帶有空想因素的個別論斷，必然要破除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式理解和附加到馬克思主義名義下的錯誤觀點，必然要根據新的實踐使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得到新的發展。」⑥

這就是說，要使馬克思主義得到新的發展必須立足於當代，對馬克思主義，包括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論著進行再思考、再認識、再評價。照此辦理，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必然會進到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可惜，從中共十三大開始不到兩年，中國發生北京的軍事鎮壓，在黨中央強硬路線的領導佔了上風，逐漸回到史達林主義的老路上去，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造成重大損失。

## 二、當代馬克思主義危機

當代馬克思主義是否存在著危機，在國際上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在現實社會主義各國，包括中國，過去一直是否認的。這種否認與對實際情況的判斷有關，也與對「危機」的理解有關。人們怕說危機，似乎一有危機，事情就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其實危機並不一定意味著「崩潰」，更常見、更確切的意義，是「到了轉折關頭」，或者如現在時興的用語：「處在十字路口」。

當代馬克思主義確實處在十字路口，存在著危機，特別在近二十年來是如此。這主要是因為有如下一些原因：

現實社會主義國家普遍地出現危機，以致馬克思主義在人民群眾乃至工人階級中失去吸引力，

社會主義作爲不同於資本主義的另外一種選擇的地位被嚴重削弱。

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經過革命，一系列社會主義國家脫穎而出，迅速彌合了戰爭創傷，以較高的速度，沒有周期性經濟危機地進行建設。那時，社會主義不但對世界工人階級有吸引力，而且在資本主義國家發生經濟危機時，也往往採取類似社會主義方向的措施，如國有化、社會福利、公共工程等等。到了二十世紀下半葉，特別是六十、七十年代以後，現實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雖然也取得一定成就，卻出現了一系列的內部矛盾和困難、曲折和失誤。這些國家普遍出現經濟增長速度下降乃至停滯，隱蔽或公開的通貨膨脹，人民生活水準降低，政治上缺乏民主，勞動缺乏動力。在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出現了嚴重矛盾以至衝突。馬克思主義者所一再宣揚的社會主義優越性不但沒有發揮，有些現實社會主義國家反而遭到重大挫折和嚴重混亂。對於所存在的問題，雖然幾經探索，迄今還在「摸著石頭過河」，未能找到新的有效的解決辦法。資本主義國家大約在七十年代中期繁榮告終，生產過剩和失業等問題又嚴重起來。西方國家上台的右派政權爲了解決這些問題，已不再像他們的前任那樣，採取傳統的社會主義方向的措施，而是採取私有化和放鬆政府管制的措施，結果取得了相當成效。

縱觀資本主義世界，馬克思所預期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已經不能容納生產力的情況，沒有能夠成爲現實。資本主義雖然矛盾重重，周期性的經濟危機難以避免，但是它的生產力發展的潛力還沒有耗盡，而且出現了新的科學技術革命，新的訊息社會將首先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到來。資本主義制度在階級鬥爭的壓力下，本身經歷著一定程度的改革、變化，使階級矛盾相對縮小和變形，工會組織和工人運動日益衰落。資本主義國家中革命的動力和前景十分不清楚。現代資本主義已經大大不

同於傳統的資本主義。而馬克思主義者的認識似乎還停留在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實際上其中一大部分已經過時。

當代馬克思主義落後於現代資本主義和現代社會主義的現實，已不能提出有充分說服力的理論說明和足以應付挑戰的戰略措施。它作為一種以革命的方式，改造世界的理論，已無力向前發展。

雖然，有些學者，如亞當·沙夫認為「目前經歷的危機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危機和社會主義理論的危機，而是不成功地、唯意志論地試圖實現這一理論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危機」。<sup>7</sup>

沙夫的意見就以下的意義上理解是對的，就是，馬克思主義作為研究的出發點和方法，作為一種批判的、唯物史觀的理論工具，按其本性來說，它將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本身不存在危機的可能性。現實的情況是當代馬克思主義已經被簡單化、僵硬化和教條化並被說成是無所不包的萬能的思想體系。因此，當代馬克思主義的某些觀點和信念已經在許多方面與現實發生矛盾，令人懷疑其是否有效。蘇聯前不久在一次社會科學和意識形態課（政治課）教師大會上，教師被譴責為把形成現制度當前諸種困惑的原因的教條的和不適當的陳詞濫調永久化。一位政治局成員說，在一次對大學生的調查中了解到政治課是令人討厭的，學生並不相信「科學共產主義」和類似課程的教條主義的公式。戈巴契夫說，很多社會，意識形態的課程的教學變得「幾乎令人討厭、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現在要「打破先前的舊框框」。<sup>8</sup>

毋寧說喬治·拉比卡和沃爾夫岡·弗里茨·豪格的觀點是正確的：「馬克思主義危機是馬克思主義存在的一種必要形式，是推動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不可缺少的東西。」<sup>9</sup>



### 三、當代馬克思主義危機的歷史教訓

馬克思主義就其本質而言是不會發生危機的，但是，事實上當代馬克思主義已經存在危機。歷史的教訓值得汲取。

大家都知道這樣一個故事：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在他寫的一本書中用了「馬克思主義」一詞。馬克思知道後說：「我所完全知道的是我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我們雖然不能把這句話理解為馬克思原則上反對把他的思想形成一個理論體系，但他確實沒有宣佈過他將拿出一套完整的世界觀。馬克思自己認為他的主要著作是，從革命的無產階級立場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和唯物史觀。也就是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演說中所說的馬克思的兩大發現：剩餘價值理論和唯物史觀。

馬克思主義逐漸成爲工人階級的意識形態，到成爲整個社會主義國家公民的意識形態是在馬克思逝世以後第二國際時代開始的<sup>⑩</sup>。普列漢諾夫在一八九四年首次提出“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完整的世界觀”，並用辯證唯物主義一詞去形容它。考茨基把馬克思的著作看作是一個包括自然和人類社會的完整的發展理論。恩格斯應德國社會民主黨之約撰寫的《反杜林論》（馬克思參加寫了一小部分）是向這個方向邁進了一步。一八七五年以後德國工人運動的發展，要求有一個明確的世界觀對工人進行教育，以排除資產階級和封建文化的影響。馬克思主義就被當作一個關於世界的無所不包的學說來教育工人並指導工人運動。馬克思主義以其科學性戰勝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學說，成爲工人運動的指導思想，並使國際工人運動出現了一個新面貌。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勝利，但也隱藏著一個使

馬克思主義絕對化、封閉化的危險。

問題就出在蘇聯社會主義革命的進程中，和在蘇聯操縱下的第三國際的發展進程中，馬克思主義本身不但被教條化，而且被錯誤地「附加」，並把這種「附加」當作馬克思主義的真諦而予以神聖化。

在列寧時期，馬克思主義被認為是一個無所不包的世界觀和政治理論。但在無產階級中不會自發地產生，要由新型的政黨共產黨從外面灌輸給無產階級。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的闡述和解釋就有了權威性。但是，在列寧的時代，除了無產階級專政這一大前提不能批評之外，其他有關國家權力、暴力、文化理論等還是可以真誠而坦率地進行討論的。

到了史達林時期，馬克思主義已被僵化為教條，並被史達林大量地、錯誤地附加。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名義下的史達林主義實際已經成為黨和國家的官方的統治的意識形態。

有三件事加速和深化了這種轉化。一是史達林按照自己的觀點給列寧主義下了定義，並強調列寧主義是新時期——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亦即，凡是與史達林所定義的列寧主義不一致的學說都是非馬克思主義，或反馬克思主義的。實際上，這就等於把史達林主義宣佈為絕對的、唯一的馬克思主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二是史達林通過對蘇聯哲學界機械論者和德波林學派的論戰加以仲裁來樹立黨（實際上是史達林個人）對理論問題的壟斷。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五日蘇共中央委員會在歷史上第一次通過一個純理論問題的決議<sup>①</sup>，譴責參與論戰的雙方，撤銷一些教授的職務，並制定了對知識界進行行政監督的新形式。三是一九三八年出版史達林審定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在這本書中明確地把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作為共產黨的世界觀，

並按照史達林的理解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一系列理論問題。這本書被稱為「馬克思主義百科全書」，成爲編寫一切教材的藍本，審查一切理論是非的標準。其影響之大，可想而知，以致今天蘇聯不得不宣佈取消歷史學的考試，因爲教科書中充滿了「謊言」<sup>⑫</sup>。其影響所及，當然也包括世界共產主義運動。

通過這三件事，當然還有其他次要的，在蘇聯就形成了摩西·萊文所說的「權力（黨和國家）——意識形態——文化的三位一體」<sup>⑬</sup>。權力干預科學最出名的例子是李森科所主持的米丘林討論會，在史達林親自干預下，把遺傳學定爲資產階級僞科學。日丹諾夫則全面攻擊蘇聯文化生活中任何真假的自由化傾向。史達林成爲一切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最後仲裁者，什麼人和事也逃不出他的睿見。

其結果是蘇聯的自然科學和科學技術大大落後於西方，社會科學除極少數例外，拿不出任何重大的成果。馬克思主義被歪曲爲史達林主義，陷於僵化和停滯。S·斯托揚諾維奇說，史達林主義把馬克思主義「歪曲到難以辨認的程度」<sup>⑭</sup>。蘇聯《真理報》一九八八年四月五日社論呼籲「我們應該盡快地恢復列寧主義的社會主義的原理，消除其附加物和變形」。「變形」當然指的是史達林主義。

赫魯曉夫時期，取消了黨和國家對自然科學和科學技術的干預，但在社會科學、人文科學、文學、藝術領域仍未取消，而且他的「解凍」和「非史達林化」，不久即被中止，出現了勃列日涅夫時期的停滯現象，形成了一種像戈巴契夫所說的「阻塞社會經濟發展的機制」<sup>⑮</sup>。戈巴契夫對此有生动的描述：「阻塞機制同樣也在意識形態方面造成了後果：對業已成熟的問題做建設性分析的嘗試

以及新的思想遇到了越來越大的阻力。占上風的是一味宣傳成就。不管成就是真是假。對普通勞動者和輿論界的正當要求和意見習以為常地採取輕視態度。在社會科學中經院式的空頭理論盛行。創造性的思想被逐出社會科學門外，膚淺的、唯意志論的評價和論斷成了真理，對之只能解釋，不容爭辯。思想的發展、創造性的生活離不開科學、理論等問題的討論，然而，這些討論都徒有虛名，消極傾向沒有放過文化、藝術、政論，甚至也沒有放過教育和醫學，在這方面也暴露出平庸習氣、形式主義、無用的空話。」<sup>16</sup> 戈巴契夫的結論是：「不抱成見的實事求是的態度使我們提出一個確定的不移的結論：國家已經處在瀕臨危機的狀態。」<sup>17</sup> 「必須進行根本的改變和改造。」<sup>18</sup>

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領導下，在民主革命時期成功地對主要在本世紀二十年代後期和三十年代初期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和我們黨內盛行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錯誤傾向進行鬥爭，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創造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並把革命引向勝利。在史達林主義籠罩著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並使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陷於停滯和僵化的三十年代，在東方中國卻獨樹一幟，使馬克思主義在反對教條主義和倡導實事求是聲中得到了發展。

但是在一九五七年以後，由於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於求成，脫離了中國的實際，也脫離了馬克思主義，犯了左傾錯誤。這種左傾錯誤，由於毛澤東的個人專斷和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現象的發展，未能得到糾正，終於導致「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的錯誤思想繼續發展，在「權力——意識形態——文化三位一體」的架構中，毛澤東的許多錯誤的附加被說成是馬克思主義的真諦。在當時所謂「毛澤東思想是當代最高、最活的馬克思主義」

的喧囂聲中，一切不同於毛澤東的思想的理論、學說、觀點、提法都被宣佈為「修正主義」。在那時的中國，馬克思主義也陷入了危機。

#### 四、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性、多元性和開放性

要正確認識馬克思主義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當然首先要強調它的實踐性。但是，這方面的問題，我們已經討論得很多了，這裏我想著重談談往往被忽略的方面。

南斯拉夫理論家格爾里奇可夫認為現在我們對社會主義的理論的、政治的、思想的分析水平遠低於馬克思主義對資產階級社會的理論和批判的洞察力。<sup>①</sup>

出現這一事實不是偶然的。一般說來，在現實社會主義國家間一旦出現「權力（黨和國家）——意識形態——文化三位一體」，馬克思主義成為統治的意識形態，不加注意，就易於產生兩種情況。馬克思主義由於受到權力的支持，本身就處於一種「官學」的特殊優越地位，不必依靠科學性、真理性、邏輯性去說服不同意見，也不必努力研究新情況、新問題，滿足於教科書中的一套陳詞濫調，因而本身自然會逐漸削弱、以至喪失活力、洞察力和批判力，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作為「官學」，就要遵從權力的要求，為權力服務；而所謂服務就是進行辯護，殊不知提出批評建議是更大的服務。此即封建社會裏還要設諫官的道理。對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完全拋棄了批判精神，習慣於自我宣傳，陶醉於「偉大、光榮、正確」、「戰無不勝」、「無比優越性」這一類偉大的空話，聽不得也聽不進不同意見。一旦出現不同意見或批評意見就認為大事不好，馬上予以反擊。結果使自己陷

於閉目塞聽，夜郎自大的狀態。事實上，任何事物總是存在著矛盾的，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也不能例外。不及時研究和正確處理這些矛盾，矛盾積累起來會出現危機，理論本身也因僵化而陷於危機。

我們要重新賦與馬克思主義以批判精神，批判性地研究以下一些主要問題。

——要對社會主義過去和現在的實踐、對現實社會主義社會的社會制度進行批判性的研究，特別是對那些所謂「禁區」，吸取經驗教訓，以了解今天社會主義的發展程度和將來的方向。

——要對現實社會主義國家和西方國家流行的關於現代社會主義的理論概念進行徹底的批判性研究和評價。也就是說，對社會主義的再認識，最後應產生一種新的、符合實際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理論。

——關於社會主義各種問題的討論，無一不觸及當代資本主義的某些方面。要從世界歷史的角度，從理論觀點批判地研究當代資本主義的新現象。要對社會主義國家和西方國家流行的關於現代資本主義的理論進行徹底的批判性研究，也就是對資本主義進行再認識。

——重新評價社會主義的概念、內容、目的和實質，重新評價社會主義國家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戰略。

——我們過去強調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性往往指的是敵對陣營或我們自己陣營裏的錯誤思想，而忽略了對馬克思主義本身也要進行自我批判性的審查，非此不足以革新和發展。首先我們應考慮馬克思主義本身作為一種批判的、唯物史觀的理論工具，作為研究的出發點和科學方法應不應該再被看作國家的統治的意識形態？要像克羅齊 (Benedetto Croce) 分析黑格爾的理論時，指出有哪些仍

然「活著」，有哪些已經「死去」，那樣批判地分析馬克思主義著作，包括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觀點，必須拋棄那些被實踐證明是站不住腳的觀點，修改闡述不正確的觀點，發揮處於萌芽的思想，補充以新的科學成果<sup>②</sup>，也就是對馬克思主義進行再認識。

恢復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性是擺脫危機和向前發展的一個要點。

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另一個要點是要承認馬克思主義的多元性。在今天承認馬克思主義的多元性，不僅是理論的反映，而且也是具體實踐和對待這種實踐的態度反映。

世界本來是多元的，但是，在史達林處於絕對權威的時代，只有他解釋和闡發的馬克思主義才是唯一的馬克思主義，只有蘇聯的模式才是社會主義的唯一模式。

二十世紀下半葉，世界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已不同於史達林時代的欽定的單一的模式。既然世界上有許多國家和民族，他們有不同的國情，有各種各樣的文化，社會主義就應該是多種多樣的。客觀上，現在已經存在著多種多樣的不同的社會主義模式。社會主義的多種模式論已經取代了單一模式論。對於建立各種不同社會模式的指導思想當然也會各具特點，有所不同。例如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模式不同於南斯拉夫的自治社會主義模式，作為各國建立社會主義模式的馬克思主義的具體論述當然也就有所不同。

在當前世界多變而複雜的形勢下，比如新的科學技術革命的挑戰，從理論上研究這些複雜的現實，尋求最優的答案，從而存在著不同的看法是自然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沒有經過歷史的考驗，輕易肯定一個，否定其他，是不科學的，也是危險的。

馬克思本人的思想是博大精深的，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經過後人附加、詮釋，馬克思主義本

身變得極其複雜。就革命領導人所闡述的馬克思主義來說，馬克思的馬克思主義就不同於史達林的馬克思主義，也不同於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因此，對於如何認識馬克思主義、如何解釋馬克思主義、如何應用馬克思主義並應用到什麼程度、如何按馬克思主義的教導去解決實踐問題並尋求階級和人類解放的道路，……等等，必然存在著分歧、不同的看法、以及各種不同的馬克思主義傾向。沒有人有權壟斷馬克思的全部思想，也沒有人有權裁決誰是或誰不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陣營內部出現各種流派，實行「百家爭鳴」，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必要條件。個人崇拜、個人專斷，使我們吃盡了苦頭，也使馬克思主義陷於停滯和危機。馬克思主義的多元化是好事，要敢於承認馬克思主義的多元性。

當然，這裏也有一個問題，就是對各種馬克思主義的傾向和解釋，並不都是馬克思主義的，如何從理論上和方法論上判斷馬克思主義的標準？英國著名馬克思主義者霍布斯鮑姆的論點是可取的，他認為：「這種標準必須是十九世紀末葉形成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其原則的核心是唯物史觀，而不是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學說。」<sup>①</sup>

既然承認馬克思主義的多元性，理所當然也要承認馬克思主義的開放性，開放性本來是馬克思主義所固有的。馬克思本人就是汲取了人類文化的一切優良成果而發展其學說的。今天提出開放性有其特別重要的意義，因為相當長的時期以來，在現實社會主義國家中深受思想禁錮、政治干預的學術專制主義的影響，造成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文學、藝術的停滯不前。

開放，就要反對思想上的偏見、宗派主義、日丹諾夫主義、學術專利主義，打破學術禁區。開放，就要按照當今多元馬克思主義傾向和多元社會主義理論的現實進行廣泛的國內國際學術



的、理論的交流。允許並鼓勵不同意見的學術、理論的討論將促進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實踐的發展。

開放，就要允許非馬克思主義的、資產階級的學術理論的輸入和討論，以吸收其合理的成分並在批判中提高我們的水平和洞察力。

在強調實踐性的同時，強調批判性、多樣性和開放性必將使馬克思主義進入一個新階段。

一九八八年八月

## 註釋

- ①②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人民日報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第一三頁。
- ③ 〈理論與實踐〉，《人民日報》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七日。
- ④ 《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定》，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九月，第二〇頁。
- ⑤ 趙紫陽：《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一月，第五七頁。
- ⑥ 趙紫陽：《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一月，第五八頁。
- ⑦ 波蘭《政治月刊》介紹沙夫新著《當代社會主義的前景》，一九八八年三月十九日。
- ⑧ 參見：Moshe Lewin, "The Gorbachev phenomenon", Radius, 一九八八第一一五—一一六頁。
- ⑨ 米洛斯·尼克里奇：〈「社會主義在世界上」圓桌會議的十年〉〔南〕《社會主義在世界上》總第五二期（一九八六年）。

- ⑩參閱：Tom Bottomore 等主編，《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馬克思主義思想詞典》，一九八二年。Blackwall，「Marxism, development of」詞條，第三〇九—三一二頁。
- ⑪參閱：Tom Batmore 等主編《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馬克思主義思想詞典》）「Soviet Marxism」  
「蘇維埃馬克思主義」詞條，第四五四—四五七頁。
- ⑫ David Rennick, "Russian Cancel History Exams Because of 'Lies' In Textbooks," *The Washington post*, (1988). *The Guardian Weekly*, Vol. 138, No.25 Week ending, June 19, 1988, P. 17.
- ⑬ Moshe Lewin, "The Gorbachev Phenomenon (1988), *Radius*, London," P.113。
- ⑭ S·斯托揚諾維奇：〈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布爾什維克化〉（英）《國際實踐》一九八七年第一期，第四五〇、四六一頁。
- ⑮ 米·謝·戈巴契夫：《改革與新思維》，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第九頁。
- ⑯ 同上，第一一〇—一二頁。
- ⑰ 米·謝·戈巴契夫：《改革與新思維》，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第一三頁。
- ⑱ 同上，第一三頁。
- ⑲ 參閱：A·格爾里奇可夫：〈早期社會主義社會：問題和展望〉，〈在二十一世紀前夕的社會主義〉，一九八五年，Verso 出版社，第八九頁。
- ⑳ 參閱蘇紹智：〈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一期。
- ㉑ 參閱米洛斯·尼克里奇「〔社會主義在世界上〕國際圓桌會議的十年」（南）《社會主義在世界上》總第五二期（一九八六年）。

## 對資本主義的再認識

### 今日討論的焦點之一

對資本主義的再認識成爲中國今日理論界討論的一個焦點，這是因爲：

——現代資本主義與傳統資本主義相比，出現許多新現象、新特點、新問題。過去對資本主義的分析曾有重大貢獻的馬克思主義已不能對此提出有充分說服力的理論說明和足以應付挑戰的戰略措施。我們迫切需要對現代資本主義的新情況進行研究和分析，在現代條件下修正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認識。

——社會主義是從資本主義母胎中產生出來的，本來就不可能與其母胎徹底決裂。而現實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是中國，並不是像馬克思和列寧所說的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的「後資本主義社會」，而是從封建、半封建性質的社會經過暴力革命建立的。這些現實社會主義國家，從發展階段來說，在很多方面，還與資本主義國家，甚至早期資本主義（恩格斯稱之爲「資本主義剝削的青年時期」）有類似之處。不了解資本主義，就不能了解現實社會主義和後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

——在今天的世界上，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已不是像史達林所設想的是兩個互相對立的集團，有兩個平行的世界市場，因而只是「誰戰勝誰」的簡單關係。在今天世界人民普遍要求和平，

特別是由於科學技術革命的發展，訊息社會的必將到來，世界統一市場之發展和跨國公司之相互滲透，二者必將處於長期的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的關係。現在「冷戰」已經結束，雙方要從對方汲取先進經驗、科學技術、管理方法乃至某些典章制度，同時避免重複對方的弊病和失誤，這對社會主義國家尤為重要，社會主義國家要應付各方面挑戰，也必須了解資本主義。

### 對資本主義再認識的方法論

要正確再認識資本主義，必須有正確的方法論。以下幾點是值得注意的。

——要正確地運用唯物史觀的方法，以批判史達林關於社會主義從空地上建立起來的說法。這種說法並不符合馬克思主義。馬克思說：「社會主義」不是在它自身基礎上已經發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在各個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sup>②</sup>，史達林的論點是把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完全割裂開來，忽略共同點和繼承關係，是歷史虛無主義的表現。

至於談到馬克思所說的「舊社會的痕跡」，我們過去往往只把它看作是像「資產階級權利」那樣的政治上、思想上的舊社會殘餘，似乎除此之外，社會主義從資本主義脫胎出來以後就一點共同之處也沒有了，這樣，不利於我們正確認識社會主義社會。

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至少有這些共同之處：都是商品經濟，都需要統一的市場，價值規律要起一定的調節作用；都是工業技術發展的產物的社會化的大生產為前提，大生產需要有計畫的管理；

生產社會性的發展，要求一定的社會化措施，鐵路、郵政的國營，社會保險和集體福利產業的發展……等等。雖然本質和具體表現有所不同，這些共同之處不能忽略。

——要有世界的眼光和運用總體的，亦即多學科的分析法。現代資本主義由於生產力的巨大發展，社會化程度已經超過政治國界帶有跨國的性質和統一世界市場的廣泛發展，加以各種複雜因素之交織，研究現代資本主義不能只立足於一個國家，而應該有個整體的跨國的世界眼光，並應求取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文化的、總體的、多學科的分析。

——馬克思主義者過去往往把實際上是現代化的後果歸之於資本主義制度本身<sup>③</sup>。實際上，只要是現代化，這些問題無論是在資本主義社會或社會主義社會都會發生，如環境污染、大城市化、傳統之瓦解、道德危機等，社會主義國家往往相信自身之「免疫」作用，不予重視，遂導致嚴重的後果。

——馬克思主義者過去往往把自由、平等、博愛、人權等觀念看作是資產階級所專有。實際上，這些觀念，在歷史上，是新興資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在反對封建制度的鬥爭中共同提出來的，是人類精神的一次大解放，社會主義社會不是拋棄這些概念，而是更好地促其實現，恩格斯曾說，「難道我們要求別人給自己言論自由，僅僅爲了在我們自己的隊伍中又消滅言論自由嗎？」這裏，恩格斯所說的言論自由難道不可以理解爲民主、人權和其他自由嗎？不僅對於資產階級民主，對於資產階級文化也不應該隨意否定，因爲其中人類文化的成果，都應該認真地以科學的態度加以研究，對於其中的優秀成果，也應批判地繼承。

——馬克思主義對於資本主義社會所做出的理論的、政治的、思想的分析和批判的洞察力仍然

具有很大的現實意義。當然，應根據新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從今天的實際出發，加以發展。比如，階級分析法，馬克思正確地指出在他生活的那個早期資本主義時代，兩大對抗的階級是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在封建社會末期，兩大對抗的階級是封建貴族和資產階級。階級分析法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仍然適用，但應根據實際情況，更細緻地分析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所存在的各階級和各階層，各階級和各階層的複雜關係使階級鬥爭具有新的形式。又如，矛盾分析法，馬克思會正確地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矛盾分析法對於現代資本主義也是適用的，但應汲取系統理論的成果，除大系統外還要注意到子（或副）系統，因為歷史上任何重大的事件都很難說是由於單一的因素引起的。

### 新產業革命和生產力的巨大發展

資本主義的歷史就是產業革命的歷史，它導致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工業資本主義已經創造了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生產力，沒有其他任何存在過的社會制度能夠與之相比。由於新能源、新材料、矽晶片、微電腦、雷射光、航空工程、生物工程、海洋工程等新科學技術的出現，新產業革命正在迅速發展，其所創造的生產力將迅速地、大大地超過歷史上所有的生產力。無可否認，新的產業革命已首先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發生，而且方興未艾。

新產業革命帶來的生產力巨大發展不能不對現代資本主義產生巨大的影響：

——生產社會化程度跨越了政治國界，出現了巨大的、強有力的跨國公司和地域性的共同體，

使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性達到了新的階段。

——新的產業革命使資本主義產業結構發生變化，從事教科文和公共服務的第三產業，取代從事農牧礦業和產品製造業的第一、第二產業而成的整個經濟最大的部門，在迅速發展的第三產業中，又以「訊息產業」、「智力產業」占居主導地位。

——使資本主義的勞動力結構發生變化，專業、科技人員取代體力勞動者成為勞動力的主導部分。從事智力勞動和管理工作的人數在美國已經超過體力勞動者，即使體力勞動者本身，在勞動時的智力支出的比重也在不斷增大。

——使資源結構發生變化，訊息取代原料、燃料等自然物資和人類的簡單勞動而成為社會財富增長的主要資源，知識的生產力成為決定生產力、競爭力、經濟成就的關鍵因素。

——社會中軸發生變化，對於組織決策和指導變革具有決定性意義的理論知識取代具體領域內的經驗成規而處於中心地位，社會圍繞著科學理論知識組織起來以達到管理社會、指導革新的目的；科學的組織問題成為社會的首要問題，一個國家的科學能力成為它的潛力和力量的決定性因素④。

——新的科學技術革命帶來不少新的產業和新的產品，在生產不斷擴大的同時，也擴大了投資機會和消費市場。同時由於新科學技術需要大量投資，往往不是單個企業所能承擔，需要政府的組織和援助，如日本政府之對第五代計算機，從而加強了國家的干預。儘管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利潤率下降趨勢的規律並沒有起作用，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曾出現過類似的情況之外，這些因素緩和了周期性經濟危機，並削弱了危機的破壞作用，雖然不能消除資本主義基礎矛盾所導致的周期性經濟危機。

——新的科學技術革命一方面產生了新的產業，另一方面使大煙囪工業變為「夕陽工業」；一方面使新的工業區崛起，另一方面使老工業區衰落；產生結構性和地區性的失業。對於這種結構性的失業，資產階級學者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是樂觀派，認為這種現象是暫時的，因為新科學技術將創造出新的行業和新的就業，經過一定的時期自會解決。另一種是悲觀派，即結構性失業將會長期存在。亞當·沙夫則從這個問題中看到社會變革的必然性。他認為根本的問題在於新科技革命使必要勞動時間縮短，閒暇時間大量增加，在以追求剩餘價值為目的的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家不願縮短勞動時間，致使失業增加，當這個矛盾日益尖銳化的情況下，只有改變以追求剩餘價值為目的的制度，才能解決，因而將出現新的社會。

——沒有社會監督的技術無限發展將導致對自然環境的破壞和對人類的威脅，如巴西東北部熱帶雨林的大量砍伐，北海油田造成的環境污染，北美、西歐工業造成之酸雨，非再生資源之大量浪費，核彈、氫彈、中子彈的發展，這一切不僅損害今後發展的基礎，影響人民生活的質量，甚至對世界和平乃至人類的生存造成威脅。

——新技術革命首先發生在工業發達國家。並將加速發展。而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其中比較落後的發展中國家，由於它們的科技水準較低，又缺乏資金，起步較晚，甚至難以起步，使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有增大的可能性，以及對發達國家的技術、資金等依賴有增加的可能，這已經使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危機和南北矛盾有加深之可能，而並沒有減緩的跡象。

新科學技術革命及其所帶來的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和對社會的巨大影響是認識現代資本主義的關鍵，證明馬克思主義關於生產力的決定作用的理論是正確的。



它還表明了現代資本主義仍然具有生命力。馬克思在早期資本主義階段所論證的：「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sup>⑤</sup>列寧在《帝國主義論》一書中所論證的，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sup>⑥</sup>被證僞，也就是不再有效。但是卻證明了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的基本論點的有效性，馬克思說，「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胞胎裏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sup>⑦</sup>

與此同時，現代資本主義的矛盾並沒有消失，但出現了新的形式，如經濟周期，階級鬥爭，壟斷和競爭等，在某些方面仍有尖銳化的趨勢，如人與自然的矛盾、南北矛盾、道德危機等，這些矛盾的發展終於必將導致新社會的到來。雖然，這個變革將是長期的和漸進的。

### 社會結構之複雜化與中產階層之發展

馬克思曾預言，資本主義的競爭和生產資本的集聚和集中，將使一小撮巨型公司取代中小型企业，社會結構將出現愈來愈簡單化的趨勢，即剩下利益截然相反的兩個不同的社會階段，即數目日益減少的資本家大亨和占壓倒多數的、處於附屬地位和受剝削的僱傭勞動者，這就是「社會兩極化」(social polarization)的理論。

實際情況如何呢！

曼德爾(Ernest Mandel)認為，「實證充分說明馬克思的預言的正確性，在主要工業化的資本

主義國家中，有勞動能力的人口出賃勞動力的人的份額在前一個三十年中從不到五〇%或大約五〇%增加到七·五%，在近三十年中，又增加到八五%（九〇%），在美國、英國和瑞典則已經達到九〇%，沒有現象說明這個趨勢已被逆轉，雖然，一旦跨過了某一階段，其增加速度逐漸緩慢下來」<sup>⑧</sup>。他還列表說明，美國在一八八〇年工資收入者（包括公職人員）占全國勞動力的六十三·一%，其中領導層的經理和高級公務員占一·一%，自我僱傭者（self-employed）占二十·九%，在一九六九年則分別占九〇·八%、七·二%和九·二%。<sup>⑨</sup>

實際上，儘管集聚和集中的過程十分迅速，但是獨立的經濟實體並沒有減少，中小企業的數目，像大企業的數目一樣在繼續增加；同時，工資收入者，從另一角度講也就是被僱傭者或出賃勞動力的，本身也在分化，成份很複雜，國民經濟和社會結構的多樣性和複雜性並沒有由於經濟的集中而消失，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結構，也就是階層劃分問題（stratification）仍然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自我僱傭者（即嚴格意義上的個人勞動者）確實在減少，他們是原來意義的中產階級。

中小企業繼續存在，這些企業主也是原來意義的中產階級。

工資收入者成份很複雜，首先當然是工人，即體力勞動者，西方稱作「藍領階級」。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不再成爲人口中的多數。一九八八年在聯邦德國第一部類（包括農、林、漁業）占就業人口的五·一%，第二部類（礦業、加工業）占四十·五%，第三部類（商業、交通、服務，包括軍人）占五四·四%<sup>⑩</sup>。而且他們的本身也分化爲不同階層，如技術工人、非技術工人、粗工等，

其中某些高級技術工人的收入水準，生活水準，社會地位已經達到中產階級的水準。

其次是腦力勞動者（包括公職人員和科教文領域，服務行業等第三產業的勞動者），西方稱「白領工人」，他們的收入，有些人如辦公室工作人員不一定高過技術工人，但總括來說，收入水準、生活水準和社會地位已經不同於工人，可稱「新中產階級」，當然，他們的本身也還在分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方的中產階級的性質有很大的變化。簡言之，從前只有一個包括上層和低層的中產階級，現在有兩個中產階級，一個是舊的中產階級，指以商業、秘書、會計等物質產品或服務的生產和分配為生的人；一個是新中產階級，指從事於非物質的知識即「知識工業」（knowledge industry）的生產和分配的人。西方學者有稱之為「知識階級」（knowledge class）的①。由於「知識階級」代表了新的生產力，對資本主義的弊病認之深、思之切，所以他們是資本主義的主要批評者和反對者。

根據聯邦德國一九八七年的統計②，在全國勞動人口中：

獨立生產者	占九·四%	——原來意義的中產階級
輔助家內勞動者	占三·二%	
公職人員（包括軍人）	占九·三%	
被僱傭者	占三九·三%	} 新中產階級
工人	占三八·八%	
		占58%

從上表可以看到工人占勞動人口的三八·八%，已不是多數（這裏不能看出來其中有多少高級技術工人實際上已併入中產階級的範疇）。被僱傭者主要指「白領工人」。原來意義的中產階級（獨立生產者）加上「新中產階級」（公職人員加白領工人）占百分之五十八，已經成爲勞動人口的多數。

中產階級的發展是由於：一、科學技術發展，勞動人口中越來越少的份額用於物質生產，特別是體力勞動；二、「知識工業」的發展要求更多的人從事於知識的生產和分配；三、企業和公共管理機關的擴大。

對具體情況進行具體分析的結果，說明資本主義社會兩級化的理論已被證僞。研究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必須深入研究資本主義之分層和新的社會結構。

### 勞動者生活的改善與失業

恩格斯所著《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八四五年）一書如實地描述了大約一七五〇—一八二〇年間英國工業化初期工人階級的勞動重負、生活痛苦和悲慘命運。馬克思從這個實際出發提出了工人階級貧困化，兩級分化，階級鬥爭尖銳化，工人階級是資本主義掘墓人等重要理論，直到提出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的理論。

隨著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工業化的逐步完成，情況有所變化。恩格斯在一八九二年爲《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所寫的德文第二版序言中已經承認「這本書裏所描寫的情況，至少就英國而言，現在在很多方面都已成爲過去」<sup>⑬</sup>。進入二十世紀之後，幾乎所有發達國家各個階層的物質生活都有所

改善（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特別是一九二九—一九三八年的大危機時有所下降），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則普遍提高，資本主義的發展並沒有使工人階級的生活條件繼續惡化。雖然工人的收入同生產資料所有者之間的距離在擴大，但是工人階級的實際收入明顯地在不斷增加。若干發達國家每小時實際勞動報酬的平均增長率<sup>⑭</sup>，如下表所示：

	美國	日本	聯邦德國	法國	英國	意大利
一九七〇—一九七五年	1.4	7.7	5.6	6.4	5.6	9.4
一九七五—一九八〇年	0.3	0.8	4.2	3.1	2.3	0.8
一九八〇—一九八五年	0.3	1.4	1.6	2.4	1.8	1.8

勞動者是否貧困化？如果用勞動者每單位時間的收入所能購買的消費數量來表現更爲明顯。此外，還要考慮到預期壽命、居住條件、福利事業、義務教育等因素。

這裏，我將介紹一個概念，即庫茲涅茲曲線（Kuznets curve）<sup>⑮</sup>，雖然對其有效性爭論不少。庫茲涅茲曲線用圖解表現出來似一個倒u形，是西蒙·庫茲涅茲在一九五五年提出的。該曲線是描述經濟增長和所得和分配的平等之間的關係。即現代經濟隨時間而繼續增長時，開始是不平等的激增，後來，則逐漸地持平和下降。從歷史發展和各國實際來看，此學說已被證實。在所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中，工業革命伴之以劇烈的和長期的不平等的增長，雖然各國間的程度和時間不同，但可以看到這一趨勢。到十九世紀末期，在所有已工業化或正在工業化國家中存在著高度的不平等，在英國最高，在這些國家中大多數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不平等達到高峰。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和五十年

代之間，在所有這些國家中，出現了顯著的持平趨勢，雖然程度和時間也有所不同。五十年代以來，情況大致穩定，即不平等在兩個方面都沒有大的變化。

在現代資本主義勞動者的生活狀況有所改善，固然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結果，但也不能忽略工人的階級鬥爭和工會的對於勞動者生活改善的作用。

因此，隨著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不論物質福利或物質平等均有所改善。馬克思的觀點：「不管工人的報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狀況必然隨資本的積累而日趨惡化。」<sup>⑩</sup>在資本主義的早期階段是正確的，而在現代資本主義則被證偽。

在我們注意到發達國家勞動者生活有所改善的同時，必須同時注意到失業的新特點，從長期看，現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正經歷著繁榮時期，雖然其間有過較小的經濟衰退和企業破產，失業問題仍相當嚴重，以失業率屬於中等水平的聯邦德國來看，一九八二年以來，失業人數總在二百幾十萬人左右，失業率在百分之九左右，由於科學技術革命，結構性失業固然是個原因，但也要看到資本家仍然要利用失業的存在以壓低在業工人的工資。

失業工人雖然有失業保險，生活仍相當艱苦。一九八七年在聯邦德國，官方登記的失業人數達二百五十萬人，大約還有一百萬人沒有登記，未登記的失業者當然拿不到失業的補助，在官方登記的二百五十萬人中只有三分之一得到全額失業補助。領失業補助有一定的時間限制，時間一過，不得再領，只能向地方申請社會福利金，金額遠較失業補助為少，而且要償還。

還有一部分失業工人淪為永久失業者，失業永久化是一個新現象。工人中一部分成為有職業者，一部分成為沒職業者，出現了有職業者 and 沒職業者之間的矛盾，英文有個新概念，叫做有職業者反

對無職業者(owners of jobs against the jobless)造成了工人階級中的分裂，使工人運動大大削弱。

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總括來說，勞動者的收入是增加的，全國人口中大約有百分之五十到六十能享受較高的收入並且能夠購買現代資本主義生產的主要產品，如電視機、錄影機、音響設備、電冰箱、冷氣機等。餘下的百分之四十到五十的人提供廉價勞動力。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則少於十分之一的人口有較高的收入和享受，而十分之九的人口提供廉價勞動力，這種情況使現代資本主義國家得以擴大市場和不減少利潤。這也是周期性危機得以緩和的原因。

工人階級生活條件的改善，加上上面所述工人人數已不佔人口的多數和工人階級本身的分化，階級鬥爭趨向緩和，工人運動已經不再成爲主要的社會運動。馬克思主義關於工人階級是資本主義的掘墓人的理論也被證僞。

### 股票分散化與壟斷繼續加強之矛盾

恩格斯一八九五年在《資本論》第三卷增補》中已經注意到「工業就逐漸變成了股份企業，一個部門接著一個部門遭到這種命運」<sup>17</sup>。到了現代資本主義，股份公司更有巨大的發展，企業股份化是現代資本主義的一個特點。一九六〇—一九八〇年美國股份公司的數量增加百分之一百四十，銷售額增加百分之六百五十，淨收入增加百分之四百四十；同時，獨資和合夥企業只相應地各增加百分之四十、四、百分之二百二十和百分之一百二十<sup>18</sup>，可見企業股份化增長之速，一九八〇

年美國企業有股份公司二百七十一萬家，占企業總數量百分之十六，但銷售額比重占百分之八十八。九淨收入比重占百分之七十九。①。可見股份公司的實力，它在數量上雖只占百分之十六，但其銷售額和淨收入均占主導地位。

企業的股份化使企業的財產權和有效的管理權分開，一方面使資本家脫離了生產，成爲靠股票紅利的收入者，另一方面使企業經理對經濟的決策權起決定作用。經理成爲真正的企業家，出現了新興的企業家階層，現在集聚和集中的已不是資本財產，而是管理的專門技術集中了的經理權成爲現代資本主義的眞正支配權，故有的學者稱之爲「管理的革命」。在企業的股份化日益增長的同時，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又出現了股票分散化的情況，英國保守黨上任以後所實行的私有化改革大大促進了股票的分散化。英國政府限制任何個人或集團購買私有制企業的股票，鼓勵本企業的職工購買股票。股票往往只售給小額買者，限制大額買者，使股票持有人由一九七九年的三百萬人增加到現在的九百萬人，佔人口總額的百分之二十，僅次於瑞典和美國，而且新增加的股票持有人廣泛地分佈於各個社會集團，特別擴散到收入較低的階層。

股票分散並不意味著沒有再集中的可能，英國私有化企業的股票持有者，特別在個別企業還有減少的趨勢，因爲有些職工買了股票後無意經營，看到好價格就又出售了，股票還將再集中在高收入階層手裡。

股票分散化並不見得不利於資本家。在列寧時代，一個資本家要控制一個企業要占有該企業的百分之四十的股票，現在小股東多了，他們無意於參加董事會的決策，因此，資本家如想控制一個企業，有該企業的百分之十或者更少一些的股票也就夠了。



職工持有股票有利於企業的經營，而不利於組織罷工，因為他們會更關心這個企業，因而不利於工人運動，在英國，與股份持有人增加的同時，參加工會的人數相應地減少。

在美國，股票的大持有者往往是人壽保險公司和養老金基金會，這些組織實際上都是職工的保險金的管理者，因而帶有社會性質，有的學者稱之為「養老金社會主義」(sinking fund socialism)，亦有稱之為社會資本主義者，這還有待研究，因為我們不能忽視在股票分散化的同時，壟斷仍有加強的趨勢。

有些學者認為現代資本主義國家有反壟斷法，或反壟斷局，因而壟斷的趨勢削弱了，甚至不存在了。這種看法值得研究。

現代資本主義國家中資本的集聚和集中仍然在發展，其特點一個是寡占(oligopoly)為主，少數幾個大公司控制了市場，例如聯邦德國的朋馳汽車公司和大眾汽車公司，它們之間有競爭也有勾結，它們仍然利用金錢組織院外集團以影響政治，它們有不受群眾監督的巨大的試驗室。另一特點是壟斷公司跨出了國界，形成跨國公司，某些跨國公司規模巨大，盈利驚人，一年的所得甚至大於某些國家的國民收入。跨國公司又與國際金融產業結合，形成巨大的經濟王國，其力量足以干預某些國際組織和較小國家的內部事務，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

應該注意的是現代資本主義一方面繼續進行資本的高度集中，另一方面沒有形成市場的壟斷。不僅大企業間進行著激烈的競爭，而且大批中小企業仍保持著競爭的活力。即使定價有公開的或隱蔽的協定，競爭則著重表現在產品質量上。因此現代資本主義的經濟仍不斷得到發展。

## 民主的發展與階級鬥爭之和緩化

馬克思主義者過去往往沒有注意到現代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發展對於消除社會不穩定和緩和階級鬥爭的作用。

資產階級民主雖然有其虛偽方面，如普選，但沒有錢無法參加競選；又如壟斷公司運用院外集團收買議員以干預政治，等等。但其法治原則、普選制度、制衡制度、新聞自由、以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罷工的自由等方面，雖不能說完善，但確有動員人民和對於人民的不滿起安全閥的作用。

過去我們往往強調即使資本主義有政治民主，也沒有經濟民主。現代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民主方面也有所發展，如勞動立法、工會組織，工人參加管理。

由於德國的社會民主黨一度執政，德國的勞工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已經有所發展，一九一九年德國憲法規定包括工人代表的國家經濟委員會，一九二〇年通過實行工廠委員會法等工人參與管理的法律。凡此種種當然隨著納粹希特勒的上台一掃而光，但是由於有過這個傳統，聯邦德國是實行工人參與管理和社會保險制度較好的國家。

一九八一年西德實行了廣泛的社會保險制度，規定任何月收入少於規定的最低水準的人可以根據法律得到社會救濟，任何月收入少於二千八百馬克左右的人都享受法律規定的健康保險計劃，每個人都有權領取養老金。勞動保護和健康保護都有嚴格的條例加以規定。

聯邦德國，在工廠和行政管理部門，法律還保障人們有權參與決策的機會。參政權，基本權利和政治活動自由都得到保證。

目前，聯邦德國在鋼鐵工業實行「平等共決」，即，當鋼鐵工業已經無法避免裁員時，管理機構和工人代表共同作出有關決定，如決定哪些人不能解雇，決定被裁的工人應得到什麼幫助，對失去職業的人提供其他職業訓練或進修計劃，以便得到其他職業，由全體工人交錢建立的失業保險計劃使失業工人可以拿到原工資的四分之三，等等。雖然大多數工廠中和所有行政管理部門中的職工還沒有這樣的平等共決權，但是，工人參與管理的經濟民主已經開始起步。

所以，儘管有不足的或虛偽的方面，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使現代資本主義國家中的階級矛盾沒有日趨激化，反而有所緩和。馬克思關於階級鬥爭尖銳化的理論已被證偽。

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雖有所緩和，但資本主義的矛盾並沒有減弱，而且有日益尖銳的趨勢，並採取了新的形式。

從工人階級本身來說，因貧困化而引起的工人運動確實有所減弱，但是還有不少人，如永久性失業的工人，被迫退出「富裕社會」。他們生活日益困難，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在業工人也往往因為技術革命減少對勞動力的需求而被投入失業者的隊伍。一旦發生周期性經濟危機時，失業將會加甚。然而，由於周期性經濟危機與階級鬥爭一樣地趨於緩和，無階級革命，特別是暴力革命，在現代發達國家幾乎不會發生，經濟罷工和政治罷工也難以大規模的出現。但是，統治的資產階級不會放鬆，他們的政府著力於用破壞工會的威信及其影響，制定法律來阻抑罷工，派遣軍警在罷工時代替工人勞動等老的和新的手段來破壞工人運動。

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最大的矛盾在於出現各種異化，諸如環境污染、吸毒、暴力、色情、黑社會、愛滋病以及各種邪教，這是由於謀生困難，競爭激烈，社會不公平，對未來失去信心，以及盲目追求利潤破壞生態平衡所產生的社會問題。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這些社會問題危害本民族的生存和人際關係乃至影響全人類，使有覺悟的人們，特別是「知識階級」，對現社會不滿。於是，女權運動、生態平衡運動、反核運動、和平運動等以反對各種形式的異化為目的的運動聲勢日益浩大，這些運動的組織者日益認識到以追求利潤為目的的資本主義社會乃是各種異化的根源。正如上面所說，現代資本主義國家中的「知識階級」往往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者和反對者，但是，他們沒有形成一種力量，也沒有明確的目標、綱領。

建設一個不以追求利潤為目的的新社會是生產力發展，也是人們的正義的要求。但是，迄今還是較遠的未來。

綜上所述，對現代資本主義再認識，檢驗了馬克思主義的部分原理。

它一方面證明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正確性和生命力。

另一方面，對於現代資本主義（不包括比較落後的發展中國家）來說，以下一些個別結論被證偽：工人階級貧困化的理論；社會兩級分化的理論；工人階級是資本主義掘墓人的理論；利潤率下降趨勢的理論；經濟危機和階級鬥爭日益尖銳化的理論；資本主義的喪鐘已經響了的理論。

通過再認識，我們也看到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仍然存在著若干共同之點，我們應該善於汲取資本主義的長處而避免其短處。因此，我對於社會主義（以區別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的定義是：

有異於資本主義的現代化的另一種可供選擇的道路，其特點在於保存並發揚現代化的優點而避免其弊病。

一九八九年四月

## 註釋

-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二卷，第三七一頁。
- ② 《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一〇頁。
- ③ Peter L. Berger, *The Capitalist Revolution*, Wildwood House, 1987, p. 30。
- ④ 以上李閔蘇紹智、丁學良《馬克思對信息時代的預見》，《人民日報》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 ⑤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三卷，第八三一頁。
- ⑥ 《列寧選集》第二卷，第八四三頁。
- ⑦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八三頁。
- ⑧ Ernest Mandel, "Economics", in *Marx: The First Hundred Years*, ed. by David McLellen (Oxford: Fontana Paperbooks, 1983), p. 201。
- ⑨ 同上，頁二〇〇。
- ⑩ 聯邦德國《統計年鑒》一九八八。
- ⑪ Peter L. Berger, *The Capitalist Revolution*, Wildwood House, 1987, p. 66。

- ⑫ 聯邦德國《統計年鑒》一九八八。
- ⑬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二卷，第三六八頁。
- ⑭ 指數已扣除物價上漲因素，《美國統計摘要》一九八七年，見《世界經濟》一九八九年，第一期。
- ⑮ Simon Kuznets,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XLV (1955) 轉引自 Peter L. Berger, *The Capitalist Revolution*, Wildwood House, 1987, pp. 43-45。
- ⑯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三卷，第七〇八頁。
- ⑰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五卷，第一〇二〇頁。
- ⑱ 《美國統計摘要》一九八四年，轉引自童大林等《當代資本主義問題引論》，科學出版社（一九八八）。
- ⑲ 同上。

## 對社會主義的再認識

十九世紀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思想體系建立的時代，它戰勝了各種社會主義流派而成爲工人階級運動的指導思想。

二十世紀上半葉，經過革命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聯勢力的擴張，建立了一系列社會主義國家。它們迅速彌合了戰爭的創傷，以比較快的速度進行建設，而且沒有周期性的經濟危機。那時，社會主義不但對世界工人階級有吸引力，而且當資本主義國家發生經濟危機時，執政者也往往採取類似社會主義方向的措施，如國有化、公共工程、社會福利等，第三世界某些國家在擺脫了宗主國的統治取得獨立後，也往往採取帶有社會主義傾向的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

到了二十世紀下半葉，特別是六十、七十年代以後，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雖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卻出現了一系列內部矛盾和困難，曲折和失誤。這些國家普遍出現經濟增長速度下降乃至停滯、隱蔽的或公開的通貨膨脹，資金和勞動力不足，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政治上缺乏民主和人權，勞動者缺乏創造性和積極性，生產效率低下，黨政機關出現嚴重的官僚主義和腐敗。馬克思主義所一再宣傳的社會主義優越性不但沒有發揮出來，有些國家反而遭到重大的挫折和危機，如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一九五六年的波蘭波茲南事件和其後幾乎每十年發生的一次危機；捷克的一九六八年

「布拉格之春」；中國一九五九年的「大躍進」和一九六六—七六的「文化大革命」等。在社會主義國家之間還出現了嚴重矛盾、裂痕以至軍事衝突，對於所存在的問題，雖然幾經探索，試行改革，仍然「摸著石頭過河」，未能找到新的有效的解決辦法。終於在一九八九年以中國的天安門民主運動並遭到本國政府的血腥鎮壓開其端，東歐的現實社會主義國家（除阿爾巴尼亞）和蒙古人民共和國幾乎都先後發生了聲勢浩大的民主運動，一個個共產黨執政的國家中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政府被推翻，普遍地開始轉化到以政治多元化（多黨政治），自由選舉和聯合政府為特色的民主政體，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也宣布結束七十二年來一黨專政的局面，實行多黨制政治和市場經濟。北朝鮮和古巴雖然在專制獨裁統治下走著傳統的社會主義的老路，中國在「六、四屠殺」及其後的「白色恐怖」下回到極權主義的老路，但是這些國家都矛盾重重，而且日益加深，終於會有民運重新爆發，一黨專政被推翻，由極權走向民主的一天。

反觀資本主義國家，大約在七十年代中期繁榮告終，生產過剩和失業等問題又嚴重起來。西方國家上台的保守派政權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已不再像他們的前任那樣，採取帶有社會主義方向的措施，而是採取私有化和放鬆政府管制的措施，結果取得了相當成效。目前資本主義社會雖然仍然矛盾重重，周期性的經濟危機仍然不可避免，但它發展生產力的潛力還沒有耗盡，而且出現了新的科學技術革命，跨入新的訊息社會。在生產力的推動下，資本主義還可能通過周期性的發展再經歷一個新的繁榮時期。在第三世界國家中，很多試行非資本主義道路發展的國家也都證明是不成功的，因而紛紛放棄帶有社會主義方向的措施。

目前不少西方人士已於宣告「西方自由民主的最後勝利」、「資本主義的勝利」<sup>①</sup>等，但我認為



卡爾·馬札尼 (Carl Marzani) 的說法也許更切合實際。他說：「如果說七十年的競賽是軍事的，那麼沒有一方勝利；如果說的是經濟，結論太早；如果說的是文化，那還有待辯論。」<sup>②</sup>但是傳統的社會主義諸多弊端，對它作出再評價，確實十分必要。

就中國來說，一九五六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在長時期內確實犯有重大失誤，這些重大失誤的產生，固然與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更與我們長期以來，對什麼叫馬克思主義，什麼叫社會主義的認識不清醒有關<sup>③</sup>，以及與社會主義制度存在著弊病，特別是長期對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都實行中央高度集權的管理制度和沒有切實建立民主制度，以至官僚主義和特權橫行有關。

中共對此有所察覺，針對存在的弊病，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給全國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衝破了黨的領導思想上存在的教條主義和個人崇拜的嚴重束縛，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總的指導方針，並提出在黨和國家工作的各個方面進行改革的任務，確立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的重要方針<sup>④</sup>。首先推動了農村的改革，實行聯繫產量的包產到戶生產責任制，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了農業的發展。在一九八四年十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上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推動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並制定了全面改革的藍圖，在一九八六年九月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又通過了「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定」，實質上提出了包括經濟、政治、思想、社會、文化、教育、科技等各個領域的全面改革。

中共能作出這樣的決定是很大的進步，因為在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和把蘇聯經驗神聖化的錯誤

占支配地位的年代裏，在史達林主義支配蘇聯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年代裏，在毛澤東個人迷信瀰漫的年代裏，在「兩個凡是」<sup>⑤</sup>盛行的年代裏，是不可能有任何些許的改革的，但是不能認為中共作出了決定就萬事大吉了。因為即使贊成改革的領導人也沒有從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進行再認識，從理論上解決問題，因而左右搖擺，舉棋不定。而正統的保守派人士更多地從維護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實為史達林主義）和社會主義出發而與改革派相對立。這種對立隨著改革派提出要求進行全面的深入的改革，認為必須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進行再認識，並且越來越提出與傳統的，特別是與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所宣傳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不同的新觀點時，正統保守派與改革派的分歧、爭論和對立就越來越嚴重。到了一九八九年民運被鎮壓以後，改革派的力量被大大削弱，正統保守派實際上實行復辟，走上了回頭路，所以，我所提出的對社會主義再認識的觀點是改革派的觀點，在官方的觀點看來，是異端，而予以壓制，但是，實踐將證明，正確的將是改革派的觀點。

吉伯特·羅茲曼 (Gilbert Rozman) 教授曾將三中全會以來，正統派與改革派的觀點列了一張對照表<sup>⑥</sup>，這張表大致符合實際情況，現在根據我的看法加以修訂。從中大致可以看到改革派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再認識提出那些主要觀點，正統派企圖回到哪些舊觀點，特別在一九八九年民運被鎮壓以後，正在回到哪些觀點。

### 一、對馬克思主義的再認識

中國的建設和改革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進行的，要對社會主義再認識，首先必須對馬克思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正統派與改革派的不同觀點

正統派

改革派

意識形態	<p>一、仍提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p> <p>二、仍然肯定史達林對馬克思主義的貢獻。</p> <p>三、毛澤東思想大部份是正確的，應予堅持。</p> <p>四、忽視人、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p> <p>五、向資本主義世界開放，將帶來精神污染。</p>	<p>只提馬克思主義，不提馬列主義。列寧主義只是馬克思主義在沙俄背景下的產物。</p> <p>史達林極大地歪曲馬克思主義，必須予以清除。</p> <p>毛澤東思想主要在民主革命時期是正確的。</p> <p>社會主義社會中，人、人道主義和異化仍是重要問題。</p> <p>研究和吸取西方社會科學的優良成果。</p>
經濟制度	<p>一、中央計畫經濟。</p> <p>二、強調國有制和按勞分配。</p> <p>三、開始時反對包產到戶的責任制，趨向重新合作化。</p>	<p>有計劃的市場經濟。</p> <p>多種經濟成份（混合經濟），部分私有化、股份化。</p> <p>包產到戶的聯繫產量的生產責任制。</p>
政治制度	<p>一、一黨專政、黨政合一</p> <p>二、高度集權</p> <p>三、黨領導一切，民主黨派、群眾團體均受黨的領導成爲黨的一部份。</p> <p>四、民主集中制。</p> <p>五、黨挑選、任命幹部。</p>	<p>政治多元主義、黨內民主、多黨制、黨政分開。分權。</p> <p>民主黨派、群眾團體的獨立性。</p> <p>民主制。</p> <p>選擇制、公務員制。</p>
社會政策	<p>一、利益一元主義。</p> <p>二、仍需階級鬥爭。</p>	<p>利益多元主義，形成市民社會。</p> <p>人民內部矛盾。</p>

主義再認識。

1. 對馬克思主義進行再認識的必要性。中國共產黨雖然一再強調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但事實上，對中共影響最大的是史達林主義。毛澤東一九四一年說：「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又應以《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為中心材料。《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是一百年來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的綜合和總結，是理論和實際結合的典型，在全世界還只有這一個完全的典型。」<sup>⑦</sup>這本書在中國被稱為「馬克思主義的百科全書」，被規定為「幹部必讀」。中國老一輩革命家學習馬克思主義都是通過這本書的。而這本書不但偽造歷史，而且把馬克思主義「歪曲到難以辨認的程度」<sup>⑧</sup>。所以，中共領導人所講的馬克思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實質上是史達林主義。此外，他們又深深地接受了毛澤東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的影響；而毛澤東思想特別在晚年有很多錯誤。應該指出，馬克思的馬克思主義不同於恩格斯的馬克思主義，也不同於列寧的馬克思主義，更不同於史達林的和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而中共一貫受儒家「吾道一以貫之」的影響，把馬、恩、列、斯、毛看作「道統」，因此，不免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有錯誤而且諸多背離之處。我們有必要通過實踐來檢驗中共所一向宣傳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2. 我們並不是要簡單地回到馬克思。即使是馬克思的馬克思主義由於長期受到教條主義、宗派主義的影響，往往從個別結論、個別著作，乃至個別詞句去理解馬克思主義，因而不能正確地理解馬克思主義。不能背誦個別結論和依賴語錄，而是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即使是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也應該吸取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最新成果而有所發展。

3. 馬克思主義是社會科學的門類之一，或者說是社會科學的一個學派。它存在了一百多年，有

其客觀存在的價值。不能把它看作宗教，不能以權力把它變成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變為統治的意識形態，這樣的「官學」必將退化。馬克思主義只是一門科學，不是包羅萬象的「科學之科學」。作為科學的門類之一，它必須符合一般科學的規定性和特徵。科學重視實踐，重視發展，重視創新；科學是無終極的，無絕對權威的。科學是不怕批評的，並且能夠根據實踐的發展進行自我批評。科學必須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不能停滯不前。要發展，就要研究新情況、新經驗、新問題，善於汲取人類文明的新成果，徹底開放，打破禁區，大膽創新，以新的結論回答時代和生活的挑戰，解答群眾所提出的問題。我們應該把馬克思主義作為研究的出發點和方法，不應該再把它看作國家統治的意識形態，要像克羅齊(Benedetto Croce)分析黑格爾的理論時，指出哪些仍然「活著」，哪些已經「死去」那樣批判地分析馬克思主義著作，包括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觀點，必須拋棄那些被實踐證明是站不住腳的觀點，修改闡述不正確的觀點，發揮處於萌芽的思想，補充以新的科學成果。這也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再認識。只有採取這種態度才能使馬克思主義得以存在和復興。那種把馬克思主義看作「放之四海而皆準，俟諸百世而不惑」的僵化的觀點，不僅違背馬克思主義本身，而且導致馬克思主義的衰落乃至死亡，「雖曰愛之，其實害之」。

## 二、對資本主義的再認識

史達林曾說：「由於國內沒有任何現成的社會主義經濟的萌芽，蘇維埃政權必須在所謂『空地』上創造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這種說法值得研究，特別是今天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裏，

這種說法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易於導致一種割斷歷史的虛無主義態度。對社會主義的再認識，不能不提出對資本主義再認識問題。

由於現代資本主義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不但馬克思、恩格斯沒有經歷過，列寧、史達林也沒有經歷過。對資本主義的認識不能夠拘泥於他們的著作，必須從現代資本主義的實際出發來對資本主義進行再認識，也才能對社會主義進行再認識。

1. 和史達林關於社會主義在「空地上」創造出來的說法相反，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不是在其自身基礎上已經發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sup>⑩</sup>。過去，我們往往把「資產階級權利」只看作「舊社會的痕跡」，實際上，還有政治上、思想上的舊社會的殘餘，似乎除壞的方面以外，社會主義社會從資本主義社會脫胎出來以後就一點共同點也沒有了。這不利於我們正確認識社會主義社會。按照馬克思的說法，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生產社會性和資本家私人占有制的矛盾，社會主義社會就是要變私人占有制為公有制以與生產的社會性相適合。生產的社會性是商品經濟的特點。商品經濟愈發達，生產的社會性程度愈高。因此，商品生產是兩個社會所共有的，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將消滅商品和貨幣，這是一種空想。儘管由於所有制不同，商品經濟可以各具特點，但商品經濟的基本特點有共同之處，例如需要統一的市場，價值規律起一定的調節作用等。又如生產社會性和大企業的發展，要求企業有計劃性，這也是共同的。只有承認有共同點，才能承認經濟行政管理經驗具有兩個社會的普遍適用性。

2. 由於生產社會性的發展，郵局、大的國營鐵路等國家資本主義的出現，國家干預經濟之加強，

農業合作社之自發組織，乃至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所有權與經營權的日益分離，當今的股票所有者的分散化和大眾化，以及在福利國家政策下，「從搖籃到墳墓的保險制度」的出現，不能否認在這些國家已經出現與社會主義有某些相通之處的現象。甚至有些國家的社會保險、福利制度比社會主義的國家還要好。

3. 自由、平等、博愛、人權等觀念，在人類歷史上，是新興資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在反對封建制度的鬥爭中共同提出來的，是人類精神的一次大解放。因此，民主、自由、平等、博愛、人權、人道主義等觀念和普選制、議會制、制衡制等一些具體的政治體制不僅有利於新興資產階級，而且有利於勞動人民。只是在資產階級掌握了政權之後，實行資產階級專政，把這些觀念和制度加以種種限制，使之變為虛偽的形式。勞動人民爲了爭取民主等權利，在今天的資本主義社會裏仍然不斷地進行鬥爭，因此，在社會主義社會裏，不是拋棄這些觀念和制度，而是批判地繼承，去偽存真，使之變成真正的民主自由。恩格斯在談到言論自由時，說得很好，他說：「難道我們要求別人給自己的言論自由，僅僅爲了我們自己的隊伍中又消滅言論自由嗎？」<sup>①</sup>這裏，恩格斯所講的言論自由難道不能夠理解爲民主和其他自由嗎？不能認爲西方的文化、社會科學都是「精神污染」。這是一種對待世界文化的虛無主義態度，非歷史主義的眼光。用徹底否定一切的態度對待資本主義使我們未能利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優秀成果，走了彎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優秀成果不能認爲僅止屬於資產階級而是屬於全人類的。對於資產階級的文化、民主、科學、典章制度，我們都應該以科學的態度加以研究，汲取其中富有人民性的，有利於人類進步的優秀成果，拋棄其糟粕。

### 三、對於中國現行制度處於什麼發展階段及其性質和特點的再認識

中國在一九五六年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就宣布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實際上無論從生產力和人民文化水平、政治民主化的程度等方面都差得很遠，勉強推行社會主義措施，急於向更高的形式過渡，因而遭到一系列的挫折乃至災難。於是，在一九八七年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上正式宣佈中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也只能是一種遁辭，因為中國以及其他現實社會主義國家所發生的所謂社會主義現象，與馬克思所設想的圖景有很大的差別。馬克思所期望的社會主義是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內部矛盾的必然產物，是後資本主義社會。它將汲取資本主義的全部成果，克服舊社會的各種異化，在更高的層次上推進人的解放。

中國有兩千多年封建專制主義的歷史，是經濟上、文化上十分落後的農民國家，缺少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和民主傳統，封建專制主義和農民的小生產者的思想和習慣勢力伸入到社會的每一個環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前，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很大程度上是前資本主義社會，並不具備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只是由於當時統治階級的腐敗，各種矛盾激化到頂點，被統治者已經不能生活下去，統治者不能繼續統治下去，以致發生革命危機。中國共產黨在堅強的組織和發動群眾進行武裝鬥爭的條件下，奪取了政權。我一直認為，在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不具備的條件下，取得政權的革命是可以成功的，但社會主義是不能建立更不能建成的。要實行社會主義，特別在中國條件下，取得政權後，必須有一個相當長的過渡時期，也可以叫做「補課階段」。在這個時期，要



大力發展生產力，特別是發展商品經濟，以形成社會化的大生產，同時要大力肅清封建專制主義和小生產者的思想和習慣勢力，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準，發展民主政治。毛澤東在建國前是看到這一點的，他曾說中國必須經過長時期的新民主主義的發展，才能到達社會主義，他還公開批判那種「想直接從封建經濟到社會主義經濟不經過資本主義經濟」的「民粹主義思想」<sup>⑫</sup>。列寧清醒地估計到這一點，指出國家愈落後，它過渡到社會主義就愈困難。史達林在一九三六年過早地宣佈蘇聯建成社會主義是一大大失誤，毛澤東更只看到革命的一面，錯誤地認為「經濟愈落後，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是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難」，「人愈窮，才愈要革命」。這就成為中國過去去急於過渡，推行左傾路線的理論依據。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毛澤東不僅沒有遵循他在建國以前的設想，使中國經過一個較長的新民主主義階段，認真發展商品經濟，肅清封建專制主義，反而，一方面在通過了土地改革運動消滅了封建主義的經濟基礎以後，沒有認真地進行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的鬥爭，由於很快地發生了「抗美援朝」和「三反五反運動」，在反對封建專制主義沒有充分進行之時，轉入了反對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以致封建專制主義在中國這樣的農民國家仍然根深柢固，影響很大。另一方面又提前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接受了史達林主義及其制度。史達林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沙皇俄國專制主義影響下的變種，它與舊中國的封建專制主義的舊傳統實有一脈相承之處。所以，中國在建國以後所推行的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很難說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而是深受中國封建專制主義的舊傳統與史達林主義的新傳統的影響的結合體。二者結合得很緊密，又披上了馬克思主義的外衣。這兩座大山必須同時推翻。只批封建專制主義，不批史達林主義，如鄧小平在一九八〇年的一個報告中承認中國所存

在的種種弊病，多少帶有封建主義色彩，而提出「肅清封建主義殘餘影響」<sup>15</sup>的要求，但是他批判史達林主義，所以對封建主義的批判和肅清也不徹底。

這種深受封建專制主義與史達林主義相結合影響的制度具有以下特點：(一)高度的、全面的集權，在整個社會中形成一個「黨—國家—軍事—經濟—意識形態—文化」的統一的實體。其中黨掌握著壟斷的權力，無所不管，無所不在。(二)森嚴的等級制，中國社會是個等級社會，包括等級政治，等級經濟，一個金字塔型的結構。幹部制度不是選舉制而是等級授權制。在金字塔的頂端是少數幾個人甚至一個人專政。鄧小平也承認這是「領導者個人高度集權」<sup>16</sup>。(三)俱有國家崇拜的特徵，其表現為不斷地尋求國家的暴力，所謂「強化無產階級專政」，「大國家、小社會」，很多社會的職能轉到國家手中，以致人民在各個方面均依賴國家，因而在各個方面受國家支配；把國家所有制看作最高級的所有制，因而急於向國有制過渡，實行全面的計劃經濟（嚴格地說，應為指令經濟（command economy）），實際上把國民經濟置於國家壟斷之下，導致腐敗和無效率。(四)國家崇拜轉化為黨崇拜和個人崇拜。因為黨壟斷了國家權力，而領導者個人又高度集權，黨和領導人被認為一貫正確，神聖不可侵犯，因而形成個人崇拜、領導職務終身制和老人政府，任何持不同意見者均不允許存在，更不要說什麼獨立組織或政黨了。(五)對意識形態和大眾傳播媒介的壟斷，實行「文化專制主義」和新聞封鎖和出版檢查，以求得「輿論一律」。

以上特點完全符合布魯斯(W. Brus)所指出的極權主義政治制度的四個主要特點<sup>16</sup>，也符合布熱津斯基(Z. K. Brzezinski)和弗萊德里克(Carl J. Fredrick)所論述的極權主義的六個基本特徵<sup>17</sup>，而且更接近雷曼(M. Reiman)所說的「全面的極權主義」(All embracing totalitarianism)<sup>17</sup>。

不認識這一點就不能進行認真的改革，也不能理解中共的政策，例如，中共爲什麼會對學生的民主運動（實際上是一種「公民不服從運動」(civil disobedience)）進行血腥的鎮壓，因此，我認爲中國現時所處的歷史發展階段，還不是社會主義，還處於「過渡時期」，而由於其制度的特徵很接近於「全面的極權主義」，又俱有「從極權主義統治過渡 (transition from totalitarian rule) 的特點」<sup>18</sup>，中國今後的發展應該是「向民主的、自由的、人道的和理性的社會主義過渡」。

#### 四、對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的再認識

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深受史達林主義的影響，大約形成於二十世紀三十、四十年代。  
1. 史達林過早地宣佈社會主義建成，並以此爲依據作出錯誤的理論概括。

一九三六年史達林在「關於蘇聯憲法草案」的報告中，根據「新的社會主義的工業已經創立成功，富農已被粉碎，集體農莊制已經獲得勝利，生產資料社會公有制已在全部國民經濟中奠定爲蘇維埃社會的基礎」<sup>19</sup>，就宣布蘇聯「已經基本上實現了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即社會主義」<sup>20</sup>。「即蘇聯已進入新的發展時期，已在完成社會主義社會建設和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過渡到應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原則爲社會生活準則的社會」<sup>21</sup>。其他現實社會主義國家也根據這個標準，先後宣布了實行社會主義。其實，從實際情況看，這些國家的勞動生產率水平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均大大低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商品經濟，亦即社會化大生產很不發達，缺乏人權和民主制度，以及舊的封建專制主義的和小生產者的思想意識和習慣勞力仍然影響很深，官僚主義和官僚機

構的廣泛存在，如果叫做社會主義，那只能說是「不夠格」的社會主義。<sup>22</sup>

史達林在他的影響下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從那種不夠格的社會主義的現實和願望提到原則的高度，把它絕對化和理論化成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和發展的規律性，因而這種理論是不完善的，沒有說服力的，乃至錯誤的。例如，在論述本質特徵方面：對單一的國有制、高度集中統一的管理體制和無產階級專政之強調；對商品經濟、市場和政治思想上的自由，民主、人權之排斥；大國沙文主義之傾向等，均屬對社會主義本質特徵之誤解。盧卡奇指出，在史達林那裏理論不再是最先的戰術決定的思想基礎，而是事後炮製的，往往只不過是一種詭辯。<sup>23</sup>

史達林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之表述就是這樣炮製的。這些表述並不與史達林本人關於經濟規律本身的定義：「經濟發展規律是反映不以人們意志爲轉移的經濟發展過程的客觀規律」<sup>24</sup>相符合，因爲它們並沒有在所有現實社會主義國家中對經濟發展起支配作用。衆所周知，現實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是匱乏經濟（Economy of Scarcity），遠不是「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物質和文化的需要」，而其經濟發展又往往是不平衡的發展。麥格道夫（H. Magdoff）認爲現在革命後的社會確實致力於工業化和現代化，但提不到「基本規律」的水平，而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的增長比例的最後決策往往是政治性質的，說不上規律。麥格道夫的論點是值得重視的。

## 2. 社會主義社會有沒有對抗性的矛盾甚或危機？

傳統理論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有任何對抗性的矛盾，當然更沒有危機。傳統理論通常認爲當剝削階級被消滅以後，所有的社會階級或階層將有完全一致的利益，所以在他們之間將沒有利害衝突和對立，他們之間沒有對抗性的矛盾。

事實不斷證明以上的觀念是不正確的，例如，一九五六年波匈事件，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七十、八十年代的波蘭罷工，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等很明顯地反映了對抗性的矛盾和危機。爲什麼說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有可能出現對抗性的矛盾甚或嚴重的危機呢？因爲由於制度的不完善，利益的多元化，以及某些領導人和政策上的失誤。

不僅有政治危機，還可能有經濟危機（例如：生產不足和供應短缺所導致的持續的危機），道德和意識形態的危機（例如：傳統理論和說教在群眾中已經失去信仰，而與今日歷史發展相一致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尚未樹立）；社會危機（例如：在舊的管轄下的人民不再信任當局，因而他們對當局的號召和要求變得漠不關心，政治上與當局分裂），文化和意識形態危機（例如：一個國家的傳統的、保守的文化與先進的文化相比較而出現的危機感）等等。

危機不等於崩潰。它指到達一個轉折點，它不是一個絕對的壞事，只有我們承認在社會主義存在着危機，我們才能夠更迫切地感覺到改革之必要。

### 3. 關於社會主義的所有制、按勞分配和計畫經濟。

長期以來，我們往往以公有制、按勞分配和計畫經濟作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這不能說沒有根據，問題在於理解的片面性和絕對化。

生產資料的公有制代替生產資料的私有制，按馬克思主義來說，確實是社會主義的根本特徵。在這個問題上有兩點值得探索，一點是我們所實行的公有制是不是真正的社會化的結果，還是僅止是國有化，甚至國家化的結果？蘇聯在列寧時代曾經討論過關於生產資料的國有化，是不是等於社會化的問題。布哈林曾區分過社會化(Socialization)、國有化(Nationalization)和國家化(Statiza-

tion)。這種討論是有道理的，可惜沒有進行下去，我以為國家化這一概念比國有化更明確。我們一直強調將生產資料收歸以國家為代表的全民所有，稱之為全民所有制。實際上是國家所有制。馬克思強調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資料和勞動者直接結合。而國家所有制使國家作為一個實體處於生產資料和勞動者之間，二者還不能直接結合。所以，國家所有制是有限的社會化形式，它本身還有待於進一步完成社會化。生產資料和勞動者未能直接結合，有個國家插在當中，是勞動者生產積性未能發揮的一個原因，也是官僚主義產生的一個根源。

不僅如此，毛澤東還強調要實行單一的全民所有制（實為單一的國有制）。中國在解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時提出，過渡時期結束的標誌是使得生產資料公有制成為我們國家和社會的唯一經濟基礎，這裏公有制應該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但是，毛澤東認為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不能長期並存，要在單一的全民所有制的基礎上來統一計劃全國工業和農業的生產和分配<sup>26</sup>。因此，中共把國家所有制看作所有制的最高形式，急於把個人所有制向集體所有制過渡，集體所有制又從小集體所有制向大集體過渡，最後都向國家所有制過渡。把國家所有制看作唯一的，絕對的所有制形式。要求一個社會的所有制純而又純，是一種非辯證的觀點，不利於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國家所有制成為唯一的、絕對的所有制形式，也就成為高度集中統一和實行國家壟斷乃至極權主義的物質基礎，實踐證明，在社會主義時期，多種所有制形式同時並存，集體所有制乃至個體所有制在某些方面比國家（全民）所有制更俱有優越性，集體所有制沒有必要過渡到全民（國家）所有制。只能說在多種所有制同時並存的條件下，也就是混合經濟的條件下，社會主義公有制占主導地位，而這種公有制又首先應強調合作社所有制。

既然承認社會主義多種所有制同時並存，按勞分配也只能成爲消費品分配的主要形式。而不能是唯一的。既然存在着多種經濟成分，國營經濟也可以採取承包制、股份制等，那麼，就還有剝削問題、按股分配的問題，以及多種新的分配形式。

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有計劃的生產將代替生產無政府狀態，是馬克思主義古典作家的共同觀點，但列寧把它推到極端，他說：「把全部國家經濟機構變成一架大機器，變成一個使幾萬萬人都遵照一個計劃工作的經濟機體——這就是我們肩上的巨大組織任務。」<sup>②</sup>於是，高度集中統一的經濟模式就成爲社會主義國家長期遵循的標準。在商品的種類成萬成百萬種的情況下，列寧的說法實際上是一種空想。而高度集中統一的經濟排斥商品經濟、排斥市場、排斥競爭，忽視商品生產、價值規律和市場的作用，形成條條塊塊，統得過多過死，造成主觀主義與官僚主義，使國民經濟被國家所壟斷，使社會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

任何一個現實社會主義國家要着手改革，首先要研究計畫和市場的關係，突破把計畫和市場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明確不是排斥商品經濟，而是把實行計畫經濟同運用價值規律，發展商品經濟統一起來，商品經濟的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在經濟不發達的國家，充分發展商品經濟尤爲重要。中國明確提出改革的方向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後來又提出「國家控制市場，市場引導企業」，一方面要健全市場機制，另一方面要進行適應市場化的企業改革，並鼓勵在「公有制爲主體的前提下」的城鄉合作、個體和私營等多種所有制經濟，促進橫向經濟聯合是社會化大生產和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在全面改革中，我們還要從認識和實踐兩個方面去探索，按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要求去考慮問題，摒棄一切與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不相適應的概念、觀點、做

法、習慣和規章制度。各種改革、各方面的改革都要適應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要求。這些比較切合實際的設想還沒有來得及實施，在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被鎮壓以後，中國政府又放棄了重視商品經濟的觀點，回到了「計畫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保守觀點。

#### 四、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和自由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主要的歷史教訓之一是沒有切實建設民主政治。社會主義社會中缺乏切實的民主是所有現實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在長期內的重大失誤，乃至產生災難性後果的一項重要原因。匈牙利著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盧卡奇就是從蘇共二十大以來發生的國際政治事件和匈牙利的經濟改革中提出了民主化的問題。在盧卡奇看來，民主化問題不是對政治領域或體制的修修補補，而是強調全部生活的民主化，他認為民主化是與社會主義的最深遠的歷史使命息息相關的；民主化是擺脫異化的社會—政治手段和實踐。<sup>②6</sup>

民主化已經成為所有現實社會主義國家不可逆轉的總趨勢。一九八九年現代社會主義國家內聲勢浩大的民主運動，使除中國、北朝鮮、古巴等少數國家外，幾乎全部東歐國家、蒙古、尼加拉瓜和一定程度的蘇聯，先後放棄一黨專政和個人獨裁的極權政府，開始轉向以政治多元化（多黨制）、自由選舉、聯合政府為特色的民主政治。

長期以來，我們強調無產階級專政，忽視社會主義民主，而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變成了黨專政，又變成了黨內少數人乃至一個人的專政，形成極權統治。我們又強調民主集中制，用兩句話來概括，



即「民主基礎上的集中，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前一句話猶可說，後一句話就變成沒有民主，只有集中。經過群眾的批評和討論，在中共黨章中刪去後一句話。我認爲民主集中制是講民主的集中，以區別封建主義的集中、資產階級的集中或官僚主義的集中。民主的集中是尊重人民的選擇，通過投票和少數服從多數、尊重少數的原則來進行的，所以，叫民主制已經夠了，而我們用了民主集中制實際上往往強調集中，忽視民主。

民主是手段，也是目的。而我們過去往往把民主只看作手段，沒有強調要建立和加強民主，並把民主制度化和法律化，沒有切實建設民主政治和民主經濟，致使人民對政治「疏遠化」。這是勞動人民積極性未能充分發揮以及產生各種失誤乃至災難性後果的一個重要原因。通過改革，我們體會到，在社會主義社會裏，民主不僅是手段也是目的。在沒有經過民主洗禮的國家尤其要把民主當作目的去爭取。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也就沒有社會主義，我們必須強調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切實推行全面的民主化。

與民主相聯繫的自由，即人的解放問題是現實社會主義國家急需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特別在中國，那裏既沒有「人的發現」也沒有「人權宣言」。馬克思認爲人的自由，即人的解放，從各種異化中解放出來，而成爲自己和社會的主人。這種自由在廢除私有制後可以充分地實現，以往的社會都給人造成了程度不同的異化，即人的創造物（國家機器、意識形態、勞動產品）反過來奴役人，愚弄人，而使人「不成其爲人」，而類似於動物或者機器、人性受到壓抑，人的想像力、創造力和欲望無法發揮。因此，馬克思說「必須推翻那些使人成爲受屈辱、被奴役、被遺棄和被蔑視的東西的一切關係」。<sup>(29)</sup>

然而，在社會主義革命後，馬克思的設想並未能夠開始逐步實現，反之，在史達林主義的影響下，中國也是一樣，「人化」的過程逆反成爲「機械化」的過程；人的主體意識和人的獨立受到侵害。在片面強調「集體主義」下，人的發展受到忽視，人的創造性、積極性受到壓抑，人性遭到扭曲，異化的現象層出不窮，這是社會主義優越性不能發揮，其發展遭到挫折的重要原因之一。

社會主義社會應當是使人真正「成其爲人」的社會。社會主義社會中的人的問題，人的自由解放問題，人道主義問題，異化問題應當成爲我們對社會主義再認識的一個重點。

## 五、關於共產黨

中共對中國革命的領導，從黨一建立就開始了，一九四九年建國以後，中共在全國範圍內（台灣除外）成爲執政黨，開始了對於整個國家的領導，建立了整個國家的領導體制。中共執掌政權之後建立的領導體制，與其他共產黨執政的國家大同小異。其基本特點，一是黨政不分，由黨對政府、軍隊、經濟、文化、科技等各方面以及對各群眾團體、民主黨派實行一元化的領導；二是以黨中央爲核心，實行高度的集權和統一指揮。概括地說，就是一黨專政、黨政不分，以黨代政。一黨專政又轉化成爲少數領導人乃至一個人的獨裁。這種一元化的高度集中爲特點的黨的領導體制，當黨處在地下狀況或戰爭的緊急狀態下，可能有其必要性。但已經可以發現其弊端。但是，當黨變成了執政黨，進入和平建設時期，特別當剝削階級已經消滅之後，這種以高度集中爲特點的領導體制就弊端很多了，諸如政權機關變爲黨的機關的附屬部分，處處受命於黨，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這種

領導體制，不僅把黨、政、軍權都集中到黨的手裏，而且把黨內的權力都集中在中央乃至中央主席手裏，當然談不上民主建設。中國在「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共內領袖集權達於頂峯，形成了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和個人獨裁。「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搞得起來，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黨的權力不受限制，而黨的領袖的權力在黨內也不受限制，憲法和一切法律關係都被隨意取締，公民權利失去任何法律保障，民主和人權被踐踏，一九八九年民運之被殘酷鎮壓，其後繼之而來的「白色恐怖」也是這個原因。

長期以來，在現實社會主義國家中，一直視共產黨一元化的高度集中領導體制為當然。今天我們對社會主義再認識，就應該重新考慮這個看法。

首先我們看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關於黨的學說，他們並沒有提出這種領導體制。相反，他們在領導工人階級的政黨的活動中指出：(1)要堅持一項基本原則：堅持民主，反對個人迷信。恩格斯在談到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組織特點時說：「組織本身完全是民主的，它的各委員會由選舉產生並隨時可以罷免，僅這一項就堵塞了任何要求獨裁的密謀狂的道路。」<sup>③</sup>(2)工人階級要能夠自己解放自己，要靠聯合，爲了實現聯合這個基本原則，馬克思恩格斯認爲國際必須向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者敞開門戶，必須接受「追求工人階級的保護、發展和徹底解放」的一切工人團體。(3)他們反覆強調了黨內的批評自由，反對黨內專制。在黨內必須允許絕對自由地交換意見、爭論，甚至小的爭吵都是必要的。針對德國工人政黨的問題，恩格斯曾指出，「帝國最大的黨（按：指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存在不能不在黨內出現許多各種各樣的派別，所以即使是施韋澤式專政的假象也應當避免。」<sup>④</sup>

因此，共產黨的一元化高度集中領導體制，特別是一黨專政和黨內領導人的獨裁，在馬克思和

恩格斯那裏找不到合法性的根據。

最先明確而系統地提出關於黨的領導體制思想的是列寧。早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建立之初，他就提出了關於集中制的思想，其最基本的要求就是黨的領導機關必須擁有絕對的權力。<sup>32</sup>

列寧所闡述的黨的領導體制，包括以下幾方面：(1) 一黨專政，布爾什維克黨不與其他政黨分享政權<sup>33</sup>；(2) 黨政合一，列寧說：「我們是執政黨，所以我們不能不把蘇維埃的『上層』和黨的『上層』融成一體，現在是這樣，將來也是這樣。」<sup>34</sup> (3) 黨對國家的領導，仍然有秘密成份<sup>35</sup>。(4) 在黨實行像軍事紀律那樣的鐵的紀律，在整個社會中做到有最嚴格的統一意志，甚至在一定的工作過程中，在純粹執行職能的一定時期實行個人獨裁制。所以，首先提出和承認在現實社會主義國家中推行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是列寧。<sup>36</sup>

對列寧的論述，我們應該注意幾點：(1) 列寧的黨的學說是在沙俄的高壓統治下，共產黨處於地下黨時期提出的，十月革命後，又經歷了嚴峻的國內戰爭時期，也就是說在特定時期提出。條件不同了，應該有所變化。(2) 列寧即使在主張獨裁的同時也預見到這種體制可能產生的弊端，因此也主張要實行多種多樣的監督，杜絕毒害蘇維埃政權的一切可能性。(3) 在內戰結束以後，進入建設時期，這種領導體制的弊端更爲明顯，列寧提出了解決黨政不分問題和民主化問題，但他受到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再加上他的逝世，沒有提出解決的具體辦法。

史達林思想體系的最大特徵，就是把列寧在黨處於非常時期所闡述的一切論述都當作普遍原理加以強化和發揮。並把其中某些觀點進一步絕對化，從而造成一種十分僵化的體制。這種體制的一個重要特點，即把領導和專政緊密地連在一起，把黨的領導作用的最高表現視爲黨的「專政」<sup>37</sup>。

這種體制，使黨的領導中原有的弊病進一步發展了，並導致政治生活中不斷出現不正常的東西和嚴重的悲劇。

史達林所建立的領導體制，從根本上來說，是把國家和政府的權力集中於黨內，同時又把黨內的權力集中到個人手裏。這種以高度集中為特點的體制，在政治上最典型的現象是個人崇拜和獨裁。在史達林領導的時期，個人崇拜現象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史達林恰恰是建立了這樣一種以個人專權為特點的制度。在這種制度下，任何不同的意見都是不能存在的，任何持不同意見的人和組織都是不能存在的。而維護這種制度的正是史達林個人所掌握的極大的權力和他所掌握的黨的專政的力量。由於這種體制也推行於其他現實社會主義國家，導致蘇聯和其他現實社會主義國家連續發生重大的失誤和危機。一九八九年遍及於現實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運動普遍要求取消共產黨的獨占地位絕不是偶然的。

我們應該根據當前的歷史發展時期，辯證的要求，從理論上批判列寧的、特別是史達林的建黨學說。如果說列寧的建黨學說是黨在地下時期和戰時、戰後經濟、政治都十分嚴峻的時刻提出來的，那麼，當黨已變為執政黨並已經轉入和平建設時期，那理應有所修正，史達林反而把黨的專政推到了極端，建立了自己的專政和獨裁，因而造成極大的危害。

一九七八年中國開始實行改革，中共領導人試圖在舊的政治框架內實行經濟改革，即所謂兩個基本點：堅持以共產黨的領導（實即一黨專政）為核心的四項基本原則和堅持改革開放，沒有把以最終取消國家壟斷和一黨專政的政治改革放在重要地位，以致兩個基本點經常發生矛盾，終於使改革陷於困境，因為經濟改革帶來更多的利益群體，出現利益多元現象，這就要求政治多元主義，即

在人民代表大會和黨內要求有不同的利益群體的代表。政治多元主義首先要求黨內民主，如馬克思、恩格斯所設想的黨內允許不同意見的存在和爭論，甚至不同的派別。然後逐步發展成爲結束一黨專政，實現政治多元，允許多黨制的存在。打破一黨專政，才能從根本上消除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通過黨內民主，逐步實現多黨制，實現黨政、黨軍、黨財、黨法的分開和取消黨對意識形態的壟斷，實現黨的現代化與民主化、國家的現代化民主化，是社會主義社會政治上發展的必經之路。

現在，世界已經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如果要使社會主義再生，我們必須對社會主義進行再認識、進行修正，並使之現代化。

一九九〇年五月

## 註釋

- ① 參閱 Mr. Z. "To the Stalin Mausoleum". *Deals*, winter issue (1989), excerpt in *New York Times*, Jan. 4, 1990.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89, pp. 3-35.
- ② Robert Heilbroner, "Reflections, The Triumph of Capitalism", *New Yorker*, Feb, 1989, pp. 98-109.
- ③ Carl Marzani, "On Interring Communism and Exalting Capitalism," *Special Supplement, Monthly Review*, Jan. 1990, vol. 41, no. 8, p. 2.
- ④ 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第三五—三六頁。
- ⑤ 《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第四七二—四七三頁。
- ⑥ 一九七六年華國鋒擔任黨中央主席時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

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錯誤方針。

- ⑥ Gilbert Rozman, *The Chinese Debate about Soviet Socialism 1978-1985*,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50.
- ⑦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七六〇頁。
- ⑧ S. 斯托揚諾維奇〈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布爾什維克化〉，〔英〕《國際實踐》一九八七年，第一期，第四五〇頁。
- ⑨ 史達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史達林文選》，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五七五頁。
- ⑩ 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一〇頁。
- ⑪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人民出版社，第三二四頁。
- ⑫ 轉引自《猛醒的時代》，中外文化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第一二二頁。
- ⑬ 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堅持改革、開放、搞活》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第六一—六三頁。
- ⑭ 同右，第五六頁。
- ⑮ 引自 Branko Horva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m*. (Armonk, N.Y.: M.E. Sharpe, Inc., 1982) p. 27-28.
- ⑯ Z.K. Brezinski and Carl J. Fredrick,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1956) pp. 9-10.
- ⑰ Michael Reiman, *The Birth of Stalinism*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loomington, 1987) p. 120.
- ⑱ 參閱 Guillermo O'Donnell, and others, *Transition from Totalitarian Rul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 ⑲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文版），（蘇聯）外國書籍出版局，一九四八年版，第四二〇頁。

- 20 史達林：〈關於蘇聯憲法草案〉，《史達林文選》，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九〇頁。
- 21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四二三頁。
- 22 鄧小平：《堅持社會主義必須擺脫貧窮》，《堅持改革、開放、搞活》，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第四一一頁。
- 23 格奧爾格·盧卡奇：〈民主化的現在與未來〉，（匈）《新匈牙利季刊》（英文版）第九七期，第一〇二頁。
- 24 〈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史達林文選》，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五年版，第五七三頁。
- 25 Harry Magdoff, "Are There Economic Laws of Socialism" in *Socialism on The Threshold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edited by Milos Nicholje, London: verso (1982) p.p. 125-127.
- 26 毛澤東：《政治經濟學讀書筆記》。
- 27 〈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會上關於戰爭與和平的報告〉，《列寧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四五五頁。
- 28 參閱：米克洛斯·阿爾馬奇：〈盧卡奇論民主〉，（匈）《新匈牙利季刊》（英文本）第九七期，第九七頁。
- 29 《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一卷，第四六一頁。
- 30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人民出版社，第二五一頁。
- 3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人民出版社，第四三六頁。
- 32 參閱《列寧全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第二一九頁。
- 33 同右，第二十九卷，第四八九、四九〇頁。
- 34 同右，第三十二卷，第一六〇頁。
- 35 同右，第二十九卷，第一三六頁。
- 36 同右，第三卷，第五二〇頁。
- 37 《史達林文選》，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四一五頁。



##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歷史命運

四十年前，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歷經艱難困苦，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勝利，特別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勝利。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在社會主義建設中，雖然同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除取得一定成績外，卻經歷多次失敗，艱難曲折地向前發展。其間，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時期，遭到慘重的失敗，經濟會瀕於崩潰的邊緣。從一九七八年開始，在改革和開放聲中，雖然在經濟和政治方面均有所發展，但幾經探索，迄今仍然在「摸著石頭過河」，未能找到新的有效的解決辦法。不僅如此，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北京學生和市民的和平的民主運動遭到慘酷的軍事鎮壓，在屠殺和逮捕的恐怖中，又出現了嚴重的政治的、經濟的乃至革命的危機。

與此相適應，馬克思主義在新中國的命運，出現了「興盛—衰落—危機—復興—新的危機」的曲折發展。

一、對社會主義認識模糊，加上列寧、史達林主義的惡劣影響，導致了史達林主義與中國封建的結合。

鄧小平在一九八四年承認「什麼叫社會主義？什麼叫馬克思主義？我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是完全清醒的」<sup>①</sup>。這種不清醒，不能不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遇到困難和曲折的一個重要原因。馬克思主義是西方工業資本主義發展的產物，是不可能有一個落後的農民國家裏產生的。雖然，早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馬克思及其社會主義學說已經開始被介紹到中國。當時，作為西方諸學說之一，畢竟影響甚微。

十月革命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當時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與其說是馬克思主義著作中的理論原理，勿寧說是列寧主義和後來更多的是史達林主義的實踐及其所提供的一種新的政治模式。毛澤東思想實際上大量承受了列寧、史達林的遺產，其中尤以史達林的遺產為多。

史達林主義本身就是沙俄亞細亞的專制主義和俄國戰時共產主義軍事獨裁統治的延續和變種。對中國有重大影響的封建主義傳統因與史達林主義結合而變得更難以摧毀。是以「一言堂」、家長制、特權思想、官僚主義、輕視法治等反覆在中國共產黨內出現。加以中國還是一個農民國家，農民所固有的空想民粹主義思想，以及屈從權力、迷信權威、崇拜偶像、渴望恩賜的習慣勢力對中國共產黨的制度也有所腐蝕，因之黨內反覆出現個人崇拜和個人專斷、唯意志論和「左」傾冒險主義。此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關於群眾、階級、政黨、領袖的理論上的偏差，對中國共產黨也有重大的影響。

這一切妨礙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清醒認識和正確理解，使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的認識比較幼稚和不成熟，多次導致指導上的嚴重錯誤，引起全面的或部份的失敗。

二、在民主革命時期，由於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理解比較正確而取得勝利。

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時期，對馬克思主義的運用是成功的。因為總結了兩次失敗的教訓，抵制了前面所說的錯誤思想和共產國際和史達林的錯誤指示，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從中國實際出發，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在民主革命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理解是正確的。

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及《七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中，根據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分析了中國社會的歷史和現狀，明確了中國社會的性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找出了一條在中國這樣一個落後的農民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即中國革命必須分兩步走，第一步，進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第二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中國必須經過長期的新民主主義的發展，才能達到社會主義。毛澤東本人曾批判了代表農民思想的空想的民粹主義。他說：「沒有一個新式資產階級性質的徹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廢墟上建立起社會主義來，那祇能是完全的空想。」<sup>②</sup>他又說：「報告（按：指《論聯合政府》）對資產階級作了充分肯定，我們黨內有民粹主義思想存在，就是想直接從封建經濟到社會主義經濟，不經過資本主義。」<sup>③</sup>他還明確號召「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幸福、富強的新中國」。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並非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這是在中國這樣一個落後的農民國家裏建設社會主義的唯一正確道路，要引導中國人民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這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一個高峯，也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創造性的發展。以後的事實證明，遵循這條正確的道路就能取得勝利。而一切失誤、困難、危機和災難都是由於違背了這一條馬克思主義的道路。

三、忽略了民主主義啓蒙和一邊倒向蘇聯導致左傾思想抬頭，而反右更把中國推向左傾冒險主義的深淵。

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到一九五二年國民經濟的恢復，正是根據上述的正確道路，分析了當時的形勢和任務，對資本主義採取了比較正確的態度，使得我們在這三年中得以有條不紊地進行工作，勝利地完成了繁重的社會改革任務和恢復國民經濟的工作。這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興盛時期，在群眾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這個時期有兩件事對以後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

一是在土地改革成功地消滅了封建主義的經濟基礎後，忽略了反封建的民主主義啓蒙，並隨著一九五一年的「抗美援朝」和「三反五反」運動，在沒有深入進行反封建的時候，大反了資本主義，致使封建主義的遺毒直到今天對中國仍然具有深遠的影響。

一是遵照毛澤東的「一邊倒」的政策，強調無條件地向蘇聯這個「社會主義老大哥」學習。這一方面表現在意識形態方面，以史達林主義為基本內容的蘇聯學術著作和體系極大地影響了中國學術界，深受把馬克思主義僵硬化、教條化、神聖化乃至歪曲的史達林主義的影響。另一方面，表現

在制度方面，即開始傾向於權力高度集中的史達林的社會主義模式和建設道路。

在這個時期，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大專院校的調整，以及各種批判所謂資產階級學術思想都是在這種影響下進行的。

這兩件事導致毛澤東在建國以前所設想的正確的發展道路迅速告終。一九五二年《毛澤東選集》經他自己修訂出版時，把前引的正確觀點都刪除了。不顧生產力的發展狀況，要求直接迅速地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空想的民粹主義思想和「左」傾思潮開始抬頭，並不斷深化。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開始衰落。

在不斷批判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之後還在搞「新民主主義」是右傾的錯誤的同時，毛澤東在一九五二年九月，很快地提出了中國共產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僅僅三年之後，很快地走上了革命的第二步，即社會主義改造階段。急於向社會主義乃至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左傾」思想日益佔上風。

按照毛澤東自己的設想，農業、手工業和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應該與國家工業化並行，至少要有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結果，不到三年，這種改造就提前完成了。這時，按照史達林的社會主義標準，在全國形成了過份單一的所有制結構和過度集中統一的僵化的經濟體制，以及與之相應的權力過分集中的政治體制。在一九五六年宣佈社會主義在中國已經基本建成，而國家工業化不過剛剛起步。如果這能叫社會主義的話，那不過是不夠格的社會主義，是個早產兒。

如何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來解釋呢？毛澤東的回答是：「在農業方面，在我國的條件下，……則必須先有合作化，然後才能使用大機器。」④而合作化之所以能夠實現和堅持鞏固，其基礎

不在於生產力的發展而在於有一種嚴重的思想和政治鬥爭作為改變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動力和保證，而思想和政治鬥爭歸根到底就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於是，階級鬥爭和政治的作用漸漸被誇大到荒誕的地步，所謂「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所謂「政治是統帥、是靈魂」、「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線」，這實質上是一種唯意志論，離開馬克思主義越來越遠了。

在以政治掛帥、急於過渡的思想指導下，從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後，對改造的要求過急，實質上是對農民和資本主義工商業採取剝奪的辦法「跑步進入社會主義」。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滿足於社會主義改造的成就，把堅持思想政治教育、兩條道路的鬥爭，不斷批判「右傾」和「右傾機會主義」，並掀起群眾運動，來發動、鞏固、發展社會主義所有制和實現整個生產關係變革看作普遍適用的方案，這就使全黨逐漸陷入「左」傾的嚴重錯誤。

這種「左」傾思想在黨內曾一度受到抵制。一九五六年一月黨中央召開知識份子問題會議，隨後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問題，五月提出「反冒進」問題，九月舉行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大會，在赫魯曉夫反史達林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影響下，指出國內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這是中國共產黨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試圖在中國糾正教條主義與空想的民粹主義的最後一次嘗試。

這次嘗試被毛澤東一筆鈎銷了。他在一九五六年四月下旬對「反冒進」已經有所保留。他在一九五七年二月所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隻字不提社會主義主要矛盾，已經比「八大」決議有所退步，但是還著重批判了教條主義和「左」的錯誤。當時聽到這次講話的人，

包括我在內，都非常興奮，以爲一九五六年春開始比較開放的進程將繼續得到發展。

形勢很快逆轉，在所謂要求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的過程中，不少知識份子提出了許多尖銳的批評意見。毛澤東被這些意見駭壞了，當時爲之生了一場病。於是，他準備反擊。這時，他對國際、國內階級鬥爭的形勢作出了錯誤估計。一九五七年三月他在供黨內幹部閱讀的〈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中，把剛剛開始的反教條主義鬥爭停止，轉向所謂反修正主義鬥爭。在內部已經著手組織反右派鬥爭了。

隨著反右派鬥爭的倉卒來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在六月十九日公開發表，使得過去聽過他二月講話的人目瞪口呆，不僅調子變了，例如從強調反教條主義轉向所謂反修正主義，從強調人民內部矛盾轉向階級鬥爭，從反「左」到反右，而且在理論上留下許多自相矛盾的痕跡，出現了某些「左」的萌芽。

一九五七年七月毛澤東的〈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該批判〉發表，公開宣布了反右派運動的開始。「左」的萌芽發展爲「左」的錯誤。

在這次運動中有五十五萬多人（主要是知識份子）被打成右派，是中國歷史上一大冤案。「雙百方針」鼓舞下出現的文學藝術學術思想的繁榮一下子變成了鴉雀無聲。毛澤東思想跌落到僵化倒退的階段。自此以後，在毛澤東以後的理論與實踐中，不斷升級的反修正主義壓倒和窒息了反教條主義，不斷升級的階級鬥爭壓倒和窒息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不斷升級的個人迷信和文化專制主義壓倒和窒息了民主思想和「雙百方針」。毛澤東率領全國人民日益陷入空想的民粹主義和「左」傾冒險主義的深淵，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日益陷入危機。

四、毛澤東的個人專斷作風，把史達林主義推向極端，背離了馬克思主義，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

在高壓政策下推行的反右派運動使廣大社會噤若寒蟬，毛澤東認為這是政治思想上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他著手進行他的更大的「左」傾冒險主義了。一九五八年中國共產黨的八屆二次會議通過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總路線帶有濃厚的「左」的色彩。八月的北戴河會議把「左」的思想推到了高峰，這次會議以後，以大辦鋼鐵為中心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猛烈地衝擊全國，整個國家處於極度的狂熱之中。在所謂「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這樣的唯意志論的口號下，在毛澤東批判「觀潮派」、「秋後算賬派」和進行所謂「插紅旗、拔白旗」運動的壓力下，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嚴重氾濫，經濟工作完全陷於混亂。

「三面紅旗」（指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是一次唯意志論的空想的民粹主義的實踐。它不依靠生產力，而妄圖依靠生產關係的急劇變革和人們思想政治覺悟提高來達到共產主義的理想社會，完全違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

一九五九年毛澤東開始糾正他所觀察到的錯誤，並開始重視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經濟理論的學習和研究，但是他的認識還受著當時「左」的指導思想的影響。一九五九年七月廬山會議上，毛澤東錯誤地發動了對彭德懷的批判，進而在全黨錯誤地發動了「反右傾」鬥爭。這場鬥爭在政治上使黨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使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逐漸升級；在經濟上打斷了糾正「左」傾錯誤的進程，使錯誤延續了更長的時間。主要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中國國民經濟在一九



五九至一九六一年發生嚴重的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

一九六〇年冬，中共中央開始糾正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並且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堅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制定和執行了一系列正確的政策和措施。這些在經濟上實行反「左」的方針，使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六年國民經濟得到了比較順利的恢復和發展。

但是，「左」傾錯誤在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並未得到徹底糾正。一九六二年九月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定範圍內存在的階級鬥爭擴大化和絕對化，實質上提出了「以階級鬥爭為綱」這個「左」的指導思想，發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以後提出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觀點，進一步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資產階級都將存在和企圖復辟，並成為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根源。它的哲學基礎則是毛澤東強調矛盾的鬥爭性、對立性，並進而把矛盾等同於對立、對立等同於鬥爭的一種有完備形態的鬥爭哲學。這是遠離馬克思主義的史達林主義哲學的翻版。經濟領域反「左」、政治思想領域反「右」，是不能長期協調並存的，要麼反「左」佔上風，要麼反右佔上風。由於中國共產黨內長期存在著「左傾思潮」，反右終於佔了上風，出現「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左」傾路線。

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在部分農村和少數城市基層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由於把各種不同性質的問題都認為是階級鬥爭或者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層幹部受到不應有的打擊。在一九六五年初又錯誤地提出了運動的重點是整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意識形態領域，也對一些文藝作品、學術觀點和文藝界學術界的一些代表人物進行了錯誤的、過火的政治大批判。在對待知識份子的問題，教育科學文化問題上發生了愈來愈嚴重的「左」

的偏差。在對待史達林主義問題上，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出現的反對史達林主義的最初嘗試，作了完全錯誤的判斷並予以抵制；在所謂關於國際共產主義總路線的論戰中把史達林主義更加推向極端。這一切終於發展成爲「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

毛澤東在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理論和實際上的錯誤發展得越來越嚴重，既背離馬克思主義，也脫離中國的實踐；他的個人專斷作風日益損害黨內民主，個人崇拜現象逐步發展。由於制度上的缺陷，中共中央不能及時糾正這些錯誤，林彪、江青、康生這些野心家又別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長了這些錯誤，這就導致「文化大革命」的發動。

五、在以「階級鬥爭爲綱」的毛澤東思想統治下，實行了「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陷入危機。

隨著對階級鬥爭形勢的認識的不斷升級，毛澤東在一九六六年五月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在農民小生產的封建政治和封建道德的基礎上發生的，不過披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並和「無產階級專政」結合一起，因而具有極大的欺騙性和破壞力。

「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基礎是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理論」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按照這個理論，既然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始終存在著兩個階段、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那就要用「階級鬥爭」的觀點觀察一切，在一切領域都實行「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階級敵人」不但要在社會上去尋找，還要在黨內去尋找。因爲「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因此要實行「文化大革命」，向黨內一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這

種奪權鬥爭實質上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以後還要進行多次。

毛澤東的這種思想把馬克思主義歪曲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毛澤東思想被稱為「馬克思主義的頂峰」、「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凡是被認為「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人，都可以以思想犯治罪，甚至判處死刑，實行絕對的文化專制主義。同時極端誇大意識形態的作用，認為精神可以決定一切，甚至精神本身就可以變為物質。於是物質生活條件和經濟建設全部被忽視。誰要是多注意一些這方面，就被扣上「修正主義」、「唯生產力論」的帽子。因為思想是「統帥」、是「靈魂」，而當時唯一能存在的思想就是毛澤東思想，所以，凡事都要用「毛澤東思想掛帥」，全國人民的思想都要用毛澤東思想統一起來，人民不允許有獨立的思想。當時差不多所有的文化教育、科學藝術機構都癱瘓了，全國人民只讀一本書（《毛主席語錄》），只看一本雜誌（《紅旗》），只能欣賞八個「樣版戲」，思想被禁錮和被愚弄到如此程度，造成最嚴重的思想僵化。

「文化大革命」的種種倒行逆施，不僅把經濟和政治引導到崩潰的邊緣，整個民族的文化也遭到極其嚴重的摧殘。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陷入嚴重的危機。

六、既得利益階層，不願放棄特權，大開歷史倒車，使馬克思主義再度陷入危機。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幫」被粉碎了，但是毛澤東晚年的錯誤不但一直沒有被清算，而且在「兩個凡是」的口號下被堅持。所謂「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要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要始終不渝地遵循。」「兩個凡是」堅持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階級鬥爭為綱，政治掛帥和極「左」路線，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威信幾乎全都喪失，出現了

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危機」。

事實上，不打破「兩個凡是」就寸步難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將永無復興之日。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光明日報》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開始了對「兩個凡是」的批判。它論證了不論甚麼理論和政策、書本或講話，凡是被實踐證明是錯誤的，都必須糾正；凡是在實踐中證明是正確的，就有權利存在，就應該堅持，這是恢復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的先聲。

「兩個凡是」被粉碎了，為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在思想上準備了條件。一九七八年底舉行的三中全會，提出「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方針，決定結束「階級鬥爭為綱」，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結束了行之長久的「左」傾路線，恢復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中國進入了一個新時期，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開始復興。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復興，具有里程碑性質的是一九七九年一月中共中央召開的理論務虛會：務虛會前後用幾十天的時間集中討論了許多具有重大現實意義的理論問題，對歷史、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問題，都作了廣泛的討論，提出了許多值得注意的新見解。為改革和開放，為創造性地研究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作了思想上、理論上的準備。

三中全會以後，改革開始了，改革不光是反「左」，還要打破一切阻礙現代化的框框。許多舊框框不但一向被看成「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而且直接和一些人的利益聯繫著，這樣，現實生活中的不同利益和思想傾向，在改革中就逐漸分化並且明朗化了。這個事實在思想界反映出來，就是在「兩個凡是」被打倒以後，在思想界不斷出現的矛盾和鬥爭。

這種思想界的矛盾和鬥爭，祇要按照學術自由討論的原則進行，本來是好事，可以使真理愈辯

而愈明，使馬克思主義在新的條件下得到發展，可是在中國，由於文化專制主義的影響，往往有人以「理論權威」、「馬克思主義的純潔性」自居，依靠權勢由領導人作出結論，對不同意見的人進行批判，扣政治帽子，予以打擊。而今天中國的知識份子已經不是「文化大革命」時期那樣的「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的馴服的奴僕，因此，雖然在一次打擊之後，不得不沉寂一時，隨著時機的發展，又會再次提出新論點，重新活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思想界大體上就在這種「批判—沉寂—活躍」和「再批判—再沉寂—再活躍」的周期中渡過。通過每一個周期，都使馬克思主義得以隨實踐的發展而發展。

其中最突出的兩次批判運動為「清除精神污染」（一九八三年）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一九八七年）。相應地一九八二年、一九八四年、一九八六年、一九八八年則成為思想活躍的年份。這些年來，中國思想界提出以下一些主要問題：一、對馬克思主義的再認識：強調當前馬克思主義的危機和多元化，要以實踐、發展、創造、批判和開放的觀點研究馬克思主義。承認馬克思主義在某些方面已經過時；二、對資本主義的再認識：要區別現代資本主義和傳統資本主義，現代資本主義雖然不能擺脫其固有的矛盾，但較之傳統資本主義已經有不少變化，給生產力的發展提供了新的發展餘地，有相當大的適應力和彈性，因而對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主義的個別論斷應予以修正；三、對社會主義的再認識：要區別現代社會主義與傳統社會主義，廢除三、四十年代對社會主義的看法，承認傳統社會主義的弊病而要進行全面改革。承認社會主義的多元化，所有制的多元化，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的政治是民主化的政治，共產黨本身的改造和多黨制的可能；四、對人的價值和人道主義的再認識：指出「人」本來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人的解放是馬克

思主義的最終目的，人道主義是社會主義的首要條件。

雖然幾經曲折，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隨著改革、開放的實踐和思想解放的發展正在開始創造性的發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逐步恢復了生命力。

但是，中國社會中的享有既得利益的某些領導階層，從維護既得利益和相當頑固的史達林主義的價值觀念和思想方式出發，總是把改革、開放、發展馬克思主義看作背離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方向；即使有某些領導人贊成改革、開放，但不能逃脫經濟領域反「左」和政治思想領域反右的舊窠臼。在矛盾中往往讓反右佔上風，他們不能容忍打倒封建專制主義特權和專斷獨裁的民主要求，在「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之後，一九八九年六月藉口學生和市民的和平民主運動為反革命暴亂予以軍事鎮壓。他們在理論上必然又回到過去造成災難的「以階級鬥爭為綱」，強調政治思想的唯意志論和僵化的史達林主義那條道路上去。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又再度陷於危機，危機還在繼續發展中。

原載《百姓》半月刊，一九八九年，第二〇一、二〇二期

## 註釋

- ① 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增訂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第五十二頁。
- ② 轉引自《狂醒的時代》，中外文化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第一二二頁。
- ③ 同上，第一二二頁。
- ④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一八二頁。

## 編寫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若干問題

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的，之後又由爲數衆多的擁護者所接受、傳播、解釋並在實踐中發展了的理論的總稱。它是包括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並涉及到歷史學、社會學和社會政治觀點等衆多領域的一個理論體系。

如果說當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的時候，他們的學說儘管已經涉及到衆多領域，但尙未能對這些領域進行同等程度的論述。那麼，在我們的時代，馬克思主義這一思想體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傳播得更爲廣泛，對當代文化和世界歷史進程的影響更大。阿爾都塞曾說：「迄今我們仍遠遠未能從馬克思的理論中對馬克思的關鍵性的發現的影響作出評價並得出所有的理論結論。特別是，在『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領域中工作的專家們，即：經濟學家、歷史學家、社會學家、社會心理學家、心理學家、文學藝術史學家、宗教和其他意識形態史學家——甚至語言學家和心理分析家，所有這些專家應該知道，除非他們承認馬克思所建立的理論之必不可少，便不能產生新的科學知識，因爲，從原則上說，馬克思的理論是打開他們研究的『大陸』的科學知識的理論。」①

馬克思主義是一個思想體系，它所涉及的各個領域有著特殊的相互密切關係。這是因爲，首先，馬克思在理論上表達了社會歷史的發展趨勢和與這個發展趨勢相一致的工人階級的利益；其次，各

個領域所涉及的理論在邏輯上相互一致，相互交錯，相互補充，相互溝通，並在發展中相互促進。

②

現代科學研究一方面有學科的分支愈分愈細的趨勢，另一方面有逐漸向多學科交叉、綜合化、系統化方向發展的趨勢。後者由於長期被忽視。尤為現代學者所關注和着力進行。③

在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面，歷來著重於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三個組成部分的分別研究，缺乏作為一個理論體系的綜合的、系統的、多學科的研究。而從上面所述馬克思主義應被看作一個理論體系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缺陷。蘇聯哲學家格·格·季里根斯基博士認為：我們的一個通病是，在各學科之間總有一定的脫節現象。哲學家批判西方關於資本主義問題或廣泛的社會發展問題的理論時，往往不大注意依據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學的研究成果。共同合作，才能提高意識形態工作的效果④。就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來說，也有同樣的情況，即馬克思主義哲學史、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史的研究比較多，而對馬克思主義發展史進行綜合的、系統的、多學科的研究則付闕如。

就國外來說，柯爾（Cole, G.D.H.）的五卷本《社會主義思想史》庶幾近之，然而它的範圍大大超過馬克思主義，而且論及馬克思主義者甚少，更不要說是站在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了。以「馬克思主義史」命名的專著，大約以南斯拉夫弗蘭尼茨基（Vranicki, Predrag）一九六一年所寫的《馬克思主義史》第一版為嚆矢。其後又出版了再版、三版和四版的三卷本。流亡在外的波蘭人科拉科夫斯基（Kolakowski, Leszek）在一九八七年出版了三卷本的《馬克思主義主要流派》。英國的麥克萊倫（McLellan, David）教授於一九七〇年出版了《馬克思主義以前的馬克思》，一九七四年出



版了《卡爾·馬克思：他的生平和思想》，一九七九年出版了《馬克思以後的馬克思主義》。以英國倫敦大學的霍布斯鮑姆（Hobswarn, Eric）教授為主編，在一九七八年出版了四卷本的《馬克思主義史》，但是這基本上是一部比較系統化的論文集。

編寫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如何貫徹這一原則還有不少問題應該予以討論。現僅就以下一些問題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特徵。「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sup>⑤</sup>。基於實踐並在現代史上最具有實際影響的馬克思主義，既是解釋世界的方法，也是改變世界的指南。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史也應把這兩方面有機地結合起來寫，不能僅僅寫成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思想、著作和觀點論戰的歷史。馬克思主義首先是一種社會發展的學說，然後成為革命的無產階級的理論體系，然後出現了一系列馬克思主義所指導的無產階級社會革命運動，然後在若干國家經過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而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馬克思主義包括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體系，這一思想體系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制度的指導和影響及後者對前者的反饋。馬克思主義是通過這三方面的互相促進而得到發展的，既有理論，也有實踐<sup>⑥</sup>。當然，作為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不同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也不同於社會主義制度發展史，如何處理理論體系、運動和制度三方面的關係有待於我們研究。

霍布斯鮑姆在論及寫作馬克思主義發展史時對如何處理歷史事件的關係舉了一些例子可供我們參考。他說：「要寫一本十月革命或者列寧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的歷史，無論多麼簡單，不是我們的目的，而是要評價十月革命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的影響以及在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中十月革命的重

要性，這就是說，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中可以不講克倫斯基，高爾尼洛夫和「曙光」號巡洋艦，而是要談如下問題，諸如布爾什維克政黨的性質以及這樣一個政黨在革命中的作用問題，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向無產階級革命轉變的問題，預測無產階級權力（《國家與革命》）的性質、機構和方針的問題，在一個缺少建立社會主義某些關鍵性條件的國家（「莫斯科還是柏林？」），無產階級取得權力的問題，各派馬克思主義者對十月革命的態度問題，十月革命對各種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的影響的問題（布爾什維克主義和俄國模式的吸引力問題）等。這個清單只是爲了說明。」⑦

任何一個學說的歷史都不能夠與那一學說的社會進程分割開來，但是，作爲馬克思主義發展史，我們的著重點當然還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本身的發展，不過要在研究馬克思主義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影響及其所起的作用的性質和程度中，在研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事件和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和運行中的經驗教訓對馬克思主義自身發展的影響中，去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發展。特別要著重於創造性地總結社會主義國家發展中的經驗教訓，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論本身的發展。

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還要求我們編寫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不是爲學術而學術，也不僅要使馬克思主義還其本來面目，它在當時形成的背景和對當時的指導意義。而且要著意於「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從中吸取經驗教訓，去探討馬克思主義的理想如何有助於解決我們當前的問題。例如引起馬克思主義者廣泛討論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巴黎公社經驗教訓的總結，對於我們今天就有著重要意義。

二、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是活生生的思想體系。它永不終結，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列寧指出：「在馬克思主義裏絕沒有與『宗派主義』相似的東西，它絕不是離開世界文明發展大道而產

生的故步自封、僵化不變的學說。恰恰相反，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於他回答了人類先進思想已經提出的種種問題。」<sup>⑧</sup>馬克思本人就是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最廣泛地吸取了當時人類知識的一切有價值的東西，將其綜合、總結、充實、直到革命的改造，以此來回答社會發展所提出的新問題，從而建立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正在於從不斷發展着的實踐中吸取自己的生命之泉。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就其根本的特徵來說不是「宗派主義的」，而是以辯證唯物主義為基礎的最富於開放性精神的。

「宗派主義」的典型例子莫過於中國的儒家的道統思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孟軻之死，不得其傳焉」<sup>⑨</sup>。墨守成規，非聖人之言不敢言，必然導致學派的僵死終結。究其實際，即使是儒家的學說也不可能一成不變，按去孔子未遠的《韓非子·顯學》篇記載，「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孔子以後的儒家內部已經分為八派：「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東正氏之儒」<sup>⑩</sup>。以後，當然派別更多了，如果只承認單線相傳的道統，那儒家早就終結了。

「主要在本世紀二十年代後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和我們黨內盛行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錯誤傾向」<sup>⑪</sup>及在其影響未能消除的年代裏，有一種流行的看法，似乎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史就是馬恩列斯的著作史，把這四位古典作家的代表作串講起來，馬克思主義史就囊括無遺了；非馬恩列斯之言不敢言，其他馬克思主義者的貢獻只能是具體「闡釋」和「應用」，若有不同的看法就被視為錯誤或「異端邪說」；否認除蘇聯的社會主義「模

式」外還可以有其他的形式，否認除史達林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外，馬克思主義在別的民族和國家那裏還可以有不同的特點和形式，即不同的解釋。這樣一些看法已被實踐證明是與馬克思主義本身發展的客觀狀況相違背的，照此辦理，只會使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研究走進死胡同。

現在，有些蘇聯學者，如格·格·季里根斯基博士也清醒地指出：「必須考慮到群眾的思想無論就知識或思想能力而言，都已經不是幾十年前的狀態。人們在智力上要求更有獨立性。如今已經不能再把意識形態與群眾思想的關係只看作是無條件地接受現成的思想公式的關係。……今天的群眾對意識形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們要求思想要有知識水準而且要有根據。」<sup>12</sup>

在我國，由於毛澤東晚年所犯的錯誤和「文化大革命」的破壞性影響，社會科學的理論研究陷於極大的困境。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改正了「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錯誤方針<sup>13</sup>，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就毛澤東思想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原則：

——要把毛澤東思想當作一種科學的思想體系，完整、準確地理解；

——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我黨許多卓越領導人對它的形成和發展都作出了重要貢獻」。<sup>14</sup>

——「不說毛澤東思想全面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不說它是馬克思主義的新階段」，而是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我們黨在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的過程中，的確有很多發展」。<sup>15</sup>

對於馬克思主義，我們可不可以採取同樣的科學態度呢？我認為原則上是可以的，即：

——馬克思主義應該是更大範圍的集體智慧的結晶。凡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本國的實際相結合而在實踐中進行鬥爭的各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人，凡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研究哲學社會科學、人文學科和邊緣交叉科學中的新問題的人，只要他們提出了符合實際的新理論，新見解，直接地豐富、充實了馬克思主義，原則上都屬於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一部分，哪怕他們的學說中包含某些缺點錯誤，或者他們一度（如前期）正確，後來脫離甚至背叛了馬克思主義。

這裡要講一個分寸，就是何謂「直接地」豐富充實了馬克思主義？這個分寸對於社會主義國家來說特別有針對性。因為在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裏，一切工作特別是精神生產都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進行的，很難說哪一個方面與馬克思主義沒有關係。但是要把所有這些方面的進展和理論成果統統寫進馬克思主義發展史，「馬克思主義史」就顯得過於「泛化」了。我們只能把諸精神生產領域裏那些既是自覺地從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出發，其理論成果又直接地對馬克思主義作出了重要貢獻的寫進去。

——既要突出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形式，也應該承認馬克思主義的特殊性形式，由於所處的歷史條件、現實政治社會條件、文化和地理條件等等國情的差別，對於馬克思主義當然會有基本上相同而具體方面有所不同的解釋。毛澤東說：「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特性。」<sup>⑩</sup>劉少奇更明確地說「要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sup>⑪</sup>

對此我們應該怎樣看呢？既然我們把毛澤東思想看作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換言之，即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形式，那麼，我們也應該承認馬克思主義具有其他國家（或民族）的形式。這也就是承認在一個共同的大前提下（即馬克思主義的最基本的原則），具有各國特性的馬

克思主義。一九八〇年五月五日中國領導人對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主席約瑟普·布羅茲·鐵托逝世的唁電中說：「以鐵托同志為首的南共聯盟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本國的實際相結合創立了適合本國情況的社會主義自治制度。」<sup>16</sup>一九八四年六月十一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義大利共產黨總書記貝林格病逝的唁電中說：「他努力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同義大利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繼承和發展了葛蘭西和陶里亞蒂的思想，為探索義大利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進行了不懈的努力，為義大利共產黨的建設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sup>17</sup>這就是說，南斯拉夫的社會主義自治制度和義大利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都是具有本國特性的馬克思主義。

在史達林時代，只承認他解釋馬克思主義的權威，「定於一」，各國都要「不折不扣」地照搬照辦，這只會使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在建國以前，毛澤東就是不拘於它的束縛，才有了立足於本國實際的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並據之以取得革命的勝利。我想，置身當代，著眼未來，我們也應該這樣。

當然，這裡也必須有一個界限：只有那些或者自己明確承認從馬克思主義出發的理論學說和觀點；或者是在馬克思主義背景的直接啓發、影響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理論學派；或者是受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的影響啓發，而試圖在馬克思主義的幫助下解決實踐問題的理論嘗試，以及在歷史上屬於主要由馬克思主義者發起和從事活動的機構（如各個「國際」）的組織及其理論家的學說觀點，才能納入馬克思主義發展史這個框架中。由此，像公開拒絕馬克思主義的英國費邊社這樣的社會主義，就不能納進來。而像「伯恩斯坦主義」、「考茨基主義」以及蘇聯的布哈林、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和當代西方的各種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則應包括在內。

如果以「系譜樹」爲例，馬克思和恩格斯爲其主幹，各國、各個時代、各個具有各國特性的馬克思主義者則爲其分枝。馬克思主義本身則是一棵本固根深、枝繁葉茂且不斷滋長的大樹。

如果以長江大河爲例，馬克思和恩格斯爲其源頭，各國、各個時代、各個具有各國特性的馬克思主義者則爲注入江河的支流。馬克思主義本身則是一條源遠流長、百川匯集、流域廣袤的長江大河。

瑟露蒂 (Cerutti, Furio) 認爲：「精確地說，馬克思畢生致力的事業，不是要使得馬克思主義成爲經典，而是不斷地把他去發現社會進程內在聯繫的新因素加以汲取、結合：既關心自然科學有關新學說的發展，如進化論，也關心新科學的發展。如在他晚年所發展的人種學。」<sup>20</sup>正是這樣，馬克思主義方有可能把歷史發展進程中可以達到的一切積極的成果予以吸收、補充進來，予以改造並把它提到更高的水準。

三、馬克思主義是在鬥爭中前進和發展的。馬克思主義發展中，不可避免地，一個重要的部分就是有關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史。

這裏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馬克思主義對其他錯誤觀點的批判，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具有批判性的。馬克思主義在其誕生過程中經歷了反對魏特林的空想共產主義的鬥爭，反對格律恩的「真正社會主義」的鬥爭，對蒲魯東的唯心主義的批判以及對各種非科學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學說的批判考察。馬克思在其經濟思想、特別是剩餘價值理論的形成過程中，經歷了對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的批判和革命的改造。在第一國際裏，馬克思及其擁護者領導總委員會進行了反對蒲魯東主義者、馬志尼分子、拉薩爾主義者、工聯主義者、巴枯寧主義者和布朗基派的鬥爭。凡此諸鬥爭，都對馬

克思主義的建立發展和趨向完備起著不可或缺的推動作用。這些都是馬克思主義發展中不可缺少的。

另一方面是來自其他方面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對這些批判的反批判也構成了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一部分。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系統性的批判檢驗開始於十九世紀的最後十年<sup>②</sup>。在經濟學方面，最早的批判性的評論來自華格納 (Wagner, Adolph)。系統的批判則來自桑巴特 (Sombart, Werner) 和龐巴維克 (Bohm Bawerk)。後來，對馬克思經濟學說的批判，主要在於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核心——價值論、剩餘價值論和利潤率下降趨勢學說，批判者包括著名的資產階級學者米塞斯 (Von Mises)、海耶克 (Hayek) 和薩繆爾遜 (Samuelson) 等。最近，批判則集中於「轉形問題」(即馬克思對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的論述)。

在社會學方面，批判主要來自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學的奠基人韋伯 (Weber, Max) 主要反對唯物史觀。涂爾幹 (Durkheim, Emile) 則認為馬克思主義過分強調經驗因素和階級鬥爭的重要性。後來受韋伯影響的還有曼海姆 (Mannheim, Karl)、阿隆 (Aron, Raymond) 和米爾斯 (Mills, C. Wright)。

最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批判集中於階級問題、國家問題、政治學和歷史科學問題。

除開以上資產階級學者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批判以外，衆所周知，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哲學理論的批判還來自馬克思主義陣營內部的修正主義者，公開宣稱自己的非馬克思主義甚或反馬克思主義立場的西方「馬克思學」家，以及某些宣稱自己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無論那一方面，它的產生都有一定的歷史背景，我們應該對它們採取分析、研究、批判、



乃至革命的改造的態度。分別情況，應付挑戰。在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史中，上述內容都值得我們扼要地論及並加以適當的處理，因為儘管它們有的是站在反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講話，但由於它們試圖對馬克思主義進行「窮根究柢」的分析或針對其某一論點提供一種「可以替代」的東西，從而提供了一個急速變化著的世界的某些最新「訊息」，這就有助於激發我們的思考和促進馬克思主義在論戰中發展。而馬克思主義者對這些批判的反批判必然促進了馬克思主義本身的發展。恩格斯所寫的《反杜林論》可以說是最著名的例子。當然，這不能占主要的地位。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不能寫成一部批判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要著重於從正面展開論述。

四、馬克思主義隨時代的發展而發展，編寫馬克思主義發展史應該有時代感，應該能充分反映當代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成果，表達八十年代的觀點和研究水平。也就是說，要能夠根據八十年代的知識水平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原則立場來進行寫作。

霍布斯鮑姆在他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史》的序言中說：「我們的著作無疑地將表達七十年代的觀點，但是我們希望它的價值實際上能保持十年到二十年。」<sup>22</sup>

霍布斯鮑姆這句話是正確的，因為寫歷史雖然要有一定的穩定性，但是不能一勞永逸，歷史確實要不斷地重寫。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也要作如是觀，這是因為：

首先，馬克思本人和馬克思主義者的手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大量文獻和資料的發現和公布，迫使我們一再地要研究新材料，運用研究出來的新觀點補充或替代原先的觀點。

馬克思的《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和眾多的《經濟學手稿》以及馬克思晚年對農業的俄國的研究的公開發表並譯成各國文字，對於馬克思早期思想、中期思想、晚年思想乃至整個馬克思

思想的研究不能不發生重大的影響。《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是一九三二年用德文發表的。《經濟學手稿》是一九三九—一九四一年用德文發表的。由於戰爭的破壞，一直到一九五二年重新發表。六十年到七十年代，才譯成幾種歐洲文字，一直到一九七九年才全文譯成中文，正式發表。因此，在此之前是無從進行研究的。馬克思一八八一年《給維·伊·查蘇利奇的信》及這封覆信的四個草稿，雖然最後在一九二六年已經出版，但是，近年來才引起學者們的研究興趣<sup>24</sup>。《列寧全集》以前的版本中被刪去了一部分、列寧患病期間列寧秘書的《日誌》以及列寧《遺囑》的公布，也不能不對列寧晚年思想的研究產生重大影響。而這些只有在史達林逝世之後，幾經曲折，才能被公諸於世。其次，隨著時間的推移，歷史連續不斷地發生許多重大的事件。這些事件或證明某些理論的有效性、侷限性和無效性、或對原有的理論補充了新看法，或提出了新的問題。這些新的實踐和問題使得我們的視野擴大，水平提高，成為我們新認識的泉源，重新實事求是地和批判地審查以前對馬克思發展史的看法就成為必要。波蘭學者亞當·沙夫有一個很有趣的說法：「馬克思用一句有名的比喻來說明這個問題，他說，人體解剖對於猴體解剖是鑰匙。這也適用於馬克思本人和他的著作。」

24 第三、即使沒有掌握新的歷史文獻，僅是我們對於世界的認識和發展規律的認識的深入，也有必要重新審查過去的一些傳統看法。

因此，我們今天編寫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必須依據八十年代的資料，從八十年代的實際出發，根據八十年代的認識，按馬克思主義發展史本來的面目來寫作，並有利於實際解決社會發展中的當代問題，求其相對穩定，但是要能如霍布斯鮑姆所說，其價值能維持十年到二十年，那就感到極大

的欣慰了！

五、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分期問題。如前所述，馬克思主義的特點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它是特殊歷史條件的產物，不可避免地隨歷史條件的改變而改變（這些歷史條件當然指重大的歷史轉變，包括勞動人民的起義、革命運動、重大事件，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地理擴散，類似產業革命的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的發展，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發展到新的階段，乃至帶歷史性的沉痛教訓的總結）。凡此種種，可以是獨立的、客觀的發生的事實，也可以是由於靈活地成功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成果，還可以是由於違背了馬克思主義而導致的結果。不論怎樣，它們都會帶來馬克思主義本身的發展乃至某些原理（這裡面當然包括馬克思主義的戰略策略）的修改。

正由於這些歷史事件的發展變化一般地與理論上的重大變化有著一定的映照關係，這就便於我們根據它們的相互影響而劃分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歷史分期。

從國外出版的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書來看，大概有這樣幾種分期法。

弗蘭尼茨基所著《馬克思主義史》，第四版，三卷本，基本上按編年史的原則，論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著作及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的發展。

第一篇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從革命唯心主義時期（一八三七—一八四三）寫至馬克思和恩格斯生命的最後一個時期（一八七〇—一八九五）。

第二篇是第一國際和第二國際時期的馬克思主義（不包括馬克思和恩格斯）。

第三篇是列寧。

第四篇是第三國際時期的馬克思主義（不包括列寧）。

第五篇是當代的馬克思主義。

另有四個分篇，是按地區或國別分的馬克思主義，包括：一、「社會主義陣營」中的馬克思主義；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三、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馬克思主義；四、馬克思主義和南斯拉夫革命。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編寫中如何把歷史進展（即按時間序列）與地區的擴散有機的結合是一個難題，弗蘭尼茨基只好採取分篇的辦法。但是，把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思想發展與各個國際分開似也與歷史進程不一致。

麥克萊倫所著《馬克思以後的馬克思主義》一書（一九七九年版）則分為五部分：一、德國社會民主黨；二、俄國馬克思主義；三、兩次大戰之間的歐洲馬克思主義；四、中國和第三世界；五、當代歐美的馬克思主義。他是這樣把歷史發展和地區的擴散結合起來的。

霍布斯鮑姆編的《馬克思主義史》，分為四卷：第一卷，馬克思時代的馬克思主義；第二卷，第二國際時代的馬克思主義；第三卷，第三國際時代的馬克思主義；第四卷，當代馬克思主義<sup>②</sup>，該書基本上是按三個國際和當代來分卷的。但在每一卷卻是按專題來分析論述的。我們認為按三個國際及其以後的時期來分卷無可非議，而每卷分專題來寫似乎失去作為一個整體的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意思，與霍布斯鮑姆本人的分析也不一致。

我們建議把重大歷史事件和馬克思主義思想和主要著作和主要思想的發展結合起來，大致按時間序列綜合地論述。當然不能以某一年劃線，只能以時期來劃線。

第一卷為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的建立，大體上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馬克思向革命的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者轉變到八十年代馬克思的逝世，其中包括一八四八年的革命，第一國際的始末和巴黎公

社這樣重大的歷史事件。馬克思主義本身的發展則標誌著通過鬥爭建立了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

第二卷爲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時期，大體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第二國際的建立到二十世紀初第三國際的建立和十月革命。其中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國際的始末，第三國際的建立，十月革命這樣的重大歷史事件。馬克思主義本身則開始分裂爲各個流派及列寧與修正主義的鬥爭。

爲了使馬克思、恩格斯時期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有一個完整的論述，頭兩卷合爲一卷，分爲上、下篇也無不可。第三卷爲第三國際的馬克思主義時期，大體上始於十月革命到中國革命或更延伸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史達林逝世，其中包括第三國際的始末，資本主義世界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的大危機、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和東歐人民民主國家的建立。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等重大事件。馬克思主義本身的發展，除在中國等這些經濟不發達國家有所創造外，特別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後，基本上是蘇聯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史達林爲代表）占統治地位，形成馬克思主義某些點上的停滯狀況，此種狀況以一九五三年史達林逝世，特別是一九五六年蘇共二十大而告終。故從思想史角度以延伸到一九五六年爲好。

第四卷爲當代馬克思主義時期。這個時期的特點包括戰後資本主義制度的變化和全面危機、科學技術突飛猛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和各社會主義國家中發生一系列重大的事件。馬克思主義本身的發展，則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一個中心之告終與各國馬克思主義者從各國實際出發把與馬克思主義同各國實際結合而出現具有各國特性的馬克思主義，同時各個階級和各個階層對馬克思主義提出各種不同的解釋。由於當代馬克思主義之多元化，這一卷可按各國特點分別寫成五個部分：一、馬克思主義在蘇聯東歐國家；二、馬克思主義在南斯拉夫；三、馬克思主義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

四、馬克思主義在第三世界國家；五、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對以上一些新情況、新問題作出正確的評價是這一卷的重點。

編寫馬克思主義發展史是我們的一項新任務，我們一定要按照解放思想、開動機器、實事求是，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的精神，通過討論，寫出八十年代高水準的馬克思主義發展史。

### 〈附錄〉

霍布斯鮑姆對他的歷史分期的解釋：<sup>26</sup>(1)一八四八年～一八五〇年以前，這是社會主義的來源和馬克思的思想的形成時期。它和早期工業資本主義（1830年代——1840年代）的增長的第一次主要的危機相結合，這時期也是在某些國家中出現向工業資本主義過渡的危機；同時還有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危機。雖然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政治中積極參加並斬露頭角，從實際行動看還沒有馬克思主義運動。

(2)一八五〇～一八七五至八三年。這是十九世紀資本主義發展的古典時期；以英國為中心的自由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迅速成長，西方的主要「發達」國家中主要工業發展的第一個階段，伴之以民族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德國等）的一個國際體系的建立；歐洲大陸上一個工人階級運動的出現——第一國際——，第一次「不發達國家的危機」——第一次俄國革命運動；巴黎公社，這是最後一次雅各賓的革命和第一次無產階級革命——這一時期與馬克思的思想的成熟發展相結合，他第二次主要參加政治事務（在第一國際時期），然而，部分地除德國外，尚未存在有主要的馬克思主義運

動，馬克思的影響不大。這一時期的下限，如果按照歷史的變化，十九世紀的七十年代更合邏輯（經濟危機和轉折點是一八七三年，巴黎公社一八七一年，第一國際結束於一八七二年，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統一是一八七五年）；但是也許最方便的是採取馬克思逝世的日子，二者很少有實質上的差別，因為馬克思在七十年代初之後很少做理論工作或實際工作。

(3) 一八八三—一九一四年，這是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時期。其直接的背景是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第二次危機，一八七三—九六年危機和緊張時期。從這次危機走出來以後，就出現了資本主義的一個新時期（「帝國主義」），出現了新技術的、經濟的、社會的和政治的特徵，結果是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末馬克思主義者試行的新的戰略前景（有稱之為「馬克思主義的危機」的）。像德國社會民主黨那樣組成的群眾性工人階級政黨越來越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權威並在其領導之下，在東歐和南歐的農業的不發達國家中革命的馬克思主義運動發展迅速，都集結在第二國際周圍。

(4) 一九一四—一九四九年。可以因一九二九—三三的「大危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而分爲一、兩個主要的分時期，這是第三國際的馬克思主義時期，大致地說該時期從十月革命到中國革命。這是資本主義「總危機」（戰爭、革命、經濟崩潰、法西斯主義、戰爭）的時期，是十月革命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產生的時期，以及馬克思主義的運動傳播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世界而成爲第三世界革命的部分。這一時期的上限是明確的，一九一四年第二國際崩潰，這也是各種革命力量的早期發展。然後匯合起來形成布爾什維主義，並發展到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下限是有爭論的，因爲現在的世界是這樣的不平衡，以致沒有一個日期完全適合於全世界。然而，以中國革命爲下限有這些好處：

1. 強調殖民地解放運動的日益增長的重要性；
2. 與戰後資本主義的穩定性相結合。

這一時期有一個特點，就是朝向三個方面發展，必須分別加以研究，雖然要在相互影響中研究。即，1.發達國家，在一九一八—二三年世界革命的希望破滅以後，馬克思主義運動的革命部分（指完全的共產主義的）仍限於少數，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而只要在保持資產階級民主的條件下，改良主義的工人運動（包括保持日益減弱了的馬克思主義）盛行。2.東歐和南歐的不發達國家和第三世界，在那裏，很明顯地成爲國際革命前景的重心。3.在蘇聯，出現了一些革命後的問題。這三方面由共同的世界發展聯繫在一起，有時同時受到影響（戰爭、戰後的革命危機、蕭條、法西斯主義、戰爭），有時在時間序列上說並行出現一些問題（例如，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資本主義相對穩定和蘇聯的新經濟政策；蘇聯的工業化、集體化和資本主義國家的蕭條）。但是，還應看到，十月革命、蘇聯、日益強烈的俄國支配的單中心的「國際黨」、共產國際對革命的馬克思主義運動的全面支配。

(5) 一九四九年以後，這先是事實上的，後是合法的多中心的馬克思主義的時期。這是一九四一年以來國際資本主義的第一次普遍的和長期的穩定時期。這也是第三世界反帝革命的勝利的時期，勝利採取了普遍的政治非殖民主義化和社會革命的局部勝利的形式，其中諸共產主義國家的建立是最進步的標誌。而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勝利更是最重要的發展。再者，在這個時期，蘇聯把它的社會主義制度的類型推廣到若干歐洲國家，蘇聯發展成爲第二個世界強國，而在這些年間，國際體制建立在兩個對立的陣營。由於發展的情況多樣而複雜，這個時期首尾一貫的處理異常複雜。或者可以這樣看，這主要是馬克思主義擴展的時期，同時也有曲折。在這個時期內，對一九一四—四九年時期中中的分析和展望必須按照世界的所有三方面的發展予以廣泛深入的評論。

從實際考慮，證明把(4)(5)兩個時期合併起來較爲更方便，因爲在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五六年間，



世界馬克思主義無論就理論和實踐來說，是由單一的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這一事實所支配。這個運動承認以蘇聯為核心，以蘇聯共產黨為首。自一九五六年以來的馬克思主義的情況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的主要的中斷。而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國際資本主義也發生重大的變化，即長期穩定和前所未有的繁榮和世界經濟擴張的告終，並進入了一個持久的危機的時期。

原載《馬克思主義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三期

## 註釋

- ① 阿爾都塞·路易：《資本論》第一卷序，《列寧與哲學及其他論文集》，〔美〕《每月評論》出版社，一九七一年版，第七二頁。
- ② 參閱〈馬克思主義〉條。南斯拉夫《政治百科全書》。
- ③ 參閱·普里戈金，本人為《普里戈金與耗散結構理論》一書所寫的〈序言〉，陝西科技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出版。  
A·F·查爾默斯：《科學究竟是什麼？》，商務一九八二年版，第八八—九〇頁。
- ④ 參閱格·格·季里根斯基：〈思想鬥爭與大眾意識〉。〔蘇〕《哲學問題》一九八三年第五期，第一六四頁。
- ⑤ 《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一九頁。
- ⑥ 參閱蘇紹智：〈關於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幾個問題〉。《河北師範大學學報》，一九八三年，第二期。
- ⑦ 霍布斯鮑姆：《馬克思主義史》第一卷，〔英〕收穫者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序言〉，第一九—二〇頁。
- ⑧ 列寧：〈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列寧選集》，第二卷，第四四一頁。
- ⑨ 《孟子序說》。

- 10 《韓非子集釋》，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一〇八〇頁。
- 11 《中國共產黨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單行本，第四〇頁。
- 12 格·格·季里根斯基：《思想鬥爭與大眾意識》。（蘇）《哲學問題》，一九八三年第五期，第一六五頁。
- 13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單行本，第三四頁。
- 14 同上，第四〇頁。
- 15 《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六四頁。
- 16 《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五二二頁。
- 17 《答宋亮同志》。《劉少奇選集》上卷，第二二二頁。
- 18 《人民日報》，一九八〇年五月六日。
- 19 《人民日報》，一九八四年六月十一日。
- 20 瑟露蒂：《卡爾·馬克思的理論中的「活的」和「死的」》。見漢寧南等主編，《再思考馬克思》，（西柏林）爭論出版社，一九八四，第十四頁。
- 21 《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條，博特莫爾主編：《馬克思主義思想詞典》，（英）勃萊克威爾出版社，一九八三年，英文版，第一〇五頁。
- 22 霍布斯鮑姆：《馬克思主義史》，第一卷，〈序言〉，第七頁。
- 23 參閱：山寧(Teodor Shanin)主編：《晚年馬克思和俄國道路》，（美）每月評論社，一九八三年版。
- 24 沙夫：《今天的馬克思主義》。（波）《哲學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三期。
- 25 霍布斯鮑姆的分卷原則的說明見附錄。

② 霍布斯鮑姆主編：《馬克思主義史》，英文版，序言，第一三—一六頁。霍布斯鮑姆的分析雖然不無可以商榷之處，但是確實提供了一個細微、綜合的分析，可供我們研究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分期問題的參考，故譯出作為附錄。



## 馬克思主義：堅持什麼？發展什麼？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七日《人民日報》的「本報評論員」文章〈理論與實踐〉一文中說：

「馬克思逝世已經一〇一年了，他的著作是一百多年前寫的。有的是當時的設想，後來情況起了很大的變化。有的設想不一定妥當，很多情況，馬克思、恩格斯沒有經歷過，列寧也沒有經過，他們沒有接觸到，不能要求馬克思、列寧當時的著作解決我們當前所有的問題。」

這篇文章在西方報刊上引起強烈的反應。例如，美聯社報導的題目是：〈中國共產黨宣布，馬克思主義現在已經過時〉；合眾國際社報導的題目是：〈胡耀邦批准對馬克思主義的攻擊〉；日本也有不少報紙說中國已經放棄馬克思主義。這完全反映了西方某些人士對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的不了解，一廂情願，甚至曲解。

中國人民自從有了馬克思主義，才使得中國革命的面貌為之一新。中國決不會輕易放棄馬克思主義，這是毋庸置疑的。

《人民日報》這篇文章，針對現實生活中某些理論脫離實際的現象，強調指出理論必須密切結合當前的實際，是完全正確的和應該的。它講了一個道理，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就要創造性地發展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就要強調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堅持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決不能以背誦馬克思主義詞句爲滿足。從這個意義上說，這篇評論員文章不過是重申了中國共產黨的一貫主張，這一點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上早就說過了。在那次全會上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反對以教條主義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強調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歷史證明，如果我們不在馬克思的重大的個別結論上有所突破，我們的事業就不能發展。

### 歷史經驗的總結

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起，就確立以馬克思主義爲指導思想，並且強調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但是，由於理論準備的不足，經驗的缺乏和照抄照搬外國經驗的影響，堅持和貫徹執行這一原則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

在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經歷了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特別是幾乎使中國革命陷於絕境的王明的「左」傾錯誤，是由於受到了在本世紀二十年代後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和中共黨內盛行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和把共產國際決議、蘇聯經驗神聖化的錯誤傾向的影響，以極端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把本來是解放人們思想的、作爲革命的指南的馬克思主義變成僵死的教條和禁錮人們思想的精神枷鎖，脫離了中國革命的實際。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年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進行的延安整風運動，衝破了教條主義的束縛，這是中國共產黨建黨

以來的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延安整風從根本上解決了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問題，在全黨確立了理論聯繫實際的作風，使全黨的工作自覺地走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也就是毛澤東思想）的科學軌道。由於這個結合，創造性地、完整地、系統地形成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引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走向勝利。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後的一段時間，由於比較注意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比較順利地完成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

之後，我們面對著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落後的大國建設社會主義的任務，這在馬克思主義古典著作中沒有現成的答案，而蘇聯的模式又不完全適合我國的國情，因而這個任務更爲困難，更爲複雜。由於中國共產黨對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思想、理論準備不足，先後在經濟工作、政治工作、思想文化工作的指導思想上，發生「左」傾錯誤，偏離了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原則。甚至作爲這個原則倡導者的毛澤東自己，也在新的形勢和任務面前，陷入了盲目性，背離了這個科學原則。在一九五六年以後的二十年中我們又經歷了曲折發展的道路，先後遭到「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兩次挫折，特別是一「文化大革命」長達十年之久的全面性的左傾嚴重錯誤，使中國共產黨陷入嚴重的困境，造成了一次大災難。

中國共產黨認識和糾正社會主義時期的「左」傾錯誤費時更久，困難更大。這是因爲社會主義時期的「左」傾錯誤與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特別是與個人迷信緊密相連的，毛澤東在長期革命鬥爭中建立了豐功偉績，在全黨和全國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人們想不到他會犯錯誤，而且往往把他的「左」當成正確的加以擁護，加以黨內生活不正常，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壞，造成嚴重的個人迷

信和濫用權力。

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反對「兩個凡是」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的基礎上，總結了建國以來的經驗教訓，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慘痛教訓，提出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一切從實踐出發」的指導方針。要求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走上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科學軌道。十一屆三中全會衝破了對毛澤東個人迷信和教條主義的束縛，這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以來的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開創了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

從以上的歷史可以證明，中國的革命和建設要取得成功，必須反對教條主義和主觀主義，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走中國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因此，我們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決不是要放棄它，而是既要堅持，又要發展，在堅持中發展，在發展中堅持，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否則，我們的事業就無法前進。

### 堅持什麼

爲了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我們不能爲了在名義上捍衛他的全部遺產，或者爲了在名義上保衛馬克思主義的純潔性，而採取教條主義的僵化態度，我們應該分析和評論馬克思主義中哪些是具有生命力的。現時仍然有生命力的部分就是我們要堅持的。



馬克思主義中有生命力的部分就是我們所說的普遍原理。恩格斯說過，馬克思主義為進一步研究提供出發點和方法；列寧說過，馬克思主義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導原理。普遍原理指的就是出發點、方法、指導原理，用中國共產黨常說的話，就是立場、觀點、方法，這就是普遍的原理，這就是我們必須堅持的。即使在這方面也應該隨著時代和科學的進展而不斷發展。當然，馬克思主義在各個具體領域中也還有一些普遍原理，這裏難以一一列舉。但是就立場、觀點、方法來說，我認為，有以下幾個方面，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

——關於思維和存在、精神和物質的辯證關係的原理。存在是第一性的，它決定思維；物質是第一性的，它決定精神。思維和精神可以反作用於存在和物質；但是，歸根到底，總是存在決定思維，物質決定精神。把這個原理轉變為方法論，就是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

——關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基礎和上層建築的辯證的相互關係的原理。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同時，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也有反作用。但是，歸根到底，起決定作用的是生產力。把這個原理轉變為方法論，就是我們在觀察社會歷史發展的時候，在促進社會歷史發展的時候，都首先要注意生產力的狀況和生產力的發展。

——關於社會革命的理論。生產力的發展帶有某種進步性和主動性，但是生產關係的發展往往由於它的惰性而有一種落後於生產力發展的傾向。當二者的差距過大以致生產關係成為生產力進一步發展桎梏時，在階級社會裏，階級鬥爭的辯證法就會引起社會革命，使生產關係適合生產力。在剝削階級已經消滅的社會裏，矛盾的對立統一的規律也會導致革命，使生產關係適合生產力。當然，革命的形式和方法，與階級社會是有所不同的。這個原理轉變為方法論，在階級社會裏，表現為階

級分析法。在剝削階級已經消滅的社會裏，表現為人民內部矛盾的分析法，「無衝突論」是違反辯證法的。

——關於社會變革的主體力量的理論。在階級社會中，消滅剝削只符合於被剝削階級的利益，廢除作為剝削的基礎的所有制只符合於不占有生產資料的階級的利益，在資本主義社會，最適於承擔這一社會變革的主體力量是無產階級，無產階級要組織成為政黨以戰勝剝削階級的統治，建立自己的統治地位，以促進社會主義的變革。

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曾說：「每一時代的理論思維，從而我們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般歷史的產物，在不同的時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因而有非常不同的內容」<sup>①</sup>。因此，在馬克思主義創立之後，很多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所創立的馬克思主義作了許多詮釋和發揮，很難說每個馬克思主義者的詮釋和發揮都是一致的。但是，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應有共同的基本的立場、觀點、方法。

即使就馬克思所提出的方法論，也不是無可補充的。現今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馬克思本人在方法論上有兩個空白點。其一是心理學。民主德國馬列主義哲學研究所辯證唯物主義研究室舉辦了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動力問題」的討論會。在會上，哈恩認為，「在動力系統中，主觀因素日益成爲一個主要的環節」<sup>②</sup>。南斯拉夫經濟學家霍爾維特（Horvat, Branko）明確地說：「馬克思未能運用任何重要的心理學文獻，因為當時這一學科尚未建立；他更少運用實驗的心理學分析法，因為未能得到。因此，雖然馬克思的見識是卓越的，特別在社會心理學方面，馬克思主要仍保留著他那時代的理性主義的結論。這種理性主義妨礙他把他的心理學的見識用於分析社會。例如，他忽略了社

會化的影響，群眾運動的不合理性、民族主義等。因此，在他的他豐富的著作中缺乏對經濟刺激和其他方面刺激的分析。……在馬克思那裏，心理學被邏輯所代替，因此，運用馬克思的分析工具，不能解釋在法西斯主義統治下的德國工人階級的行為，南非工人的種族隔離態度，以及美國工人階級的保守主義。」<sup>③</sup>我認爲，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中應補充以心理學的分析是正確的。而迄今，很多馬克思主義者仍未能重視心理學的研究，而往往視之爲唯心論。

第二是數學。霍爾維特在同一文章中說，「馬克思時代只有一個數理經濟學家庫諾 (Cournot)，而他又是馬克思沒有注意到的重要經濟學家。馬克思某些天才的分析的創新被困於數字例子和計算上的錯誤」<sup>④</sup>。今天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仍缺乏數學的訓練，當然，我不認爲數學方法對社會科學是到處適用的，但是，凡是可以轉化爲量的關係的部分，數學方法是大有幫助的。例如用系統論的方法研究經濟問題，從理論上講，是可取的，因爲經濟問題不僅需要定性分析，還需要定量分析。

## 發展什麼

馬克思主義除上述的普遍原理外，還有一部分是運用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於具體實際而得出一個別原理或結論。這些個別原理或結論，總的來說，是可以因時間、地點、條件的不同，而有所改變的。即時間、地點、條件變了，個別原理或結論可以部分的改變或完全改變，或者叫部分的過時，或完全過時，需要根據今天世界和中國的實際，得出新的原理或結論。這就是我在本文中所述的馬克思主義中需要發展的部分。

我認爲，很難開出一個清單，具體地說明哪些個別的原理或結論需要部分改變或完全改變。因爲，如前所說，在馬克思主義創立之後，很多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所創立的馬克思主義作了許多不同的詮釋和發揮，西方近來常談到馬克思的馬克思主義、恩格斯的馬克思主義、列寧的馬克思主義、史達林的馬克思主義……等等。這種說法如果連它們之間的基本點都否定了，當然是錯誤的，如果指的是區別其個別的結論和原理，或者叫對馬克思主義的詮釋和發揮有所不同，則似無不可。因此，要在一篇文章中概括論述馬克思主義的哪些個別的結論和原理到今天仍然適用或已經過時，那是不可能的，需要多篇文章加以逐個地分析研究，最後集成一本專著。因此，我在這裏想指出的是，如何分析和如何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個別原理和結論，概括地說，可以有以下各種情況。

——經過實踐和歷史的考驗，只要具備一定條件，在這種條件下的個別原理和結論就是正確的。例如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基本分析，發現了剩餘價值規律，揭露了資本主義的剝削實質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即生產社會性和生產資料資本家私人占有的矛盾。只要具備資本主義社會的條件，這個結論就是正確的和有效的。可以說，這一種情況是類似普遍原理的部分。

——由於方法論上的缺陷所引起的結論過於簡單化，以致與實際不一致，如前所述，馬克思主義者往往缺乏對個人、集團、階級、社會的動力和行爲的研究——心理分析，亦即缺乏對主觀因素的分析。例如認爲一旦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勞動者成爲國家的主人，就會自覺地爲社會而積極勞動。實際上，社會主義社會的動力問題，包括所有引起和刺激人們行爲使之提高勞動生產率，促進社會的發展的問題，仍然是一個有待認真研究的問題。

——由於缺乏實踐或實踐的發展還沒有達到成熟的階段，馬克思主義古典作家沒有預見到或作了某些預見，而實踐證明並不如此，反而論點是不正確的。例如馬克思對於社會主義社會中不存在商品生產和貨幣的預見，實踐證明是不正確的。

——由於時間、地點、條件變了，馬克思主義古典作家的某些原來的論述已經過時了。例如，衆所周知的馬克思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曾論述社會主義在全世界或幾個主要國家取得勝利的問題，在壟斷資本主義時期，這就不對了。列寧提出了由於資本主義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規律，社會主義可以在一國取得勝利。到了今天，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儘管資本主義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規律的作用依然存在，但是由於跨國公司的發展和北大西洋條約，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社會主義在一國勝利已經相當困難了，由於這種情況使得我們有必要在許多方面發展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本人原來的論證是正確的，後來某些馬克思主義者對之作了錯誤的詮釋和發揮，因而有必要撥亂反正。例如史達林認為階級鬥爭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將隨著建設的發展和成功而日益尖銳化的論點，是錯誤地詮釋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又如，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毛澤東曾說：「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還說，「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類如上台，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sup>⑤</sup>。把按勞分配看成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並認為按勞分配易於產生資本主義要加以限制等，顯然是違反馬克思的原意的。

——馬克思本人原來的論點是可以研究的，而後來某些馬克思主義者卻企圖使之僵化。例如關

於社會經濟發展的單線論還是多線論，馬克思本人並沒有肯定，他早期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那句人所共知的名句，提出亞細亞生產方式，可以解釋為多線論；在他成熟期不再談論此問題，可以解釋為單線論；到他的晚年，提出俄國道路<sup>⑥</sup>，又可以解釋為多線論，而史達林卻肯定為單線論，這易於與僵化的歷史決定論的假設扯在一起。對這一類問題，應該恢復討論，以便發展。

——馬克思本人在某些問題上本來是有所論述的，但是這些問題被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所忽視。例如，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是同自由和民主分不開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一篇政治論文就是反對普魯士反動的書報檢查，維護言論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的。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原理》中，說明了社會主義革命的發展進程，首先將建立「民主制度」；接著通過這個制度建立「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sup>⑦</sup>，他們在《共產黨宣言》中說：「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sup>⑧</sup>把民主問題提到首要地位。恩格斯後來在《卡爾·馬克思》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導言》中強調說：「《共產黨宣言》早已宣布，爭取普選權，爭取民主，是戰鬥無產階級的首要任務之一」<sup>⑨</sup>。可見，他們多麼強調民主的重要性。而後來者對這一方面沒有進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特別在社會主義社會裏，造成了馬克思主義歷史上最大的理論和政治災難。這些問題有待於我們結合實際重新進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以發展社會主義社會，同時也發展馬克思主義本身。

馬克思提出了一些新的觀點，但由於當時條件的限制，而未能充分發揮，有待於後來的學者加以研究和發展。例如，現代的投入—產出分析法和經濟增長模式分析法，就是從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二卷的再生產圖式發展而來的。因此，有些學者認為馬克思是現代增長理論的前驅<sup>⑩</sup>。又如，馬

克思極爲注意技術人員和科學在社會轉變中的決定作用。現代許多學者認爲研究和發展這一思想，可以看到行將到來的人類文明新時代的萌芽<sup>①</sup>。而馬克思注意總體的分析，又開今天系統科學的先河。

——更多的情況是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馬克思主義古典作家沒有經歷過，沒有接觸過，當然沒有研究過。現代資本主義出現的新情況，如階級關係的新變化，跨國公司的發展，科學技術革命的作用，國家在經濟中的作用……等等；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國家中出現的新問題，如執政黨的建設問題，群眾、階級、政黨、領袖的關係問題，社會主義社會的階層劃分問題，社會主義民主和自由問題，共產黨之間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問題……等等，不一而足。這些新情況和新問題，我們都不能期待馬克思主義古典著作中給予我們現成的答案。有待於我們從實際出發，研究、解決並提出新的結論，從而發展馬克思主義。

以上各種情況說明我們爲什麼要發展馬克思主義以及從哪些方面發展馬克思主義。當然這些情況以及所舉的例子遠非完全，不過說明馬克思主義有待於我們發展之必要和方面之多而已。

原載《馬克思主義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一期

## 註釋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〇卷，第三八二頁。

② 馬特斯、舍恩黑爾：《社會主義社會的動力問題》（民主德國）《德國哲學雜誌》，一九八五年，第二期。

- ③ 霍爾維特：《馬克思對社會科學的貢獻及其失誤》〔美〕《實踐》（國際版）第四卷第三期，一九八一年十月，第三〇〇頁。
- ④ 同上。第三〇〇、三〇一頁。
- ⑤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無產階級專政》，人民出版社，第一、二頁。
- ⑥ 參見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列奇的信》及其三個覆信手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九卷。
- ⑦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二一九頁。
- ⑧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單行本，第四四頁。
- ⑨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二卷，第六〇二頁。
- ⑩ 霍爾維特：《馬克思對社會科學的貢獻及其失誤》。〔美〕《實踐》（國際版）第四卷第三期，一九八四年十月，第三〇二頁。
- ⑪ 蘇紹智、丁學良：〈馬克思對信息時代的預見〉，《人民日報》，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 馬克思主義的國際挑戰及其意義

一、馬克思主義一定要向前發展，否則就沒有生命力。

一百年前，一八八三年三月，當馬克思剛剛辭世的時候，他的學生兼戰友威廉·李卜克內西在他的墓前致辭道：「他並沒有死。他活在無產階級的心裏，他活在無產階級的思想裏。他的英名將永垂不朽，他的學說將日益發揚光大！」<sup>①</sup>

一百年來的全部世界歷史證明了這個悼辭的遠見卓識。

回顧過去的一個多世紀，我們曾看到馬克思主義取得的世界歷史性的勝利。馬克思主義創立的時，不過是衆多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學說中的一個流派。用恩格斯的話說，「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當四十二年前（指《共產黨宣言》發表的時候——引者注）我們在巴黎革命即無產階級帶著本身要求參加的第一次革命的前夜向世界發出這個號召時，響應者還是寥寥無幾。<sup>②</sup>可是，很快，馬克思的學說就戰勝了形形色色對立的思想體系，成爲國際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指導思想。在馬克思逝世四分之一個世紀以後，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的成功，把馬克思制定的科學社會主義由學說首次變爲現實。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又有一批國家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不論以後在某些國

家裏發生的歷史事件該作如何評價，蘇聯和一些國家裏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都應該被看作是無產階級革命對當時帝國主義世界鏈條上的薄弱環節的突破！

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崛起，第三世界其他國家的走向社會主義，使過去在歐洲風起雲湧的共產主義運動的巨大力量，也出現在其他各大洲的廣闊地平線上。

與馬克思主義成爲世界政治現實中的強大力量相適應，馬克思主義也成爲當代世界思想文化領域的強大潮流。人們不會忘記，在馬克思的《資本論》問世的時候，資產階級世界曾企圖以沉默來窒息它。而到了今天，沒有哪一個文明國家裏不在出版發行馬克思的著作、不設有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機構、不具有一批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從事理論研究的學者，沒有哪一所著名的大學裏不在開設馬克思主義課程或講座，沒有哪一本有關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嚴肅著作能夠完全避開馬克思主義提出的重大問題。

一九七八年八月，在西德杜塞爾多夫舉行的總議題爲「現代科學中的哲學和世界觀」的第十六屆世界哲學大會上，總統瓦爾特·謝爾以東道國元首的身份向大會致開幕詞說：「在我三十年的政治生涯中，我實際上每天都這樣或那樣地接觸到馬克思。……誠然，今天還有費希特的門徒。但是從來也不能以費希特的名義進行政治活動。相反，馬克思的思想正在左右著數十億人的生活，而且不僅是在社會主義國家裏。馬克思爲什麼能有普遍影響？我認爲這是由於他集中研究了當時最迫切的問題，即社會問題。這個問題今天依然是千百萬人的最迫切的問題。至少在世界上的社會問題得到解決以前，馬克思主義將繼續存在。」<sup>③</sup>

這是出自一位非馬克思主義者之口的評語，它從另外一面證明了：在馬克思離開這個世界以

後，他所闡發的學說，他所開創的社會運動，已經成爲任何人都不能不正視的巨大精神存在和巨大政治現實。

但是，一個嚴肅的馬克思主義者在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時候，不能只沉湎於慶功祝捷，而應該把主要的精力傾注在解決面臨的困難和問題上。我們不能不正視當前國際上流行著的「馬克思主義過時論」和「馬克思主義危機論」，以及國內一部分人中存在著的對馬克思主義的冷淡態度。「馬克思主義過時論」基本上爲資產階級學者所宣揚（其中也包括「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一些成員）。他們企圖論證：無論是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經濟關係所作的論斷，還是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政治上層建築所作的剖析，都已經是十九世紀的意識形態，在當代的條件下完全對不上號了。貝利（A. Beale）聲稱：「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已經過時了，並且已經被駁倒」<sup>④</sup>。另一些人則宣布：馬克思主義作爲一個嚴整的理論學說已經「分崩離析」，即將成爲一種歷史的陳列品<sup>⑤</sup>。「馬克思主義危機論」自七十年代以來盛行於「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討論中。這些人認爲，馬克思主義遇到一些真正的「理論危機」。這一理論危機是處在「當代資本主義危機和當代社會主義某種危機狀態的背景之下的」<sup>⑥</sup>。如A·戈爾茲就說，不存在工人運動的危機，而存在工人運動的理論危機。L·阿爾都塞的說法更爲尖銳：「是的，根據許多跡象來看，馬克思主義今天再次處於危機，因爲這個危機是公開的。公開，即意味著在各方面它都是明顯的。……我們已經長時間感受到這種危機……」<sup>⑦</sup>

面對著國際國內針對馬克思主義的這些思潮，我們應該怎樣看待呢？首先當然要鑒別。這些思潮的歷史背景、社會背景、政治黨派背景和文化背景是錯綜複雜、各有不同的。國際上的思潮，我

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它們歸於階級鬥爭的原因：西方某些人宣揚「馬克思主義過時」、「馬克思主義遇上了危機」，是出於歷來的階級偏見，是意識形態鬥爭的需要，等等。但是，僅僅這樣分析是遠遠不夠的。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我們不能像以前那樣用一句「階級敵人惡意中傷」來解釋問題的全部。我們還必須從理論上說明問題。我們必須看到，「馬克思主義過時論」、「馬克思主義危機論」和對馬克思主義的冷淡態度，在一定的程度上，正是對以教條主義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的一種懲罰。不能不承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和中共黨內一度存在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錯誤傾向，我國政治生活和思想領域裏會長期存在的個人崇拜、閉關鎖國的「左」的錯誤傾向，確實在一個時期內嚴重阻礙了馬克思主義的生氣勃勃的發展，致使馬克思主義沒有能夠對現代資本主義發展中的許多新現象、現代社會主義實踐中的許多新問題、現代自然科學中的許多新成就、現代社會科學中的許多新學科，作出迅速及時的、富有理論深度的、經得起生活考驗的探討和解答，毛澤東說的好：「馬克思主義一定要向前發展，要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不能停滯不前。停止了，老是那麼一套，它就沒有生命了。」<sup>⑧</sup>理論一旦不能答生活之所問、釋群眾之所疑，理論本身勢必要遭到生活和群眾的「冷遇」，而懷有各種目的的對手就會趁機製造聲勢，這是毫不奇怪的。

今天，在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時候，我們必須本著最嚴肅的責任感，向自己，向一切忠實於馬克思事業的人，提出一個早就應該提出的任務，這就是研究和回答當代提出的種種問題。

對於一位偉大思想家和革命導師的紀念，除了認真地研究他的思想、科學地探討他的思想與當代現實關係並以此指導實踐之外，再也找不到其他更好的方式了。因為偉大思想家和革命導師的歷

史就是他的偉大思想的歷史，就是歷史進程之中他的偉大思想發揮作用——即理論掌握群眾的歷史。所以，我們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對於馬克思這位偉大先驅者的最好紀念，歸根結柢，應該體現在對馬克思主義的堅持和發展上。

堅持和發展的關係是辯證的、內在統一的，不應該相互割裂。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是對客觀歷史規律的科學概括，離開了這個前提，任何所謂「發展」，都會走向歧途。因此，只有堅持馬克思主義，才能發展馬克思主義。另一方面，馬克思的學說所以有力量，能把那一時代千千萬萬熱情追求真理的人吸引到自己的旗幟下，根本原因，是它立足於那個時代社會經濟生活的最新發展，吸取了那個時代人類多種實踐的最新成果，總結了那個時代無產階級鬥爭的最新經驗，從而解答了那個時代人們最爲關心的歷史之謎<sup>9</sup>。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正在於它從不斷發展著的現實生活中吮吸自己的生命之泉。按照馬克思主義的這個最根本的特性去認識馬克思主義，以馬克思主義的這種最富開放性的精神來對待馬克思主義，就永遠不會有什麼「過時」的問題、「危機」的問題，絕不會出現以冷淡態度來對待馬克思主義的現象。因此，只有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主義，才能真正地堅持馬克思主義。在堅持中發展，在發展中堅持；使發展不偏離已被實踐驗證爲真理的馬克思主義科學大道，用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新的實踐，這就是我們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原則態度。

我國自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以來，堅持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已經成爲我國越來越多的理論工作者共同遵循的原則。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政治路線，使這一原則成爲中共在思想理論戰線的指導性方針<sup>10</sup>。這爲我們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創造了最佳的政治條件。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這一正確原則已經化爲理論界的現實。應當承認，我們理論

界的現狀與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原則要求之間還存在著相當的距離。我們已經有了正確的原則，現在需要的是把原則化爲行動，用我國理論界的具體研究成果來體現馬克思主義的創造性。

## 二、馬克思主義者必須面向當代世界，回答馬克思主義在國際上遇到的挑戰。

置身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我們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應該著重研究哪些新現象、解決哪些新問題，也就是說，應該回答來自哪些方面挑戰呢！

國際上對馬克思主義的挑戰直接的原因可歸於西方「馬克思學」(Marxology)和「西方馬克思主義」(Western Marxism)的興起。

在本世紀五十年代末以前，資產階級學術界對馬克思主義還是採取冷淡漠視的虛偽態度。比如，資產階級經濟學家J·凱恩斯在提到《資本論》的時候就曾以「不屑一顧」的口吻說：這是「一部過時的經濟教科書……不僅在經濟觀點上是錯誤的，而且在現代世界上是既沒有價值又無從實施的」<sup>①</sup>。資產階級社會學家R·阿隆更斷言，「在西方文化裏，馬克思主義已經沒有什麼地位，就連法國和意大利也不例外……（在這些國家裏）要想找到一個配稱爲經濟學家的人，一個可以按照嚴格詞義稱之爲馬克思主義者的人，那是白費力氣」<sup>②</sup>。然而六十年代以後的情況卻幡然一變。一九六二年，西方世界最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的敵手J·鮑亨斯基宣告：「在共產主義歷史上有三個時期：馬克思主義時期、列寧主義時期和蘇聯時期。研究這三個時期的，應當是相應的三門不同的但相互聯繫的科學：馬克思學、列寧學和蘇聯學」<sup>③</sup>。從這時起，西方就開始形成了「馬克思熱」。許多學者，包括一些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紛紛著書立說，對馬克思的著作進行考證、解釋和發揮。其中一部

分學者治學態度比較嚴謹，做了不少有意義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則抱著明確的意識形態鬥爭的目的來「研究」馬克思的思想，通過對馬克思著作的獨特的闡釋方式，歪曲和批判馬克思主義。

與西方「馬克思學」家公開宣稱自己的非馬克思主義的（甚或反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不同，「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大部分聲明自己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其中許多人還參加了本國的共產黨組織，有些則真正獻身於改造舊世界的革命鬥爭。「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起源雖然比西方「馬克思學」悠遠得多，但二者的興盛期卻是一致的。正如D·貝爾在他那本概述二次大戰後世界社會科學進展的小冊子中所描述的，「本世紀五十年代末，西方世界激進思想已銷聲匿跡，但隨後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人們又看到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和新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驚人地崛起，其規模之大，完全出人意料」①。「西方馬克思主義」圍繞著馬克思主義中那些最基本的論題，發起了長期的、尖銳的、激烈的論戰。有人形象地稱之為「馬克思的文藝復興時代」。

直接的原因雖然可以歸之於西方「馬克思學」和「西方馬克思主義」，但是，更深刻的原因還根植於產生它們的歷史背景。國際理論界向馬克思主義提出的種種挑戰不過是國際經濟、政治、社會現實本身新的發展變化的理論表現而已。根本上是由於：第一、二十世紀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的發展已經對人類物質精神生活的各個方面產生了巨大、深刻、持續的影響，使得世界的面貌大大改觀。第二、戰後資本主義經濟已經發生了急劇的、明顯的變化，資本主義的政治上層建築和文化生活方式也發生了顯著的演變。第三、戰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發生了一系列重大的事件，社會主義實踐中產生了許多意義深遠的新特點，出現了很多馬克思主義古典作家從未論述、甚至從未預料到的現象。第四，馬克思主義史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大量的、有的堪稱為第一手性質的文獻、資料的

發現和公布，使人們對以前難以弄清的問題有了重新探討的可能。正是在這一錯綜複雜的社會歷史背景之下，許許多多問題被提到了馬克思主義者的面前。

由此可見，不論西方「馬克思學家」和部分「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某些論點，從我們的立場來看是何等的錯誤，但是，他們提出的問題中卻包含著一個急速變化著的世界的大量「訊息」。分析、批判、回答這些問題，就需要對當代世界現實作出實事求是的而不是先驗圖解式的、獨立的而不是人云亦云的、全面系統的而不是片面抽象的研究。

國際上的新問題大體上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當然，這種分類只具有相對的意義，它們之間的關係，與其說是平行並列的，不如說是縱橫交錯的，有時往往是一方面問題激起了另一方面問題的產生。

#### 第一，人類社會文明的發展問題。

六十年代以來，在科技革命的背景下，國際學術界展開當代社會文明發展趨勢的大規模討論。參預這場影響極為廣泛、至今方興未艾的討論的，既有知名的社會科學家，也有許多第一流的自然科學家。所謂「電子技術社會」說、「規劃性社會」說、「訊息化社會」說、「後工業社會」說、「第三次文明浪潮」說，等等，層出不窮。提出當代人類文明已開始進入「訊息化社會」(Informationalized Society) 階段的學者，歸納出這種社會的基本狀況是：(1) 它以人類的知識創造力代替簡單勞動和資本來產生價值的源泉。(2) 產業內部的活動狀態發生了變化，產生了以創造和應用知識、科學、技術為目的的訊息產業。訊息的流通得以有組織的進行，確立起了訊息作為商品的地位，訊息的利用成爲人們活動的基本因素。(3) 對教育賦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大部分的閒暇時間用於社會成



員的知識啓發和更新<sup>15</sup>。D·貝爾的「後工業社會」(Post-industrial Society)理論論證：美國這樣最發達的國家已經進入「後工業社會」，它不同於工業社會的地方在於：在工業社會中，首要的問題是資金的問題；計畫表現為「以自然物的加工為目標競賽」；主要經濟部門是製造業之類的生產商品的部門；社會圍繞著人和機器協作進行生產這個中軸轉；主導性的職業是半熟練工和工程師。而在後工業社會中，首要的問題是科學的組織；計畫表現為「人與人之間的比賽」；主要經濟部門是建立在訊息基礎上的智力工藝學；社會圍繞著科學——理論知識組織起來，以達到控制社會、指導變革的目的；主導性的職業是科學家；一個國家的科學能力成爲它的潛力和力量的決定性因素。現在美國只不過是先行一步，隨後，其他工業發達國家也都要相繼進入後工業社會，而不論其社會政治制度有何不同。貝爾解釋說，他的觀點其實「是從馬克思那裏開始的」。因爲「馬克思規定生產方式包含社會生產關係和『生產力』(即技術)」。對工業社會和後工業社會的劃分正是以生產力(技術)爲標記的。「後工業社會的基礎就存在於科學對於生產方式的無情影響之中」<sup>16</sup>。「耗散結構理論」的創立者、當代最負盛名的科學家之一I·普里戈金也認爲，我們這一代人「生活在訊息技術的革命之中……訊息技術革命觸及到了我們文化的真正核心」<sup>17</sup>。A·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九八〇)中宣告：繼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的浪潮之後，人類文明的第三次浪潮已經來臨。當今在生態環境、人口、能源、資源、經濟發展等方面出現的全球化問題，原有的價值觀念和社會身份體系(Role System)的解體，是工業文明即將完結的症候。第三次文明浪潮建立在與前兩種文明大不相同的能源、技術、生產體系的基礎之上，它帶來全新的社會生活方式。

顯然，這裏討論的正是必須引起馬克思主義者高度關注的大問題，因爲馬克思主義本來就是以

揭示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爲己任的。上述理論雖然含有某些不可避免的錯誤，即使在西方學術界也還沒有獲得一致的贊同，但是，這些論述中卻包含著重要的合理因素：它們全都觸及到了現代生產力最基本的特徵——科學技術的決定性作用，並試圖循著這條線索推測人類文明的演進趨勢。必須指出，在這方面，馬克思的預見比他們要早出一個多世紀，並且深刻卓越得多。在一八五七—一八五八年的《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就曾寫到：「隨著大工業的發展，現實財富的創造較少地取決於勞動時間和已耗費的勞動量，較多地取決於在勞動時間內所運用的動因的力量，而這種動因自身……取決於一般的科學水平和技術進步，或者說取決於科學在生產上的應用。」這表明，「一般社會知識，已經在多麼大的程度上變成了直接的生產力，從而社會生活過程的條件本身在多麼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並按照這種智力得到改造」。

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歷來是根據勞動資料——生產力的特徵來區分社會文明的不同發展階段的。「社會關係和生產力密切相聯。隨著新生產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隨著生產方式即保證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變，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係」。

既然我們肯定科學技術是現代最重要的生產力，並且親眼目睹到作爲生產力的科學技術對當代社會文明的強有力作用，那麼，當代的馬克思主義者，就不能迴避對下述問題作出富有理論深度的分析：

——現代科學技術是不是已經使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如果說不是，根據是什麼？如果是，文明的這一更高階段的總體性特徵是什麼？它和前一階段的社會文明有什麼區別？新的文明會造就怎樣的社會結構，形成怎樣的社會關係？

——新的文明是一切民族和國家都必然要進入的普遍性社會發展階段，還是資本主義國家特有

的發展形式？如果是普遍性階段，它在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那裏，將具有怎樣的具體表現形式？尤其是科學技術水平比較落後的中國，它將以怎樣的姿態對待文明的這一新浪潮？如果是資本主義國家特有的形式，它是否將引起馬克思主義中有關資本主義的一系列重要理論的有效性問題（比如：科技進步條件下的勞動價值論、科技革命與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結構，等等）？

第二，由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的新特點引起的問題。

二次大戰以後，資本主義經歷了較長一段時間的相對繁榮。雖然目前資本主義世界呈現出普遍的滯脹和嚴重的危機，包括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危機（對這些危機連資產階級學者都聲稱沒有萬全之計），但是，顯然難以斷言資本主義的總崩潰已經指日可待。這就促使人們重開關於「資本主義的彈性」的討論。歐洲共產主義的一些理論家認為，資本主義在每一次較大的危機後都能「重新穩定下來，這是馬克思完全沒有預見到的」<sup>②</sup>。馬庫塞則認為連列寧也沒有預見到這種情況<sup>③</sup>。如果資本主義對科技革命（新型生產力）的衝擊、勞資之間的階級衝突、生產危機等等，確實具有一定的適應能力，那麼，我們要問：這種適應能力究竟可以達到多大的限度？它的內在機制是什麼？

人們看到，當代資本主義適應能力的內在機制中，包括所有制向國有化方向的演變、國家調節作用的增強、社會福利措施的改進和社會結構與階級關係的一些變化：

——資本主義國家或是通過把私人公司收歸國有，或是成立國家和私人共有的混合公司，或是直接成立新的國營企業，增大資本主義國有制的比重。與此相應，資本主義國家對經濟的直接干預和調節的作用大大加強了：通過信貸系統、稅收政策調節社會生產；國家在法律上保證企業的高折

舊率，刺激生產技術方面的大量投資；國家積極參預國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統一行動進行國際性的壟斷調節，等等。最爲突出的，是資本主義國家制定長期規劃。著名經濟學家J·加爾布雷雷斯等人發表著作和演說，向國會提出議案，要求建立美國特有的「資本主義國家計劃委員會」，在全國範圍內實行經濟計劃工作。<sup>23</sup>

國家所有制並不就是社會主義<sup>24</sup>。資本主義的國家所有制雖然部分地取消了這些國家內部的私有資本和私有制，但並沒有從根本上鑷除資本主義。但是，如果這種國有化的趨勢繼續擴大，國家調節經濟過程的作用繼續增強，是不是意味著資本主義發展中出現了部分的質變，即資本主義已經進到它的又一個發展階段呢？南斯拉夫的一些學者用「國家資本主義」範疇來概括當代資本主義的這種特徵，用「極權主義」來稱呼它的國家體制<sup>25</sup>。這種分析不是毫無道理的。馬克思、恩格斯把工廠內部生產的有組織與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看作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之一。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經濟調節作用的增強，從而市場和價值規律中一種新的機制的加入，將會使這一個基本矛盾發生怎樣的變化呢？有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哈伯馬斯：《理論和實踐》(一九六三年)、《作爲「意識形態」的技術和科學》(一九六八年))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的理論家<sup>26</sup>，根據這些現象論證：在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國家起著資本主義經濟的有效穩定者的功能，這使得傳統「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二分法變得不再適用：「政治」不再是「上層建築」的一部分，政府活動和政治鬥爭已經被包含進「經濟基礎」的功能中。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發揮著保障社會和擴大再生產全過程的作用，這樣的國家既是資本主義國家，同時又是獨立於資本家階級各階層的國家。對於這樣的現代國家，列寧關於國家純粹是剝削被壓迫階級的工具的論斷需要重新估價。在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裏，社會主義革命不需要打碎原有的國家機器，只需要使國家「變形和轉換」，在新的基礎上確立民主國家的正統性，能夠真正反映民意，管理好大企業，最終達到把國家置於人民的監管之下。

面臨著當代資本主義國家功能的新特點，發達國家的共產黨結合本國的實際探索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確實應當受到我們的重視。

——與上述問題密切相關的，是當代資本主義富裕物質生活條件下，無產階級革命的可能性和具體途徑的問題。二次大戰後，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都大力採取多種多樣的福利措施來緩和勞資矛盾，如衆所周知的「三高」政策，包括勞動保護、失業救濟在內的社會福利，某些國家的終身雇傭制甚至職工子女替職制（日本的一些企業）。在福利政策不能全部奏效並逐漸陷入困境的情況下，資本主義企業還越來越重視發揮雇工在企業活動中的作用，為公司設立工人董事、讓工人參與經營管理。<sup>26</sup>

法蘭克福學派由此得出「富裕社會」理論，認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根本改變了無產階級的地位，高度工業化社會的技術條件創造了富裕，富裕滿足了人們的需要，於是不滿與抗議的原因就消除了。無產階級已由「絕對否定」現存制度轉變為肯定和支持現存秩序。革命將不再起源於經濟剝削，而是起源於人的某些本能的被壓抑<sup>27</sup>。用弗洛伊德學說來解釋社會的根本問題，這當然是很荒謬的。但是，從「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歷史唯物主義出發，我們又不能不正視這樣的問題，即：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物質生活條件下，無產階級將從何處獲得他們的革命意識，也就是說，他們將怎樣感受到革命的必要性？我們是不是應該擯棄單純從經濟生活角度看問題的簡單化觀點，回到馬

克思的異化理論對資本主義的總體批判上去，把當代資本主義的危機視爲一個從物質生活領域愈益向政治、社會、精神、文化領域轉移、深化的過程？從而，我們對當代資本主義對人類的危害的批判，就不應該簡單重複十八、十九世紀駭人聽聞的物質困苦的話題，而應該深入到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對人類價值的貶損、對人與自然的基本關係的破壞（如生態危機）。可以設想，當代資本主義條件下革命的興起，不會單純是對經濟解放的嚮往，而是嚮往在經濟解放的前提下，完善人的一切社會關係、豐富人的精神存在、建立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關係（「自然界向人的生成」——馬克思語）。簡言之，是要求消滅一切形式的異化（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文化的、心理的），實現人的生存的完滿性。

——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階級結構問題。隨著科學技術在現代資本主義生產中越來越占主導性的地位，由管理人員、科技人員構成的「中間階級」人數日益增多，社會作用日顯重要。有些資產階級學者聲稱，「馬克思關於由經濟的財產結構產生的一個分裂成爲兩個對抗階級的社會的見解，對歐洲的現實說來已不再是正確的描述」。在經濟的勞務領域中占支配地位的白領中間階級的成長「對於馬克思的理論來說，成了一塊重要的絆腳石」<sup>26</sup>。在反駁資產階級學者的觀點時，有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如N·普蘭查斯：《當代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各階級》，一九七五年）論證新中間階級是由介於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人組成的一個不穩定的經濟複合體，其聯合有賴於它在社會經濟制度中的思想政治功能。而另一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認爲這裏正好可以用上「工資階級」這個概念，它已經取代了馬克思傳統意義上的「工人階級」。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則仍然堅持認爲「新中間階級」不過是現代工業化條件下的無產階級的一部分。

這裏進行的並不是單純的概念之爭，而是關係到馬克思無產階級革命學說的有效性問題：如果無產階級絕大多數成員已經「白領化」，那麼，應當怎樣看待這種新型的無產階級的社會地位和歷史命運？如果無產階級不再成爲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人數衆多的基本勞動階級，那麼，推翻資本主義的革命力量將是誰？在無產階級人數極少、力量較弱的東方國家，無產階級同農民、小資產階級直至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爭得了革命的勝利，是否可以設想，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力量將是無產階級同「中間階級」絕大多數成員的聯盟呢？事實上，歐洲共產主義已經提出了類似主張。對這些問題，我們不能單純從馬克思主義古典著作中有關的語錄來判斷，而必須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方法論作出獨立的研究。

### 第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產生的新問題。

五十年代發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包括史達林的逝世和「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的解散，預示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一個中心、一條道路、一種模式」的完結。各國馬克思主義者紛紛從本國實際情況出發，探索走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造成當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五色繽紛的新局勢。對此，某些人至今仍然看不慣，企圖使「指揮棒」重新發揮作用，而我們則對這一充滿著歷史辯證法的多樣化趨勢感到由衷的高興。多樣化的實踐必將從多方面檢驗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促成科學共產主義學說的極大豐富和發展。

三十多年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出現的各種事件，如南共被開除出共產黨情報局，蘇共二十大對史達林的批判、一九五六年的波蘭匈牙利事件、中蘇論戰、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布拉格之春」及其被鎮壓、蘇軍入侵阿富汗、越南入侵柬埔寨以及柬埔寨共產黨的勝利和失敗、波蘭的動亂和軍

管、阿爾巴尼亞與外國黨的一系列衝突、蘇聯「大家庭」內部的民族主義運動、歐洲共產主義的興起和演化，等等，對馬克思主義提出了一系列很尖銳的新問題。對這些事態產生的問題絕不能予以迴避，迴避只會使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喪失威信。我們應該收集第一手資料，以事實為依據進行慎重的研究，作出馬克思主義的結論，而不能讓這段充滿了重大事件的歷史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留下一片空白。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大量文獻和資料的發現和公布，如《列寧全集》以前的版本中被刪去了一部分、列寧患病期間列寧秘書的《日誌》、列寧《遺囑》、著名人物的回憶錄和家書、重大事件的原始材料以及相當數量的「野史」（其可靠程度當然需要鑒別）等等之公布，這一切導致了對國際共產主義史上許多重大事件和人物的再研究與再評價，諸如「戰時共產主義」、「新經濟政策」、史達林的「工業化道路」和「自上而下的革命」、蘇聯的肅反擴大化真相、第三國際的歷史作用、托洛茨基與第四國際、羅莎·盧森堡、葛蘭西和布哈林的理論觀點等等。列寧逝世前的著作和有關背景材料的公布，更引起人們對他晚年思想的重視。列寧晚年發現十月革命所開創的事業在取得了偉大勝利的同時，還存在不少缺陷和弊病，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和蘇維埃機關的民主化、反對官僚主義和過分集中以及發揮合作社的作用等問題。而史達林在這些問題上卻背離了列寧的思想，以致發展到後來，釀成了蘇聯黨和國家以及他個人的嚴重悲劇。研究這一切，不僅事關恢復歷史本來面貌，而且直接關係到馬克思主義在當代的發展。

爲了把馬克思主義推向前進，我們還必須充分重視「比較社會主義體制」的研究。所謂「比較社會主義體制」，概言之，就是比較社會歷史條件相對不同的國家在建設社會主義方面所選擇的不同



道路，從這些不同的道路所取得的相應的經驗、教訓中探索、總結出帶規律性的東西來。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尋找推翻資本主義的革命道路上，雖然他們對革命成功以後的政治經濟建設也作過許多科學的預見，但由於在這方面或是缺乏經歷，或是經歷短暫，因而沒有也不可能制定出有關這方面的系統而又具體的理論。史達林和毛澤東在指導社會主義的實踐中創建了功績，但也有過重大的失誤，這些失誤相應地反映在他們的理論觀點中。因此，可以說從世界範圍來看，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建設（這裏的「建設」是廣義的，包括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理論還有許多有待於填補的空白。

進行「比較社會主義體制」的研究，可以分爲若干層次。第一個層次是研究社會主義由學說變成現實制度而產生的對一切社會主義國家都具有普遍意義的那些問題。例如，與革命戰爭時期相比，在成爲執政黨以後，共產黨本身產生了哪些確鑿的變化和可能產生的變化？由此就應該探討：執政黨的建設，包括組織原則和組織建設、思想原則和思想建設、黨內民主生活的建設都有哪些規律性？黨的領導權的新舊交替即培養接班人的問題有哪些特殊困難和解決的途徑？黨和社會的關係，即執政黨和國家在權力與責任的關係方面的問題，執政黨條件下的群眾、階級、政黨、領袖之間的關係問題，執政黨的活動和國家法制的關係問題，執政黨和工會、婦聯、共青團等群眾組織的關係問題，這些是又一個方面的重大問題。最後是作爲國家制度的社會主義需要處理的一系列問題，如社會主義社會中人民內部矛盾和階級鬥爭問題、建立高度社會主義民主問題、民主集中制問題、國家內部的民族關係問題等等。

第二個層次是要探討社會主義從一國現實變成多國現實而產生的新問題。後誕生的社會主義國

家在一個時期內必不可免地會把先誕生的社會主義國家視爲自己的「模式」。但是，在經歷了一個過程後，又必不可免地會面臨因照抄照搬而發生的多方面的不適應。即使是「模式」國家本身，也會逐漸發現自己原先所設計出來的社會主義標準「模式」有許許多多不能適應現實的地方。從這裏就產生了標準模式自身是否要變化和別國是否要拋棄外來模式的問題。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自治制度」的提出和實踐，蘇聯東歐國家六〇年代以來進行的規模不等的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正是反映了這一點。我們要著重研究這一系列改革和試驗的成敗得失，比較不同的改革方案和具體措施所帶來的不同的社會、經濟效果（社會的安定狀況、民主化的程度、社會結構的適應性、經濟效益、勞動生產率、科技發展，等等）。

社會主義從一國現實變成多國現實產生的問題還包括：執政的共產黨之間相互關係的原則、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和民族自主權與民族利益的關係、各國黨對其他黨的意識形態評價、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經濟協作和所謂的「國際分工」以及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和衝突。

第三個層次是要比較研究不發達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特殊規律性問題。二次大戰以後，發生革命並建立了新政權的幾乎都是不發達國家，這似乎預示了某種帶有規律性的歷史趨勢。具體的革命現實把許多錯綜複雜的因素帶進了原先馬克思主義古典論述並未預見到或沒有完全預見到的歷史進程之中。不發達國家的革命已經大大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不發達國家革命勝利以後如何科學地建設社會主義，這對馬克思主義提出的問題更多、更複雜。因爲比較起馬克思恩格斯所設想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進程，不發達國家的進程具有更豐富得多的特點。在這些國家裏，革命前的社會經濟機體還有相當成份沒有發展到資本主義階段，而是保留著封建的、半殖民地半封

建的甚至農奴制的和氏族制度的一些成份或殘餘。社會主義政權的建立使它們沒有經歷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在缺乏發達的商品經濟物質前提、普遍的文化素養和民主生活傳統的社會歷史條件下，這些國家在如何對待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如何處理既要迅速增強本國薄弱的生產技術基礎、又要提高人民低下的生活水平之間的矛盾，如何看待科學、教育、文化和知識分子在建設社會主義中的作用，如何擺脫前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和心理意識對新社會的腐蝕影響等方面，各有哪些經驗教訓？鑒於這些國家大都是具有被帝國主義侵略的痛苦歷史，它們如何清除帝國主義的影響以及怎樣處理接受外來先進科學文化和經濟的推動幫助同維護民族自尊、民族獨立之間的關係！

第四，因馬克思大量手稿特別是早期手稿的出版而引起的有關馬克思主義本身的基本理論問題。

——關於青年馬克思和老年馬克思的關係。一位著名的「馬克思學家」寫道：「目前，這兩者之間不可思議的關係，似乎構成了馬克思學術研究領域裏引人注目的、最突出的爭論中心。由於馬克思主義在今天遠遠不只是思想史上的一個考古研究的主题，因此這一爭論就不可避免地歸結到關於何者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那一類爭辯。」<sup>②</sup>某些人全盤否定青年馬克思的著作，另一些人則竭力抬高青年馬克思而貶低馬克思的成熟理論。顯然，這兩種觀點都是對待馬克思主義的非科學態度，各自從特殊的政治、意識形態需要出發來鑄造馬克思的形象。我們要把馬克思的思想發展當作一個有機的、完整的過程來研究，對其中的疑難問題，如異化理論與歷史唯物主義的關係、「類」概念與階級鬥爭學說的關係、自由與決定論的關係、哲學與政治經濟學的關係等等，作出實事求是的回答。要弄清：在馬克思青年時期的思想中，究竟有哪些因素是他後期確實拋棄了的（而且要站

在當代實踐的基礎上對這種拋棄作出科學的評價？有哪些則是形式上消失了而實質上卻溶進了成熟理論的深層？有哪些論題是出於策略上的考慮（如爲了更有效地向哲學修養不深的勞苦大眾宣傳，爲了在與不同派別的對手交鋒時更靈活主動）而變換了提法或是暫時避免提起！

——關於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的關係。在相當長的時期裏，這個問題是一個「禁區」。到了今天，不承認馬克思主義包含有人道主義的人是越來越少了。即使是阿爾都塞這樣聲稱馬克思主義是「反人道主義」的學者，也只是從方法論上，即從把科學與價值對立的結構主義方法論意義上說的<sup>30</sup>。但是，這個領域裏仍然存在許多有待深入研討的問題：如果馬克思主義具有人道主義，那麼，它在馬克思主義裏占居什麼地位，是構成了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方面（或一種成份、一個論題）呢，還是作爲一種精神體現在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改革的總體設想裏？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與歷史上的和當代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是什麼關係，它具備了哪些使它根本不同於其他一切形式的人道主義的本質特徵？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對當代資本主義與當代社會主義各有什麼現實意義？

——馬克思主義中科學與意識形態（「意識形態」在這裏具有特殊的含義，意指一定的個人或集團、階級關於自身存在的「使命」和「意義」、關於未來「理應如何」的意識和信念）的關係。《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具有比後期著作更強烈的倫理色彩，一些西方學者似乎從這裏發現了另一個馬克思：「馬克思在第二次降世（指因早期著作的發表而興起的「馬克思熱」——引者注）的時候，不是一個《資本論》的作者、風塵僕僕的經濟學家的姿態出現，也不是作爲革命的長褲漢（Sana-Culottes）、具有鼓舞力量的《共產黨宣言》的作者出現的。他穿著哲學家 and 道德家的外衣走出來」<sup>31</sup>。馬克思學說的前提「不像馬克思主義所論斷的那樣，是科學的原理，而更像是信念的先驗的哲學原理」<sup>32</sup>。

馬克思主義中科學與意識形態的關係便被重新尖銳地提了出來。這個問題實際上可以溯源到第二國際時期。考茨基等人宣揚馬克思主義是經驗的科學，不能把它稱為哲學，因為唯物主義觀點就是經驗的觀點，此外不再意味著任何別的東西。這種說法就在歷史上形成了一種錯誤觀點，似乎馬克思主義根本沒有自己的哲學，更不用說意識形態體系了。於是新康德主義者就用康德哲學中的道德論來「補充」馬克思主義，提出「倫理社會主義」的觀點來與考茨基的庸俗觀點相對抗。在當代，這個問題同時又以「馬克思主義是科學還是一種價值體系」的形式出現。爭論的焦點是：馬克思關於共產主義的設想是以社會自身發展的客觀趨勢為依據的，還是僅僅依賴於對人類未來的一種美好理想？

這個問題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因為它也是我們在國內經常遇到的實際問題。如果像某些西方學者那樣，把科學社會主義歸結為對未來的一種道德信念，那是極端錯誤的，這裏面隱含著把馬克思主義歸結為一種宗教信仰的企圖。但是，如果完全否認馬克思主義具有自己的價值體系，那也是錯誤的。近來我們不是在批判「共產主義渺茫」論，倡導堅定共產主義的理想和信念（「理想」和「信念」在哲學中就屬於價值的範疇）嗎？我們應該堅持馬克思主義中科學與價值的統一。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既肯定了「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主張像物理學揭示物理現象、生物學揭示生命現象一樣，揭示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作為科學的馬克思主義）<sup>34</sup>，同時又堅信共產主義的實現將使人類「在最無愧於和最適合於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安排自己的生活（作為價值觀的馬克思主義）<sup>35</sup>。

——馬克思與恩格斯、列寧的關係。大部分西方學者都熱衷於尋找他們之間的「矛盾」。諸如論

證：馬克思的哲學觀是「人本主義」，恩格斯是「實證主義——唯科學主義」；馬克思把辯證法規定爲人類實踐的矛盾結構，恩格斯則把辯證法「濫用到自然界」<sup>35</sup>；馬克思揭示人對客體世界的關係是「實踐」，恩格斯和列寧則機械地理解爲「反映」<sup>36</sup>；馬克思恩格斯把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無產階級人數衆多視爲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前提，而列寧則忽視這些必要條件，只相信布朗基式的少數革命家的煽動革命；「對於馬克思來說，專政的概念主要是社會的經濟的。對於列寧來說，專政主要是政治概念」<sup>37</sup>；馬克思訴諸無產階級的自我解放，而列寧強調由先鋒隊來解放無產階級。類似的論題不勝枚舉。這是一些極爲嚴重的其中有些包含著明顯的曲解和惡意的挑戰，它們從反面要求我們對全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發展進行深入細緻的研究，對這一發展的全過程作出有根據的、合乎邏輯的解釋。否則，既不足以回答對手的挑戰，也不足以說服懷有疑慮的善良人們。

### 三、在全面改革中發展馬克思主義，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中國的理論工作者面向當代，研究馬克思主義，首先和主要的是用馬克思主義之矢，射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之的，這是不言而喻的。中國是一個大國，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大黨，中國革命有著漫長曲折的歷史，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提供了很多寶貴的經驗和深刻的教訓。有這樣一個豐富生動的研究對象，認真總結經驗教訓，中國的理論工作者一定能夠對世界範圍內的馬克思主義發展作出獨特的貢獻。

很多人都感到，目前我們國內的理論狀況在相當程度上跟不上實際生活的生氣勃勃的發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進行了一系列重大的革新和創建，現實生活裏湧現出的新事物、新經驗，

許多是從前不敢想像的。最突出的莫過於以專業承包、聯產計酬為特點的生產責任制在農業中的推行所獲得巨大成功。這在馬克思主義古典論著中找不到現成的指示，在傳統規範中沒有它的地位（恰恰正是犯「禁忌」的），在國外現有的各種模式中也就找不到它的等同形態。它完全是超出傳統的獨創性事物。相比之下，理論界仍然在某些方面固守在「陳年古董」上，圍繞著某些抽象的、脫離了生活實際因而顯得乾癟蒼白的結論兜圈子。這就給「左」的思想傾向留下了庇護所和溫床，給橫加指責者提供了意識形態的依據。長此以往，勢必會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所領導的改革大業形成阻礙。因此，時代擺在中國理論工作者面前的最迫切、最重大也是最神聖的任務，就要研究如何進行全面的改革，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的前途，中國理論工作者的前途，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前途，皆繫於此。

列寧曾經說：「一切民族都將走到社會主義，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卻不完全一樣，在民主的這種或那種形式上，在無產階級專政的這種或那種類型上，在社會生活多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速度上，每個民族都會有自己的特點」<sup>38</sup>。中國共產黨把毛澤東思想定義為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

「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個綱領性的命題包涵兩個主項：一是「社會主義」，一是「中國特色」。要滿足這兩個方面的要求，完滿地實現這個偉大綱領，首先就要求我們對社會主義做一番溯本求源的研究，把社會主義同幾十年來被奉為「定本」的某種固定的模式區別開來，為此，我們要直接回到出發點去，考察這樣一些問題：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究竟作過哪些論述？在這些論述中，哪些是屬於普遍性的，即任何民族、任何國家建立社會主義社會都不

能缺少的基本方面，哪些則是屬於特殊性的，即或多或少帶有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本人特定歷史地域條件影響的方面？在列寧對於科學社會主義學說的重大發展中，哪些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性原理，哪些則是適合俄國特殊社會歷史條件因而不能到處搬用的個別性結論？在史達林和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的論述中，哪些確實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哪些則必須予以摒棄？此外還應該研究在馬克思主義發展的各個階段上其他許多堪稱爲領袖和思想家的人物，看看他們對社會主義究竟作過哪些論述，其中哪些是眞知灼見，哪些則是時過境遷的東西。如果我們對社會主義不作這樣一番可以說是追根究柢的研究，就很難把握住社會主義的本質，就難免不把社會主義在實踐中出現過的這樣那樣的具體模式當作社會主義的普遍原則。

其次，還要求我們對自己的國家作一番前所未有的全面的調查研究。不言而喻，賦予「社會主義」這種普遍性的（即一切民族將來都要實行的）制度以中國特色的，當然是中國的特有國情——它的歷史、它的文化、它的民衆、它的習慣心理和民族生活方式、它的政治經濟現狀、它的自然生態環境等等。只有對以上諸方面都做過深入考察研究之後，我們才能在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一般的東西、原則）和中國的具體國情（特殊的東西、現實）之間，找到最優的結合方式。過去我們所以走過不少彎路，幹過一些引爲痛心的事，除了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沒有完全把握得準以外，就是因爲沒有很好研究甚至沒有意識到需要很好研究這些方面，當然也就找不到最優的結合方式。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經濟結構、政治結構、家庭社會關係結構、文化意識結構諸方面應該具有怎樣的特徵，都需要我們在馬克思主義創造精神指導下，運用當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各種先進方法，經過長期的探索和實驗，才能逐步明確起來。



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總目標，全面改革是達到這個總目標的唯一有效途徑。就不同的國家搞社會主義而言，不存在社會主義的標準模式；就一個國家搞社會主義而言，不存在社會主義的固定模式。搞四個現代化建設必須進行一系列的改革，改革要貫穿四個現代化建設的整個過程，這應該成爲中國共產黨領導四化建設的一個極爲重要的指導思想。我們要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闡發馬克思主義的改革觀。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新生的、不斷成長的社會機體，相對於日益發展的社會生產力，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都有一個不斷完善以便適應、保護和繼續促進這種發展的過程。因此，改革爲社會主義的本性所決定。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不止一次地說過，社會進步由自發的過程變爲自覺的過程，是人類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過渡的基本標誌之一。如果在私有制的社會裏，社會的發展是通過對抗和衝突實現的，那麼，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則是在科學理論指導之下有計劃地通過革新而實現。這正是社會主義有計劃發展的特點，也是它的優點。作爲革命者，思想要隨著歷史的發展而發展。凡符合人民利益和時代要求的新思想、新創造、新經驗都應當樂於吸收；凡不符合新的歷史任務和革命實踐要求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風，都應當敢於拋棄。要樹立起改革是生氣勃勃的創造性的社會主義事業的貫穿始終的原則這樣一種認識。

胡耀邦在《四化建設和改革問題》的報告中，闡明我們改革的總方針是：從實際出發，全面而系統地改，堅決而有秩序地改，有領導有步驟地改。這就要求我們系統地研究改革理論，全面地比較國外各種改革的利弊，預測改革中可能產生的各種問題，從而制定科學的改革方案和措施。在這方面，我們要特別善於從已有的改革中總結經驗，用被生活驗證爲正確的新理論、新原則取代在實踐中證明根本行不通的舊理論、舊原則。長期以來，許多同志都感到，我們的經濟體制的弊端主要

是缺乏活力，也就是企業缺乏應有的主動性、靈活性，職工缺乏應有的積極性和責任感。我們有理由更深入地問：社會主義社會建立了生產資料公有制，克服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性和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爲什麼不能充分發揮應有的活力呢？農業生產體制的改革給了人們極大的啓發。這個改革才進行了幾年，農業戰線已經是春意盎然，一派生機。可見，缺乏活力的現象的存在，不能歸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誰如果在這方面有懷疑，就要犯極大的錯誤。問題主要還是在於與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經濟結構和落後的經營管理方式。幾十年來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證明，所有制形式必須與生產力的性質和水準相適應，而不是一切都歸國有。在中國目前的條件下，應該進行所有制結構的改革，實行在國營經濟主導下多種經濟形式同時並存。而在有了先進的所有制結構的同時，還必須靠先進的方式去經營。否則，生產關係的優越性就落不到實處，就會落空。從這裏，我們要進一步開闊思路：在我國政治、思想文化上層建築領域裏，是不是也存在一些受外國模式影響的制度、規則、習慣做法，自以爲是合於社會主義的標準，而實際上恰恰是限制了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充分體現，抑制了人民群眾多方面的創造力的充分發揮呢？我們在社會政治領域裏的目標是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在物質生活領域裏的目標是高度的物質文明，在精神生活裏的目標是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如果不大膽拋棄那些陳舊僵化、與人民利益不相容的框框、套套，十二大提出的這些宏偉目標就難以實現。我國上層建築領域裏應該進行多方面的改革，掃除那些抑制著生機和活力的障礙，使社會主義社會的全體成員在從物質生產到精神生產、從國家政治生活到基層社會生活的廣闊天地裏，都能夠煥發出蓬蓬勃勃、源源不斷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總之，改革上的大量問題是當代世界和中國向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提出的重大課題。我們應該廣開思路，大膽探索。建設有中國

特色的社會主義，這是我們前人從未做過的偉大事業，過去三十多年來我們已經形成的格局，在許多方面是不符合這個總的要求的，必須進行改革。沒有改革就不能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也不能在中國的具體條件下發展馬克思主義。

本世紀最偉大的數學家之一希爾伯特(David Hilbert)在他那次開創了二十世紀數學進展新格局的著名演說中，把「問題」稱爲科學發展的內在動力。無疑，只有與人類實踐密切相關的理論，才會不斷遇到新問題；倘若一個理論不被實際生活所質問，那就表明它已經被生活所拋棄，已經死滅了。馬克思主義在當代遇到種種問題的「挑戰」，不是表明了馬克思主義的「危機」或「瀕臨崩潰」，而恰恰是馬克思主義的希望之所在：馬克思主義在對這些問題的挑戰的應答中，必將獲得向前發展的無限動力。

馬克思以他天才的智慧、堅韌不拔的意志，執著追求真理的獻身精神和崇高嚴正的歷史責任感，在充分地領會和批判地吸收人類思想所建樹的一切寶貴財富的基礎上，對發展到十九世紀中葉的世界歷史進程所提出的最重大、最迫切、最困難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系統的研究，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有力地表明了馬克思的學說不愧是以往人類思想最偉大代表的學說的直接繼續，從而確立了自己在人類思想史上的不朽地位，贏得了不同種族、不同國家、不同時代一切進步人類的衷心敬仰和永久紀念。如果我們能以馬克思那樣的精神、意志和責任感，對馬克思身後一百年來人類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裏創造的一切重大成果予以公正的評價和批判的吸收，對發展到二十世紀後期的世界（包括中國）歷史進程所提出的最重大、最迫切、最困難的問題，進行深入系統的探討，作出有說服力的回答，能用當代馬克思主義的成果來證明：在馬克思主義裏絕沒有與「宗派主義」相

似的東西，它絕不是離開世界文明發展大道而產生的故步自封、僵化不變的學說，而是植根於日新月異的人類實踐之中，富有永不枯竭的強大生命力，那麼，我們就能夠對得起馬克思事業繼承者的光榮稱號；在這位偉大革命導師的遺像面前，我們就將毫無愧色。

原載《馬克思主義研究》，一九八三年二月，第一期

## 註釋

- ① 轉引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九卷，第三七八頁。
- ②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二四四頁。
- ③ 《第十六屆世界哲學大會文獻匯編》。
- ④ 貝利 (A. Beila)：《二十世紀資本主義革命》(英文本)第一三頁。
- ⑤ 參見 M·卡伊芒在法國《世界報》，一九七八年九月三、四日上的綜述文章。
- ⑥ 參見一九八二年南斯拉夫察夫答特《社會主義在世界上》，國際論壇圓桌會議的議題第三組 (8)。
- ⑦ L·阿爾都塞：《馬克思主義的危機》，《今日馬克思主義》(英)，一九七八年七月號。
- ⑧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四一七頁。
- ⑨ 參見《列寧選集》，第四卷，第三四七頁。
- ⑩ 參見《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第四部分。
- ⑪ J·凱恩斯：《勸說集》，一九三二年，(英文版)第三〇〇頁。

- ⑭ R·阿隆：《知識分子的鴉片》（法文本）第一一五頁。
- ⑮ J·鮑亨斯基：〈蘇聯學——「政治和現代史」〉，《議會》周報增刊，一九六二年，第三期。
- ⑯ D·貝爾：《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社會科學》，中文版，第一一七頁。
- ⑰ 資料來源：一九六九年日本情報產業部門會議的《諮詢》。
- ⑱ D·貝爾：《後工業社會的來臨》，紐約，一九七三年，第一一四、一一八、三七八頁。
- ⑲ I·普里戈金：〈我們得到了我們所需要的科學嗎？〉，《信使》一九八二年，第四期。
- ⑳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六卷（下）第二一七、二一九、二二〇頁。
- ㉑ 同上。第四卷，第一四四頁。
- ㉒ 參見〔法〕《巴黎競賽畫報》，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刊載的專題討論。
- ㉓ 《蘇維埃馬克思主義》，紐約，一九六一年，第三〇頁。
- ㉔ 參見H·蘇通：《當代經濟》，紐約，一九七六年，第四〇二頁。R，李卡希曼：《陷入困境的經濟學家們》，紐約，一九七六年，第二八七、二九〇頁。
- ㉕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三一七、三一八頁。
- ㉖ 參見〔南〕弗蘭尼茨基《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第三章，第一節。
- ㉗ 參見〔日〕《朝日雜誌》一九七九年八月三日，《赤旗報》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七、十九日，關於日共舉辦的國際理論討論會的報導。
- ㉘ 參見伯特·豐森：〈「日本這個公司」：它的經濟成功的關鍵〉，〔美〕《底特律新聞》，一九七八年八月七日。
- ㉙ 參見戴維·麥克萊倫：《馬克思以後的馬克思主義》第十九章：〈法蘭克福學派〉。

- ② R·達倫多夫：《歐洲社會階級結構最近的變化》，英文版一九六四年，第一二七—一二八頁；A·吉登斯：《先進社會的階級結構》，紐約，一九七三年，第一〇一—一八八頁。
- ③ R·塔克爾：《卡爾·馬克思的哲學和神話》，劍橋，一九七二年，第一六八頁。
- ④ 參見三聯書店一九八一年版《關於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問題的論爭譯文集》中所收的阿爾都塞的論文。
- ⑤ S·胡克：《馬克思的第二次降世》，載《紐約時報·書評》，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二日，第二頁。
- ⑥ W·泰默爾：《馬克思主義。學說—影響—批判》（前言），一九六〇年。
- ⑦ 《資本論》第一版序言和二版跋。
- ⑧ 《資本論》第三卷，第九二六—九二七頁。
- ⑨ R·阿朗遜：《薩特個人主義的社會理論》，見《西方馬克思主義》，倫敦，一九七八年。
- ⑩ L·科拉科夫斯基：《馬克思主義主要流派》第一卷，第十六章，第二卷，第十七章。
- ⑪ S·胡克：《革命、改良和社會正義》，紐約一九七六年，第八七—八八頁。
- ⑫ 《列寧全集》第二三卷，第六四—六五頁。

## 馬克思主義與自由\*

人的自由的問題，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理論問題，也是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理論問題。然而長期以來，我國理論界對馬克思主義的自由觀的研究卻不多；即使是涉及到馬克思主義的自由觀的著述，也往往局限於認識論領域，彷彿「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一語道出了馬克思主義的自由觀的全部旨趣。無須贅言，迴避馬克思主義的自由觀或把馬克思主義的自由觀簡單化的做法，是有悖於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實際、有悖於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的。恩格斯認為只有用《共產黨宣言》中的這一段話才最適宜於表述未來的社會主義紀元的基本思想：「代替那存在着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①我們認為，馬克思主義非但不諱言「自由」，而且對自由作出了獨到的、科學的解釋：馬克思主義主要是從人的解放和歷史發展來描述人的自由、甚至通常所說的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意義上的自由也需要從人的解放和歷史發展來理解。本文擬對馬克思主義的自由觀作一些初步的探討，希望引起對這個問題的重視和討論。

### 1. 自由的一般意義

無論是馬克思主義還是非馬克思主義，對於自由的意義至少有某種共同的理解，否則就談不上

有其各自的自由觀。較為通行的說法是：自由意味著不受限制；當一個人不受限制地做他想要做或選擇做他能夠做的事情的時候，他是自由的<sup>②</sup>。實際上，這也就是對自由的意義一般規定。

這種對自由的意義的一般規定涉及到A：「從……獲得自由」和B：「自由地去做……」兩個方面。前一方面回答「需要克服或防止什麼限制？」的問題，後一方面回答「什麼行為是不受限制的？」的問題。前一方面是否定的、消極的方面，它強調行動時所遇到的限制；後一方面是肯定的、積極的方面，它強調行動所由發生的願望<sup>③</sup>。這兩個方面又是密切相關的：一個對於自己所受到的限制一無所知或所知甚少的人，他在去做自己想要做或選擇做的事情的時候，往往會感到不自由；一個無所用心，無所作為的人，即使他知道自己所受到的限制，也不會體驗到自由；只有在克服和防止所受到的限制的基礎上去做自己想要做或選擇做的事情的時候，才有人的自由，也才有自由可言。由此可見，自由實際上意味著可能性與現實性的某種關係：這種關係是以人的理性（認識）、意志（目的）以及實踐活動為中間環節的。

從自由的一般意義來說，自由或不自由只能是人的自由或不自由，而且只能是個人的自由或不自由。在中世紀，甚至歷史進入近代之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上帝被視為創世者或「第一推動者」，而其餘一切則被視為上帝的自由意志產物；現在，「上帝或神是自由的」這種陳詞濫調已經不值一提了。我們也不能說自然界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雖然現在很少有人用機械決定論的眼光來看待自然界了——量子力學理論、耗散結構理論強調或然性、偶然性因素在自然界的運動。演化過程中的作用；但是我們卻不能因此就說自然界的發生、發展是隨意的、自由的，正如我們不能根據處於機械決定論水平上的近代自然科學理論而說自然界是不自由的一樣。這是因為，自然界的變化過程是沒



有自覺意識、沒有主觀願望參與的：純粹的自然過程本身並不是在克服某種東西、也不是在實現某種東西，自然界由其自身的規律所決定的運動方向並不是自然界的預定目的。因此，只有人才有自由與不自由可言。進而言之，我們也不能說人的聯合體（如國家）是自由或不自由的。的確，個人的自由與否與別人的自由與否是密切相關的。個人的自由與否是通過人們之間的相互關係，即社會來實現的。但是，我們卻不能因此說人與人之間的某種關係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當我們說「一個社會是自由的社會」的時候，我們實際上是在說，為個人的自由提供了某種條件，同樣，當我們說「一個社會是不自由的社會」的時候，我們實際上是在說，這個社會的某些方面妨礙了個人的自由。所以說，所謂自由與不自由，只能是個人的（或每一個人的）；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或社會只能是個人的自由或不自由的條件。

當然，這裡所說的自由一般意義並不是古已有之的。自由是與人類歷史共始終的東西，人的歷史也是自由在其中成長的歷史；但是無論如何，只有在人類歷史進入近代以後，隨著資本主義（首先在英國）的發展，才充分展開自由觀的討論，才逐漸明確自由的一般意義。在近代，早期的英國自由主義——包括經濟上的自由主義和政治上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們的自由概念主要是否定的，消極的意義上的自由。例如，亞當·斯密和李嘉圖認為，在商品市場上，交換是完全自由的，是有關的個人為追求個人利益而作出的選擇，這種自由不受任何力量（包括政府和法律方面）的阻礙：④又如，在J·S·密爾看來，自由乃是一個人沒有任何外來的強迫或限制的情況下，按照自己選擇的方式行動，這種行動自由應該受到政府的保護⑤。到了十九世紀末，在德國哲學（尤其是康德和康德以後的德國哲學）的影響下，牛津學派的T·H·格林對早期的自由主義思想作了修

正和補充。格林提出了積極的、肯定的自由主義：自由是從事值得去做或享受值得享受的事情的一種積極的力量或能力，自由意味著按照現有條件發展人的能力的實際可能性<sup>6</sup>。綜合這些英國近代自由主義的思想家們的有關理論，我們就可以得到如前所述的對於自由的意義的一般規定。至於自由是人的自由以及自由是個人的自由這一思想，在多數近代思想家們那裏也是勿庸置疑的。近代自由主義思想家們大多把自由看作是「天賦人權」或者把自由看作是人所特有的天賦。例如近代最有影響的思想家之一洛克認為，生命、自由和財產是人的天賦權利<sup>7</sup>。近代思想家們還進一步明確了「自由是個人的」這一思想。我們看到，當黑格爾重新用亞里士多德的方式對自由作國家主義的說明（——即認為自由在於調整個人意願，以便與其在社會中的責任和崗位相稱，或者說，自由就在於符合國家的公民身份）的時候<sup>8</sup>，他遭到來自多方面的反對。例如、黑格爾主要反對者之一克爾凱郭爾認為，只有通過個人的主觀體驗才能接近真理，自由乃是委身於個人自己選擇的生活道路。又如，黑格爾的另一個強有力的反對者尼采認為，自由是個人而非群衆的，自由意味著（每一）個人發展和超越自身，成爲超人<sup>9</sup>。而在馬克思、恩格斯等人談到自由的時候，也常常使用諸如「任何人」、「每一個人」之類的術語——無論是在所謂「早期」的一八四四年手稿中，還是在所謂「晚期」的《資本論》中，都是如此。因此同樣的，綜合多數近代思想家們的有關理論，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印象，自由概念本身就具有某種人道主義（自由是人的自由和自由是個人的自由）的意味。

不言而喻，我們在這裏討論自由的一般意義，並不是說，人們在自由觀上沒有分歧。實際上，如前所述，在近代，人們對自由的意義的理解是各有側重的，人們對自由的意義的了解是逐漸明確的。我們認爲，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在自由觀上的根本分歧主要不在於對自由的一般意義的

規定上，而在於在或多或少或少的程度上，在這樣或那樣的方面承認這種對於自由的一般意義的規定的前提下，對自由所作的說明。

## 2. 馬克思主義的自由觀<sup>(1)</sup>勞動與自由

馬克思主義的自由觀的一個主要之點和根本之點是，用勞動說明人的自由——不僅說明自由的意義和特徵，而且說明自由的發生和發展。（注：馬克思主義古典作家們所說的勞動，有時是指人所特有的活動方式——實踐，但在一般情況下是指人們為獲得生活資料而進行的物質活動——生產。在這裏我們不妨從後一個意義上來使用勞動一詞；這並不導致概念上的混亂，因為即使是人的物質生產活動也是人所特有的。）

首先，馬克思主義的勞動理論揭示了自由的意義和特徵。在《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說，生產活動「本來就是類生活。這是產生生命的生活。一個種的全部特性、種的類特性就在於生命活動的性質，而人的類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覺的活動」<sup>⑩</sup>。在這裡馬克思實際上是把生產活動視為人類特有的自由活動。那麼，這種活動的內容如何呢？在《資本論》第一章中，馬克思明確地說：「勞動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是人們自身的活動來引起、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sup>⑪</sup>也就是說，勞動是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交換關係。人與自然的物質交換關係當然不同於自然界自身內部的相互關係。這是因為：在這種物質交換關係中，儘管人依賴自然界，人靠自然界來生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是人又再生產自然界，人通過改造自然而使之成為他的創造物和現實<sup>⑫</sup>。關於這一點，馬克思後來在《經濟學手稿（一八五七—五八年）》中又指出：「誠然，勞動尺度本身在這裏是由外面提供的，是由必須達到的目的和為達到這個目的而必須由勞

動來克服的那些障礙來提供的。但是克服這種障礙本身，就是自由的實現，而且進一步說，外在目的失掉了單純外在必然性的外觀，被看作個人自我提出的目的，因而被看作自我實現，主體的物化，也就是實在的自由——而這種自由見之於活動恰恰就是勞動，……」<sup>⑬</sup>。由此可見，在馬克思看來勞動並不意味著脫離自然，而是通過改造自然獲取生活資料；同樣的，自由並不在於迴避障礙，而是通過克服障礙達到自我實現。

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的勞動理論實際上已對自由作出了一些規定。這種理論認為：自由是人類特有的行為特徵；自由首先存在於人與自然的相互關係中；自由不是超然於自然界，超然於外在必然性之外，而是自覺地把自然界當作對象世界、通過使自然界發生改變而實現人的自由。

其次，馬克思主義的勞動理論把自由解釋為一個發生、發展的過程。恩格斯在《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一文中對勞動創造了人（和人的自由）做了精闢的描述。在恩格斯看來，在勞動（正在形成中的勞動）中，從人的手變得自由到人腦與猿腦區別開來這一過程是人逐漸遠離動物的過程；而「人離開動物愈遠，他們對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帶有經過思考的、有計劃的、向著一定和事先知道的目標前進的特徵」<sup>⑭</sup>。所以說，正是自由（計劃性和目的性）這一活動特徵的形成，使正在形成中的勞動成爲人的勞動，使正在形成中的人成爲真正的人；反過來說，在正在形成中的人的正在形成中的勞動向真正的人的勞動轉變的時候，人的自由發生了。然而，事情並不到此爲止，自由還有其隨著真正的人勞動的發展而發展的一面——這又可以從如下兩點進行考察。第一，與勞動分工、勞動交往的和所有制關係的發展相一致，人的勞動能力也由片面的、畸形的轉向全面的、完整的。近代以前，勞動分工的發展始於性別方面的分工等自然形成的分工，經過物質勞動和精神

勞動的分工，終於形成城市與鄉村的分離、商業和生產的分離；近代以後，更是形成了以大工業生產為基礎的複雜的嚴密的分工體系。在分工發展的同時，交往也發展起來：人們的交往愈來愈衝破部門的、行業的界限，衝破地域的、民族的狹隘性，從而愈來愈具有普遍的、世界的性質<sup>15</sup>。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認為，在私有制條件下，勞動分工和勞動交往不過是個人的片面的、畸形的發展的條件，每個人因此局限於一個特殊的活動範圍。而在公有制條件下實現聯合起來的個人對全部生產力的總和的占有，使得任何人都沒有特定的活動範圍，每個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門發展<sup>16</sup>。第二，勞動生產力的提高，使人越來越脫離直接的生產過程，從而獲得越來越多的自由時間。無疑，勞動本身就是人的自由行為，就確證人的自由本質。但是，從某種意義來說，勞動對人又具有某種強迫性，因而「像野蠻人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為了維持和再生產自己的生命，必須與自然進行鬥爭一樣，文明人也必須這樣做；而且在一切社會形態中，在一切可能的生產方式中，他都必須這樣做」<sup>17</sup>。要想從勞動這個領域獲得自由，就必須提高勞動生產率，用較短的勞動時間生產出更多的使用價值。

「因此，時間的節約，以及勞動時間在不同的生產部門之間有計劃的分配，在共同生產的基礎上仍然是首要的經濟規律。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為規律」<sup>18</sup>。勞動時間的節約，就意味着著人可以在更多的時間上脫離直接的生產過程，意味著自由時間的增加，意味著獲得自由。所以馬克說，「這個領域（指生產勞動領域——引者）始終是一個必然王國。在這個必然王國的彼岸，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展，真正的自由王國，就開始了。但是，這個自由王國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國的基礎上，才能繁榮起來。工作日的縮短是根本條件」<sup>19</sup>。

由此可見，從自由的發生、發展這一角度來說，馬克思主義的勞動理論表明：自由是在人與自

然的物質交換關係中產生出來的，或者說，勞動創造了人和人的自由；不僅如此，勞動的（分工和交往的）發展為人的能力或潛力的自由發展，從而為人的解放，為人成為全面的、完整的人提供了條件，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又為人在直接生產過程之外獲得自由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綜合上面的論述，我們不難得出這樣一個簡單的結論，即：馬克思主義的自由觀與馬克思主義的勞動理論是密切相關的；確切地說，馬克思主義的勞動理論從一些重要的方面提供了馬克思主義自由觀的大致線索。而且，從馬克思主義的勞動理論這一角度來說，我們可以看出馬克思主義的自由觀有兩個明顯的特徵。其一，馬克思主義的自由觀是全面的自由觀。馬克思主義的自由觀不像密爾等人的理論那樣僅僅把自由看作是不受限制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消極的，否定的自由），也不像尼采等人的理論那樣把自由僅僅看作是不斷擴張自身，不斷超越自身（——積極的，肯定的自由）；馬克思主義的自由觀認為：自由在於既承認障礙又克服障礙，自由意味著在一定條件下發展人的潛力，實現人的本質。其二，馬克思主義的自由觀是歷史的自由觀。馬克思主義的自由觀不像天賦人權論那樣把自由說成是人的先天特徵。更不像黑格爾主義那樣把自己說成是絕對理性在國家生活中的體現；在馬克思主義的自由觀看來：自由是人的本質特徵或人類特有的行為方式；自由首先是在勞動中發生、發展的；自由的成長是一個實現的、歷史的過程。在這裡，馬克思主義的自由觀與非馬克思主義的自由觀在一些方面的分歧是顯而易見的。

### 3. 馬克思主義的自由觀（ii）政治與自由

自由是人的自由，這就意味著，自由或不自由是在人與人之間的一定的社會關係，即政治關係中實現的。當馬克思把自由理解為「障礙的克服」和「人的自我實現」的時候，他所指的，不僅是

人對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認識和改造，即勞動解放，而且包括了人對於社會統治形式的改造，即政治解放。

就政治與自由的關係而言，馬克思主義自由觀有以下基本特點：第一，是聯繫社會生產力水準及歷史發展來理解人們的政治關係以及在這種關係中的自由或不自由，將生產力的一定發展視爲人的政治解放與自由的前提。這就克服了過去的自由觀的不科學性和空想性，而成爲指導現實的科學體系。

在社會生產力十分落後或不夠發達的條件下，爲了維持生計，人們必須花費大量時間從事勞動，在這種條件下，自由可以在兩種意義上存在，其一，人的勞動本身就體現著人的自由本質。不過，這種勞動又有不自由的一方面，因爲在這種情況下，人完全是受生活需要的驅使而用大量時間來從事勞動的。關於勞動的這種自由與不自由，我們在前面已作過較爲詳細的論述。而且與我們將來要討論的問題無直接關係，這裡就不再贅言了。其二，有少數人是自由的——這部分人擁有生產資料和社會剩餘產品，他不必受制於直接的生產過程；而且由他們支配的政治制度又肯定了他們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從而保障了他們在非生產領域的社會生活中支配他人的自由。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少數人的自由是以多數人的不自由爲前提；這部分少數人的自由時間是以其他的多數人的勞動來提拱的：「一個階級的自由時間，是由社會大眾全部生活時間轉化成勞動時間這件事，生出來的。」<sup>20</sup>而正是在這種自由時間裏，有閒階級或剝削階級建立並維持了一種形式上超越於每個人之上的政府或政治，這種政府或政治以一種虛幻的共同體的形式體現著特殊社會集團的特殊經濟利益，從而成爲人們（個人）自由或不自由的社會前提。因此，在階段社會裏，自由是有階級性的。至於原始

社會，生產力水平極其低下，談不上有什麼剩餘產品，因此，既沒有統治和奴役存在的餘地，又沒有權利和義務的任何差別<sup>②</sup>。這種社會並不能為個人提供自由的社會條件，正像他不能為個人提供不自由的社會條件一樣。少數人剝削壓迫多數人，以多數人不自由為少數人自由的前提這一種政治關係是在生產力有了一定發展而又十分不足的條件下產生的。生產領域的不斷發展，提供了較以往多的自由時間，也就逐步地為較多的人要求和能夠參與政治生活或從事非生產活動提供了可能，為人們要求和能夠改變、調整現有的政治關係提供了可能，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恩格斯指出：「文化上的每一個進步，都是邁向自由的一步。」<sup>③</sup>因為人類技術上每一個進步都為人的政治解放，即在政治關係中的自由提供了物質前提。無產階級的政治解放，正是建立在以往歷史，特別是資本主義生產的技術條件和文明成果基礎之上的。「唯有借助於這些生產力，才有可能去實現這樣一種社會制度，在這種制度下不再有任何階級差別，不再有任何對個人生活資料的憂慮，在這種制度下第一次能夠談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談到那種同已被認識的自然規律相協調的生活」<sup>④</sup>。馬克思多次強調，異化的揚棄，人的解放和自由「是以生產力的巨大增長和高度發展為前提的」<sup>⑤</sup>。生產力的巨大增長和高度發展，創造出極大的財富和剩餘時間，才能使全體人們有可能參與對社會的管理並通過這種管理和聯合，把自然界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中，實現那同已被認識的自然規律協調的生活。

生產力的發展是政治解放與自由的前提，並不是說，生產力的發達直接意味著人的自由。要實現人的自由必須有這樣一個政治制度，它能夠提供一種適當的社會關係。保證每個社會成員能夠擁有社會的生產資料，即「聯合起來的個人對全部生產力總和的占有」<sup>⑥</sup>。強調生產資料公有制是人類自由的基礎，這是馬克思主義自由觀的又一個特點。



馬克思主義認為，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條件下，不可能有真正的人的自由。私有制對自由所造成的障礙在於：首先，它使一些人成爲擁有生產資料和統治權力的剝削者和壓迫者，而使另一些人喪失或缺乏對於勞動對象、勞動成果以及勞動活動本身的所有權自主權，並因之失去非生產領域之外的社會生活的自主權。在這種異化和敵對的關係中，勞動者「無機的生命」，他的生命和創造活動被他人拿走了，他對於自身活動的權力被他人剝奪了。「生產力是和他們分離的，因此這些個人喪失了一切現實生活內容，成了抽象的個人」<sup>26</sup>。在生產和所有的現實活動中，他不是作爲自由的人，而只是作爲屈從於他人的工具，接受著他人對於自己的勞動過程和勞動成果的支配，接受著外在的社會統治形式的控制。儘管私有制隨著歷史的進步改變著形式，但「在奴隸勞動、徭役勞動、雇傭勞動這樣一些勞動的歷史形式下，勞動始終是令人厭惡的事情，始終是外在的強制的勞動」<sup>27</sup>。因爲在剝削和被壓迫的所有制關係中，是談不上人的真正解放和自由的。其次，私有制還限制了人們的活動範圍，從而限制了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私有制形式下的個人之間的交往雖然不斷採取新的、擴大的形式，但每個個人不可能占有全部社會生產力的總和，因而不可能得到全面的發展及自由。「過去的一切革命的占有都是有局限性的：個人的自主活動受到有限的生產工具和有限的交往的束縛，他們所占有的只是這種有限的生產工具，因此他們只達到了新的局限性。」<sup>28</sup>馬克思主義正是爲了實現人類的真正自由平等而否定私有制，生產資料公有制正是旨在克服桎梏人的障礙而成爲人們自主活動和自由的社會條件。生產資料公有制，在馬克思這裏有確切的含義，這就是「聯合起來的個人對全部生產力總和的占有」。它包括互相聯繫的兩層意思，一是指「聯合起來的個人」對生產資料的占有，也就是每個個人對生產資料的占有。每個社會成員，不是憑權勢的大小或資本的多少，

而是作爲勞動者的存在和資格，獲得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支配權，因而成爲自身以及社會的主人。社會生產資料受聯合起來的個人即每個個人的支配而不只是某個人或某些人的支配，也就是說，每個個人都必須作爲主人而對生產資料有着自主權，任何人都不能用任何方式剝奪這種自主權支配權。在這種真正消滅了剝削和壓迫的關係中，「勞動轉化爲自主活動」「過去的被動交往轉化爲所有個人作爲真正個人參加的交往」<sup>28</sup>。使勞動和其他非生產性活動成爲自我決定自我實現的活動，從而使社會生產置於全社會即每個個人的自覺控制之下，使勞動者「獲得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動，這種自主活動就是對生產力總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來的才能總和的發揮」<sup>29</sup>。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另一層意思，是聯合起來的個人「對生產力總和的占有」。每個個人可以在占有生產力總和的前提下全面地發展自身。「在過去的一切所有制下，許多人屈從於某種唯一的生產工具」<sup>30</sup>。從而受到各種限制而成爲片面的甚至畸形的人。「在無產階級的占有制下，許多生產工具應當受每一個個人的支配。而財產則受所有的個人支配」<sup>31</sup>，從而在普遍的占有和普遍的交往中人盡其才，獲得全面發展的社會條件。因爲「對生產工具的一定總和的占有，也就是個人本身的才能的一定總和的發揮」<sup>32</sup>。每個人的發展又造成了其他人的發展，人與人之間不再是互相妨礙的障礙，而是互相創造的條件。因此，按照本來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理想，社會主義自由比包括資本主義制度在內的以前任何社會的自由在內容上都要更爲豐富。

以上我們已經談到，人的自由必須以生產力一定發展爲前提，並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爲基礎。但僅此仍是不夠的，一個具備一定社會生產力和公有制所有制關係的社會，還必須加上健全的民主制度，才能爲人的自由提供「真實的集體」「在真實的集體的條件下，各個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並通過

這種聯合獲得自由」<sup>34</sup>。馬克思主義自由觀之區別於其他政治理論和自由學說的又一個特點，在於它把真實的集體，即民主化的政治關係作為政治解放與自由的標誌。

「真實的集體」，其首要的規定性是各個個人參與的集體，即「各個個人自己的聯合」。一個人是否自由，取決於他是否具有參與集體或者說參與政治的現實權力，他的自由度，取決於這種參與的性質與程度；個人只有通過對一定社會的政治或政府的參與、管理，並受到這個政治或政府的制約和保護，才成為「真正的個人」<sup>35</sup>。對於被排斥在政治集體之外的，或者說喪失了政治生活中的主體權力的個人，至多是某種行使他人意志的工具，是不能在完整的意義上被稱為真實的個人的。正是在這種的意義上馬克思說：「只有在集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集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sup>36</sup>但是在以往各種私有制形式下的政府或政治，並不是真實的集體，而不過是冒充的集體，因為他們只是少數人或部分人參與的集體，少數人或部分人參與或組成了一定的政治或政府，卻以虛幻的共同體的形式凌駕於一切人之上。「在過去的種種冒充的集體中，如在國家等等中，個人自由只是對那些在統治階級範圍內發展的個人來說是在的，他們之所以有個人自由，只是因為他們是這一階級的個人。」<sup>37</sup>資本主義以前的私有制社會裏，是極少數人的政治參與，即極少數人的民主與自由，少數人通過把王權在王室、皇族中世代傳遞的世襲制來把握國家最高政權；資本主義的普選制在一定程度上擴展了社會成員對於政治參與的範圍，但仍然只是一部分人，即掌握有資本的那部分人所操縱的政治或政府，因而也是冒充的集體。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並不因其標榜民主、自由，而恰恰因為這種民主和自由還不真實不徹底。馬克思認為，真實的集體必須是消滅了階級差別的最普遍最廣泛的個人參與的聯合體。每個人不是憑特權，憑資本

或其他的什麼，而是憑社會的人本身，參與對國家的管理及其對自身的支配，並通過真實廣泛的選舉，自下而上地選出能代表自己意志的公僕。這種各個個人參與的聯合體，才能實現民主的社會化或社會化的民主，即社會主義的民主，因而才能有真實的普遍的個人自由。

除了各個個人的參與，馬克思關於真實的集體還有着與之相關的另一個規定，這就是，它必須是能夠保護或創造真實廣泛的個人自由的聯合體，使各個個人能「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由」。馬克思主義認為，政治或政府本身並不是目的，而是個人「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sup>38</sup>。人們結成一定的社會關係和政治體制，正是爲了全面發展自己，保護個人自由。但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政府卻成了與大多數個人對立的、異化的、「虛假的集體」，這個集體只保護那些在統治階級範圍內發展的個人的自由，個人自由只是對那些在統治階級範圍內發展的個人來說是存在的，「由於這種集體是一個階級反對另一個階級的聯合，因此對於被支配的階級說來，它不僅是完全虛幻的集體，而且是一個新的桎梏」<sup>39</sup>。無產階級的政治解放，正是揚棄這種異化，即打碎虛假的集體，創造真實而廣泛地保障個人的集體。在真實的集體的條件下，個人所受的制約是自己的、內在的、不是外在的強制的；這種制約不是爲了維護某些人的專制或資本的統治，而是爲了每個個人的根本利益，即創造每個人自由發展的條件，它要反對的，恰恰是那些破壞這種條件的行爲，那些以破壞或剝奪他人自由來滿足自己的自由的行爲。說一個社會是否民主自由，就是看其在多大程度上爲個人自由創造了條件，即各個個人在多大程度上是自由的。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正在於他能夠保證和創造出較資本主義更普遍的個人自由，它「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sup>40</sup>。因此，社會主義在本質上是與真正的民主主義一致的。列寧在〈俄國社會主義者的任務〉一文

中說，民主主義工作與社會主義工作「有不可分割的聯繫」<sup>①</sup>。又說「俄國一切社會主義者都應該成爲社會民主主義者」，「俄國一切真正的和徹底的民主主義者，都應該成爲社會民主主義者」<sup>②</sup>。在社會主義實踐中，由於舊社會的痕跡以及政治體制本身的某些不完善，人民的政治權力一度受到侵犯，但這些並不是社會主義自身的東西，而是與社會主義的本質不相容的。社會主義的民主必須並且能夠在改革中得到完善和發展。

綜上所述，馬克思主義自由觀並不僅僅是關於認識論的學說，而是關於人的自由發展和徹底解放的理論，它包括人在與自然的關係中獲得自由（勞動解放）和在人與人的關係中獲得自由（政治解放）兩個方面，而且，它又是將這兩個方面聯繫起來考察人的自由及其歷史發展的。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就是因爲它所研究和力圖解決的是人類自由和解放這個人類的根本性問題並對之作出科學的指示。馬克思主義將繼續研究時代發展所提出的人類自由和發展的新問題，並作出新的科學的解答。

原載《馬克思主義研究》，一九八七年第四期

## 註釋

\*本文與廖曉義合作。

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九卷，第一八九、五三五頁。一九九四年一月三日，卡內帕請求恩格斯爲一九九四年三月起在日內瓦出版的周刊《新紀元》題辭，用簡短的字句來表述未來社會主義紀元的基本思想以別於但丁曾說

的「一些人統治、另一些人受苦難」的舊紀元。恩格斯給卡內帕的信中說，「我打算從馬克思的著作中給您尋找一行您所要求的題詞……但是，除了從《共產黨宣言》中摘出下列一段話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適的了。」

② 見 D. D. Raphael 的 *Problems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MACMILAN EDUCATION LTD, 一九八五年版，第一一五頁。

③ 同上書，第一一六頁。

④ 見喬治·霍蘭·薩拜因的《政治學說史》，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版，第七五九～七六〇頁。

⑤ 見密爾的《論自由》的第一章。

⑥ 見薩拜因的《政治學說史》，第七九九頁。

⑦ 見薩拜因的《政治學說史》，第五九二頁。

⑧ 見薩拜因的《政治學說史》，第七二五～七二六頁。

⑨ 見 L. J. 賓克萊的《理想的衝突》，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版，第四章。

⑩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二卷，第九六頁。

⑪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三卷，第二〇一～二〇二頁。

⑫ 參閱《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二卷，第四九～五一頁。

⑬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六卷下冊，第一一二頁。

⑭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五一六頁。

⑮ 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五一頁。

⑯ 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三七～三八頁。

- 1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五卷，第九二六頁。
- 1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六卷，上冊第一二〇頁。
- 19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五卷，第九二七頁。
- 20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六五一頁，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
- 21 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一五四—一五五頁。
- 2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一五四頁。
- 2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一五四頁。
- 2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三九頁。
- 2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七五頁。
- 26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七四頁。
- 2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六卷下，第一一二—一三頁。
- 28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七四—七五頁。
- 29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七五頁。
- 30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七四頁。
- 3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七五頁。
- 3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七五頁。
- 3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七四頁。
- 3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八二頁。

- ③④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七五頁。
- ③⑤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八二頁。
- ③⑥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八二頁。
- ③⑦ 同上書。
- ③⑧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八二頁。
- ③⑨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二七三頁。
- ④① 《列寧選集》，第一卷，第九九頁。
- ④② 《列寧選集》，第一卷，第一〇三頁。



## 馬克思對訊息時代的預見\*

近幾十年來方興未艾的新技術革命越來越有力地改變著人類文明的各方面。正如愛因斯坦之後最偉大的科學家之一普里高津所說：當代人「生活在訊息技術的革命之中……：訊息技術革命觸及到了我們文化的真正核心」。從科學的角度說，我們這個時代最主要的特徵就在於它是一個高度訊息化的時代。

因提出「訊息社會」（所謂「後工業化社會」）理論而著稱的貝爾，在其影響頗大的代表作中有這樣一段令人深思的話：訊息化，「這一發展的許多方面很久前就已被人預見到。例如，聖西門和馬克思早就極為關注技術人員（在一種情況下）和科學（在另一種情況下）在社會轉變中的決定性作用」。貝爾同時說明，這個看法並非他首創，而是採自其他學者。貝爾許多方面並不贊同馬克思主義，但他的這個看法卻是公正而有眼力的。

生活在一個多世紀前的馬克思，對其身後來臨的訊息時代作過怎樣的預見呢？他何以能夠作出這樣「天才的」預見呢？正值全國熱烈探討改革體制、迎接新技術革命的挑戰之時，我們理論工作者從他的預見中應該得到哪些啓發呢？

## 馬克思的預見

馬克思生活的時代是近代科學技術剛剛大規模應用於生產的時代。先是蒸汽機而後是電力，作爲人類馴服自然力的象徵，刷新了生產力系統中基礎性的動力部分；人類知識的結晶——機器，以它加工的精確和速度取代了靈巧而緩慢的手工操作；化學在農業上的初步應用促進了產量的成倍增長……這一切像魔力一樣創造出龐大的財富，歷史上最強有力的革命家——科學嶄露頭角。這正是馬克思得以作出天才預見的客觀背景。

對社會發展趨勢始終持有驚人的敏感和洞察力的馬克思，立即從上述現象中看到行將到來的人類文明新時代的萌芽。

馬克思首先關注並探討的，是科技進步條件下人從直接勞動過程中解脫出來的可能性。促使這種可能性出現的因素在他看來有二：一是全社會範圍內勞動生產率的普遍提高，有可能使社會不再把大部分成員投入生產維持社會生存的資料的部門中去。二是自動機體系的出現，在技術上使生產部門的勞動者有可能不再親身參與到具體生產過程中去。馬克思認爲，當傳統勞動方式轉變爲現代化勞動方式的時候，「勞動表現爲不再像以前那樣被包括在生產過程中，相反地，表現爲人以生產過程的監督者和調節者的身分同生產過程本身發生關係。……工人不再是生產過程的主要當事者。而是站在生產過程的旁邊」。進一步說，「隨著大工業的這種發展，直接勞動本身不再是生產的基礎。」<sup>①</sup>

馬克思同時探討了科技進步所展示的具有代表性意義的第二大變化趨勢——勞動的質變以及相應的新式勞動者的出現：「……不再是工人把改變了形態的自然物作為中間環節放在自己和對象之間；而是工人把他改變為工業過程的自然過程作為媒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無機自然界之間」<sup>②</sup>。在傳統的勞動形態中，勞動就是人直接操作着工具（它不過是被加工過的簡單自然物件）對生產對象發生作用。而在現代科學進步的條件下，處於勞動者與勞動對象之間的是綜合了多門科技知識的自動機體系，驅動它運轉的是自然界本身提供而為人所控制的種種巨大能量。這一切體現了人類理性對大自然客觀規律的掌握和利用，因此，勞動表現為被人有意識地改造為工業過程的自然過程對自然界發生作用。

這樣一來，勞動者本身也要發生相應的變化。「發展為自動化過程的勞動資料的生產力要以自然力服從於社會智力為前提」<sup>③</sup>。所以，體力勞動者朝智力化方向的演變是必然的、不言自明的。

馬克思從上述種種趨向中獲得了有力的啓發，他竭力要挖掘出隱藏在這一一切背後的那個更深層的發展趨勢。一旦把握住了這個發展前景，他立即沉浸在由衷的喜悅和激動之中。這個意義重大、深遠的發展前景就是：科學、知識將取代人類的直接勞動和積累勞動（即被加工過的自然資源）而成為社會財富的主要源泉，社會的發展越來越將為智力所規劃和控制。他寫道：「隨著大工業的發展，現實財富的創造較少地取決於勞動時間和已耗費的勞動量，較多地取決於在勞動時間內所運用的動因的力量，而這種動因自身……取決於一般的科學水平和技術進步，或者說取決於科學在生產上的應用。」這表明，「一般社會知識，已經在多麼大的程度上變成了直接的生產力，從而社會生活過程的條件本身在多麼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並按照這種智力得到改造。」<sup>④</sup>

簡略回顧了馬克思的論述，再來看當代人筆下的「訊息社會」。綜合衆多學者的經驗描述（他們的某些結論自然不能被我們接受），訊息時代的基本特徵可以概括爲：

——產業結構發生變化，從事教科文和公共服務的產業成爲社會經濟的最大部門，其中又以「訊息產業」占居主導地位。美國農業勞動力一七九〇年占總勞動力的百分之九十，一九八〇年降爲百分之三·六；產業工人一九五〇年占就業總人數的百分之三十五·五，一九八〇年降爲百分之三·六。這些勞動力到哪裏去了呢？轉入教、衛、文、財和服務行業去了。一九八〇年，美國這部分產業人數已達總勞動力的百分之六十七·三。日本也有類似的趨勢。這類數字所說明的社會變化，一言以蔽之，就是服業的比重越來越大。

——勞動力結構發生變化，專業科技人員（所謂「白領人員」）取代體力勞動者（「藍領工人」）而成爲勞動力的主導部分。學者們強調，判斷社會訊息化的程度，不僅要看人們在什麼部門工作（產業結構），還要看他們做什麼性質的工作。從事智力勞動和管理工作的人數一九五六年在美國首次超過體力勞動者。工業文明史上這個含義深遠的變化自那時以後愈益顯著。到一九八〇年，美國二者比例達到約百分之五十二比百分之三十四。更爲驚人的變化趨勢是，一般人專業技術人員的增長率是勞動力平均增長率的二倍，而較高級的科學家和工程師的增長率則達到勞動人員增長率的三倍。不僅如此，即使是體力勞動者本身，其勞動時智力支出的比重也在不斷增大。日本六十年代新興化學工業中工人由體力作業轉變爲監視作業的部分達到百分之七十六。至於在更先進的使用電腦——機器人系統的企業裏，工人作業基本上是緊張的腦力支出。

——資源結構發生變化，訊息成爲社會財富增長的極其重要的資源，知識的生產力成爲決定生

產力、競爭力、經濟成就的關鍵因素。發達國家訊息部門的增值占生產總值的份額日益增加。美國前總統卡特一九七九年三月的科技咨文宣稱：「在過去三十年裏，美國經濟的增長有百分之三十（四十是技術革新的成果。」明尼蘇達大學一位教師統計，從二十年代中到七十年代中，美國農業產量的增加完全是提高生產率的結果，而生產率的增長主要歸功於新的知識和訊息。

——對於組織決策和指導變革具有決定性意義的科學理論知識處於中心地位，社會圍繞著科學理論知識組織起來以達到管理社會、指導革新的目的；科學的組織問題成為社會首要問題，一個國家的科學能力成為它的潛力和力量的決定性因素。

當我們把馬克思的預見與當代的客觀趨向兩相對照時，不是立刻可以發現一種驚人的呼應嗎？所謂「產業結構變化」，不正是人本身得以從直接勞動過程中解脫出來嗎？所謂「勞動力結構變化，白領人員的總額和增長率均超過藍領工人」，不正是勞動的質變以及相應的新式勞動者的出現，也即智力勞動成為現時代勞動演變的主導趨勢嗎？所謂「資源結構變化，訊息成為決定生產力和財富增值的關鍵因素」，不正是一般社會知識已經在愈益廣大的程度上變成了直接的生產力嗎？至於所謂「對於組織決策和指導變革具有決定性意義的科學理論知識處於中心地位」，這正是馬克思所揭示的「社會生活過程的條件本身……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並按照這種智力得到改造」的客觀規律的充分表現。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馬克思身後一個多世紀的社會趨勢就是這樣驗證他的預見的！

可貴的不僅是馬克思一般地預見到訊息時代的特徵，更重要的是他還進而揭示出該時代繁榮發達的根本途徑。這一點對我們面臨挑戰、力爭後來居上特別具有現實意義。

馬克思指出：「自然界沒有製造出任何機器，沒有製造出機車、鐵路、電報、走錠紡織機等等。……它們是人類的手創造出來的人類頭腦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識力量。」<sup>⑤</sup>所以，如果拋棄各種外在形式，「財富豈不正是人的創造天賦的絕對發揮嗎？」<sup>⑥</sup>他由此得出一個原則性論點：在由傳統形式的勞動向現代化生產的「轉變中，表現為生產和財富的宏大基石的……是對人本身的一般生產力的占有，是人對自然界的了解和通過人作為社會體的存在來對自然界的統治，總之，是社會個人的發展」<sup>⑦</sup>

「人的創造天賦」，「社會個人的發展」——這就是馬克思指明的訊息時代。繁榮發達的源泉！如何開發它，使之能夠源源不斷地湧流出來呢？馬克思認為，基本的途徑一方面是與現代化生產密切相聯的科學文化教育，要對作為勞動者的社會個人進行完整而非片面的、富有啓發性而非刻板機械的系統教育，把他們培養成技能盡可能多方面的積極「主體」<sup>⑧</sup>。另一方面要利用現代科技手段使人能夠擺脫漫長的直接勞動的條件，逐步為人們提供越來越多的「自由時間」，即進行多種多樣的科學、藝術、體育、社會活動等等的時間，充分發展和發揮人們各方面的豐富潛能。「增加自由時間，即增加使個人得到充分發展的時間，而個人的充分發展又作為最大的生產力反作用於勞動生產力。」<sup>⑨</sup>因此，在馬克思看來，在現代科技條件下，社會越是富裕，就能夠為人們提供越多的開發創造力的自由時間和手段，而社會能夠越多地提供這種時間和手段，它就可以越快地富裕發達起來。「因為真正的財富就是所有個人的發達的生產力。」<sup>⑩</sup>

馬克思的這些真知灼見，不但得到他身後衆多民族發展道路的成敗得失的一再證實，也得到當代學者有關訊息社會的研究展望的有力支持：

——世界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把人材的開發利用置於如此重要地位。職業教育、成人教育、終身教育、嬰兒乃至胎兒的早期教育、創造工程教育、「人才公司」、「腦庫」、「人才銀行」……層出不窮。凡在這方面捨得花大力氣的國家就躋身世界的前列，反之，即使進口再多的先進設備，現代化也依舊「化」不起來。美國所以本世紀一直遙遙領先，地大物博固然是重要條件，但關鍵更在於人力開發和人才引進。戰後美國從外吸收科技人才達二十二萬名，其中許多人成了新學科的開拓人、新理論的創立人、新技術的發明人、新政策的制定人。現在，美國擁有一千多萬大學畢業生，一百多萬研究院畢業生，近一百萬高級師資。它就是憑藉這樣雄厚的人才儲備保持着領先地位。日本從戰敗國一躍而起，同樣主要靠的是智力開發。以人才優勢補資源之不足，由「教育大國」而走向「經濟大國」，這就是日本的成功之路。所以，在現代，國家的強大，民族的繁榮，並不單純取決於領土的廣袤、資源的富饒和人口的衆多，而是越來越取決於人民是否普遍具有較高的知識水平，是否擁有各種出類拔萃的人才。只要在這些方面具有優勢，資源貧乏同樣能富裕，國土狹小同樣能強大，人口不多同樣能繁榮。否則，再大的國土，再多的資源也只能沉睡如故，絕不會自動起來造福社會和人民。

——新技術革命造成的新局勢，把這個問題推向更加突出的地位。科學家們堅信，創造工程學將是二十一世紀最宏偉的工程。「訊息社會」裏，不但繁重的體力勞動可交給自動機去做，重複的腦力勞動也可移交給電腦，人類將着重於創造性的活動。羅馬俱樂部研究報告認為，傳統的學習已不能適應目前世界問題的複雜性，唯「創新學習」才能夠使人們自覺地提高預見事件的能力和對決策的參預作用。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名為「加拿大的明天」的對策研討會呼籲：為確保在「新產業革

命」中爭得主動，必須增加智力投資，改變教育制度，培養「有知識、有適應能力、富於創新的一代人」。日本一九六九年五月情報產業部門會議的《措施諮詢》就已確認，「訊息社會」對於教育、尤其是全體社會成員的教育賦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大部分閒暇時間要用於人的教育和自我啓發。日本人痛感在科技方面「有養育能力而無生育能力」（諾貝爾獎獲得者江崎玲于奈語），在八十年代伊始展開了大辯論，進行民族自我批評。其結果由「六十人委員會」起草報告訴諸政府和公眾輿論，指責近年來日本發展出現種種消極特徵的「原因在於社會教育制度過於墨守成規，而且從本質上說，還束縛了真正強有力的、富於創造性的個性」。日本要找到新時代必需的衝勁，就必須「創造出一個更適宜於創造性，更適宜於個人的能力，更適宜於消除大學、工業和國家之間界限的環境」。

《世界面臨挑戰》的作者這樣概括所有力爭早日跨入「訊息社會」的民族必須正視的問題：「這就是訊息社會的本質：它是建立在根據各人自身的能力『充分使用各人才能』的基礎上的。……訊息的特殊效能，正是在於它能夠發揮個人的才能：它越促進培養、獲取知識和行動等方面的個體化，就越能加速反過來使每個人的能力得到最好運用的過程。」

建國以來，我國在人口智力開發方面取得不小成績。例如，一九八三年全國高校在校學生一百二十萬零七千人，比一九四九年的十一萬七千人增長近十倍。但由於歷史的原因和人口基數過大，現在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人口的文化素質仍很低。據一九八二年全國人口普查資料，我國（編按：指中國大陸）知識份子（大學畢業、肄業和在校大學生）佔人口總數的百分之〇·六，在全世界幾乎處於最低水平，比印度還要低得多。文盲、半文盲佔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三·五，而法國是百分之二，聯邦德國是百分之三。如此貧乏的智力資源已成爲我國現代化的嚴重障礙。針對這個問題，鄧



小平早就大聲疾呼：「靠空講不能實現現代化，必須有知識，有人才。沒有知識，沒有人才，怎麼上得去？」<sup>①</sup>趙紫陽在六屆人大二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改革經濟體制，迎接技術革命，推進經濟建設，都迫切需要大批掌握現代科學技術和管理知識的人才。」因此必須「加強智力開發」。這些戰略考慮和施政方針，可以說是真正抓住了高度訊息化時代中國振興發達的關鍵。

在回顧馬克思對訊息時代的預見時，一方面我們深感他預見的科學性，另一方面也會深思：爲什麼他在工業化時代就能對後來的訊息時代作出如此科學的預見？雖然他既沒有使用「訊息社會」這樣的新穎術語，也不可能想像到電腦、核能這類新興的技術。除了前述背景條件的客觀原因外，根本的主觀原因在於：馬克思作爲革命的社會科學家，從不把自己封閉在狹義的「社會理論」的圈子裏，而是把社會科學也當作整個科學的一個有機部分，密切注視著各門科學最新的發展，敏銳思考 and 積極探討科技的進展給人類社會可能帶來的深刻變革。

然而，與馬克思所做的相比，我們現在的理論界在某種程度上是不能適應新技術革命的時代發展的。鄧小平幾年前就已指出：「現代科學技術正在經歷著一場偉大的革命。……當代的自然科學正以空前的規模和速度，應用於生產，使社會物質生產的各個領域面貌一新。」<sup>②</sup>儘管如此，有的是因爲知識結構陳舊，有的是因爲鄙棄「奇技淫巧」的封建思想殘餘以及多年來閉關自守和「左」的思潮造成的思想僵化，使得一些人對國際上科學技術的最新潮流往往愚昧無知。對科技發展產生的交叉、邊緣學科和學說，往往不能本著分析鑒別的科學精神，提取其中於我現代化有價值的訊息，而是形而上學地拒斥。長此以往，我們就很難完成黨和人民給予的重託。我們中國的理論工作者應

該像馬克思那樣，密切地注視、公正地評價和合理地汲取當代世界各門科學最新發展的成果，以急迫的現實感和崇高的責任感，著重研究怎樣搞好改革，創造出迎接和發展新技術革命成果的社會經濟文化條件，促進兩個文明的繁榮發達。

原載《人民日報》，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 註釋

\* 本文與丁學良合作。

-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六卷下，第二一八～二二二頁。
- ② 同上，第二一八頁。
- ③ 同上，第二二二頁。
- ④ 同上，第二一七～二一九頁。
- ⑤ 同上，第二一九頁。
- ⑥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六卷上，第四八六頁。
- ⑦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六卷下，第二一八頁。
- ⑧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三卷，第五二九～五三五頁。
- ⑨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七卷下，第二二五頁。
- ⑩ 同上，第二二二頁。

- 《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三七頁。
- ⑫ 同上，第八四頁。



## 對外開放政策和馬克思主義

對外開放政策卓著成效，因為它符合我國國情，是一條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政策。

馬克思生活的時代還不存在社會主義制度，他甚至從來沒想過要給社會主義制度擬訂任何模式，當然更不可能設想社會主義國家將來實行什麼具體政策。因此，要想在馬克思的著作中引出關於對外開放政策的有關語錄，當然是荒唐的，也是錯誤的。一項政策是不是符合馬克思主義，不在於馬克思主義古典作家有沒有講過，而在於它是不是採取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並以之與本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

馬克思主義是發展的科學。它的生命力就在於不斷地從人類最新的成果，從社會的實踐經驗中，吸取營養、得到充實；在實踐中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一切從實踐出發，馬克思主義也就得到了發展。作為創造性馬克思主義，而不是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不能不涉及當代一切重要的問題。

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產黨宣言》中，說明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的非常革命的作用，特別它在創造巨大的生產力時，曾充分論證了世界市場的作用。世界市場，一方面是產業革命和社會化大生產的結果；另一方面是促進生產力發展和打破舊的封建的、宗法的關係的重要因素。資本主義在一個多世紀以前就呈現出這樣一種趨勢，即世界市場的擴大，國際交換和國際分工的發展，

用相互依賴的紐帶把各個不同的民族聯繫起來。這一過程是生產力蓬勃發展的反映，也是進步的趨勢。

今天的世界，和一個多世紀以前有了根本的不同，在資本主義國家存在的同時，出現了許多社會主義國家。但是，世界市場、國際交換和國際分工對於生產力的發展的作用不是削弱了，而是更強了。這首先是由於生產力的飛速發展，特別是當前我們正面臨著一次新的技術革命。電子技術、訊息技術、生物工程、空間技術、海洋工程、人工智能等新科學技術之發展層出不窮。特別是電子計算機、人工智能和通訊技術的綜合發展，將使我們這個時代成爲一個高度訊息化的社會。當今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不同別的國家發展經濟貿易往來，不同世界市場發生聯繫，閉關鎖國的時代、「兩個平行的世界市場」的時代都已不復存在了。而且在高度訊息化、大眾媒介普遍發展的今天，想閉關鎖國也是做不到的。可以說，今天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

從我國的實際來看，外國學者，如吉爾奈特公認，在十三世紀末葉，「在社會生活、藝術、文娛、機構和技術領域，中國無可爭辯地是當時最先進的國家」。而到解放以前，中國卻變成世界上最貧窮、最不發達的國家之一。原因何在呢？除其他重要的原因外，閉關鎖國也是中國歷史上落後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們建國以後，在某種程度上還是閉關自守，雖然，不是完全由於我們的過錯，例如，建國初期，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國實行封鎖，再加上我們會錯誤地採取了一些「左」的政策，特別是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不但給我們帶來了災難，而且使我們與世界隔離開來，錯過了戰後六十、七十年代世界各國進行技術革命的良機。所以，建國以來的經驗說明閉關自守不符合馬克思主義關於世界市場促進生產力發展的論點，關起門來搞建設不可能發展生產力。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的思想路線是：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況、新事物、新問題，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繫實際的原則。明確在社會主義階段最根本的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而要使我們的經濟發展快一點，就是要實行對外開放政策，開放十四個沿海大中城市，引進外資、國外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當然，我們要注意實行開放政策所帶來的一些問題和消極因素，但是它們比起加速我國建設事業的積極效果要小得多。總之，對外開放是一條馬克思主義的政策，決不是權宜之計，不但要堅持下去，而且還要進一步開展。

原載《世界經濟導報》，一九八四年五月





# 馬克思主義與保衛和平運動\*

——為國際和平年而作

在今日世界，和平與戰爭的問題是關係到人類共同前途的一個嚴重問題，保衛和平運動已成為一個強大的群眾性的進步運動。以解決現代社會基本矛盾為己任、以實現全人類徹底解放為最高目標的馬克思主義者本身，必然是積極的保衛和平運動者。闡明馬克思主義對待和平與戰爭的問題的看法，對於組成最廣泛的保衛和平運動的統一戰線，從而對爭取世界和平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馬克思主義認為，戰爭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惡魔」；隨著科學技術和軍事工業的發展，戰爭必然具有日益增大的毀滅性作用。在現代條件下，世界和平的嚴重威脅來自軍備競賽。

馬克思在他去世前三年（一八八〇年），根據當時的情況，曾一般地敘述了戰爭的惡果。他指出「戰爭無疑會造成相當長期的、沒有益處的力量衰竭」①。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恩格斯已對未來戰爭的規模和破壞後果作了深刻的預見。他說：「現在除了世界戰爭以外已經不可能有任何別的戰爭了。這會是一場具有空前規模和空前劇烈的世界戰爭。那時會有八百萬到一千萬的士兵彼此殘殺，同時把整個歐洲都吃得乾乾淨淨，比任何時候的蝗蟲群還要吃得厲害」②。

科學技術和軍事工業的飛躍發展，在爲人類創造出巨大財富的同時，也造就了毀滅自身和整個人類的手段。科學技術的發展不僅使武器的殺傷率成千百倍地增長，而且使普通非軍事平民遭受越來越大的損失，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軍事人員有一千七百萬人死亡，而平民因空襲、飢餓、疾病和法西斯暴行而死亡的人數大大超過了軍事人員<sup>③</sup>。今天的世界已受到了核武器以及生物、化學和光學武器的可怕威脅；其中，核武器已成爲人類頭上的「達摩克里斯劍」。一顆相當於幾千萬噸普通炸藥當量的原子彈，可以在瞬間之間置千萬人於死地；而現在僅兩個超級大國擁有的核武器，已足以使整個世界毀滅幾十遍。一旦爆發了核大戰，出現了「核冬天」，戰爭雙方連同整個人類有可能一齊遭到徹底的和無情的毀滅。從這個意義上講，比起十九世紀，人類今天的生存環境和條件更爲嚴酷，抉擇的餘地更爲狹窄和明確——要麼維護世界和平，要麼共同毀滅。世界戰爭，核戰爭，這是真正的「蝗蟲群」，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可怕的「惡魔」。今天，馬克思主義關於保衛世界和平的立場的確定，正是以此爲核心根據和出發點的。

(二)馬克思主義認爲，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是現代戰爭的主要根源；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結構和不正常的國際政治關係爲各種戰爭的醞釀和發生提供了溫床。

僅僅知道戰爭的破壞作用是不夠的，還必須找出戰爭的根源，像列寧所說的那樣，弄清楚「戰爭是由於什麼打起來的」、「爲了什麼政治目的進行的」<sup>④</sup>；只有這樣，才有可能提出制止戰爭的辦法。

恩格斯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曾分析了普法戰爭歐洲大陸新的戰爭格局形成的原因。他認爲，德國吞併法國的亞爾薩斯和洛林，使法國變成俄國反對德國的同盟者；而沙皇對君士坦丁堡的野心，

又把奧地利甚至意大利變成德國反對俄國的同盟者。大陸上的軍事強國由此分爲相互敵對又相互威脅的兩大軍事陣營；激烈的領土爭奪，稱霸地區的野心，以及由此形成的全面而尖銳的軍事對峙和空前規模的軍備競賽，決定了「下一次戰爭，只要一爆發，就絕不會限於局部地區，它在頭幾個月裏就會把大國——至少是大陸上的大國——都捲進去」⑤。

列寧的一個基本觀點是：現代戰爭產生於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他指出，當列強在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規律的作用下開始爭權奪利、重新瓜分殖民地 and 勢力範圍的鬥爭時，戰爭便不可避免。對於這種帝國主義戰爭、一切侵略戰爭和剝削階級爲了鞏固自己的階級統治而進行的戰爭，是必須堅決反對的，但是馬克思主義者並不無條件地反對一切戰爭。我們的目的是要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消滅人類劃分爲階級的現象，消滅一個民族剝削另一個民族的現象，從而使得戰爭不能發生。因此，我們贊成革命戰爭、民族解放戰爭，和維護民族獨立和保衛社會主義的戰爭，而這一切都是剝削階級強加的。

當前世界局勢的動盪和不穩定，國際關係中種種危機和戰爭「焦點」的出現，首要的原因就在於兩個超級大國的爭奪——既有明爭，譬如競相在歐洲部署新式核武器、在太空試驗打擊、摧毀對方的新式雷射武器；又有暗鬥，譬如出錢、出武器、出軍事顧問，在中東等「焦點」上扶植代理人，削弱對方勢力和影響；在今天世界各地所發生的大部分戰爭和各種衝突的背後，都可以見到超級大國的巨大陰影。其次，重要的原因還在於不公正、不平等的國際關係，即大國、強國竭力追求對小國、弱國的霸權主義統治，實施國與國關係中的強權政治。這方面，美國對格瑞納達的軍事入侵、對利比亞的封鎖、恫嚇和轟炸，對尼加拉瓜內政的赤裸裸的干涉，蘇聯對阿富汗的武裝占領，都是

極爲明顯的事例。再次，還應看到，舊的、不合理的國際經濟關係和分工，工業發達國家與第三世界許多不發達國家之間鴻溝的急劇加深，也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範圍內激化了矛盾，誘發了衝突，爲干涉者提供了種種藉口；正像馬克思主義古典作家一再指出的那樣，不平等、不合理的政治關係是不平等、不合理的經濟關係的集中體現，經濟的剝削爲政治上的壓迫創造了前提。

(三)馬克思主義認爲，保衛世界和平必須同爭取社會進步聯繫在一起，反對戰爭衝突必須同改造舊的國際政治關係和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結合在一塊。

十分清楚，揭露戰爭的罪惡性質，是制止戰爭的一條重要途徑。馬克思曾經在他起草的《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中說過：「還有一個信念鼓舞著這次大會的參加者。工人階級的解放既然要求工人們兄弟般的合作，那麼當存在著那種爲追求罪惡目的而利用民族偏見並在掠奪戰爭中灑流人民鮮血和浪費人民財富的對外政策時，他們又怎麼能完成這個偉大任務呢？」<sup>⑥</sup>馬克思主義古典作家在自己的著述中把追求罪惡目的而進行的掠奪戰爭，算作「非正義的」戰爭，並予以淋漓盡致的揭露。

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獲得巨大進步的今天，全世界人民更有理由要求制止戰爭衝突的爆發，更有理由共同抵制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行徑，更有理由希望生活在一個更加寧靜、安定、更加公正、合理的環境中。它首先要求擁有最大量和最尖端毀滅性武器的兩個超級大國承擔裁減軍備、率先停止試驗、生產和部署一切類型的核武器，直到削減並銷毀核武器的主要責任，正視全人類生存、延續的權利。它也要求改善舊的國際政治、經濟關係，改造不合理、不平等的世界經濟結構和分工安排，克服國與國交往中的霸權主義，使爭取民主、平等和公正權利的要求事實上爲發達

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所共同接受。這是正義的要求，也為世界和平與穩定所需要。要實現這個要求，歸根結底，就要消滅剝削壓迫的制度，因此，保衛和平運動必須與爭取社會進步和社會主義運動聯繫在一起，社會主義就其本質來說，必然要求和平，因為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之後，消滅了剝削階級，不存在貪婪地向外掠奪的社會集團，勞動人民作為新社會主人，就要全力建設自己的新生活，必然反對戰爭，維護和平。

(四)馬克思主義認為，對於無產階級和革命者來說，武裝鬥爭、暴力革命並不是唯一的革命手段；在現代條件下，特別在發達國家中，非暴力的方式日益占有更重要的地位。

西方一些別有用心的人誣蔑說，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必然需要戰爭，彷彿非如此便達不到革命和改造的目的。這是極其荒謬的。革命者總是在反動階級首先採取武力鎮壓的情況下，才被迫拿起武器的。

事實上，即使是在革命危機時期，當反動階級逼得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不得不使用武器進行反抗和鬥爭時，馬克思主義者也清楚地意識到；暴力革命是有它的局限性的；它不是革命的唯一形式，甚至不是最好的形式，它僅僅是無產階級和革命者在特殊時期和特殊條件下可能運用的一種「革命的槓桿」（馬克思語）；如果可能的話，共產主義者也會是最不反對「用和平的辦法廢除私有制」的人（恩格斯語）。

恩格斯在他晚年所寫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中已經看到：「鬥爭的條件也已發生了本質上的變化。……一個革命者，如果自願選擇柏林北部和東部的新建工人街區來進行街壘戰，那他一定是個瘋子了。」他得出結論：「如果說在國家之間進行戰爭的條件已經起了變化，那麼階級鬥爭

的條件也同樣起了變化。實行突然襲擊的時代，由自覺的少數人帶領着不自覺的群眾實現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他在列舉了德國社會民主黨利用普選制取得的進展後指出，在變化了的條件下，「我們採用合法手段卻比採用不合法手段或採用變革辦法要獲得多得多的成就」<sup>⑦</sup>。

在現代戰爭的條件下，核武器以及其他先進的、高精度的和殺傷力極大的武器的使用，使戰爭的後果發生了質的改變。世界大戰的後果將導致世界的毀滅。在這種情況下，已不能完全像克勞塞維茨的「戰爭是政治的延伸和繼續」的名言那樣來理解戰爭了。寇茲 (Ken Coates) 說：「這種政治的繼續現在已經是種族滅絕。因此戰爭已經脫離了政治行爲的領域而成爲犯罪行爲了」<sup>⑧</sup>。在今天，如果有哪個革命者試圖利用新的世界大戰推動社會主義革命，並且建立更多的社會主義國家，有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產生蘇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產生了更多的社會主義國家那樣，那麼這不僅是幻想，簡直是荒誕。新的世界戰爭的真正後果——不論是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國家向社會主義國家首先開戰，還是相反的情形——將可能出現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曾經講過的那樣，即「鬥爭的結局」是「鬥爭的各階級同歸於盡」<sup>⑨</sup>。毋庸置疑，在今天，非暴力的鬥爭方式更適應於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新的革命要求。

(五)馬克思主義認爲，革命不能「輸出」，改造社會的變革不能靠外部力量「推動」；一個國家的革命，只能是那個國家大多數群眾自願選擇的結果，是主客觀條件成熟的反映。

恩格斯早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以前就已經指出：共產主義者十分清楚，「革命不能預先隨心所欲地製造，革命在任何地方都是完全不以個別政黨和整個階級的意志和領導爲轉移的各種情況的必然結果」。<sup>⑩</sup>

列寧也堅決地否定了從蘇維埃國家「輸出革命」的論調，尖銳批評了企圖從外部「推動」革命的人。一九一八年六月，他在莫斯科工會和工廠委員會第四次代表會議上說道：「有人以為，革命可以在別的國家裏按照定單和協議來進行。這些人不是瘋子就是挑撥者。」<sup>①</sup>他一貫認為，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爆發和實現，是這個國家內部主客觀革命形勢成熟的產物，即統治和壓迫階級不可能照原樣繼續統治下去，受壓迫階級無法在桎梏下繼續生存下去。當主客觀條件尚不成熟之際，從外部「輸入」或「推動」革命或鬥爭的努力，只能起到相反的效果。與此同時，列寧也明確提出：共產黨人和革命者並不是應當放棄對仍在受資本壓迫和剝削的人民的責任，但是，「我們主要是用我們的經濟政策去影響國際革命」。<sup>②</sup>

在今天的世界上，仍有少數國家在「援助世界革命」、「支持別國反帝鬥爭」或「改造社會的變革」的種種藉口下，或者干涉別國內政，或者直接出兵入侵其他主權國家。不論其真實動機如何，當「受援國」本身不具備真正的革命條件、人民群眾的大多數不情願甚至反對這種外來的「援助」時，「輸出革命」是對世界和地區穩定局勢的破壞，是對國際和平關係的威脅，是對主權國家的侵犯和蔑視：即使在思想原則方面，這種做法也是與馬克思主義格格不入的。馬克思主義者，社會主義國家，應當抵制和反對「輸出革命」的主張和行爲。

(六)馬克思主義認為，和平共處各項原則是避免不同社會制度國家發生衝突、維護持久世界和平的重要保證。

列寧在十月革命勝利之後，多次提出了社會主義國家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的思想。他在第二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所作的關於和平的報告以及他起草的有名的《和平法令》中，把爭

取和平的方針宣布爲蘇維埃國家對外政策的總路線。蘇維埃政府建議所有第一次世界大戰交戰國立即開始就締結公開和民主的和約，即不割地、不賠款的和約進行談判，從而，正如列寧其後在《給美國工人的信》中所寫的那樣，「在全世界面前舉起了和平的旗幟和社會主義旗幟」。

他還強調：蘇維埃共和國「希望同各國人民和平共處，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來進行國內建設，使自己在蘇維埃制度基礎上把生產、運輸和社會管理工作納入軌道」；「我們將用一切力量來維護今後的和平，我們要把和平保衛住」，「我們既已從事和平建設，我們將不惜用一切力量來把它不斷地進行下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就堅定地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一九五四年毛澤東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的開幕詞中把「保衛國際和平和發展人類進步事業」作爲我們的總任務的一部分，直到一九八二年，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鄧小平把「維護世界和平」作爲我國八十年代的三大歷史任務之一。

列寧認爲，爲了反對戰爭，實現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和平共處，必須堅持一些重要的原則：

首先，應當尊重一切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他在談到同德國在拉巴洛簽訂的條約時說：「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代表團正確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務，維護了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主權的完整」。他同時要求蘇維埃政府迅速處理沙俄政府在以往遺留下來的問題，廢除與弱小的鄰國簽訂的不合理的條約，歸還占領的外國領土，撤出仍在別國的沙俄軍隊。

其次，不干涉其他民族和國家的內政，承認各國有權獨立地解決內部問題。如前所述，他否定了「輸出革命」的荒謬主張。他也駁斥了某些人攻擊蘇維埃政權具有「侵略性」的觀點，說道：「有一些蠢人在叫喊什麼赤色軍國主義；這是些政治騙子，他們裝出一副真正相信這種蠢話的樣子，從



各方面責備我們，用他們那種辯護士的本領來捏造假證據，蒙蔽群眾的眼睛」<sup>①</sup>。從而再次肯定蘇維埃國家決不會干涉他國內政。

最後，完全平等和互惠互利是有效合作的基礎，列寧說：「我們要給自己定一個規矩：如果國際資產階級不向蘇維埃俄國或同資本主義作鬥爭的其他國際無產階級隊伍作或多或少或少的等價的讓步，我們也決不向國際資產階級作任何政治讓步」<sup>②</sup>。他懂得，如果失去了平等的原則，合法與共處是不具有真正的意義的。

今天，在國際事務和交往中，中印等國倡導的彼此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已成爲基本的準則。近年來中國政府在解決香港問題時所提出的「一國兩制」的主張，也爲解決國際間一些重大的爭端提供了範例，即依靠談判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只有依據這些原則和主張，才有可能在意識形態不同和社會制度不同的各國各地區之間避免和減少戰爭衝突，實現持久的世界和平。

(七)馬克思主義認爲，世界和平既取決於各國政府的相互信任和合作，也依賴於全世界人民，尤其是進步力量的共同努力。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列寧在答《觀察家報》和《曼徹斯特衛報》記者法爾勃曼提出的問題時說：「我們的經驗使我們堅信，只有對各個民族的利益極其關心，才能消除衝突的根源，才能消除互不信任，才能消除對某種陰謀的顧慮，才能建立語言不同的人們、特別是工人農民的互相信任；沒有這種信任，無論各族人民之間的和平關係，或者現代文明中一切珍貴事物的比較順利的發展，都是絕對不可能的」<sup>③</sup>。這種信任反映到國家關係上，就是遵守協議、履行義務。因此列寧要

求：「我們決不允許嘲弄和約，決不允許破壞我們的和平工作」<sup>20</sup>。他很清楚，在現實世界，和平共處是有客觀基礎的，即，「有一種力量勝過任何一個跟我們敵對的政府或階級的願望、意志和決心，這種力量就是迫使他們走上同我們往來的道路的全世界的共同經濟關係」<sup>21</sup>。只要各國發展和擴大經濟、技術和貿易往來，建立國家之間、地區之間正常而有效的經濟關係，加強政府間的信任和合作，消除毒化國際氣氛，加劇軍備競賽的因素，各國之間是可以避免衝突和戰爭的。

馬克思主義更強調，爭取世界和平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事業，只要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積極因素，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進步力量，反對戰爭因素（尤其是那些企圖利用戰爭來達到罪惡目的的勢力），世界總的和平態勢是完全可以保持下去的。在爭取世界和平的運動中，工人階級應當是最積極、最有力的組成部分，因為它的本性決定了它對殘殺人的戰爭的憎惡，這正像馬克思在《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關於普法戰爭的第一篇宣言》裏所闡述的那樣：「英國工人階級向法國工人和德國工人伸出友誼的手。他們深信，不管當前這場可惡的戰爭怎樣結束，全世界工人的聯合終究會根絕一切戰爭。官方的法國和官方的德國彼此進行同室操戈的鬥爭，而法國的工人和德國的工人卻互通和平與友誼的音訊。單是這一件史無前例的偉大事實，就使人們可以展望更加光明的未來。這個事實表明，同那個經濟貧困和政治昏憤的舊社會相對立，正在誕生一個新社會，而這個新社會的國際原則將是和平，因為每一個民族都將有同一個統治者——勞動！」<sup>22</sup>

(八)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的理性和人道主義信念應當而且可以制止自相殘殺的野蠻爭鬥，最終徹底根絕一切戰爭，實現崇高和美好的大同境界——共產主義。

馬克思主義古典作家的著述表明，他們既是堅定的革命鬥士，又是真正的人道主義者和偉大的

理性主義思想家。人們可以從馬克思、恩格斯關於壓迫民族（即以強力征服、欺凌和奴役其他民族的民族）本身是不會最終得到解放的著名思想中看到他們那種崇高的人道主義理想；在他們大量的有關英國對印度、對中國的關係、沙皇俄國對波蘭、對弱小斯拉夫民族的關係的文章和講演中，清晰地顯示出這一追求。在馬克思、恩格斯那裏，明顯地和一貫地體現了人類近現代社會最先進思想中有關人文主義的那些極為精闢和深入人心的世俗道德主張，他們把自己的高尚的和經過批判承繼下來的人道主義理想同對他們認為是違背了這種理想的行為（特別是資本主義中的掠奪和侵略的批判）緊密地結合起來，形成了一種深刻而先進的人道主義信念和社會主義大同思想。譬如，《共產黨宣言》中就提出了這種影響整個世界和人類命運的要求：「代替那存在著各種階級以及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一個以各個人自由發展為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的聯合體。」<sup>②</sup>正是這種信念使他們認為，剝削和壓迫終將被消滅，「那種不成其為人」的人必將消滅，人必將作為「真正的人」而生活。在名著《資本論》中，關於「兩極」的積累和分化的論述，再清楚不過地表明了馬克思對違反人性和人的尊嚴、摧殘人的生命的世界的憎恨，對人的命運的關切。然而，他們對人類的前途和命運抱有樂觀主義態度。這種樂觀主義的理由在於，作為理性主義思想家，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人類的理性力量，相信人類能夠控制自己的命運，保證社會的延續和人的生存，相信和平、平等、自由是人類理性成熟的結果；所謂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過渡的預見，正表明他們對人類可能有而且應該有的發展前景的肯定。實際上，當今天人們說他們有信心制止世界大戰的爆發、實現持久的世界和平之時，正是把這種想法植基於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揭示的信念之上的。

因此，馬克思主義所講的和平，本身具有新的政治內容。它不單純是意味著不打槍、不放炮，

終止戰爭行爲，它也包含了一個向更加美好、更加進步、更符合人的本性和尊嚴的世界轉變的環節，顯示出向人類文明的新的階段過渡的方向。這種世界和平，是符合未來世紀發展要求的和平，是具有真正永久價值的和平。這種和平，無疑將受到進步力量和地球上絕大多數居民的真誠擁護。當然，目前戰爭的危險並沒有消滅，持久和平不會自行到來。因此，有必要動員全世界人民起來反對戰爭、維護和平，制止超級大國的軍備競賽，反對干涉別國內政。可以相信，只要全世界人民進行堅持不懈的努力，就一定能夠防止世界戰爭、贏得和平。

原載《馬克思主義研究》，一九八六年四月，第三期

## 註釋

\*本文與王逸舟合作。

-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四卷，第四三九～四四〇頁。
-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一卷，第四〇一頁。
- ③ 寇茲 (Ken Coates)：《最危險的十年》，(一九八四年) 發言人出版社，第一三三～一三四頁。
- ④ 《列寧全集》，第二三卷，第二四頁。
- ⑤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九卷，第二七頁。
- ⑥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六卷，第一三頁。
- ⑦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二卷，第五九四～六一〇頁。

- ⑧ 寇茲：《最危險的十年》，第一三四頁。
- ⑨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四六六頁。
- ⑩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三六六頁。
- ⑪ 《列寧全集》，第二七卷，第四四九頁。
- ⑫ 《列寧全集》，第三二卷，第四二七頁。
- ⑬ 《列寧全集》，第二八卷，第四六頁。
- ⑭ 《列寧全集》，第三〇卷，第一六四頁。
- ⑮ 《列寧全集》，第三三卷，第一二二頁和一二四頁。
- ⑯ 《列寧全集》，第三三卷，第三一八頁。
- ⑰ 《列寧全集》，第二九卷，第四六頁。
- ⑱ 《列寧全集》，第三三卷，第二九五頁。
- ⑲ 《列寧全集》，第三三卷，第三四七頁。
- ⑳ 《列寧全集》，第三三卷，第一二二頁。
- ㉑ 《列寧全集》，第三三卷，第一二八頁。
- ㉒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七卷，第七、八頁。
- ㉓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四九一頁。



## 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的社會發展階段問題\*

從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到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到來之前，社會的發展要不要分階段？如何分階段？我國現在處在什麼階段？這是一個具有重大現實意義的理論問題。而這個問題，從六十年代以來就被弄得混淆不清，需要認真加以研究。

問題要從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和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的兩段著名的話談起。馬克思說：「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①列寧說：「從向著共產主義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非經過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不可而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②

如何正確地理解這兩句話，在我國理論研究和宣傳工作中，存在著重大的分歧。一種流行的，甚至一時成為定論的是：把馬克思、列寧在這裡所說的「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中的「共產主義社會」解釋為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因此，把「過渡時期」的界線劃到共產主義高級階段，也就是說，到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前夕，「過渡時期」才結束。與此相應，把社會主義社會看作從資本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的整個過渡時期，看作無產階級專政時期，不再劃分階段。

在這種情況下，不同意上述觀點，認為馬克思、列寧所說的「共產主義社會」指的是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社會主義社會）的觀點，就被指責為修正主義，因為這種觀點會導致在共產主義高級階段未實現前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就會消亡的結論。

究竟誰是誰非，要研究兩個問題：

一、馬克思、列寧所說的「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這裡所說的「共產主義社會」究竟是指的共產主義社會的高級階段，還是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社會主義社會）？

二、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一直到共產主義社會的高級階段，要不要劃分為若干階段？怎樣劃分？

## 一

把「過渡時期」的界線劃到共產主義社會的高級階段，還是劃到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社會主義社會）？各人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但是，如果說馬克思、列寧（前引語錄中）所說的「共產主義社會」只能理解為「共產主義社會的高級階段」，那是缺乏根據的，也是與馬克思、列寧的原意不符的。

誠然馬克思講的是「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他在《哥達綱領批判》一書中沒有用過「社會主義社會」這個範疇。列寧則不僅講過「從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也多次講過「資產階級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從資本主義過



渡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本身包括低級階段（社會主義）和高級階段，所以，「共產主義社會」可以理解為前者，也可以理解為後者。問題在於如何完整地、準確地根據馬克思和列寧的原來的意思來理解他們所說的共產主義這個範疇。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一書中，關於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社會主義社會）是這樣說的：「我們這裏所說的是這樣的共產主義社會，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礎上已經發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③。他還指出這個社會的特點，「在一個集體的、以共同佔有生產資料為基礎的社會裏，生產者並不交換自己的產品；耗費在產品生產上的勞動，在這裏也不表現為這些商品的價值，不表現為它們所具有的某種物的屬性，因為這時和資本主義社會相反，個人的勞動不再經過迂迴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為總勞動的構成部分存在著」④。又說，在這個社會裏，「每一個生產者，在作了各項扣除之後，從社會方面正好領回他所給予社會的一切。他所給予社會的，就是他個人的勞動量」⑤。這個社會「不承認任何階級差別，因為每個人都像其他人一樣只是勞動者；但是它默認不同等的個人天賦，因而也就默認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權」⑥。所以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一書中所說的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的這個共產主義，指的是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社會主義社會），而不是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

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把馬克思的意思解釋得更明確了。該書第五章第三節的標題就是「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在這一節中列寧描述了社會主義社會的一些重要特點。「生產資料已經不是個人的私有財產，它已歸整個社會所有。」「人剝削人已經不可能了，因為那時已經不能把工廠、機器、土地等生產資料攫為私有了。」「國家正在消亡，因為資本家已經沒有了，階級已經沒有

了，因而也就沒有什麼階級可以鎮壓了。但是，國家還沒有完全消亡，因為還要保衛容許事實上存在不平等的『資產階級權利』。」<sup>7</sup>

列寧還明顯地把無產階級專政看成是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時期的特殊的國家。列寧說：「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有一段很長的「陣痛」時期；暴力永遠是替舊社會接生的穩婆；同資產階級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時期相應的，是一個特殊的國家（這就是對某一階級有組織地使用暴力的特殊制度），即無產階級專政」<sup>8</sup>。又說過，「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需要經過長期的分婉痛苦，經過長期的無產階級專政」<sup>9</sup>。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也闡述了這樣的觀點：「隨著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建立，國家就會自行解體和消失」，國家消亡是一個過程，「正在消亡的國家在它消亡的一定階段，可以叫做非政治國家」。<sup>10</sup>

從以上馬克思和列寧的論述，完全有理由認為，馬克思和列寧所設想的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社會主義社會）的特點是：整個社會佔有生產資料（單一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沒有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沒有階級，國家的鎮壓職能已經消亡，但國家還沒有完全消亡，國家還有保衛按勞分配的職能，因而可以叫做非政治國家，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即不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了。有的人認為社會主義社會裏，即使國家對內沒有鎮壓的職能，但是，在國外還存在帝國主義國家的條件下，國家還有抵抗外國侵略者的職能，這也是無產階級專政的職能。把抵抗外國侵略者的職能也當作無產階級專政雖然是史達林講的，但是，嚴格地說，這並不屬於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專政，因而不屬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範疇。

馬克思和列寧所講的從資本主義社會向共產主義社會的過渡，就是指的向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

階段，即社會主義社會過渡。也就是說，當建立這樣的社會主義社會時，過渡時期便結束了。列寧說過，「那麼過渡這個詞到底是什麼意思呢？它在經濟上是不是說，在這制度內既有資本主義的也有社會主義的成份、部分和因素呢？誰都承認是這樣的」<sup>①</sup>。建立了馬克思和列寧所說的社會主義社會，已經沒有資本主義的成份、部分和因素了。建立了這樣的社會主義社會，過渡時期便已結束。

## 二

我國現在的社會主義社會和馬克思、列寧所設想的不一樣，那是因為我們現在所處的階段與之不同。

現在有一種流行的看法，就是：從資本主義社會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是一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歷史時期都叫做社會主義社會，不再劃分階段。這種看法值得研究。事物的發展總是從量變到部分的質變，然後到最後的質變，如果說最後的質變作為劃分大階段的標誌，那麼部分的質變就可以作為劃分小階段的標誌。從資本主義社會向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過渡，或者說，從無產階級專政建立以後，是要劃分為若干階段的。

共產主義社會劃分為兩個階段，馬克思早在《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已經有了這樣的思想；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原理》（一八四七年）中開始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作為兩個依次發展階段。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一八七五年）中對這兩個階段又作了經濟上的具體區別。在《哥達綱領批判》一書中，馬克思也沒想過從資本主義社會向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過渡要有個過渡

時期。但是，過渡時期怎樣理解和怎樣劃分階段，理論界還有不同的看法。

最近發現了共產主義者同盟科倫領導人之一和一八五二年著名的科倫共產黨人案件的被告之一彼得·格爾哈特·勒澤爾的供詞。這個供詞引起了研究者的廣泛興趣。勒澤爾說，馬克思在一八四九年冬到一八五〇年期間，曾多次講，共產主義在它完全建成前必須經過幾個階段：在小資產者掌權的革命以後，接著產生社會共和國；社會共產主義共和國；純粹共產主義共和國。<sup>12</sup>

勒澤爾的這個供詞不一定準確。但是如果拿來和馬克思、恩格斯在一八五〇年三月《中央委員會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書》中的不斷革命的觀點相印證、可以看出：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到來以前，是要分階段的。第一階段是民主主義共和國階段，「民主派將會取得統治，他們將不得不提出一些多少帶點社會主義性質的措施」；第二階段，社會共和國，是「帶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共和國」，即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階段；第三階段，社會共產主義共和國，是「帶有共產主義傾向的共和國」，即實現向完全共產主義過渡，相當於社會主義；第四階段，純粹共產主義共和國，相當於共產主義。

馬克思、恩格斯設想，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要經過若干階段，才能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初級階段（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的高級階段。

列寧在《馬克思主義論國家》中又明確地提出，在無產階級專政建立以後，經歷三個發展階段：I、「長久的陣痛」，即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過渡；II、「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III、「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sup>13</sup>

馬克思當時設想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將會首先在資本主義最發達國家取得勝利，因而在取得

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以後，將會經過比較短的時期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社會主義社會）。列寧在十月革命以前，闡述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的觀點時，也是這樣看法的。

在十月革命勝利以後，列寧認識到俄國這樣一個小資產階級佔優勢的國家裏，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比資本主義發達國家要困難得多。列寧說過，「在愛斯蘭這樣一個人人識字和全國都是大農業的小國家裡，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情形，和俄國這樣一個小資產階級佔優勢的國家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情形，不可能是相同的」<sup>(14)</sup>。又說，「在俄國，我們推翻資產階級以後已經是第三年了，今天還只是跨出最初的一步子，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即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在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之後，階級還仍舊存在，而且還要在各個角落存在好多年。在沒有農民（但仍然有小業主！）的英國，也許這個時期會短一些」<sup>(15)</sup>。

在我國這樣一個在解放前是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小生產佔絕對優勢，生產力發展水平、生產社會化的程度和人民的文化水準都極為低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將會更長一些。在我國，過渡時期還沒有結束，還沒有進入馬克思和列寧所設想的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社會主義社會）。因此，實踐向我們提出了在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到來之前，社會發展階段的劃分問題。

列寧會多處使用了「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這個概念<sup>(16)</sup>。毛澤東也講過，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有可能分成兩個階段：一是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這可以叫做不發達的社會主義；二是由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即由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到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後一階段可能需要比前一階段更長的時間。經過了後一階段，物質產品、精神產品都大為豐富，人的共產主義覺悟大為提高，就可以進入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的了。所以，研究社會主義劃分階段的問題可以參酌列寧和毛澤東的

設想，採用「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和「發達的社會主義」這個概念。我們認為，從資本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可以分爲這樣幾個階段：一個就是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這裡又分爲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就是從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後到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個時期的特點是還存在著多種經濟成分，相應地存在著多個階級，因而是進行激烈的、尖銳的階級鬥爭的時期。這就是過去我們所講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那個「過渡時期」。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就進入另一個時期，即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然後進入發達的社會主義；最後才進入到共產主義階段。

馬克思和列寧所講的社會主義社會就是這個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發達的社會主義的特點，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列寧在《國家與革命》裏，說的很清楚了。在這個階段，生產力有很大的發展，機械化、自動化的程度有很大的提高，物質產品大爲豐富。在思想上，共產主義覺悟大大提高，已經消除了小生產者的習慣勢力和小生產者的心理，精神產品也大爲豐富。馬克思當初設想的社會主義革命將首先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成功。在那裏，經過「陣痛」以後，就可以進入這個階段。如果美國和西歐這樣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國家取得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他們就可能經過一個較短的「陣痛」以後，不經過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直接進入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而在俄國、中國這樣小資產階級佔優勢的國家裡，即使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還要經過很長的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才能進入發達的社會主義。

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特點是存在著公有制的兩種形式，還有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資產階級作爲一個階級已經基本消滅，但是還有資本主義的殘餘和資產階級分子，甚至封建主義的殘餘，

還有相當比重的小生產者，工農之間還存在著由於生產資料的關係不同和生產力發展水平不同而存在著的階級差別，小生產者的習慣勢力和心理仍然氾濫，生產力還沒有大發展，產品也未能較大豐富。這時，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已經結束，但是還有階級鬥爭，還需要無產階級專政，因而，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還沒有結束。

那麼，我們的社會是不是社會主義社會呢？列寧曾經說過，「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這個名稱是表明蘇維埃政權有決心實現向社會主義的過渡，而決不是表明認為新的經濟制度是社會主義的」<sup>①</sup>。列寧這話是在一九一八年說的，當時蘇聯還沒有實現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還存在著五種經濟成分。蘇聯在這種情況下採用「社會主義共和國」這個名稱，列寧認為是可以的。我國現在的情況同一九一八年蘇聯的情況不同，我們已經超過了蘇聯一九一八年的階段。不僅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建立起無產階級專政，而且基本上完成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共產黨領導下的廣大群眾有決心實現向社會主義的過渡，說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是完全可以的。但是，還不能說我們已經建立了馬克思、列寧所設想的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社會主義社會）。我們還存在著資本主義、甚至封建主義的殘餘，小生產還佔相當地位，小生產者的習慣勢力和心理還氾濫著。這說明我們還處在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還處在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不能認為我們的經濟制度已經是發達的或者完全的社會主義。

### 三

把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這樣一個很長的時期看作一個整個的歷史時期，不再分階段，易於導致混淆歷史階段，使我們不能夠正確認識和把握社會主義的發展規律，以致會發生政策上的錯語，造成嚴重的後果。我國二十年來的實踐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不分階段，混淆階段，就會把某一階段存在的現象、因素，擴大成爲社會主義幾個發展階段上都有的現象或因素。例如，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的第一個時期（過渡時期）經濟上存在多種成分，相應地存在著幾個階級，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由於不分階段，把從資本主義到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從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到發達的社會主義看作同一個歷史時期，就把這個矛盾貫穿到了整個的歷史時期，在整個歷史時期都要不斷地進行階級鬥爭，就易於把階級鬥爭擴大化。這就妨礙我們按照社會主義發展的規律，在無產階級成爲統治階級，並把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奪取到自己手中之後，把全黨全國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集中主要力量發展生產力，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致使我們在從革命到建設的過程中，動動搖搖，一度偏離了社會主義建設這一工作著重點。

不區分發達的社會主義和不發達的社會主義，混淆這兩個階段，在經濟上的後果也很嚴重。如果把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才應該做的事，拿到不發達社會主義階段來做，就發生過早地消滅個體經濟，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業，想要取消按勞分配、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反對物質利益，……甚至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結果挫傷了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破壞了生產關係，也嚴重地破壞了生產力。

不分階段，混淆階段，有許多社會現象無法解釋。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如何產生的問題就是一



例。本來，我們國家只處於不發達的社會主義。資產階級作為階級已基本上消滅，但資本主義經濟殘餘還存在，資本主義的殘餘勢力還存在，小生產還佔相當優勢，這在一定的條件下，就會產生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可是，由於認為我們已是社會主義社會，資本主義已經消滅，就只能從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內部來找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產生的原因，於是，認為按勞分配、社會主義商品貨幣是產生新資產階級分子的原因，從而根本否定了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和社會主義的商品貨幣關係；邏輯地得出社會主義生產關係中必然產生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荒謬結論。

原載《經濟研究》，一九七九年三月，第五期

## 註釋

\* 本文與馮蘭瑞合作。

- ① 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二一頁。
- ② 列寧：《國家與革命》，《列寧選集》第三卷，第二四五頁。
- ③ ④ ⑤ ⑥ 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第一〇頁，第一〇一—一一頁，第一一〇—一二頁。
- ⑦ 列寧：《國家與革命》，《列寧選集》，第三卷，第二五〇、二五一、二五二頁。
- ⑧ 列寧：《被舊事物的破產嚇壞了的和為新事物而鬥爭的》，《列寧全集》，第二六卷，第三七五頁。
- ⑨ 列寧：《關於人民委員會工作的報告》，《列寧全集》，第二六卷，第四四二—四四三頁。
- ⑩ 列寧：《國家與革命》，《列寧全集》，第三卷，第二二六、二二四頁。

- ⑪ 列寧：《論「左派」幼稚性和小資產階級性》，《列寧全集》，第二七卷，第三一〇頁。
- ⑫ 參見《外國哲學資料》，第二輯，商務印書館，一九七六年版。
- ⑬ 參見列寧：《馬克思主義論國家》，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三二頁。
- ⑭ 列寧：《關於人民委員會工作的報告》，《列寧全集》，第二八卷，第四二八—四二九頁。
- ⑮ 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全集》，第三一卷，第二五頁。
- ⑯ 見：(1)《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一文的初稿，第八章，《列寧全集》，俄文第五版，第三六卷，第一三九頁，(2)《關於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的工作》，《列寧全集》，第三〇卷，第二九九頁。
- ⑰ 列寧：《論「左派」幼稚性和小資產階級性》，《列寧全集》，第二七卷，第三一〇頁。

## 各種現實社會主義體制的比較和分類

我們既然承認各個現實社會主義國家的生產方式或社會制度的本質特點是共同的，而各國的社會體制卻有所不同，那麼，比較社會主義體制學必然要回答這樣的問題：哪些因素造成各個社會主義國家在本質上的相同和在社會體制上的差別？這些因素之間有什麼關係？根據什麼原則劃分各國社會體制的類型？怎樣評價各種不同類型的社會主義體制？

### 一、影響社會主義國家社會體制的主要因素

早在十月革命後不久，列寧就提出了向社會主義過渡形式的多樣性問題，他寫道：「由於開始建立社會主義時所處的條件不同，這種過渡的具體條件和形式必然是而且應當是多種多樣的。地方差別、經濟結構的特點、生活方式、居民的覺悟程度和實現這種或那種計畫的嘗試等等，都一起會在國家勞動公社走向社會主義道路的特點中反映出來。這種多樣性愈是豐富（當然，不是標新立異），我們就能愈可靠愈迅速地達到民主集中制和實現社會主義經濟。」<sup>①</sup>這裏講的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形式，還不是社會主義體制，但同樣給我們的研究以很大啓發，這就是，要考察各個社會主義國家

在社會體制上的差別，必須進行多方面的綜合的分析，既包括歷史因素，又包括現實因素，既包括經濟因素，又包括政治、法律、文化、意識形態等等社會因素。

影響各國社會體制的主要歷史因素是：(1)長期形成的獨特經濟結構；(2)和民族特性相聯繫的生活習慣和社會關係網絡；(3)政治管理形式傳統；(4)文化觀念背景；(5)革命道路和方式。

由於各國生產條件的不同，儘管各國的經濟發展遵循著共同的歷史規律，但經濟發展的具體方式和由此形成的經濟結構卻存在著很大的差別。例如中國早在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之前就有類似於國家的組織對社會生產的參與（主要是公共水利事業和交通事業），而歐洲國家則較少有這種情況；中國封建生產方式的主要特徵是小農經濟，而歐洲封建生產方式的主要特徵則是莊園經濟；有些國家的資本主義經濟主要靠外來資本的刺激，而有些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卻完全是自身發展起來的；革命之前，有些國家的資本主義社會化生產占了主導地位，而另一些國家仍然是小生產的汪洋大海。在無產階級革命成功之後，要組織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無疑不能脫離本國的生產力水平和經濟結構的現實。由此造成各國在經濟組織形式上和管理體制上的差異。

在特殊的生產條件和生活條件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民族，自然會形成特殊的生活習慣和特殊的家庭、家族以及一般社會交往方式，儘管這些方面不是凝固不變的。隨著歷史的發展，許多傳統要改變，但是一個民族自身內部基本的組織和聯結方式是變化最緩慢的，而且即使有所改變，也常常是有保留有繼承的改變。世界上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的古老民族，特別是歐洲以外的民族，在現代社會體制中保存著長期形成的某些歷史傳統，換句話說，它們往往是把自己的民族特性和歐洲的工業文明融為一體。在原有工業基礎比較薄弱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傳統的生活方式、人際關係和交往方

式，對整個社會體制的影響程度，顯然是更大的。

革命後建立起來的政治制度無疑是對舊政治制度的根本否定。但是，在政治制度的實質發生轉變的同時，那些具體的形式卻有一些可能要保留下來。例如，東方國家傳統的集中管理辦法，雖然有其產生弊病的一面，但是也有其必然的合理的一面。應當指出的是，各國的這種歷史性傳統是不盡相同的。過去許多年裏，各個社會主義國家在理論上不僅對政治管理形式傳統的影響作用研究不夠，而且大都是一概否定這種可能性的，然而，這種影響作用卻是始終存在於現實之中的，這一點已經為無數經驗材料所証實。

與上述各方面傳統相聯繫的是文化和觀念上的傳統。這方面的影響比較起來，更為持久，更具有潛在特點。這裏需要首先指出的固然是，各國有不同的傳統道德、藝術、宗教、哲學和科學觀念，這些意識形式許多時候會以不加改變的形態存留在人們的頭腦之中，但是，另一方面更深刻的傳統卻是特殊的思維習慣和心理素質。正是這後一方面，往往使得任何外來的現代思想觀念，只有經過不同程度的變形，才能在這個國家扎下根來。這種潛移默化的影響作用，恐怕是研究一個國家社會體制的最困難之處。

實現社會主義轉變的革命，在各國採取了不同的道路和方式。一個國家的革命途徑和經驗，對於該國革命後所選擇的社會體制和政策措施的影響作用，常常是顯而易見的。例如，中國革命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採取了農村包圍城市逐步擴大革命根據地的戰略。南斯拉夫進行了獨立的民族解放運動。這些對經濟社會體制是有深遠的影響的。而其他一些東歐國家無產階級政權的建立，主要是利用了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聯紅軍進行戰略反攻時創造的特殊歷史條件，這也不能不影響到後來新

社會體制的形成。

除上述歷史因素之外，影響經濟社會體制的還有各種現實因素。這些現實因素必然受歷史因素所制約，同時也對歷史因素發生作用，而且正像各種歷史因素之間相互作用一樣，各種現實因素之間也是相互依賴相互貫通的。影響社會體制的主要現實因素是：(1)各國共產黨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理解；(2)經濟社會發展戰略；(3)政體和決策程序；(4)社會觀念和生活方式；(5)國際環境和對外政策。

社會主義社會是直接通過人們的主觀努力建立起來的。歷史上沒有一種經濟社會形態像社會主義一樣，理論發揮了如此巨大的影響作用。各國共產黨對於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理解，從一開始就存在著差異，只是由於某些原因，在五十年代初期以前，蘇聯的「正統」理論一直處於最高權威的地位。然而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後，各國黨在理論上的分歧日益明朗化了，儘管各國的發展趨勢並不是始終如一的。最重要的基本理論問題是：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公有制形式；按勞分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社會主義國家在國際鬥爭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歷史表明，採用教條主義和「左」的思想方法來解決這些問題，給各國的實踐造成了巨大的損失，甚至是巨大的災難。在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社會體制的變革中，理論的變革起了先導作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出現，使得各國共產黨之間，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對各國社會體制的形成和發展具有更為突出的、有些時候甚至是決定性的影響作用。總之，一國的外部條件和據此制定的對外政策，從多方面規定和影響著該國的社會體制。各國的社會體制在戰時和平時不同；在國際形勢緊張和國際形勢比較緩和時也不同；維持世界性的強大軍事力量和僅有一般的國防能力自然不

同；生產資源基本自給和外貿占絕大比重的國家也不同；主張不同制度國家之間和平共處和努力「輸出革命」干涉別國內政的國家不同；自身能夠獨立和對他國依賴很大的國家也不同。

以上我們列舉了影響社會主義國家社會體制的主要因素，這種敘述無疑是概括的和大大簡化了的，事實上情況要複雜得多。由於上述諸種因素及其發展變化的差別，造成了各國在不同發展階段上社會體制的差別。因此，儘管社會主義國家在本質上是相同的，但是不存在普遍適用的體制「模式」，在一個國家發展過程中，也不存在固定的模式。

## 二、各種社會主義體制的分類標準

前面敘述的影響社會主義國家社會體制的主要因素，是我們在進行比較研究時必須注意把握的。但是，直接依據這些因素來區分各種類型的社會體制則很不方便，有的過於抽象，而有的則又過於瑣細。在分析這些因素的基礎上，從各國現實體制的特徵出發，我們試圖提出一些較為直接較為明晰的分類標準。

粗略看來，應當而且可以作為分類標準的主要有這些方面：(1)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2)消費物品分配結構；(3)生產資源配置結構；(4)信息傳輸結構；(5)決策結構；(6)社會組織結構；(7)政權結構；(8)意識形態結構，等等。

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從理論上說，社會主義社會無疑是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之上。但是由於各國在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時，經濟發展水平參差不齊，生產力結構極不平衡，所有制

形式也應多樣化，否則就會妨礙社會經濟的正常發展。所有制結構上的主要差別表現在：(1)是單一的公有制；還是公有制爲主的多種所有制形式並存；(2)公有制是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還是社會所有制或者社會股份所有制，等等；(3)非公有制形式僅只是個體所有制，還是包括外資、內外合資、私人股份所有等多種形式，等等。除了這些質的方面的差別之外，比重等量上的不同也是重要的。

消費物品分配結構。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各國共同遵循的基本經濟原則。但是各國的現實分配體制卻相差甚遠。有國家統一規定工資水平的，也有國家控制工資總額的，還有企業單位根據銷售收入自行決定分配辦法的。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簡單勞動和複雜勞動，不同行業不同工種的工資結構更是差別懸殊。特別是在非公有制經濟存在的情況下，按資本分配的現象不可避免，如何確定其合理的比重等等，更是未能解決的問題。分配結構在西方學者的著述中常常與「動力結構」或「刺激結構」相提並論。紐伯格把「動力結構」分爲強迫命令、精神刺激、物資刺激、物質刺激和精神刺激相結合四種類型<sup>②</sup>。例如，南斯拉夫獨特的工人自治制度的形成，是以其不斷發展的自治理論爲基礎的。這種自治思想並不被認爲是一種創造，而是被看作爲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因而在南斯拉夫特別重視的是馬克思主義關於自由生產者聯合體的觀點、關於異化勞動的學說、關於國家消亡的理論、關於社會主義民主的理論以及關於利益多元主義的理論。

實現了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的國家大都是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首先必須集中一切力量醫治戰爭創傷，恢復國民經濟。隨之而來的是工業化過程。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這些國家不能不選擇讓農業提供大量積累，國家直接控制經濟，迅速實現外延增長的發展戰略。這種



發展戰略與高度行政集中的經濟社會體制無疑是直接相聯繫的。隨著經濟自身的發展和國際條件的改變，最初的發展戰略逐漸發生了轉變。六十年代中期，東歐國家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不同程度地重新修改了經濟社會發展戰略。我國一九八一年的五屆人大四次會議，也提出了經濟發展戰略轉變的方針，即從以速度為主要目標轉變到以滿足人民基本需要為主要目標，從重點突出的發展轉變到平衡的發展，從關閉自守轉變為對外開放，從外延為主的增長轉變為內涵為主的增長。與此同時，經濟體制和整個社會體制的改革也愈益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社會主義國家在理論上一致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無產階級專政和民主集中制。但是各國對這些原則的理解和解釋，特別是實踐，存在著相當大的差別，即使是同一國家在不同階段也有所不同。例如是一黨制，還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制；是集一切權力於黨，還是黨政分開；是高度集權，還是分權；是集體領導，還是權力集中於一人或幾人；怎樣理解社會主義民主；人民群眾如何成為國家的真正主人；是以經過科學論證的方案為基礎，還是單憑領導人的主觀偏好決策；是以相對穩定的法律為基本管理手段，還是以經常變化的行政命令為基本管理手段，如此等等。而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共同之處在於，政治體制對經濟體制、法律體制以及整個社會體制，有著極其直接的影響和決定作用。

社會主義制度確立之後，人們的社會觀念和生活方式發生了急劇的轉變。但是這種轉變逐漸平緩下來，因為僅僅靠政治的和軍事的激情並不能從根本上迅速扭轉人們的物質生活處境，而以此為基礎的社會觀念、價值標準和行為方式，不能不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而達到徹底的轉變。但是，物質文明對精神文明的決定性作用，並不否定精神文明的相對獨立性。各國共產黨在組織經濟

建設的同時，對社會文化的發展和人民群眾社會主義覺悟的提高，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可是由於過去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高度集中統一的需要，在社會觀念和生活方式方面進行的宣傳教育，往往片面強調一致性、紀律性和自我犧牲精神，不大注意鼓勵人民群眾的創造性，自由發展和主人翁精神，完全否認個人利益存在的必然性和積極意義。這種情況在各國有所不同，糾正的程度也不同。我國在黨的十二大以來，大力強調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性，鼓勵人們成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紀律的勞動者，在全社會建立新型的社會關係。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特別指出，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發展，人們的生活方式也將發生深刻的變化。這些都必然會影響到我國將來的社會體制。

現實的社會主義國家生活在一個極其複雜的國際環境之中。資本主義國家的存在，後進國家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世界大戰的威脅，等等，對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政治發展政策以及整個社會體制，是不可忽視的制約因素。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和不止在正常的條件下，前三種「刺激結構」無疑是不現實的，問題的關鍵顯然在於物資刺激和精神刺激如何相結合。此外，制約分配結構選擇的因素，還有經濟觀點和社會觀點的對立。經濟效率和社會平等常常是互相矛盾的，不論追求哪個極端都是不現實的不合理的。那麼，二者如何平衡協調，這在各國是不同的。

生產資源配置結構。社會的生產和再生產，要求不斷地把有限的生產資源採取一定的方式配置到不同的生產部門和領域。在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中，資源配置是通過中央指令性計劃實現的，一些國家改革後的經濟體制採取了中央計劃和市場機制相結合的資源配置方式，個別國家則選擇了完全由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模式。實踐表明，無論是完全由指令性計劃還是完全由市場機制配置生

產資源都是不可取的，但並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一部分由計劃一部分由市場來配置資源的板塊結構是合理的。在目前可以構想出的合理模式中，除了文化、衛生、教育、國防等社會公共事業和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應由國家財政安排之外，物質生產部門的資源配置都應當經過市場機制的的作用，計劃則應通過運用利率、貼現率、稅率等等調節器來達到宏觀總量的平衡。一些國家正在向這樣的模式過渡。

訊息傳輸結構。一切社會活動的進行，都離不開訊息。無論是國家機關還是生產企業，或者是家庭和個人，他們的一切行為決策都受輸入訊息的制約，而據此做出的行動又成爲新訊息，對自身形成反饋並傳輸給其他行爲者。訊息對決策有重大的意義，沒有充足的真實的訊息，就不能保證做出正確的及時的決策。訊息越是廣泛越是可靠，決策的失誤就越小，成功的把握就越大。訊息傳輸的範圍、速度和數量，是衡量一個國家發達程度的基本尺度之一，也是衡量一種社會體制是否合理的基本尺度之一。訊息傳輸結構通常包括收集、傳達、處理、儲存、取出和分析各種情報和知識的機制和渠道<sup>③</sup>。社會主義各國訊息結構上的差別，主要表现在：(1)是縱向傳輸爲主的直線型結構，還是橫向傳輸爲主縱橫結合的網絡式結構；(2)縱向渠道是單一的行政渠道，還是包括相互獨立的新聞、信訪、檢查、司法、立法等多條渠道；(3)縱向渠道中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渠道是否同樣順暢；(4)是按照決策機關主觀偏好收集、加工和處理訊息，還是遵循客觀全面的原則收集、加工和處理訊息，如此等等。

決策結構。決策結構顯然指的是，誰來決策和怎樣決策。在資本主義社會，工人階級，不但被剝奪了生產資料所有權，而且也被剝奪了決策權。從理論上說，社會主義事業是人民群眾自己的事

業，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切決策權力屬於人民，人民群眾或者直接決策，或者選派出代表決策。但是由於歷史的原因，社會主義國家中並非所有的決策能都符合人民的利益。在現實的條件下，過分集中的決策結構容易產生官僚主義，從而違背人民群眾的利益和願望；而過分分散的決策結構也容易導致無政府主義，從而損害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問題的關鍵顯然在於，什麼樣的決策應當分散，什麼樣的決策應當集中；在什麼樣的情況下，人民群眾應當直接決策，在什麼樣的情況下，人民群眾應當間接決策。社會生活中的決策，大體有這樣四個層次：(1)關係國家社會全局的宏觀決策；(2)地方發展方面的中觀決策；(3)生產企業和經營單位的微觀決策；(4)家庭和個人生活決策。這四種決策完全集中做出，顯然是一種極端的情況，只有軍事共產主義時期接近這種結構。第二種結構是中央做出前三個層次的決策，第四個層次的決策由家庭和個人在中央控制的範圍內有所選擇。第三種結構是中央集中做出第一第二兩個層次的決策，後兩個層次則由執行決策者自己做出。第四種結構是中央、地方、企業單位和家庭個人分別決策。

社會組織結構。這裏的社會組織，首先是指家庭、家族、民族等社會結構性團體，也包括各種區域性組織、行業組織、居民團體，以及教會、工會、社團、黨派等等。良好的社會組織結構儘管形式可能不同，但無不是以最有效地促進個人的全面發展和形成積極的整體性效應為特徵的。因此，全國在社會組織結構上的差異表現在：(1)社會組織是多樣化的還是較為單一的；(2)社會組織中是以傳統類型為主的，還是以適應工業化發展需要的現代類型為主的；(3)社會組織是促進個人全面自由發展的，還是束縛個人全面自由發展的；(4)社會組織是推動社會進步的還是妨礙社會進步的，等等。

政權結構。特定的歷史條件造成了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結構最初必然是高度集中的單一結構。這

種結構對於在落後國家中實現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是積極的，甚至是最合理的。但是隨著非常時期的結束，這種結構產生出愈來愈多弊病。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在於能夠創造比資本主義更高程度的民主。日本的高橋勇治認為，問題的焦點在於官僚主義，官僚主義如果蔓延出來，黨和國家機器就會脫離人民群眾，社會主義建設必然遭受挫折<sup>④</sup>。波蘭著名經濟學家布魯斯在分析東歐的實踐時指出，在東歐國家中，經濟發展的古典障礙似乎已經消除，政治因素卻可能成爲某一階段妨礙經濟發展的唯一因素<sup>⑤</sup>。東歐在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事實上也不同程度地進行了政治體制的改革。把社會主義國家不同政權結構區分開來的特徵是：(1)各種政權機構以什麼樣的形式代表人民的利益；(2)政權結構反映人民群眾要求的程度如何；(3)政權機構內部有沒有制衡機制；(4)黨和政府的關係如何，等等。

意識形態結構。從研究社會體制角度考察的意識形態結構，並不是指各國意識形態中有哪些觀點、思想和流派等等，而是指各國意識形態發展中所遵循的不同規則和受到制約的不同條件，各國對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科學和文藝創作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獲取知識和傳播知識自由等等的認識和實踐。這些自由是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科學文化，維護社會安定，促進經濟政治健康發展的有力武器。但是往往自由都不可能是絕對的。這些自由必須是有一定限制的自由，例如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人道主義的、誹謗誹盜的，宣揚戰爭和種族主義的意識形態，是絕對不容許傳播的，是與社會主義自由不相容的，但是，社會主義各國的實踐表明，容易走向極端的往往是把合理的限制過分擴大，從而導致在意識形態領域用行政命令和長官意志解決問題的惡劣做法，嚴重破壞了社會主義科學文化事業的發展。例如，在蘇聯的肅反擴大化時期和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時期，這種傾向發

展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這兩種極端對於絕大多數國家來說，目前都是竭力要避免的。但是，在如何保障正常的自由和限制危害社會的自由的問題上，各國的做法是不同的。例如，是通過制度和法律解決問題，還是靠行政機構發布命令解決問題？是靠充分發揚社會主義民主靠人民群眾自覺監督，還是靠專門的行政機關和幾個領導人審查批准？等等。而這些差別，事實上又關係到是否真正有效地達到目的。我國提出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實行雙百方針，充分發揮社會主義民主和自由，是其中的一個類型。

除上述標準之外，爲了更好地了解 and 把握各國的社會體制，我們還需要比較在類似或不同條件下進行的各種體制的成就。哪些範疇最能顯示體制的成就，各國學者有不同看法。我們認爲以下範疇是重要的：

1. 生產水平
2. 生產增長率
3. 產業構成
4. 效益和勞動生產率
5. 經濟穩定和社會安全狀況
6. 居民消費水平
7. 文化教育衛生水平
8. 社會平等程度
9. 民主化程度
10. 政治穩定程度

上述範疇均可以通過一系列指標顯示出來。

### 三、社會主義體制的的基本類型

我們以爲任何一種抓住某一個方面的特徵進行分類的辦法，都帶有片面性。應當把各國的社會體制當作有機的整體來對待。

根據前面敘述的原則和方法，我們把社會主義體制劃分爲四種基本類型。

第一種類型，是軍事共產主義社會體制。這種軍事體制與蘇聯內戰時期的軍事共產主義體制雖有相近之處，但也有許多不同特點。軍事共產主義社會體制，是一種社會生活高度集中統一，各方面控制極其嚴格的社會體制。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的特點是，國家所有制爲主，集體所有制爲輔，沒有其他所有制形式。消費品分配結構的特點是，平均主義傾向突出，中央有關行政機關直接決定社會成員的收入水平，配給方式普遍。生產資源配給結構的特點是，中央計劃部門根據國家的政治軍事目的，有權無償調遣全國一切生產資源，任何從事生產和非生產活動的單位必須無條件服從計畫命令。訊息傳輸結構的特點是，縱向渠道占絕對主導地位，橫向渠道很少，訊息量不充分，失真情況嚴重。決策結構的特點是，中央機關做出宏觀、中觀、微觀，以及一部分家庭和個人決策，決策權高度集中統一。社會組織結構的特點是，形式單調，傳統色彩濃厚，對個人束縛嚴重，除執政黨以外的社團沒有獨立意義。政權結構的特點是，一切社會權力集中於黨的領導機構，黨的權力集中於最高領導人。意識形態結構的特點是，嚴格控制言論出版活動，科學文化教育受行政命令支配。這種社會體制，在許多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過程中時間長短不同，都曾實行過。

第二種類型是，中央集權體制。這種社會體制與第一種類型有許多近似之處。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方面，除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之外，還有微量的個體所有制。在消費物品分配結構方面，中央機關決定工資水平，平均主義傾向仍然是嚴重的，但比較注意考慮行業、地區和工作性質的差別，緊缺物品仍然採取配給方式分配。在生產資源配置結構方面，中央計畫通常直接安排國營部門的生產資源，勞動力不採取硬性分配辦法，而是靠國家規定的差別工資率調節流向。在訊息傳輸結構方面，縱向渠道為主，橫向渠道為輔，決策需要的訊息量經常不足，而且失真程度也較高。在決策結構方面，中央行政機關做出宏觀決策，同時也做出中觀和微觀活動的各種主要決策，家庭和個人做出自己的生活決策。在社會組織結構方面，家庭等基本結構組織變化較快，社團活動仍受較大限制，在社會組織中，個人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仍受到較大程度的束縛。在政權結構方面，黨政在形式上是分開的，政府的立法、行政和司法在十分有限的範圍是各自獨立的，但是重大權力事實上集中於黨的領導機構，集中於黨的最高領導集團。在意識形態結構方面，對政治經濟和法律思想以及與之較為接近的社會意識形式控制嚴格，對自然科學、文學、藝術和宗教等社會意識形式，允許較為自由的發展，行政干涉較少。

第三種類型是，民主集中體制。這種體制是從中央集中體制演變過來的，有許多新特點。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是公有制為主的多種經濟形式並存結構。其中公有制中的國家所有制已經發生較大變化，國營企業已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獲得了自身所有的性質。消費物品分配結構較好地體現了按勞分配原則，個人收入的多少，一方面取決於自己勞動貢獻的大小，另一方面取決於企業的經營效果，原則上廢除了配給辦法。生產資源配置結構表現為計畫和市場的有機結合，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具



有基礎性意義，中央計畫利用各種宏觀調節器，對市場加以引導。訊息傳輸結構是縱橫交織更注重發展橫向渠道，訊息量較為充足，失真程度較低。決策結構是分層決策，宏觀、中觀、微觀、家庭和個人活動基本上是由活動的承擔者決策，分散程度較高，但宏觀方面仍保持高度集中決策。社會組織較為多樣化、現代化，各種社團有較大獨立性，但政黨活動受限制，政權結構表現為政府有較大獨立性，內部有一定制衡機制，領導層人員流動較快，基礎發展方向和重大國內國際問題仍由黨的最高領導層決定。意識形態結構是堅持政治的統一性，其他方面，例如經濟、法律、文藝、科學、宗教等等實行自由發展民主監督的原則。

第四種類型是，工人自治體制。這種體制中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是以公有制為主並包括個體、內外合資、外資等等多種形式的結構，其特殊之處在於公有制不是蘇聯式的國有制或集體所有制，而是稱之為社會所有制，由工人自治管理的經濟形式。消費物品的分配結構較為複雜，在社會所有制勞動組織中，工人的收入取決於自己工作的性質和勞動的數量和質量，同時也取決於勞動組織的經營狀況和外部收入狀況；而在非社會所有制單位裏，個人收入既有取決於勞動的因素，也有取決於資本因素。行政配給形式已被完全取消。資源配置結構是一種完全靠市場機制調節的結構，這個市場不僅限於國內市場，還包括一定範圍的國際市場，社會計畫處於一種從屬於市場的地位。訊息結構以橫向渠道發達為特徵，縱向渠道的作用大大削弱，訊息來源廣泛，但仍然有一定程度的失真情況。決策結構是高度分散化的結構，不僅中觀、微觀和家庭個人決策分散開來，而且許多宏觀問題事實上也被取消了集中決策的可能，例如全國各地區協調發展問題，外貿外匯的全國統一控制問題等等。社會組織結構複雜，現代化特徵突出，組織形式豐富多樣，活動較為自由，對促進個

人多方面發展的作用較為顯著。政權結構中有較為嚴格的制約關係，按職業、居住地區等等多種關係分別結合形成的自治共同體選派代表團，參與政治活動，黨政有較明確的分工，領導層人員流轉極快，權力分散程度和民主化程度較高。意識形態結構的特點是高度的自由化，除公開詆毀黨和宣揚顛覆國家的言論受到一定法律限制外，其他方面的思想和言論，包括政治經濟等所有意識形式，允許自由發表，自由爭論。

上述四種基本類型，是根據一般的特徵確定的。事實上各國都有自己的特殊性，這裏的劃分自然不能概括無遺。即使僅就這四種基本類型而言，也不能得出哪一種類型最好、哪一種類型最壞的結論。我們必須承認，各種類型都有其優點和缺陷，特別重要的是，對於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發展階段來說，形成某種社會體制模式，主要的並不是取決於人們的願望，就是說具有相當程度的客觀必然性。

原載《社會經濟體制比較》，一九八五年一月，第四期

## 註釋

- ① 《列寧全集》，第二七卷，第一九一頁。
- ② 莫里斯·伯斯坦主編《比較經濟制度，模式和案例》，一九七九年（美）歐文出版公司，第二三、二四頁。
- ③ 參見埃岡·紐伯格、威廉·達菲等著《比較經濟體制》，一九八四年商務印書館版，第五一頁。
- ④ 高橋勇治《社會主義與官僚主義》：〔日〕《中國研究》雜誌，一九八三年，第四期。
- ⑤ 弗·布魯斯《政治制度和經濟效率：東歐的實踐》，〔美〕《比較經濟學雜誌》，一九八〇年，第四期。

## 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自治制度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關係\*

西方一些學者多年來一直在宣揚這樣一種觀點：南斯拉夫自治制度是由於南共被開除出共產黨情報局，外部壓力巨大，國內經濟危機的情況下，採取的一種把困難交給群眾以尋求解脫的冒險嘗試。

但是南斯拉夫理論界卻並不這樣認為。南共最著名的理論家愛德華·卡德爾說：「自治不是我們的某種特殊的思想上或理論上的創造。它一向是社會主義這個概念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它存在於巴黎公社，存在於列寧的蘇維埃，存在於像我國革命這樣的群眾性的一切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之中，而它的某些形式和因素也存在於整個世界社會主義實踐之中。」<sup>①</sup>卡德爾的話反映了共盟和理論界的兩個基本看法：第一，自治制度在理論上是以科學社會主義為基礎的；第二，自治制度在實踐上是有其世界範圍內社會主義革命的經驗根據的。本文討論的就是前一個方面，即自治制度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關係。

當然，所謂自治制度具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是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在他們的著述中確立了自治思想的基本原則，並不能簡單理解為他們已經完整地制定了一套社會主義自治制度的理論。

按照南共盟和理論界的看法，和自治制度關係最直接最切近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 一、工人階級的解放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

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自己解放自己的思想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德意志意識形態》等早期著作中就已有所表達。南斯拉夫理論家尼科里奇認為工人階級的這項事業不是任何國家、政黨、社團，更不是政界和知識界的精英所能夠代替和包辦的②。卡德爾說：「任何國家、制度或政黨都不能把幸福恩賜給人們。人們必須自己——不是個人單獨地，而是在平等基礎上聯合起來——去創造幸福。他們必須在各種適當的、有組織的民主形式中，充分掌握好自己個人的和全社會的關係，充分利用國家、制度和政黨這些工具來實行自治。」③

由於把自治理論奠定在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自己解放自己的思想之上，所以南斯拉夫歷來主張，所謂工人自治的本質，首先是作為革命的歷史主體的工人階級的行動和實踐，只有經過這樣的行動和實踐，工人階級才能解放全社會也解放自己。根據馬克思主義的這一觀點，可以引出這樣的結論：如果工人階級自己解放自己是使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目標得以實現的基本前提，那麼，沒有這樣或那樣形式的自治，就不能達到這個目標。

### 二、社會主義作為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特殊歷史階段的必然性

南斯拉夫認為，社會主義社會，誠如馬克思和列寧所論述的那樣，是必不可免的一個歷史階段。

但是，社會主義並不是一個與通常所說的社會歷史形態並列的具有自己獨立規定性的社會，而是一個「不是基於自己基礎，而是產生於資產階級制度，不僅有資本主義社會各特徵而且有政治社會許多特徵的社會」<sup>④</sup>。可是同時「社會主義的實質不能是這些歷史階級特徵的加強，不能是國家、政治領域、代議制民主的加強，不能是政治領域和勞動領域的分離，而是這些東西的消亡」<sup>⑤</sup>。因此社會主義階段為歷史發展所規定，一方面它是以往社會管理的政治等形式逐漸消失的過程，另一方面它還沒有達到共產主義那樣的全社會的自由聯合體。民主、自由等範疇不僅存在而且也只能是通過最徹底地發展民主和自由才能實現共產主義。而一當實現共產主義以後，達到所謂「全民民主」、「全民自由」，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所謂民主和自由也就失去了它們原來的意義。因此這個時期的根本特徵，在南斯拉夫看來只能是工人和勞動者的自治。卡德爾早在一九四九年就有了這樣的認識：「社會主義發展不能有任何其他道路。而只能是不斷加深社會主義民主的道路，即愈來愈擴大人民群眾自治，愈來愈廣泛地吸引他們參加國家機關——從下級機關到最高機關——的工作，愈來愈廣泛地參加每個企業、機關的直接管理。」<sup>⑥</sup>

關於社會主義和自治發展的前景，南斯拉夫前哲學協會主席普勒德拉格·弗蘭尼茨基曾這樣寫道：「社會主義任何時候也不會被徹底建成，因為它尚在不斷地建設和改造中，即改造那些社會主義從舊的社會政治形態繼承下來的舊關係和舊結構，建設已成爲未來共產主義關係萌芽的新的社會關係。……新的社會經濟關係一旦在自治基礎上完全建立，這些關係一旦在歷史上徹底獲勝，那我們就不會再有社會主義，而是新的共產主義社會。」<sup>⑦</sup>

### 三、消滅異化勞動和勞動的解放

異化勞動學說是馬克思早期思想成就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南共盟和理論界認為，社會主義的目的是逐漸地擺脫勞動者與他們的成果的異化。社會主義如果不能把勞動從異化狀態中解放出來，工人階級和整個社會就永遠不能得到解放。因此，社會主義社會必須建立在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工作條件以及勞動成果的緊密結合之上，即建立在勞動者真正掌握自己的活動，支配自己的活動及成果之上。這就是實現工人在經濟政治等社會生活中的自治。

米那洛·馬科維奇寫道，社會主義自治是以馬克思的異化理論為其哲學背景的。而馬克思及其追隨者所創立和發展的這些基本的哲學觀點是：「(1)人在本質上是一種自由的創造性活動的存在物，實踐的存在物；(2)在階級社會的條件下，人們的潛力被浪費了，人被異化了；(3)被國家所控制和統治的商品生產和政治生活，是異化的兩種基本形式（異化勞動和異化政治）；(4)統治階級在保護異化方面有一種既得利益，因此人的解放和人的潛力的完全發揮只能通過整個經濟政治結構的革命改造和自治的引入。」<sup>⑧</sup>

### 四、建立社會所有制與生產者自由聯合體

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或社會所有制，是馬克思主義所確定的共產主義社會的一個基本特徵。我國學術界過去有人以為南斯拉夫的社會所有制是他們自己創造的概念，這是誤解。事實上我們中文中的「公有制」在許多種外國文字中就是「社會所有制」。不僅塞爾維亞文是如此，甚至俄文也是如

此，只是過去在中文譯文中大都譯成了「公有制」。

社會所有制的建立是一個歷史過程。《共產黨宣言》指出，奪取了政權的無產階級，首先是「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裏」<sup>⑨</sup>。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都經過了這樣的階段。但是，南斯拉夫認爲生產資料的國家所有制只是間接的社會所有制，還必須向直接的社會所有制過渡。

社會所有制並不是一個抽象的法律範疇，它表現著現實的社會經濟關係，特別是生產過程的關係。如果人們的生產活動方式，勞動的組織形式不發生相應的改變，社會所有制只能是一句空話，反過來說，社會所有制的確立也必然導致生產活動方式和勞動組織的更新。馬克思說：「生產資料的全國性的集中將成爲自由平等的生產者的聯合勞動體所構成的社會的全國性基礎，這些生產者將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計劃自覺地從事社會勞動<sup>⑩</sup>。在這個自由聯合體中，「他們用公共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並且自覺地把他們許多個人勞動力當作一個社會勞動力來使用」<sup>⑪</sup>。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勞動者全體和社會才實現了對生產資料和生產成果的占有。

從馬克思的上述思想可以看到，社會所有制的建立和生產者自由聯合體的形成是同一個過程。正如卡德爾在《社會所有制在當代社會主義實踐中的矛盾》<sup>⑫</sup>一書中分析的那樣，社會所有制，按照馬克思的觀點歸根結底是聯合勞動者的社會職能，而不是某個表面上「代表」直接生產者行使職能，它實際上是不受直接生產者影響的所有者的「職務行使者」的社會職能。而自治制度的實施是把國家所有改變爲聯合勞動者所有，從而實現完全的社會所有。因此巴卡里奇說：「聯合勞動這一述語表明自治的實質並標誌著我國社會組織在什麼樣的基礎上。」<sup>⑬</sup>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南斯拉夫已

經實現了生產者自由聯合體和社會所有制，相反，他們認為，自治是，「從資本主義過渡到自由聯合體」，而且「整個社會主義時期是向著這個方向過渡的」。<sup>14</sup>

爲現有的歷史條件所決定，這個過渡必然是充滿矛盾和困難的過程。在南斯拉夫，這一點始終是公開承認的。由於存在著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許多關係和因素（例如商品、分工、國家、政治等等）的條件下，聯合勞動的範圍和內容必然存在許多客觀限制，勞動者的個人利益、集體利益、社會利益之間還有差別，有時甚至是衝突，因此社會所有必然是不完全的。然而，這些矛盾的存在並不能否定自治制度的存在，因爲自治制度正是解決這些矛盾的手段。

##### 五、國家開始消亡與人民群眾管理社會

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是社會階級對立的產物，是階級壓迫的工具。階級消滅以後，國家必然就不再存在。但是，國家的消亡是一個歷史過程，它不以資產階級國家的破壞而告完成，而是由此開始。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無產階級還需要某種國家，不過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而是「組織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即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國家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

但是，南斯拉夫理論界認爲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在後來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受到了某些人歪曲和篡改。正如某些南斯拉夫學者所說的那樣，無產階級專政，在馬克思的理論中本來是指一個國家消亡和民主增長的過渡時期，而現在卻被與一個強大的、集中的、獨裁主義的國家聯繫在一起



南斯拉夫認為，推翻資產階級政權之後，客觀上需要經過一個權力高度集中的時期，即所謂「行政社會主義」時期。在這個時期中，新秩序的主要支持者是新生成的國家，國家代表全體工人階級並通過他們代表全社會，確定社會發展目標，分配社會發展基金，對全社會各個部分下達指令性任務，並運用其權威監督這些任務的執行。由於當時面臨著內部和外部的種種威脅，面臨著戰爭破壞和經濟不發達狀態，國家作為社會經濟生活的組織者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這個時期應是短暫的。如果這種局面拖延太久，國家就容易從一個工人階級的工具變成工人階級的主人。這必然會破壞社會所有制的建立和發展，阻滯勞動的解放。正確的做法應當是及時地，「從國家所有制轉變為直接生產者管理下的全民所有制」<sup>16</sup>，讓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直接參與經濟、政治及一般社會的管理，盡可能地擴大社會主義民主，縮小國家機構的集中權力。這在南斯拉夫就稱為工人自治。

值得注意的是，南斯拉夫認為國家的消亡首先是從經濟職能開始的。鐵托說：「國家的這一消亡首先是由『其經濟職能』、由生產者管理生產、由經濟職能逐漸從國家轉到工人集體開始的，不過這種變化不是跳躍的、突然的，而是逐漸的，以避免無政府狀態」<sup>17</sup>。南斯拉夫理論界認為，這種觀點是列寧最先提出來的。列寧在批評布哈林關於國家消亡的見解時指出，首先消亡的可能是強迫性勞動（即國家的經濟職能），然後是懲罰鎮壓系統，最後是軍隊<sup>18</sup>。工人階級管理社會事務最主要的是對經濟活動的管理。如果生產資料、生產活動都集中在國家手中，勞動者便事實上沒有掌握權力，而且這種勞動，如卡德爾所說，仍然帶有僱傭勞動的特徵。因此自治必須首先是經濟領域的自治。

但是，國家消亡首先從經濟職能開始，並不意味著國家的這種職能完全消失。鐵托說：「國家

在管理經濟方面的各項職能，並沒有完全消失，不過，這種職能不是排他的因素。它們變得越來越弱，因為勞動人民被吸收參加管理。「列寧引證馬克思的話時說，不應當忘記，『無產階級所需要的，只是逐漸消亡的國家』。」<sup>19</sup>

## 六、直接民主制與代表（或官員）的撤換

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初期階段，南斯拉夫很大程度上是由南共聯盟代表無產階級掌握政權。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有組織的自治共同體及其代表團已遍及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從聯合勞動到公眾需要），可以說代表制已包括了人與人之間的一切關係，而且已成為一個完整的制度和整個社會和政治制度的工具。沒有必要，也絕少可能在代表制以外，再形成什麼經濟和政治權力」<sup>20</sup>。

南斯拉夫的代表制並不是簡單的逐級選舉制。「代表制是組織工人階級和全體人民及公民來行使權力並根據自治的原則管理公眾事物的一種手段。自治社會的全體成員和他們的利益——個人及其利益和個人的利益共同體，以及社會和整個社會的利益——都參與代表制，並通過代表制來表達自己的意志。因此代表制是作為社會按照自治原則實行民主一體化的一種形式而出現的。」<sup>21</sup>南斯拉夫的代表議會制度中，不再有作為某一特定政黨的代表的舊式議員，而是有自治利益共同體的集體代表團。但是這種代表制並不排除南共及其領導下的「社會主義主導力量」的作用，只有當這些主導力量「成為社會的一個有機部分而對社會意識發揮重大影響的時候，代表制才能夠履行其社會職能」<sup>22</sup>。在民主的自治共同體中，「代表團必須經常與自己的選民和自治共同體保持聯繫，並定期報告自己活動的情況和自己參加其工作和決策的那個代表議會的活動和問題，它還必須接受選民關

於它的工作和方針的指示。代表團必須在工作中對自己的選民和自治共同體負責。代表團可以隨時撤換」<sup>(23)</sup>。

與代表制相聯繫的輪換制的實行，目的在於反對國家領導機關和社會自治機關幹部更新過於緩慢的條件下可能產生的各種消極後果和現象，例如因循守舊、疲沓自滿、官僚主義、獨斷專行等等。輪換制也有助於社會主義直接民主的進一步深入。限制連任的原則大大地「擴大了將要參加重要的社會機關工作的公民的範圍」。「這種輪換幹部和實踐中審查幹部的的方法，使公民有可能更正確地評價各個部門的工作，更現實和更高質量地履行自己的選舉權」<sup>(24)</sup>。實行幹部輪換制和可更換性，使幹部在任年期滿之後回到其原來所在單位，從而可以「縮小職業性的政治幹部再增加的領域」。隨著上述兩個領域的不斷「擴大」和「縮小」，社會主義民主和自治必將不斷深入。

## 七、社會主義時期社會成員物質利益的差別與利益多元主義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預見到共產主義初級階段還不可能實現「按需分配」，只能是「按勞分配」。按勞分配就是根據勞動者提供的勞動的質和量而分配給他相應數量的消費品。這裏通行的原則是商品等價交換的同一原則，即等量勞動和等量勞動相交換。勞動者的體力腦力是不同的，家庭負擔是不同的，但從社會領取消費品的原則則是相同的，這樣就必然存在事實上的不平等。勞動仍帶有被迫的性質。因此，按照勞動分配這種平等權利，「按照原則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法權」。「但是這些弊病，在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在它經過長久的陣痛剛剛從社會裏產生出來的形態中，是不可避免的。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文化發展」。<sup>(25)</sup>

南斯拉夫從自己建設社會主義的實際出發，提出了一種稱爲「利益多元主義」的理論主張。卡德爾的《民主與社會主義》一書最詳盡地闡述了這種思想<sup>26</sup>。他分析道，首先，工人階級也是分爲階層的，其利益也就不能歸結爲一個單一的政治公式。工人階級共同的長遠利益在於由勞動者來管理社會，而不是由私人或國家所有制的勢力來管理社會。然而按勞動分配收入也會在工人階級內部引起利益衝突。這類衝突將在長期的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獲得解決，但不是按工人階級的這個或那個階層的意志來加以解決。此外，工人階級以外的各部分勞動人民，例如農民、手工業者等，也有着與工人階級的階級利益並不對立的利益，但他們的利益也並不只是和工人階級的階級利益一致的。同樣，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對當前政策的制定也存在着意見的分歧與衝突。在整個社會思想體系中，也就是在思想、政治、科學、文化等方面，人們的觀念也會有很大的差別。

如何使這些利益充分表現出來和得到考慮以及協調起來呢？讓不同的政黨來代表不同的利益並使各種利益政治化是不行的，因爲那樣不僅不能使這些利益差異在社會的管理中得到真正表現，而且會使社會政治多元化，破壞社會主義的穩定和統一發展。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這些問題應當而且也可能通過民主的協商的辦法來解決。南斯拉夫自治制度的多種領域和多種形式，就是這些利益問題的解決途徑和手段。卡德爾認爲大體上有以下六個領域：(1)聯合勞動和一切與農民、手工業者、自由職業者等各種形式的個體勞動有聯繫的部門。這些部門的勞動者對勞動和創造的條件、手段和成果的地位而形成的利益，以聯合勞動一切領域的工人自治的形式得到民主的表現。(2)公民和勞動人民在公共服務部門的利益，諸如衛生保健、社會福利，教育、科學、文化等方面。這些利益以自治共同體的形式按照民主原則加以組織。(3)與公民居住地點的生活條件有關的利益，由地方和區

的自治共同體照管。(4)各民族的特殊利益，由各共和國和自治省通過實行自治並在聯邦制度內建立自治民主關係加以保證。(5)社會主義力量在一般的思想政治領域中的創造性活動。這種活動以自治多元主義即自治民主制度中的社會政治組織和其他社會組織的特殊作用爲出發點。(6)廣泛範圍內共同的公衆利益，由代表制的民主機構，也就是政府和社會自治機構，在社會政治共同體議會和向它們負責的機構裏決定。

卡德爾接著寫道：「很自然，上述自治利益的每一個領域自身也就是一個複雜的民主制度。每一個領域原則上都是以基層自治組織和共同體的自主權爲基礎的，而不是以勞動或業務技術組織的等級制度爲基礎的。這種情況使自治者可以借助於自己行使表決權或對他們負責的代表團直接施加影響，在決定各種公共事務方面享有直接的發言權」<sup>27</sup>。

#### 八、計畫與勞動者直接管理的一致性

計畫是共產主義社會的基本特徵。

對於馬克思恩格斯所論述的計畫概念，南斯拉夫有自己的理解。他們認爲，所謂社會計畫並不是國家計畫，國家計畫只是一種間接的社會計畫。固然不能否認國家計畫的作用和意義。國家計畫在目前南斯拉夫還頗爲重要。但是國家的作用是有限的，它只涉及那些最必要的社會共同利益的領域和問題，在這方面國家的強制或仲裁還是不可缺少的，還不能用聯合勞動的組織之間通過自由和自願的協商達到協議的制度來代替。而在其他更廣泛的領域，國家計劃則是而且應當被取代的。國家計畫總的發展趨勢應當是向聯合勞動者的直接計畫過渡。自治計畫制度就是這樣的途徑。

但是，南斯拉夫所說的自治計畫，並不是由基層生產組織自行其事的那種計畫，它所強調的只是計畫與生產者的直接銜接，只是計畫必須增強其「社會」性，向名副其實的社會計畫發展。

自治計畫的一般途徑和方法是由各種聯合勞動組織之間通過協商相互達成協議和契約。自治計畫是工人對生產資料、收入和整個社會再生產制度的監督的表現。如果沒有聯合勞動者的積極活動，沒有他們對生產活動的自覺管理，這種計畫就不會產生和實施。因此，南斯拉夫認為，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社會計畫與聯合起來的生產者自覺活動的一致性就體現在這裏。

計畫總是帶有一定的強制性。計畫如果不包含某種義務，就不會對物質和整個社會發展有任何影響，就不能對付自發勢力，而計畫工作的意義就在於對付自發勢力。另一方面，從一個或若干個中心唯意志論地和主觀主義地硬性規定義務，則反映了對社會資金的壟斷，即意味著取消工人自治和社會自治<sup>28</sup>。進一步發展自治要求使生產者向自由生產者聯合體方向發展，這就是說，通過他們的聯繫和組織而戰勝市場的自發作用。這同時也是指把客觀的經濟規律的標準強加於每一個聯合勞動基層組織，而不是在它們之間的關係中實行行政——唯意志的調節。價值和其他市場規律也正是通過自治的社會計畫來校正和限制<sup>29</sup>。

以上就南斯拉夫自治制度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直接有關的幾個方面做了一個粗略的探討，限於篇幅我們只能到此為止了。

承認南斯拉夫自治制度有其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根據，並不等於說我們就完全同意南斯拉夫對馬克思主義觀點的全部理解，即使在南斯拉夫，各種分歧意見也是一直在爭論著的。同樣，如果說南斯拉夫自治理論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也並不意味著這套理論和制度對於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是完全

可以照搬的。卡德爾多次說過，南斯拉夫的自治制度絕不是社會主義的唯一形式。這種看法無疑是正確的。

原載《當代國外社會主義問題》，一九八四年十月，第二期

## 註釋

\* 本文與郭樹清合作。

- ① 卡德爾一九七四年五月一日同《勞動報》記者的談話。
- ② 參閱米洛什·尼科里奇：〈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自治發展的理論基礎〉，載《社會主義在世界上》雜誌（英文版）一九五一年，第二三期，第三三頁。
- ③ 參閱卡德爾：《社會主義自治政治制度的發展方向》，共產主義者出版社，貝爾格萊德一九七七年版。
- ④ 普勒德拉格·弗蘭尼茨基《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第一五〇頁。
- ⑤ 同上。
- ⑥ 卡德爾：〈論南斯拉夫的人民民主〉，載《共產主義者週報》，一九四九年，第四期。
- ⑦ 普勒德拉格·弗蘭尼茨基：《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第一五〇—一五一頁。
- ⑧ 米那洛·馬科維奇：〈自治思想的哲學基礎〉，（南）《社會政治哲學》（英文版），第三三三頁。
- ⑨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二七二頁。
- ⑩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四五四頁。
- ⑪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三卷，第九五頁。

- ⑫ 中譯本作，《公有制在當代社會主義實踐中的矛盾》。
- ⑬ 巴卡里奇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關於籌備南共十大工作小組起草文件提綱的談話。
- ⑭ 巴卡里奇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同《信使報》記者的談話。
- ⑮ 參見米那洛·馬科維奇《自治思想的哲學基礎》，〔南〕《社會政治哲學》（英文版），第三二八頁。
- ⑯ 參見基德里奇：《我國過渡時期的經濟問題》，〔南〕《共產主義週報》，一九五〇年，第六期。
- ⑰ 鐵托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六日關於工人管理工廠的報告。
- ⑱ 參見列寧：《對布哈林《過渡時期的經濟》一書的評論》。
- ⑲ 鐵托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六日關於工人管理工廠的報告。
- ⑳ 卡德爾：《民主與社會主義》，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第一五五頁。
- ㉑ 同上。
- ㉒ 參見上書第一五九頁。
- ㉓ 同上書，第一六二頁。
- ㉔ 卡德爾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日關於南憲法草案的報告。
- ㉕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一二頁。
- ㉖ 參見卡德爾：《民主與社會主義》，第一〇一—一〇三頁。本文下面敘述主要根據這幾項的論述。
- ㉗ 同上書，第一〇三頁。
- ㉘ 參閱卡德爾：《自治計劃制度》，工人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版。
- ㉙ 參見南聯邦執行委員會主席普拉茨寧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七日在議會的報告。



## 布哈林國際學術討論會側記

由意共葛蘭西學院組織的「關於在蘇聯和國際共運史上的布哈林」的國際學術討論會，於一九八〇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在羅馬郊區福拉多加的陶里亞蒂學院（即意共中央黨校）舉行，引起了世界廣泛的注意。

### 討論會的緣起

一九三八年的三月二日，在莫斯科，對布哈林、李可夫的公審開始了，共有二十一人被起訴，十一天以後，全部以叛國、間諜活動、破壞和謀殺罪判罪。十八人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一人判處二十五年，二人判處十五年徒刑。公審結束後，三月十五日，布哈林、李可夫等十八人就被槍斃了。這就是史達林時代對「右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聯盟」，即所謂「共同的人民公敵匪幫」的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的清洗。

四十多年過去了，但是，對於這些審判是否公正有理，世人頗為懷疑。史達林逝世後，蘇聯開始強調「恢復社會主義法制」，三〇年代政治審判中被告人所交代的材料和事實幾乎都證明是假的，

迄今爲止，幾乎所有在莫斯科政治審判案件中的被告人的公民權都已恢復。但是，沒有正式地和公開地撤銷判決。布哈林和李可夫這樣的著名人物未能平反。

在史達林的監獄和集中營關了多年，幸而活下來的布哈林的遺孀A·M·拉林娜和她的兒子尤里·拉林（布哈林）（在布哈林槍斃時只兩歲）在一九六一年向蘇聯最高黨政機關要求給布哈林平反並恢復他的黨籍。一九六二年蘇共中央委員彼·波斯伯洛夫在全蘇歷史學家會議上公開宣布，布哈林當然不會是間諜和恐怖分子。一九六五年，蘇共四名最老的活動家，列寧的朋友：葉·斯塔索娃、維·卡爾賓斯基、P·卡塔尼揚和A·魯登科（現均已逝世）也寫了一封信給蘇共中央，要求廢除非法判決和恢復布哈林的黨籍，但均沒有回音。

直到一九七七年六月，蘇共中央的一個官員叫克雷莫夫的用電話通知尤里·拉林說，由於重新審查有關審判的文件的工作尚未完成，布哈林的審判案不能撤銷，是以恢復布哈林黨籍的問題不能解決。其後，在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一日，尤里·拉林又向蘇聯最高法院申請給布哈林平反，但仍無音信，正義始終無從伸張。

尤里·拉林在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二日給意大利共產黨總書記貝林格寫信，信中公布了布哈林的遺囑，並請求貝林格同志：「以你認爲最適合的方式參與我父親的平反的運動。」

英國羅素基金會也得到了這封信的複本。這封信散發到很多國家請求支持。世界各國有一百位著名學者，包括各國若干著名共產黨人，聯合簽名要求蘇聯政府重新審查布哈林案件，給予平反，並向公衆闡明產生錯案的背景。

意共《團結報》（一九七八年六月十六日）發表了意共中委、葛蘭西學院院長、黨史學家保羅·

斯布里亞諾的長篇聲明，指出爲布哈林平反不僅關係到恢復歷史本來面貌，也是正義和政治上的需要。意共文化事務的主要發言人阿爾多·托爾托來拉以及意共《再生》周刊也先後發表聲明。

至於在各國學者間開創研究布哈林的工作的是英國的亞歷山大·厄爾里希。他在五〇年代就開始研究布哈林，並著有《一九二四—一九二八年蘇維埃工業化的辯證法》一書，其後，對於作爲蘇聯的奠基人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布哈林的學術上和政治上的興趣大爲高漲，出版了大量的多種文字印行的布哈林著作的新版本和大量的研究布哈林的著作，甚至編寫了關於布哈林的劇本並拍攝電影。

布哈林國際學術討論會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應各國學者的建議召開的。

## 討論會的召開

經過充分的準備，一九八〇年四月二日葛蘭西學院院長保羅·斯布里亞諾向世界有關學者發出邀請信。信中說：「這一倡議的目的是要使人們通過擺脫各種辯護性的或誣蔑性的看法，來把各種觀點進行比較，從而對布哈林這一革命運動中最重要和最傑出的人物之一、十月革命和由十月革命所開拓的歷史進程中的主角和見證人之一、隨後又變成史達林鎮壓的最著名的犧牲者之一，進行深入的、實事求是的和批判性的研究，而過去由於種種原因，對布哈林的研究甚少。」

討論會事先確定分五個專題進行：(一)布哈林和「社會主義建設」；(二)布哈林和革命中的國際關係問題；(三)作爲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布哈林；(四)在史達林主義最後確立情況下對布哈林的判決；(五)關

於東歐各國的改革及其同新經濟政策問題的關係。每一個專題都約定主要報告人和發言人，並將講稿事先印發與會者。

羅馬郊區福拉多加的陶里亞蒂學院由四座別墅連在一起，陶里亞蒂先前曾在此休養。附近有奈米湖和卡斯蒂爾甘多爾湖風景區，景色秀麗，空氣新鮮，絕無羅馬市內喧囂混亂的情景。

正式與會者五十人。除意大利的學者外，還有從英、美、法、奧、加等西方國家來的著名的研究蘇聯和研究布哈林的學者參加。東歐國家中，有來自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學者，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匈牙利前總理赫格居斯·安德拉什。他說，他在一九七六年因發表《官僚主義和社會主義》一書被開除出黨，現任教授。還有旅居英國的波蘭學者布魯斯和旅居西德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持不同政見的學者米徹爾·雷曼。討論會原來約請了蘇聯的萊比捷夫和米庫辛，但均未到會。

討論會上曾發生一個有趣的插曲，即在舉行討論會那兩天，蘇聯駐意大利大使館發了一期《新聞公報》，刊載了蘇聯歷史學博士夫塞沃羅德·伊凡諾夫的論文《布哈林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文中着重講了列寧批判布哈林的一面，並說布哈林是極端貪婪的人，是列寧最倔強的政治反對派之一，布哈林反對建設社會主義的列寧主義路線。還說，列寧逝世後，布哈林加強了對列寧主義的攻擊，形成了右傾機會主義集團反對黨領導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政治綱領。在俄國，勞動者沒有忘記那些布哈林主義的復辟計劃。這個《新聞公報》顯然是針對這個座談會的。二十九日，意共總書記貝林格同志到會，並與各國學者會見。顯然，這也是給蘇聯當局的一個政治答覆。

## 討論會重新提出了布哈林的形像、理論和行動

討論會並沒有着重討論布哈林案件本身，因為與會者有相當大的一部分人是在前述羅素基金會所發起的要求蘇聯政府給布哈林平反的聯合簽名上簽字的學者，與會者都認為布哈林案件是一件冤案（參閱英國學者肯·寇台斯：《布哈林案件》，一九七八年版），布哈林本人應予平反是理所當然、無庸置疑的事。討論會著重討論了布哈林的理論、歷史地位和歷史作用以及布哈林案件產生的原因。整個討論會充滿了實事求是的、科學的態度，表現了對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的著作進行分析和闡述的嚴肅性，排除了簡單化的論斷和輕率地同今天的問題掛鉤，向更廣泛的公眾重新提出了布哈林的形像和行動問題，具有很高的學術水平和說服力。會上印發的論文就有二十來篇，二十多萬言，這裏不能一一列舉；僅將會上所討論的按問題分述於下：

### 一、布哈林其人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把布哈林描繪為十惡不赦的惡棍，給布哈林戴上一連串帽子：人民公敵、匪幫暴徒、人類姦賊、白衛侏儒小丑、法西斯奴僕、出賣國家秘密並為外國偵探機關供給消息的間諜、謀刺列寧，凶殺明仁斯基、古比雪夫和高爾基的殺人犯，反對列寧，反對黨，反對蘇維埃國家，真是罪惡滔天，罄竹難書。在一九三八年蘇聯官方報紙上都登了這樣一幅漫畫：漫畫的標題是「右派托洛茨基魔獸」，畫了一個雙頭怪獸，兩個頭都是凶神惡煞般的，一個寫著托洛茨基，

一個寫著布哈林，四個爪子都沾滿了鮮血，牽著怪獸皮帶的手上寫著蓋世太保，極盡醜化之能事。

討論會的發言還布哈林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本來面貌。與會者指出，布哈林在一八八八年生於莫斯科的教師家庭中。一九〇六年在莫斯科大學讀書，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一九〇九年被沙俄當局逮捕並流放。一九一二年逃出俄國，於克拉可夫（波蘭）遇到列寧，從此他成為列寧的戰友和學生。俄國十月革命後曾歷任《消息報》總編輯、共產國際主席。布哈林是布爾什維克黨的最著名的知識分子領袖。列寧曾譽之為黨的「最著名的和傑出的理論家」。

與會者指出，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布哈林可以說是知識分子類型的。他的興趣十分廣泛，涉獵的範圍包括經濟學、社會學、國家論、哲學以及文化改革和知識分子問題等等。黨的領袖集團中的人一般往往把理論工作看作是解釋或維護他們的革命思想，而在掌權以後則是解釋或維護其日常的事務。布哈林受這種影響較少，他不滿足於重複已經說過的話，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的一位創新者。他習慣於不迴避那些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沒有現成答案的令人不愉快的問題。他也不像某些人把馬克思主義信奉為「清教主義」，完全排除其他學派的理論或學科。他注意對當代非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所提出的某些概念進行討論，如果認為是正確的，就運用它來分析各種新現象、新問題，特別是在經濟學和社會學方面。如布哈林是布爾什維克理論家中第一個使用「國家資本主義」、「均衡論」、「新利維坦」（New Leviathan，意即「新極權國家」）等等這些概念的人。

布哈林的缺點在於，他也經常表現出某些教條主義態度，對事務的分析也受到墨守成規的損害，又不計後果地頑固堅持著既定路線。他的這些缺點，列寧察覺到了並給以批判。例如，他曾把嚴峻的戰時共產主義看作是一種永久的解決辦法，相信能夠消滅市場、價值規律、貨幣以及一般經濟規

律。缺點還表現在他對社會主義條件下民族問題的態度以及同「左派共產主義者」一起反對布列斯特和平談判。同時，在他的著作中，對某些問題的看法有些過份簡單化的毛病。但這種情況主要發生在一九二一—二四年這段可稱為布哈林的自我檢討的時期之前。但是，在他自我檢討之後，他的觀點有所轉變，例如從「左」轉到「右」，從戰時共產主義轉到新經濟政策；從一九一九年的黨的專政的無產階級專政思想轉到一九二五年以後尋求轉變到一種群眾能夠參加政府的「公社—國家」，設想發展蘇維埃民主。因此，布哈林被人攻擊為「動搖的知識分子」。但應該說，布哈林這種轉變是從實際出發的，應該看作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貢獻。

就其為人來講，布哈林是個謙虛的人，加入革命後，隨著經驗的增長而愈見謙虛。他非常樸實，過著幾乎近於禁欲的生活，全神貫注於研究。他宣傳目的和手段相一致的道德觀，堅持良心的重要。很多人認為列寧死後，布哈林能繼承列寧的事業。然而，史達林有更強的組織能力和掌握實際的手段，在政治舞台上能夠智勝布哈林這個知識分子。史達林不能容忍布哈林的堅決支持列寧的新經濟政策，而不贊成他自己的工業化和集體化的政策。史達林先利用布哈林的地位作為反對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的政治鬥爭中的盟友，然後又貶低他直至清洗了他。

## 二、布哈林的帝國主義理論

布哈林在一九一五年就寫了《世界經濟和帝國主義》一書，比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早兩年，並經列寧看過，還寫了序言，應該承認列寧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影響。

在帝國主義理論方面，布哈林首先提出「國家資本主義」一詞，即在單一的國家中的資本主義

已經達到這樣集中和有組織的程度，以致工業、金融和政治首腦可以融合成爲一個單一的國家托拉斯。他比列寧更早提出的另一個重要觀點，是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要的和最後的階段。沒有帝國主義，金融資本主義不能存在。在國家內部一定的生產無政府狀態和競爭是受到控制了，但是國家之間互相競爭，這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戰爭，因爲殖民地已經瓜分完畢，而任何新的劃分只能通過戰爭來取得。因此，資本主義的危機成爲國際化，而爲革命開闢了道路。

布哈林還主張承認資本主義「相對穩定」的事實，這不僅在於資本主義制度在克服戰爭和戰後初期的危機中顯示了恢復力，也因爲資本主義採取包括各方面的「合理化過程」。這包括：(一)通過低工資和失業，對工人階級施加更大的壓力；(二)技術設備的充實或改進和「更新」，即技術進步；(三)各種類型的聯合（托拉斯、辛迪加、卡特爾等）使資本主義在組織形式中有巨大的進步，即走上國家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

布哈林還注意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干預的增加，類似E·瓦爾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所注意到的。布哈林差不多引進了「極權主義」的觀念。他注意到帝國主義國家將採取越來越多的步驟來控制經濟和社會生活。他看到國家權力實際上滲透到生產的各個部分，國家不僅關心維護剝削方法的一般條件，並採取步驟使國家越來越成爲一個直接的剝削者，通過組織和指導作爲一個集體的資本主義生產。他把劇增其權力並擴張其職能的那種國家的現象稱爲「新列維坦」。

布哈林到一九三四年初，從法西斯的發展中，看到災難性的後果，因此，研究和著重譴責法西斯的危險。他稱法西斯爲最壞的、最凶惡的、退化的帝國主義，特別是其「野獸般的」、「反國際主



義」，「種族歧視」，侵略性的進軍，反對文化等方面。他看到納粹德國和軍國主義日本是兩個真正的敵人。他警告說，法西斯不會滿足於吞併蘇聯，還要轉而反對西歐。這雖然不超過預言的性質，但是那還是在一九三四年，史達林對法西斯主義還沒有形成明確的概念的時候。據此也可以證明布哈林不可能成爲法西斯的走狗。布哈林還試圖形成一種意識形態，使蘇維埃社會能夠抵制法西斯主義並擊退其進攻。這就是「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並尋求一個有效的政治的、社會的和經濟的綱領。這個綱領的基礎就是：國內和解，通過市場的重建使城鄉間出現新的聯合，一個更按比例的、健康的經濟發展，物質福利的適當擴大，更多的群眾參與政治以及國家的民主改革。他的目的和希望是：每一個集體農莊將在一天變成反擊侵略者的無敵的堡壘。我們知道，後來這沒有成爲事實。

### 三、布哈林的社會主義革命理論

布哈林在一九一八年認爲，如果沒有歐洲的革命，俄國革命將會失敗；但到二〇年代中，他成爲堅持「社會主義在一國勝利」的理論家。這和他提出「世界革命進程」(World Revolution Process)的論點有關。它意味著不能把「世界革命」看作是在世界主要國家多少同時爆發和即將發生的革命，而是一個更複雜的歷史現象，是一個「進程」；世界革命雖是一個「整體」，但是「長期的」，甚至包括「整整一個時代」。這個時代業已開始，但仍處在它的第一階段，一個「緩慢」、「十分緩慢」的現象。布哈林看到和這一進程結合在一起前進的三種力量：東方反殖民主義的革命，西方工人階級的鬥爭，蘇聯的「社會主義的建設」。正因爲它是緩慢的並且爲這些不同的力量所推動，還因爲各種因素只是緩慢地、不正規地和在不同時代中發展，這個進程也是多樣化的。布哈林雖然從來沒有講過

到社會主義的不同道路，但是，他足以接近這個理論。單在一九二三年，他強調了「鬥爭條件的無限差別……」，因此，對革命運動的不同部分，「任務和具體目標有所分歧」。從這個單一的和多方面的進程所產生的「各種社會主義」，區分它們的差別比區分不同的資本主義社會還更重要，所有的社會主義社會將受到它們不同的出發點的巨大影響。

布哈林是堅持社會主義在一國勝利的理論的。他堅持在孤立的俄國，儘管其經濟和社會十分落後，可能緩慢地，甚至要花幾個十年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社會。但是他從不把一國建設社會主義和世界革命的「漫長進程」分割開來。在能夠設想的各種社會主義之中，在這種條件下的俄國所能夠建設的類型，將是社會主義中「不可避免的落後類型」。「俄國的社會主義，與其他比較起來，將表現為亞細亞的。」因此，蘇維埃俄國不能夠為其他先進國家提供一個固定的模式，影響也較少。

布哈林把重點放在東方的反殖民主義的覺醒，特別重視在中國所發生的事件。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二七年遭到嚴重失敗的時候，正是布哈林領導共產國際的時候。對於這種失敗，布哈林要負很大的責任。他從中國的失敗中懂得：「我們必須多麼小心地決定我們的政治策略，我們必須以多麼大的注意力來研究這一國家、那一國家發展的特點。」此外，他掌握了「農民問題確實是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一再強調這一革命的民族性質，他也為中國和其他東方農業國家預見到一種「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可能性。

#### 四、布哈林的國家論

布哈林的《世界經濟和帝國主義》一書，對於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也是有影響的。隨著革命

形勢的發展，布哈林的「國家論」有著越來越精彩的論述。他甚至預見到史達林主義國家的產生。對於無產階級專政的認識，布哈林有個轉變過程。既然階級的意識形態不是隨階級一起產生的，而是由較小的集團——黨所灌輸的，因此，他最初認為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黨的專政，他甚至認為如果有強有力的領袖們，也可以說是領袖們的專政。這樣有可能產生「個人權力」，但他認為只有在階級社會才會如此。以後，布哈林越來越傾向「群眾參與」的觀點，並對早先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踐採取批判的態度。在一九二五年《走向社會主義之路和工農聯盟》一書中，他認為，在戰時共產主義時期，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是軍事——無產階級專政。龐大的蘇維埃權力機關使全體蘇維埃事實上沒有了，而決策完全是執行委員會主席團，亦即三人或五人小團體的事。在和平時期，必須改變蘇維埃權力的形式，肅清和廢除戰時共產主義時期的殘餘。革命的法制應該代替一切不確定的、獨斷專行的形式。在和平時期，經濟活動居首要地位，任何沒有制度的、隨意的、突然的干擾經濟生活的進程，必然極端破壞經濟生活。「群眾參與決策」極為必要。提高工人階級各階層以及農民的文化水平和政治參與是最大的任務。要取消命令和下達指令的方法，完全和立即採用說服的辦法。終其一生，布哈林堅持以上觀點，並捍衛列寧「使無產階級專政制度民主化」的聲明。他堅持「真正群眾的眞正參與」，並談論過渡到公社——國家，「其中群眾，包括每一個小農，都將參與決策」。他還認為，工人階級直接行使權力還是反對官僚主義的一劑良藥。官僚主義對共產黨是一種腐蝕劑。共產黨必須防止官僚主義的危險。他提出蘇維埃的每一個成員強制性地參與管理國家的事務，並採取不斷的輪換制。在管理國家的過程中要逐漸使全體人民都參加進去，沒有例外。

布哈林認為「社會化」，不等於「國有化」和「國家化」。他反對黨和國家權力之合一，反對無

限制的「國家化」。在二〇年代，他一再公開表示擔心蘇維埃黨——國家的權力的過份集中。他警告說，現代國家的權力以其高踞於社會之上的政治和經濟的權力的新的聯合，成爲他所稱謂的「新利維坦」。這個詞原先指的是帝國主義國家。他使用這個詞於蘇聯，表示他對事實上是史達林統治下的蘇維埃國家的變形和退化的擔心。他以多種方式來談這種擔心。他使用過「一個官僚主義階層」、「一個新的官僚主義的國家」、「軍事——封建政權」等，總之，他攻擊的是蘇維埃國家的濫用權力。他還意識到俄國的國家中央集權論者的傳統，及其暴虐統治的歷史。他擔心俄國傳統和現代國家的結合將產生一種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可怕的方法。這可以說明爲什麼他在經濟工作中和文藝工作中反對「壟斷的」政策，他把市場看作一個國家和社會之間的經濟的也是政治的中介，以及他強調建立一個新的法制。這也可以說明他爲什麼堅持社會主義的道德觀：不能夠把「建設社會主義」簡單地和鋼鐵生產和蘇維埃國家的權力等同起來。他還認爲，如果對於人民，蘇維埃工業化不比資本主義工業化更有利和較少剝削，那就不是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布哈林預見到並且警告這樣一種前景，即：布爾什維克革命可能以「建設社會主義」的名義產生一個用電話、書記處和秘密警察裝備起來的新的彼得大帝。這許多觀點也可以說是他在後來提出的「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的先聲。

因此，布哈林在一九二八—二九年反對史達林的政策措施。布哈林及其追隨者把史達林的辦法貶之爲「通過一〇七條款（非常措施）到社會主義之路」，攻擊史達林的工業政策將「把蘇聯放到舊俄的歷史道路上去」，說史達林關於「階級鬥爭」不斷尖銳化的理論結果將產生「一個警察國家」，說史達林的農業政策是「可怕的片面性」和基於「對農民的軍事——封建剝削」。總之，布哈林攻擊史達林的路線，認爲它對整個革命，亦即對社會主義是毀滅性的。

在布爾什維克文獻中，史達林主義和布哈林主義是對立的。以「自上而下的革命」為特點的史達林主義的鬥爭觀點和政策上的極端主義，以至後來的史達林主義制度就是在與在哈林主義作鬥爭中產生的。結果，其後二十五年來，布哈林的觀點在史達林的俄國以及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受到強烈譴責，起先被批判為「腐朽的自由主義」，然後當作叛國的「右傾」，最後當作犯罪的陰謀。

##### 五、布哈林與社會主義建設

二十五年來，大多數西方學者和所有蘇聯作家都公認，除了史達林主義之外，別無另一種可供選擇的建設社會主義的布爾什維克方案。此種情況，隨著五〇年代新政治情況的出現，特別是官方的非史達林化的開始，而有所改變。東方和西方的共產黨人而非共產黨人開始研究蘇聯歷史上的巨大轉折點，即一九二九—三三年農業的強迫集體化是否有別的代替物。而強迫集體化近來越來越被認為是史達林主義和俄國特殊悲劇的開始。這些問題不可避免地要引導到對蘇聯二〇年代新經濟政策的非史達林主義政策以及新經濟政策的主要解釋者和捍衛者布哈林的研究。

目前不少西方和蘇聯的學者把新經濟政策看作是一個與史達林主義不同的代替物。布哈林主義則是新經濟政策的辯護士，這是布哈林的真正重要性所在。

布哈林的新經濟政策綱領，概括地說，是：試圖通過合理的計劃和市場的結合，通過社會主義和非社會主義的形式之結合，推動一個工業和農業平衡增長的逐漸發展的模式。布哈林還有以下一些值得注意的觀點：關於農民的農業和合作社農業的作用、社會消費、市場、科學的計劃、按比例的投資、自願原則、國內和平和階級合作的必要性等。這也是布哈林對馬克思主義的重要貢獻之一

過渡時期的經濟問題。

這裏，涉及以下一些問題：

一、如何看戰時共產主義的經驗。內戰時期，黨的領導層，包括布哈林，都把那種極端主義和強制性的政策歌頌為「社會主義的」。實際上，戰時共產主義與經濟增長無關，只不過是戰時管制和動員現有資源而已。然而，內戰的經驗對布爾什維克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有重大影響。史達林從這個戰時的傳統得出他的一九二九年的自上而下的革命的結論。反之，布哈林則認為內戰的教訓，主要是反面的，說明通過無產階級的強制重整經濟和社會這一「幻想」的破滅。同時，布哈林認為，在戰爭結束後，國內和平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唯一社會關係。他反對那種說法，即通過由黨、國家所發動的「第三次革命」來建設社會主義。他認為「階級鬥爭」現在必須變為和平、演進，並主要表現在市場關係舞台上的社會主義部分與私人部分之間的經濟鬥爭之中。

二、如何看待農民。布哈林認為社會主義要取得並保持勝利，至少需要俄國的基本人口的不言而喻的支持，而在俄國和其他不發達國家占多數的階級是農民，因此與農民結成友好的、合作的聯盟是俄國革命的基本問題，也是布爾什維克統治的「絕對必要的條件」。他還根據列寧在《論合作社》中給社會主義下的定義：「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不再把農民看作是產生資本主義的階級，而是「非資本主義階級」。在二〇年代要保持工農聯盟，就要通過工業品與農產品的交換來發展它們的合作，利用經濟的、貨幣的刺激來引導農民出售更多的農產品並減輕與強迫徵收有關的政治壓力，運用商品市場和更自由的產品交換，有可能使小規模農場和工業在私有的基礎上進行生產，這樣來逐漸刺激工業的生產和重工業的建設。因此，布哈林堅決反對托洛茨基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超

工業化」理論。

托洛茨基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主要論點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主要任務是建設工業和增加工人階級的政治和經濟作用，這就需要巨額的積累。用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話說，應該採取「社會主義積累的客觀規律」，即最大限度地勒索農民，人爲地保持「價格剪刀差」，運用政治壓力和價格行政機構來進行。而新經濟政策將使農民可能積累財富，危及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作用。依靠農民的超工業化對他們來說似乎是唯一正確的選擇。

因此，可見布哈林的選擇是多麼重要了。在這一點上，史達林最初和布哈林一起反對過托洛茨基，並取得了勝利。但是，到了二〇年代後期，史達林實際上對農民也是與托洛茨基同樣的看法，並採取了更嚴峻的手段來剝奪農民。布哈林則以悲劇的結局失敗了。

## 六、布哈林與今天東歐的政策

從上述布哈林的一系列觀點，很自然地令人聯想到今天東歐的改革。但是，與會者認爲，並非對布哈林的懷念和從布哈林著作中啓發了今天改革者的思想，而是作爲尋求一種非史達林式的共產主義道路的自然結果。改革者對新經濟政策和蘇聯二〇年代感覺興趣。於是，今天試圖在史達林主義的框框之外尋找「真正的社會主義」，就不免和布哈林有觀點上的相似之處了。

戰後東歐的「人民民主」時期，大多數東歐共產黨的領袖都主張採取一條與史達林路線不同的漸進主義者 (gradualists) 的路線。原因之一是由於國內社會政治情況，更爲平衡的經濟政策（當前的消費、農民和中等階級的地位等）成爲取得長期的、真正的政治支持的必要條件。這種觀點和布

哈林在新經濟政策時期某些論點有關。史達林和布哈林都承認在一個主要是農民的國家中「社會主義一國勝利」的可能性。但史達林相信征服農民的可能性，布哈林則相信爭取農民的可能性；此外，布哈林還主張工農聯盟、更緩進的經濟政策、在長期計劃中平衡前進的原則、市場機制之廣泛運用。但是，由於蘇聯的外部壓力，人民民主國家的緩進政策被迫放棄。只有南斯拉夫在一九四八年以後頂住了，採取了新經濟制度，放棄強迫的集體化，後來又採取工人自治、企業自負盈虧以及市場關係，但這與布哈林都無關了。

布哈林觀點之復活主要是在史達林死後。這一次並不是像蘇聯在二〇年代或人民民主國家在四〇年代那樣要選擇與史達林主義不同的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道路，而是對史達林主義所創造制度的非史達林化。這一點，在東歐比較簡單，而在蘇聯則阻力較大。在東歐史達林逝世後不久，對經濟體制中的過份集中和主要用行政辦法管理經濟進行了批判。布哈林著作中關於運用市場機制來建設社會主義，攻擊官僚主義的過份中央集權的論點，就不僅有理論的意義，也有實踐的意義了。

蘇聯和東歐的社會和社會問題各不相同，改革是多樣化的和曲折的，但改革的原則都指向同一方向：較少的指令性指標，更多的企業自主權，更多的以經濟手段管理經濟。而中國近來提出利用社會主義下的市場尤有重要意義。所有這一切都可以認為與布哈林的觀點有關。因此，不僅要把布哈林放在當時的歷史時期來考察，也要把布哈林的觀點與今天的社會主義問題的關係，與東歐的實際發展的關係，聯繫起來加以判斷。



## 布哈林《過渡時期經濟學》評述

《過渡時期經濟學》是建國以來我國第一次公開出版的尼古拉·布哈林著作。這本書的出版標誌著我國思想和出版界的進一步解放。

### 布哈林及其著作的再發現

自從一九三八年布哈林在莫斯科「右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聯盟」審判案中被槍斃以後，被推崇為「馬克思主義百科全書」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給布哈林定下了鐵案：人民公敵，匪幫暴徒，法西斯奴僕和間諜，謀刺列寧和凶殺明仁斯基、古比雪夫和高爾基的殺人犯，反對黨、反對列寧、反對蘇維埃國家的反革命陰謀家。於是布哈林貽罵名於全球。長久以來，布哈林要麼不再被提起，要麼在政治需要的時候，被揪出來當作反面教材加以批判。布哈林的著作在很多共產黨執政的國家裏被當作禁書。

然而，國際上，從一九五三年情況就有了變化，到了七十年代竟可以說出現了「布哈林熱」。而我國由於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特別在「十年動亂」期間，「閉關自守」，因而知之甚少。

史達林逝世後，蘇聯強調恢復「社會主義法則」，蘇聯政府為莫斯科審判案（包括布哈林案件）中的一些死者（包括一些主要作證人）恢復了身後名譽，有時還給予他們榮典。這些行動本身就證明了這些死者的案情是不真實的。但是布哈林和李可夫這樣著名的人物未能平反。一九六一年蘇聯四位曾和列寧共事的老布爾什維克寫信給蘇共政治局要求撤銷非法判決和恢復布哈林的黨籍。一九六二年蘇共中央委員彼·波斯伯洛夫在全蘇歷史學家會議上會公開宣布，布哈林當然不會是間諜和恐怖分子。布哈林的遺孀A·M·拉林娜和他的兒子尤里·拉林（布哈林）在一九六一年和一九七七年兩度向蘇聯最高黨政機關要求給布哈林平反，並恢復他的黨籍。長期不得音信。他們於一九七八年寫信給意大利共產黨總書記貝林格，請他參與布哈林的平反。英國羅素基金會把這封信的副本，散發給世界著名共產黨人、學者請求支持。有一百人聯合簽名要求蘇聯政府重新審查布哈林案件，給予平反。一九八〇年意共葛蘭西學院並組織「關於蘇聯和國際共運史上的布哈林」國際學術討論會。國際上發起了一場為布哈林平反的世界性運動。世界輿論認為為布哈林伸張正義，不僅是恢復歷史本來面貌問題，而且也是出於道德上和政治上的需要。

另一方面，自布哈林被槍斃二十五年來，大多數西方學者和所有蘇聯學者都公認在社會主義建設中除史達林主義外，別無另一種可供選擇的布爾什維克的方案。我國也是如此。史達林逝世後，東方和西方的共產黨人和非共產黨人開始尋求與史達林主義不同的可供選擇的建設社會主義的其他方案。特別是六十年代，東歐各國的改革者試圖從史達林的框子之外，尋找更適當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這一類問題不可避免地要想到蘇聯二十年代新經濟政策和新經濟政策的主要解釋者和捍衛者布哈林。五十年代，英國學者亞歷山大·厄爾利希（Alexander Erlich）首先開始研究布哈林，其

後，對於布哈林的學術上和政治上的興趣大為高漲，出版了大量以多種文字印行的布哈林著作的新版本和大量研究布哈林的著作，甚至編寫了關於布哈林的劇本和電影脚本。

### 《過渡時期經濟學》一書的出版時代及其局限性

布哈林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興趣十分廣泛，涉獵的範圍包括經濟學、社會學、國家論、哲學以及文化改革和知識分子問題等等。他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創新者，不滿足於重複已經說過的話，習慣於迴避那些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沒有現成答案和令人不愉快的問題。他也注意對當時非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所提出的某些概念進行討論，如果他認為是正確的，就運用它來分析各種新現象、新問題，特別是在經濟學和社會學方面。《過渡時期經濟學》這本書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者對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的過渡時期進行第一次詳細的分析。布哈林自己說，這本書是「對資本主義瓦解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社會改組的基本規律作理論分析的嘗試」<sup>①</sup>。這本書充分反映了對馬克思主義的創新，提出了一系列新問題，新觀點。因此難免有正確也有錯誤的地方，在引進和運用非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所提出的某些概念方面也是如此。例如，由於他在書中大量使用波格丹諾夫式的概念術語和煩瑣哲學，往往陷於「玩弄概念」，使行文晦澀難讀，概念混亂。而在運用「國家資本主義」、「平衡論」等概念時，則使分析達到新的水準。

布哈林的著作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分界線是一九二一至二四年。有些研究布哈林的學者認為一九二一至二四年可稱作布哈林的自我檢討時期。在這個時期之前，他的缺點在於經常表現出某些教

條主義態度，對事物的分析也受到墨守成規的影響，甚至頑固堅持著既定路線。他的這缺點，列寧察覺到了並給以批判。在布哈林自我檢討時期以後，他從實際出發總結了經驗，在觀點上有了很大的轉變。《過渡時期經濟學》出版於一九二〇年，因此帶有布哈林自我檢討時期以前的缺點。

這本書成書於一九二〇年，正是蘇維埃國家粉碎了外國武裝干涉，取得國內戰爭勝利，實行新經濟政策的前一年。那時，聯共（布）的領導層，包括布哈林，都把那種不通過市場的極端主義和強制性的政策歌頌為「社會主義的」。這就使這本書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的色彩。把嚴峻的戰時共產主義看作是過渡時期普遍的帶有規律性的現象，相信能夠消滅市場、貨幣、價值規律。而且布哈林探討過渡時期規律時，常常從戰時共產主義的經驗出發，缺乏正常狀態下的過渡時期實際經驗的總結，往往不得不採用抽象的論述和邏輯的推理，所以缺乏堅實的實際論證。

這就是這本書的局限性和某些缺點錯誤產生的原因。但是，這本書究竟是對過渡時期經濟的最初的、系統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提出了不少有價值的論點，特別是對過渡時期經濟的研究開闢了道路，對今日的研究仍有參考的價值。列寧在批評這本書的缺點的同时，肯定了這本「出色的書的出色的質量」，譽之為「輝煌的作品」，並對這本書作了詳細的評論。②

### 《過渡時期經濟學》提出的一些值得研究的問題

這本書雖然卷帙不大，但是涉及面很廣，瑕瑜互見。其中很多問題需要進行專題研究和探討。現在提出以下一些值得研究的問題。

一、關於政治經濟學的對象。這本書開宗明義首先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布哈林認為：「理論政治經濟學是以關於商品生產為基礎的社會經濟的科學，也就是關於無組織的社會經濟的科學。」因此，資本主義商品社會的末日也就是政治經濟學的告終。」總之，政治經濟學是研究商品經濟的。」<sup>③</sup>

這裏，布哈林把政治經濟學加上「理論」兩個字是畫蛇添足。政治經濟學本身就是理論科學，如果沒有理論，那只剩下了生產組織學之類了。政治經濟學也不只是研究商品經濟的。因此，列寧在對該書的評論中，一開始就指出布哈林的「定義比恩格斯的倒退了一步」，並指出「甚至在純粹的共產主義社會裏不也有K和D的關係嗎？還有積累呢？」

布哈林的這個定義，加上根據蘇聯戰時共產主義的經驗認為社會主義將不存在商品生產，就導致了蘇聯在二十年代一部分經濟學者認為政治經濟學將隨資本主義的消滅而告終，否認政治經濟學包括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部分的錯誤結論。

二、關於世界經濟這一範疇。世界經濟這一範疇雖然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早已提出，但是布哈林是第一個給以明確定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他說：「在我們這個時代，世界經濟是社會經濟的具體表現。世界經濟是一個現實地存在的統一體。」<sup>④</sup>他反對把世界經濟看作是各國國民經濟簡單的總和，而是「一種特殊的有機聯繫的存在——這才使簡單的總和成爲現實的總體」<sup>⑤</sup>。布哈林的定義對於我們今天研究世界經濟，特別是把世界經濟作爲一門科學仍然是有意義的。

三、關於國家的經濟作用。布哈林注意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干預的增加，類似瓦爾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所注意到的。他提出「國家是一個『超經濟的因素』。但是它有

巨大經濟意義<sup>⑥</sup>」。他認為帝國主義國家作為經濟因素能夠起巨大的作用。他形象地指出和帝國主義國家機構所表現出來的巨大力量相比，霍布斯的「利維坦」（指國家權力）不過是一隻小狗。同時，他指出帝國主義國家的權力和經濟作用不管有多大，「絕不排斥它的純階級的性質。這些職能要麼是擴大剝削過程本身的必要條件（鐵路），或維護統治階級的其他利益（衛生措施），要麼是對階級敵人的戰略讓步<sup>⑦</sup>」。「這裏『公益的』職能無非是剝削過程的必要條件<sup>⑧</sup>」。這些論點對於我們分析今天所謂資本主義的福利國家仍然是有意義的。

四、再生產的觀點研究經濟。它對研究資本主義發展的「危機」時代和過渡階段尤為重要。這是布哈林在經濟學方法論，也是運用他的「平衡論」進行分析的一個貢獻。而我們過去對此甚少注意。布哈林正確地指出，「再生產的觀點在方法論上是唯一正確的觀點。因為它正是研究重複生產循環的條件，也就是研究社會體系動態平衡的條件」<sup>⑨</sup>。他用再生產的觀點來分析戰爭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時，提出了「消極的擴大再生產」這一概念。這是指「隨著戰爭的進行，再生產過程就具有一種『歪曲的』、倒退的、消極的性質，就是說，實在的生產基礎隨著每一次的生產循環而愈來愈薄弱：『發展』不是按照日益擴大的，而是按照不斷縮小的螺旋線進行的」<sup>⑩</sup>。這一概念對於研究過渡時期的經濟，例如我國「十年動亂」時期的經濟也是有用的。

布哈林是用辯證法的觀點來研究戰爭和經濟危機對資本主義生產的影響，指出「資本主義體系經過暫時的停滯之後，會以組織上更加完善的形式繼續發展下去」<sup>⑪</sup>。他從理論上分析，認為「在消極的擴大再生產耗盡了社會剩餘價值（M）之後，就會絕對不可避免地開始發生瓦解過程」<sup>⑫</sup>；但是，他並不是資本主義自行崩潰論者，他正確地指出，「只有當資本主義社會的最重要的生產力，

即整個工人階級還默然「同意」執行資本主義職能的時候，資本主義社會才能存在。這個前提一消失，資本主義社會就不能繼續存在了」。<sup>13</sup>

對於無產階級革命，他充滿信心地指出，「革命和內戰的耗費雖表現為生產力的暫時下降，但由於生產關係按照新的方法進行了改造，生產力的暫時下降卻為生產力的巨大發展打下了基礎」。

五、關於資本主義社會的「成熟性」問題和共產主義建設問題。布哈林認為前者指的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客觀前提，即「馬克思提出的兩個基本因素：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sup>14</sup>，只有在「勞動的社會化在技術上使任何具體的社會結構有可能實行計劃組織」<sup>15</sup>才可以說業已「成熟」。這就很明確地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的物質前提，以及「能夠決定生產立即合理化的基本因素是社會化勞動」<sup>16</sup>。他還指出與資本主義建立的自發過程不同，「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有組織的體系，是無產階級這個有組織的集體建設起來的。……建設共產主義的過程在很大程度上是自覺的，就是說，是一個有組織的過程」<sup>17</sup>。他還指出社會主義革命將提出社會主義方法，但決不是馬上就是完完全全的社會主義。這對我們研究社會主義都有現實意義。

六、運用「平衡論」研究過渡時期的工農關係和城鄉關係。布哈林指出正常的發展要求工農之間和城鄉之間要保持一定的相對比例關係，也就是講的是為整個體系的平衡所必須的生產力分配。由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特點是工業統治農業和城市統治鄉村，因此，在無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後，「現在發生一問題——怎樣能夠取得新的平衡：一方面是農業本身內部的平衡，另一方面是城鄉間的平衡。這個問題是決定人類命運的問題，因為它是一個最重要，最複雜的問題」<sup>18</sup>。為了取得最低限度的「平衡」，他提出國家的強制、使小生產者主要通過流通領域加入有組織的機構（形式上採取國

家資本主義的辦法)和農民組織的辦法。所謂國家強制，布哈林不能不受當時「戰時共產主義」的影響，但他認為並非杜林式的「純粹暴力」。

七、關於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布哈林明確指出：「在資本的統治下，生產是剩餘價值的生產，是為利潤進行的生產。在無產階級的統治下，生產是為了滿足社會的需要而進行的生產。整個生產過程的不同職能意義由不同的所有制關係和國家政權的不同階級特點所決定」<sup>①9</sup>。可以認為已經提出了當前我們所討論的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之觀點。

八、關於過渡時期的生產管理形式。布哈林認為在戰爭時期，蘇維埃國家體系具有軍事無產階級專政的性質，生產屬於軍事化生產。但是，戰爭轉為和平，經濟上的尖銳危機過去之後，「不再需要極端的軍事管理形式」<sup>②0</sup>。因為強制的形式會造成某些巨大的缺點，「『發達的』管理體系的新階段就代替了它」<sup>②1</sup>。「隨著國家政權和人與人相互關係上的任何強制規定的消亡」，「全部蘇維埃體系的最重要任務之一是吸收最廣大的群眾直接參加管理」<sup>②2</sup>。這就提出了當代廣泛發展的企業管理中的參與和自治的思想。

九、關於過渡時期的經濟範疇。這是這本書的薄弱環節，不但因為過渡時期存在著「流動性、可變性、運動」這些特點，而且還因為布哈林當時還缺乏實踐的經驗。布哈林在這方面提出的一個重要的，但被人們忽視、甚至反對的範疇即「平衡規律」。由於列寧在《評論》中說，「這非常好。但是說『必然有一定的比例』是不是比說『從平衡的角度』，更確切一些呢？」<sup>②3</sup>於是「平衡論」就成了布哈林一大罪狀。布哈林說，「從平衡的角度觀察社會制度，並且是不合理的、盲目的社會制度，當然同預先規定的協調毫無共同之處，因為它是從這一制度的存在這一事實及其發展這一事實出發



的。後一情況要求這種平衡的類型是動的平衡，而不是靜的平衡」<sup>24</sup>。實際上，布哈林從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中引進「平衡論」的概念，是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一個貢獻。特別動的平衡是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因此他對過渡時期問題的提法也是正確的。「在一定的時刻社會存在的物質條件如何，它的這種條件如何，它在這種條件下能存在多久；怎麼可能進行生產的；是否可能建立平衡；在建立平衡的情況下能產生什麼樣的結果，在相反的情況下又能產生什麼樣的結果；在這兩種情況下生產關係起什麼樣的變化，在這兩種情況下運動的規律如何，等等」<sup>25</sup>。時間已經過了六十年，布哈林對於過渡時期提出的極有啓發的問題迄今還有待於進一步研究。

十、關於暴力和強制及其同經濟的相互關係。這是布哈林全書得到列寧最欣賞的部分。但是，應該說，這一部分是有很大的局限性，因為可以說這只是蘇聯「戰時共產主義」時期經驗的總結。列寧在《過渡時期經濟學》一書上批寫「非常好！」「對！」並有這麼一段話：「由於這種政權是對付資產階級的『集中的暴力』，它本身就是一種經濟力量，所以這是一種摧毀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力量，它把生產中的物質骨骼轉交給無產階級支配，並逐步把生產中非無產階級的生產人員安置到新的社會生產聯繫的體系中去。另一方面，這種『集中的暴力』也部分適用於內部，是勞動人民實行自我組織和對自己實行強制的紀律的因素」<sup>26</sup>。在無產階級革命時期和剛剛取得政權的一個時期，這個提法是正確的。但是無產階級政權已鞏固，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已取得決定性勝利以後，仍然強調「集中的暴力」必然引起消極的以至破壞性的後果。布哈林在一九二一至二四年自我檢討以後改變了這種看法決不是偶然的。

總之，《過渡時期經濟學》可以說是一本研究過渡時期經濟的筆路藍縷的書，既有很多不成熟的

乃至錯誤的看法，也有大量啓人深思的有價值的論點，值得我們認真研究探討。

原載《讀書》，一九八一年，第一期

### 註釋

- ① 見《布哈林自傳》，《格拉納特百科辭典》，第四十一卷，第一冊附錄，第五六頁。
- ② 見列寧：〈對布哈林《過渡時期的經濟》一書的評論〉，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版。
- ③ 布哈林：《過渡時期經濟學》，三聯書店，一九八一年版，第一、二頁。
- ④ 同上，第二頁。
- ⑤ 同上，第三頁。
- ⑥ 同上，第一七頁。
- ⑦ 同上，第一四頁。
- ⑧ 同上，第一四頁。
- ⑨ 同上，第二八頁。
- ⑩ 同上，第三〇頁。
- ⑪ 同上，第三一頁。
- ⑫ 同上，第三六頁。
- ⑬ 同上，第三七頁。

- 14 同上，第四三頁。
- 15 同上，第四五頁。
- 16 同上，第六三頁。
- 17 同上，第四九頁。
- 18 同上，第六八頁。
- 19 同上，第九七頁。
- 20 同上，第一〇四頁。
- 21 同上，第一〇四頁。
- 22 同上，第一〇三頁。
- 23 列寧：〈對布哈林《過渡時期的經濟學》一書的評論〉第四三、四四頁
- 24 布哈林：《過渡時期經濟學》，第一一一頁
- 25 同上，第一一四頁。
- 26 同上，第一二一頁。



## 布哈林的再評價

——寫在為布哈林平反之際

真理必定戰勝強權。

正義終將掃除邪惡。

今年是布哈林誕辰一百週年，又是他含冤被「地獄般的機器 (hellish machine)」<sup>①</sup>所處決的五十周年。

布哈林的平反和恢復名譽是世界進步人士所關心的一個大問題。從蘇聯部分知識界人士和國際人士來看，布哈林在六十年代已經被平反了<sup>②</sup>。大家所關心的是在當前提倡民主化、公開化，進行全面改革的蘇聯，能否為布哈林公開平反和恢復名譽。令人高興的是，經歷了半個世紀，一九八八年二月五日塔斯社傳來電訊，蘇聯最高法院已為布哈林等二十人平反。

布哈林的平反和恢復名譽之所以重要，「不僅涉及他們的歷史功過問題，而且也是出於道義上和政治上的需要」<sup>③</sup>，「除了具有一般的歷史重大意義之外，還在道義上、理論上、教育和政治上有其連帶的影響」<sup>④</sup>，並有助於「消除史達林主義所給予的社會主義形象中的黑暗的、不人道的方面」<sup>⑤</sup>。

在共產黨領導下和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一直被看成是最先進、最正義、最人道的社會組織形式，它保證了和擴大了民主，使人民免於遭受剝削和壓迫。

但是，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之後，不過十幾年，在蘇聯卻出現了與社會主義原則相牴牾的史達林主義。

什麼是史達林主義，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在中國也是一樣。近年來，中國學者多數的看法是：史達林主義在政治體制上的特徵是，官僚主義、高度集權、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個人迷信、獨斷專行、大規模的暴力鎮壓，最終形成極權主義政權。在經濟體制上的特徵是，排斥商品生產和市場機制，實行高度集中統一的管理，包容一切的指令性計劃，採取不平衡的發展戰略，忽視人民消費。在文化體制上的特徵是，實行文化專制主義，絕對的統一意志和大規模的情報封鎖。

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期內，人們把「史達林主義」之說看作是資產階級的謾言而予以否認。對布哈林和三十年代審訊的其他受害者，在蘇聯宣傳機器的影響下，則被認為是罪有應得的一夥反蘇反共的「人民公敵」。

經歷了半個世紀，蘇聯共產黨的領導層終於在最近比較實事求是地對待史達林和史達林時代。

蘇共中央總書記戈巴契夫在慶祝十月革命七十週年大會上的報告中說：「正是由於缺乏蘇維埃社會主義民主化的應有水平，才使個人崇拜，使三十年代的破壞法制、專橫和鎮壓成爲可能。坦率地說，這是在濫用權力的基礎上的真正暴行」。史達林及其周圍的親信爲大規模鎮壓和違法現象對黨對人民所犯的過錯是巨大的和不可原諒的」。<sup>⑥</sup>

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雷日科夫在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對瑞典《每日新聞報》記者們說：史

達林時代是蘇聯歷史上最困難、最悲慘的時代，「這段期間所犯的一系列嚴重錯誤，背離社會主義原則，搞無端報復，這些都是永遠不能原諒的」，「史達林偏離了列寧主義原則，導致黨政領導體制中實行軍事化的獨裁」<sup>7</sup>。

一九八八年二月五日蘇聯最高法院在為布哈林等二十人平反的報告中說：「經查，對這一案件的事先調查粗暴破壞了社會主義法制，偽造證詞，用不能允許的方法向被告人口供」，「撤銷軍事法庭對布哈林等人的判決，由於這些人的行動沒有犯罪成份，此案不能成立」<sup>8</sup>。

史達林主義的存在是無可懷疑的了。它創造了三十年代的「大審判」，給蘇聯帶來悲慘的時代。今天，在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實現民主化、公開化的過程中，自然令人回想起蘇聯在二十、三十年代的爭論和布哈林的著作，因此，對布哈林思想和政策進行再認識、再評價和研究，便具有重要的意義了。

### 布哈林主義是列寧主義的繼續

史達林本人和他所主持編寫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宣傳史達林是列寧最忠實的戰友和學生，他對列寧主義作出了最深刻的解說和理論上的論證。因此，史達林主義不是偶然的，而是列寧主義——布爾什維主義（Leninism-Bolshevism）的必然結果。

這種所謂「連續性論」（Continuity thesis）的論點是站不住腳的。事實上，自從蘇聯內戰結束，開始實行新經濟政策以來，真正繼承並豐富了列寧主義的是以布哈林為代表的一大批老布爾什維

克，而不是史達林。

布哈林是新經濟政策的捍衛者和解釋者，也是列寧晚期思想的捍衛者和解釋者。但是他並不是把列寧的思想原封不動地照搬，而是把這些思想的內容和含義向前推進了一步。關於前一點，已經為大家所公認，這裏不再論證。我將著重談談布哈林與列寧晚期思想的關係，因為它涉及當前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問題，特別是關於黨和國家機關的民主化這一非常重要的問題。

列寧在其生命的最後時期，由於認真地思考了當時蘇維埃國家的實際情況和存在的問題，總結了經驗教訓，不僅繼續堅持和發展了新經濟政策的思想，而且提出了關於社會主義的極其豐富的思想。列寧在《論合作制》一文中說，「以前我們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應該放在政治鬥爭、革命、奪取政權等等方面」，而現在「當國家政權已掌握在工人階級手裏，剝削者的政權已被推翻」以後，「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對社會主義的整個看法根本改變了」。

列寧對社會主義的整個看法的根本改變表現在：一、不再把社會主義和階級鬥爭緊密聯繫在一起。二、經濟建設的行動方法不再是革命的行動方法，而是「採取改良主義的、逐漸的、審慎迂迴的行動方法」<sup>⑩</sup>。「所謂改良主義式的辦法，就是不摧毀舊的社會經濟結構——商業、小經濟、小企業、資本主義，而是活躍商業、小企業、資本主義，審慎地逐漸地掌握他們，或者說，只是隨著它們活躍的程度能夠使它們受到國家的調節」<sup>⑪</sup>。三、合作社是使農民感到簡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改造方法。列寧認為「文明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會主義制度」<sup>⑫</sup>，而沒有強調無產階級專政。就改造的步子來說，不能過急過快。列寧說，首先要發展流通領域的合作社，這需要經過「整整一個歷史時代，在最好的情況下，我們度過這個時代也要一二十年」<sup>⑬</sup>。四、改造國家機關和文化革



命是兩個劃時代的主要任務。列寧在他的最後幾篇文章中，深感到經濟落後的國家，肅清封建專制主義遺毒和擺脫半亞細亞式的不文明是非常艱巨的任務。列寧對蘇維埃國家機關和黨的機關的狀況很不滿意，認為它臃腫、官僚主義嚴重，「簡直毫無用處的」。為此，列寧提出必須「對我們的政治制度實行一系列的改變」<sup>①</sup>，必須精簡機構，厲行節約，特別是反對官僚主義和加強廣大群眾的聯繫，接受工農的監督，防止權力過分集中，實質上提出了政治、經濟的改革和黨及國家機關民主化的問題。

布哈林正是繼承了列寧晚期這些光輝的思想。布哈林的思想是對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徹底否定，是對新經濟政策思想的發展。

與布哈林等老布爾什維克相反，史達林所繼承的是戰時共產主義中最極端的東西——強化階級鬥爭、國家全面干預、各種強制措施、極端政策等等。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深受史達林主義的影響，不了解和違背了列寧的晚期思想，用強制的辦法急於向社會主義甚至向共產主義過渡，從而備遭曲折和失誤。直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國共產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才批判了「兩個凡是」的方針，放棄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並把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一九八七年在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上，第一次肯定中國尚處於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又採取一系列同列寧晚期思想的精神相一致的措施，這樣就開闢出一條走向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道路，使經濟體制和民主制度有了發展。

當列寧在一九二二年下半年因病在哥爾克休養的時候，布哈林是唯一經常去看望列寧的政治局成員。他們之間存在看不尋常的誠摯友誼，一起談論政治問題、領導科學，談論列寧的最後幾篇文

章。列寧逝世不久，布哈林就把這些文章解釋為列寧的「政治遺囑」。<sup>15</sup>

從布哈林所堅持和所反對的就可以證明布哈林不僅是新經濟政策的解釋者和捍衛者，也是列寧晚期思想的解釋者和捍衛者，並有所發展。

布哈林堅持什麼，反對什麼，科恩 (Stephen F. Cohen) 作出了最好的概括。茲引述如下：他說，「布哈林成為對受意識形態狂熱激勵的壟斷性的國家權力的為所欲為提出批判的偉人——他對戰爭措施和大躍進，反對行政管理方面的胡作非為和不守法度，反對過分的集中統制和寄生性的官僚主義，反對好大喜功和疲沓作風」；「相反，布哈林主張實行使多數農民富裕、私有經濟繁榮、通過市場關係『長入社會主義』的漸進政策。他提倡以他所謂的『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為基礎的、奉行『我們的經濟是為消費者而存在，不是消費者為經濟而存在』的社會發展模式。他反對『成吉思汗』式的統制，主張實行一種上級的合理的靈活的目標同『下級的因地制宜的主動性』相結合的計劃經濟。……他一方面頌揚黨在政治上實行專政，但又強調『蘇維埃法律而非靠有名無實的申訴局節制的蘇維埃專斷』的作用。同理，對文化知識界，他也極力維護以『無為而治，自由競爭的原則』為基礎的政策，而不主張管得過死，捆住每個人的手脚」。<sup>16</sup>

布哈林主義是有別於史達林主義的另一條可供選擇的道路

認為史達林主義是列寧主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必然產物的另一論點是認為蘇聯歷史上不會有過可以取代史達林主義的可供選擇的道路 (no alternative to stalinism) (以下簡稱史達林主義的替

代物)。

多年來，在西方和蘇聯，大多數關於蘇聯歷史的專門著作，都基於這樣一個原理：在蘇聯歷史上不曾有過史達林主義的替代物。儘管西方的蘇維埃學研究者和官方的蘇聯學者的價值觀和目的是對立的，論證的方法和理由也有所不同。

在中國，有些學者也認為蘇聯這樣一個經濟文化落後的大國，經過戰火的嚴重破壞，又是處在資本主義包圍下的唯一社會主義國家，爲了應付可能爆發的戰爭，蘇聯必須以最快的速度把一些具有國防意義的工業搞上去。史達林通過高度集中的體制，採取強迫的手段，集中有限的資金、資源，發展急需的工業部門，用「自上而下的革命」的辦法搞工業化和集體化是必要的而且是成功的。儘管他有接受和鼓勵個人迷信、實行個人專制、肅反擴大化等錯誤，但這些是次要的。①

實際上，蘇聯社會主義經濟雖然有所發展，那是由於社會主義制度本身的生命力和蘇聯人民艱苦奮鬥的犧牲精神。而史達林主義只能造成重大的破壞和損失，阻礙經濟的發展，起了反面的作用。蘇聯的經濟建設成就不能歸功於史達林主義。雖然，史達林本人對蘇聯，特別是對於取得偉大的衛國戰爭勝利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也不能說在蘇聯歷史上不曾有過史達林主義的替代物。事實上在二十年代，布爾什維克內部各個派別公開辯論有關國家建設問題時就有許多與史達林的解決辦法不相同的主張。現在，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在進行適合於本國國情的改革，更加證明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確實存在著史達林主義的各種替代物。

不能說托洛茨基主義是史達林主義的替代物。特別在經濟建設和對農民的關係上，在二十年代，

托洛茨基提出用剝奪農民的辦法進行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要求超工業化（super industrialization），「擰緊螺絲」，單一的經濟計劃等等強迫軍事化措施。後來從一九二九年開始都被史達林暗暗地採用。

因此，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史達林主義開始形成時，最有力量的，特別是理論力量的替代物就是布哈林主義。布哈林所捍衛、闡述和發展的新經濟政策思想和列寧晚期思想，也是向史達林主義的形成和統治提出了預先的警告。

布哈林和一切理論家一樣，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難免有正確也有錯誤。我們決不是想把布哈林樹立成爲新的理論偶像，一如我們反對樹立任何理論偶像；也不想把布哈林主義生搬硬套地用在今天，一如我們反對任何教條主義。

我認爲，蘇聯正式爲布哈林和三十年代審訊的其他受害者平反的意義在於說明共產黨敢於面向真理，敢於揭露和驅除「社會主義形象中的黑暗的、不人道的方面」，從而有利於恢復社會主義的聲望。

由於史達林主義不僅發生在蘇聯，類似的理論也出現在好多國家，如匈牙利的拉科西主義，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均屬此類。因而，研究布哈林的思想，特別是研究他對極權國家的危險的認識和他對史達林主義產生的預先警告，對於消除史達林主義及類似理論產生的根源有著重要的意義。

布哈林對極權國家的危險的認識

布哈林曾被批評爲是動搖的知識分子，因爲他多次改變他的觀點。我認爲，任何觀點，特別是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觀點，由於缺乏實踐的經驗，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變革是必要的。列寧在十月革命以前，在一九一八年內戰以前，在戰時共產主義時期，在新經濟政策時期，以至在他的晚期，他的觀點有過多次改變。這正說明列寧在不斷總結經驗的基礎上，改進了和發展了他原先的認識。

布哈林也是這樣，不少研究布哈林的學者認爲一九二一—二四年可稱作布哈林的自我檢討時期，這是布哈林의思想和政策變革的分界線。當然並不意味著兩個階段之間沒有任何聯繫，而正是說明這個變化是同列寧關於新經濟政策의思想和列寧晚期思想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因此，我對於布哈林의思想和政策的論述，以他在一九二一—二四年自我檢討之後爲主，布哈林의思想是多方面的，我看重從以下三方面評述他對於極權國家的危險的認識，也就是他對於史達林主義的出現的預先警告在理論上和現實上的重要意義。這裏包括三個互相聯繫的方面：一、對於戰時共產主義的看法；二、對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的階級鬥爭的看法；三、對「新利維坦」的看法。

### 一、布哈林對戰時共產主義的看法

中國有一句成語：「馬上得天下，不能以馬上治之」。意思是說，用軍事暴力的辦法取得政權，但不能用軍事暴力的辦法來治理國家。這原是自明的道理，但是共產黨領導的國家，其體制往往脫胎於革命戰爭年代，特別在史達林主義影響下，不能擺脫軍事辦法的影響從而造成失誤，乃至產生災難性的後果。

在中國，我們經常使用軍事術語和軍事辦法於建設，如說政治戰線、經濟戰線、思想戰線。基本建設要集中力量打殲滅戰；文化大革命的時期更是如此——實行「全面專政」、「大批判開路」，把階級鬥爭推向極端，並把工人、農民、學生、教師、機關工作人員、一直到街道居民都按軍隊編制組織起來。一九六七年毛澤東派人民解放軍到各地方，各單位執行「三支兩軍」任務（派人民解放軍執行「三支兩軍」即支左、支右、支農、軍管、軍訓）。這種戰時措施使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生活都陷於不正常，帶來重大的破壞。

蘇聯內戰的經驗對於日後布爾什維克建設社會主義的思想有重大的影響。如何看待這個戰時傳統是列寧及其追隨者布哈林與史達林的分歧的一個出發點。

列寧在一九二一年四月才開始使用「戰時共產主義」一詞並加上了引號<sup>⑤</sup>。這說明所謂「戰時共產主義」的那種極端主義的、強制性的和軍事化的布爾什維克政策，在開始時只不過是爲了取得戰爭的勝利而進行的戰時管制和對於有限的人力、物力、財力的資源的動員手段而已，實際上同建設社會主義和建設共產主義無關。後來，由於內戰的延長，黨的領導人才賦予它以建設社會主義乃至直接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意義，因而形成爲一種意識形態。

匈牙利學者拉茲洛·薩穆利（László Szamuely）曾給「戰時共產主義」的基本原則作出了幾條概括<sup>⑥</sup>：一、最大限度地擴大國家所有制和國家的直接權力；二、勞動力的強制分配、勞動力的「軍事化」；三、經濟活動（生產、貿易、分配）的高度集中管理；四、分配中的階級原則和社會原則，在分配中平均主義占統治地位；五、經濟生活的「實物化」，商品和貨幣關係的廢除，實行餘糧收集制，停止城鄉交換，取消自由市場；六、建設和管理社會主義經濟的主要工具是暴力，即國家

的強制。

戰時共產主義取得了內戰的勝利並且已經形成了一種意識形態。內戰結束以後，如何看待戰時共產主義引起了激烈的論戰，其傳統有著深遠的影響。從薩穆利所概括的戰時共產主義的基本特徵中，我們不難看到史達林主義的影子。

列寧對戰時共產主義作為建設社會主義之路則逐步予以否定。

他於一九二一年在《論糧食稅》的報告中指出：「戰時共產主義」是戰爭和經濟破壞迫使我們實行的。它不是也不能是適應無產階級經濟任務的政策，它是一種臨時辦法」<sup>21</sup>。他也指出戰時共產主義「在禁止地方流轉方面走得太遠了。……是一種錯誤」<sup>22</sup>。他還指出從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〇年那一時期認為一旦有了政權，就可能「直接過渡到共產主義的生產和分配」<sup>23</sup>。這當然也是否定戰時共產主義的政策。他明確地說「戰時共產主義」是一種「用『衝擊』的辦法，即用簡捷、迅速、直接的辦法實行社會主義生產和分配的原則的嘗試已經失敗了」<sup>24</sup>。因此，列寧很明確地決定用新經濟政策來代替它，並認為從一九二一年春開始，蘇維埃經濟政策已進入第二個發展過程。<sup>25</sup>

布哈林在內戰時期也是個「戰時共產主義」的熱烈擁護者。一個具體的例子就是他在《過渡時期經濟學》第十章十分強調「超經濟」的強制。但是在新經濟政策實施以後，他間接批評他在這本書中對暴力的擁護時，指出「超經濟的強制」只限於革命的破壞時期；一旦舊制度被推翻，它就失去了「它十分之九的意義」，建設時期應該是和平的<sup>26</sup>。一九二一年八月，他承認戰時共產主義的政策在軍事上是必要的，但是它們同經濟發展是不相容的<sup>27</sup>。他還認為在戰爭時期，蘇維埃國家體系具有軍事無產階級專政的性質，生產屬於軍事化生產，但是，戰爭轉化為和平，經濟上的尖銳危機

過去之後不再需要極端的經濟管理形式。「蘇維埃政權的形式必須在逐漸消除和消滅戰時共產主義時期的殘餘的意義上予以改變」。<sup>(27)</sup>

隨着布哈林對新經濟政策理解的深入，他對戰時共產主義和他以前在內戰時期企圖通過無產階級的高壓統治來改造經濟和社會的想法日益採取批判的態度。

史達林沒有對戰時共產主義傳統進行任何深入的反思，反而得出了他的以片面發展重工業、強迫集體化和大規模恐怖鎮壓為主要內容的「自上而下的革命」的結論。布哈林則從「戰時共產主義」的經驗中得出了以下的重要見解：反對戰時共產主義的極端主義；階級鬥爭變得緩和而且主要表現在市場關係上；工業只有在發展農業的基礎上才能得到發展；強調國內和平，與農民建立良好合作關係，反對無產階級的強制和無限制的國家化，擔心黨和國家權力的過分集中會帶來不良後果。

## 二、布哈林對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的階級鬥爭的看法

對於資本主義社會裏的階級鬥爭和內戰時期的階級鬥爭，是沒有什麼爭論的。問題在於：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鎮壓了剝削階級反抗後，並進入和平建設時期的條件下，階級鬥爭與過去有什麼重要的區別？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階級鬥爭的主要特點和發展趨勢是什麼？以及由此引出的問題，無產階級政黨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中，對於農民應遵循什麼路線？最終將涉及對極權國家的看法。

對以上問題的不同看法成爲蘇聯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爭論的一個重要問題。爭論的結果有着



深遠的影響，不僅影響蘇聯而且影響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包括中國。

在蘇聯關於這個問題的爭論中，勝利者是史達林。他使用慣用的手法把布哈林的觀點加以歪曲，無限上綱，給他扣上「階級鬥爭熄滅論」和「和平長入社會主義論」兩頂大帽子，予以批判和定罪。史達林把自己的「階級鬥爭隨著社會主義的進展而愈來愈尖銳化」的論點奉為官方觀點。他說：「我們的進展愈大，勝利愈多，被擊潰了的剝削階級殘餘也會愈加凶惡。他們愈要採用更尖銳的鬥爭形式，他們愈要危害蘇維埃國家，他們愈要抓緊最絕望的鬥爭手段來作最後的掙扎」。<sup>②</sup>

這個論點成爲史達林主義的主要內容——自上而下的革命、大規模鎮壓以至最後形成極權主義政體——的理論基礎。而這個理論的三個基本依據<sup>③</sup>，經過歷史的證明，完全不符合事實。

史達林關於階級鬥爭愈來愈尖銳的論點，過去長期爲各國共產黨所接受，影響所及，不僅使社會主義國家的制度普遍採取了史達林模式，而且出現了五十年代初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一系列冤案，如匈牙利的拉伊克案件、捷克斯洛伐克的斯蘭斯基案件等，給各社會主義國家造成巨大損失。

在中國，在六十年代也出現了這種理論。毛澤東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理論」，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定範圍內存在的階級鬥爭擴大和絕對化，發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以後提出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仍然是我們社會的主要矛盾的觀點，進一步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資產階級都將存在和企圖復辟，並成爲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根源<sup>④</sup>。到一九六六年，毛澤東又提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他的主要論點是：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裏。黨內走

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過去的各種鬥爭都不能解決問題，只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這實質上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以後還要進行多次<sup>①</sup>。這個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的實際。但是與史達林一九三七年《論黨的工作缺點和消滅托洛茨基兩面派及其他兩面派的辦法》的報告中所講的「三個基本事實」<sup>②</sup>卻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毛澤東的這些論點成爲他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基礎。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在中國這塊廣闊的土地上到處喧鬧著階級鬥爭，用階級鬥爭代替了一切。所謂「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不鬥則退，不鬥則修，不鬥則垮」，「中國有八億人口，不鬥行嗎」等口號，都是這時候出來的。廣大黨內外的幹部和群眾遭受了批鬥和迫害，整個中國陷於沉重的災難之中。

因此，澄清這些問題，使布哈林關於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的階級鬥爭理論恢復本來面目，批判史達林的階級鬥爭愈來愈尖銳的論點，具有理論上和政治上的重大意義。

布哈林的理論決不是史達林所強加給他的什麼「階級鬥爭熄滅論」和「和平長入社會主義論」。《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強加給布哈林的所謂「階級鬥爭熄滅論」是這樣的：「說社會主義在其與資本主義成分鬥爭中獲得的成功愈多，階級鬥爭也就會愈緩和，說階級鬥爭很快就會完全熄滅下去，階級敵人將不經過抵抗而讓出自己的一切陣地；說因此根本就用不著實行進攻富農」。<sup>③</sup>

布哈林根本沒有提出過這種所謂「階級鬥爭熄滅論」，布哈林不但在一九二一—二四年自我檢討以前沒有否認階級鬥爭，就是在自我檢討以後，也沒有否認。一九二三年十月他在《對反對派經濟

綱領的批判」一文中說：「如果說無產階級專政是反映整個社會統一的某種『階級合作』的外殼，那麼，這決不意味著階級鬥爭的停止，而是階級鬥爭採取了另一種形式，另一方面，這種階級鬥爭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階級鬥爭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發展趨勢（因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當整個社會還沒有分裂和沒有崩潰的時候，階級鬥爭不斷尖銳化，而在順利地向社會主義前進的條件下，到了一定時期就開始『消亡』）」<sup>34</sup>。

他一九二五年在《到社會主義之路和工農聯盟》一文中說：「我們知道得很清楚，階級鬥爭不會立即停止和消亡，而會持續很長很長的時期，直到一般的階級劃分最終消失為止。不過，現在我們已經看到，關於階級鬥爭的主要途徑的問題以及關於階級鬥爭的形式問題，不可避免地正在發生變化，……在資本主義制度範圍內工人階級政黨是國內戰爭的政黨，一旦工人階級依靠廣大農民階層取得了政權，事情就倒過來了。既然資產階級專政已被打碎，既然它已被無產階級專政所取代，那麼工人階級的任務就是鞏固這一專政、保護它不受任何侵犯。在這種條件下工人階級政黨就成為國內和平的政黨，這就是說，它要求以前占統治地位的各階級、階層和集團服從工人階級；它要求它們保持國內和平」<sup>35</sup>。

布哈林一九二七年在《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建設時期》一文中比較集中地談到過渡時期階級鬥爭的規律，他說：「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基本路線，是矛盾縮小和最後消亡的路線。但是，這決不排除這些矛盾在一定發展時期內的尖銳化。……就是在『和平』時期，也不排斥階級對抗的尖銳化」<sup>36</sup>。

概括起來，布哈林的基本觀點是，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不是階級鬥爭的停止，而是採取

了另一種形式，即要求保持國內和平以利於建設，階級鬥爭的發展趨勢是矛盾的縮小和最後「消亡」，但這個過程是漸進的和排斥一定時期的尖銳化。他確實具有階級鬥爭「愈來愈溫和」的論點，但這不但是事實而且是和列寧一致的。<sup>37</sup>

至於「長入社會主義」的問題，布哈林確實有過這個觀點。布哈林在一九二二年（在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上關於綱領問題的報告）中說：「在修正主義的提法中，人們對長入社會主義的這個問題談得很多，修正主義的觀點認為，資本主義將長入社會主義。我們可以說，我們僅僅通過法令，通過純粹暴力措施不可能完成自己的任務；這是一個長時期的有機的過程，嚴格地說，是真正長入社會主義的過程。但是，我們和修正主義者之間的區別，就在於這種長入從何時開始。修正主義者根本不要任何革命，他們認為，這種長入的過程在資本主義內部就已經開始了。我們認為，這個過程是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之後開始的。無產階級應當摧毀舊的資產階級國家，奪取政權，並且利用這個槓桿來改變經濟關係。在這裏我們面臨著一個很長的發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社會主義的生產和分配形式獲得愈來愈大的基礎，而資本主義經濟的一切殘餘將逐漸被排擠出去，直到資本主義社會被完全改造成社會主義社會為止」。<sup>38</sup>

這裏，布哈林很明確地把他的「長入社會主義」的論點和修正主義者區別開來。他所說的「長入」有兩層意思。一層意思是說，過渡時期向社會主義發展是一個「長時期的有機的過程」，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而不是「通過純粹暴力措施」；另一層意思是說「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將不經過任何革命而轉入共產主義」<sup>39</sup>。他還經常重複這樣一句話「不需要進行第三次革命」。這裏布哈林講的「革命」當然指的是社會革命，即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革命。

實踐證明，布哈林的論點是正確的。史達林否定了這個觀點，帶來了史達林主義。毛澤東否定了這個觀點，明確提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在共產黨掌握政權，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進行「政治大革命」，其結果只能是造成混亂和破壞。

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所謂長入社會主義的問題，實際上是講工人和農民的關係，也就是對農民應該進行說服教育、執行自願原則、逐步改造、通過合作社把個體農民納入集體所有制的軌道，而不能採用暴力、實行剝奪的辦法。布哈林說：「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決不能對農民採取大規模的強制手段」，對資產階級和富農實行和平經濟改造，用經濟鬥爭的辦法把他們排擠出去，以至最後消滅這個剝削階級，而不能採取革命初期的暴力鎮壓和剝奪。布哈林的缺點是對當時蘇聯國內富農的反抗估計不足。總的說來，布哈林相信和平的辦法，而史達林只相信強制。

實踐證明，史達林的「自上而下的革命」給蘇聯帶來重大的人力、物力損失。而在中國，在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初期，由於正確執行自願互利，逐步前進的方針，而不是採取暴力，鎮壓和剝奪的手段，比較順利地實現了改造，沒有遭到像蘇聯集體化過程中的巨大損失，而且生產有所增長。但是在人民公社化過程中，由於違背了這些原則，打擊了農民的積極性，使生產遭到巨大的損失。終於不得不在二十餘年後取消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即包產到戶，使農業生產得到恢復和較大的發展。

這就是為布哈林平反在階級鬥爭問題上的理論上和政治上的意義。

### 三、布哈林對「新利維坦」的看法

「利維坦」(Leviathan, 極權國家) 是布哈林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研究帝國主義國家時, 用來描繪帝國主義國家增強其權力並擴展其職能的現象。

他在《世界經濟和帝國主義》一書中說：「金融資本把幾乎所有這各部分統一在許多集中化的組織裏，結成一個『軍事反動集團』。『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思潮已經被現代帝國主義公開的君主制趨向所取代，而現代帝國主義歷來是需要獨裁的。……『強權』，已經成爲現代資產階級的理想。」「現代國家也是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發展的最高的、囊括一切的組織形式，因此它擁有驚人的巨大權力。」<sup>40</sup>

他認爲帝國主義最驚人的特點就是國家新的干預作用，國家通過對整個經濟的調節和「軍國主義化」介入社會生活的每一細節。他在《帝國主義強盜國家》中說：「國家變得愈來愈龐大。……這樣就逐漸形成一個單一的無所不包的組織，即現代帝國主義強盜國家這一占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的萬能組織，它具有無數的職能和巨大的權力，既有精神權力（各種愚弄手段：宗教、出版物、學校等等）又有物質權力（警察、軍隊）。……這就是當代的怪物，當代的利維坦國家。」<sup>41</sup> 他還指出：「包羅一切的國家組織生活——不是社會生活，而是國家生活，開始提到了首位。霍布斯老人在他的著作《利維坦》中說，沒有一種權力可以和國家權力相比，但是他的『利維坦』同金融資本的國家機構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巨大的力量相比，不過是一隻小狗」。<sup>42</sup>

布哈林的「新利維坦」理論使他預感到歐洲政治生活中極權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來臨的危險性，使他成爲第一個深入分析和譴責法西斯主義的人。猶如阿克頓的名言：「絕對權力絕對腐蝕人。」任何具有絕對權力的國家都具有「新利維坦」的特點和弊端。到二十年代以後，布哈林使用這一帶有諷刺性的詞來表示對事實上史達林統治下的蘇維埃國家的變形和蛻化的擔心。這裏，我將著重分析後一個問題，即布哈林對在蘇聯這種社會主義制度下，國家具有絕對權力的危險性的認識。

美國芝加哥大學鄒謙教授在北京的一次報告中說，全能主義 (totalism)——指國家對社會和人民的全面干預——在一定時期，如戰爭時期是必要的，也是可以容忍的，但它是危險的，爲期過長，超過了一定限度，就要變成極權主義 (totalitarianism)。在社會主義國家出現的「新利維坦」現象與此有關。

蘇維埃俄國在國內戰爭時期，由於供應的極端困難和戰爭的殘酷，實行軍事無產階級專政，而這種無產階級專政又是由黨乃至少數領袖們執行，大量使用暴力和強制手段，實行及類似「全能主義」的國家干預。當時所有的布爾什維克領袖們對此並無異議。

內戰停止後，列寧在一九二二年就反對一種由少數寡頭決定一切的越來越極權化和官僚化的傾向的出現，反對中央過分集權和領導個人集權，反對黨干涉國家事務，批判採用戰時共產主義相聯繫的方法<sup>⑤</sup>。布哈林在一九二五年明確提出要求取消戰時共產主義時期的軍事無產階級專政制度，以革命法制取代行政專斷，以正確安排管理事務代替強加在工人階級和農民身上的徵收和徵用的辦法，以徹底地完全地和無條件地轉向說服的方法代替命令和指示的方法，更加堅決地吸引廣大勞動居民階層參與國家的事務。<sup>⑥</sup>

列寧逝世後，黨和國家的權力日益集中在史達林的手中。特別在一九二七—二八年的穀物危機後，史達林強調爲了徵集穀物，不排除採用必要的行政手段。一九二八年開始就使用「西伯利亞方法」(Siberian Method) 徵集穀物。與布哈林的經濟漸進主義的方案相反，蘇俄著手跳躍到與戰時共產主義類似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和強迫集體化<sup>45</sup>。於是，一個個人崇拜，經濟和政治管理方面的僵硬的中央集權形式<sup>46</sup>的史達林主義就此形成。

布哈林在二十年代末期就對史達林主義，基本上就是「新利維坦」提出預先的警告。但是，由於論述的分散和經常採用伊索寓言式的語言，難以明確列舉他關於「新利維坦」的論點。概括起來，大致有以下幾方面。

——無限制的國有化和強迫集體化將造成中央集權的經濟統制。布哈林認爲，蘇聯過早地沒收小規模生產者的經濟，結果會產生一個「龐大的行政機構」，而強迫集體化，由於下達指令性指標和實行義務交售制，實際上把農民也納入國家的經濟軌道。這就有可能出現徹底的中央集權的經濟統治和隨之而來的干預過多的現象。而徹底的中央集權的經濟統治類似資本主義中的絕對壟斷。「在絕對壟斷的情況下，很容易僵化，很容易發展官僚主義」<sup>47</sup>。至於集中和過分集中將易於出現「新利維坦」類型的國家。

——要防止黨和國家機關「官僚主義化」的危險，列寧晚期著作對國家和黨的官僚機構有越來越清醒的認識，他的最後幾封信件和幾篇文章對「令人討厭的官僚化的現實」提出憂心忡忡的警告，布哈林在告誡人們提防中央集權的經濟統治的危險的同時，還擔心官僚主義的滋長。他認爲國家過早地消滅小生產者經濟和在現代工業發展中盲目追求企業規模愈大愈好，顯示出龐大行政機構的不



可避免，也產生了官僚化的現象和官僚主義的弊端。集權制變成了官僚集權制。「官僚主義化」，必然造成機構臃腫、形式主義，文牘主義、經營不善、大量浪費、工作中的關係顛倒混亂、經濟呆滯等現象，甚至社會蛻化現象<sup>48</sup>。而且官僚主義必然脫離群眾，脫離實際，使行政長官易於趨向一個自我孤立的特權階層。布哈林在〈有組織的經營不善〉的理論<sup>49</sup>一文中所批評的雖然講的是西方，言外之意也針對國內的問題。

——要防止沙俄時期「落後性」的影響。沙皇俄國具有農奴制殘餘，沙俄國家組織又具有「亞細亞專制制度」的特點。革命勝利後它們的影響還是很深的。在這樣的國家裏，史達林強調要不斷地「強化國家」，而布哈林卻擔心由於沙俄時期的「落後性」的因素與現代化國家結合在一起，蘇聯的社會主義可能成爲一種「落後的社會主義」，導致用一種「可怕的方法」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他看到了一種陰暗的前景：強制執行集體化和「超工業化以及隨之而來的史達林關於階級鬥爭愈來愈尖銳化的理論，這樣做的結果就會是警察國家」<sup>49</sup>。布哈林強調要建立社會主義法制，他所關心的是在確保社會日益發展過程中消滅國家的權力。

——要防止由於強化國家和強化無產階級專政、強調高度集中統一的領導，以致最後形成黨政合一，把黨和國家的權力集中在一個人身上。布哈林擔心出現這樣的局面：形成把社會中的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空前地融合爲一體的政權，一切組織都帶有「國家化」的色彩，盛行國家崇拜。他以為這樣的政權即使是蘇維埃國家也有會濫用權力和從事剝削的潛在能力的問題。而戰時實行的無產階級專政即黨的專政，甚至是少數領袖的專政的作法，若不加以變更，使這種專政無產階級化和民主化，那就會形成黨政合一，國家崇拜就會變成對領袖的個人崇拜，布哈林以爲這裏包含著「無產

階級國家和無產階級政黨蜕化的危險」。<sup>50</sup>

列寧在一九二二年就提出黨政分開的思想。他說：「必須十分明確地劃分黨（及其中央）和蘇維埃政權的職權……黨的任務則是對所有國家機關的工作進行總的領導，而不是像目前那樣進行過份頻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瑣碎的干涉。」<sup>51</sup>列寧反對將人民委員會的行政工作搬到政治局討論的作法，並對過分集權趨勢有足夠的警惕。他說：「在這一點上我也有很大的過錯，因為人民委員會和政治局之間，很多事都是通過我個人來聯繫的。一旦我離開工作，兩個輪子立刻就轉動了。」<sup>52</sup>但是列寧的意見沒有被執行。黨政，後來還有軍事，大權越來越集中於史達林一身。布哈林在一九二八年已經看出了蘇聯黨政合一的危險性，他在與加米涅夫的談話中說：毛病的根源就是黨政合一<sup>53</sup>，本來爲了依靠黨領導下的群眾來制止國家的危險傾向，黨不應該與政府混合，以避免黨與政府及其官僚機構合而爲一。布哈林一九二八年說：「在我們龐大的機關毛孔中也有官僚主義蜕化分子。」<sup>54</sup>他擔心在這些官僚主義蜕化分子中會出現一些以「壟斷」權威和特權爲基礎的新的統治階層。

針對以上問題，布哈林說：「我們是過分集中了，我們必須自問：我們是否應當朝著列寧的公社國家的方向採取一些步驟？」<sup>55</sup>後來，他更具體地說：「歸根到底，從遠景來看，我們的國家機關是這樣一種組織，往後它應當包括千百萬人，包括全體勞動者，成爲向公社國家過渡的一定階段，可惜我們距離這種公社國家還很遠很遠。」<sup>56</sup>「公社國家」當然還是一種空想，布哈林在這裏表達的是列寧晚期關於黨和國家機關民主化和無產階級專政民主化的思想。

在一個近乎全能主義的政治專政下，革命逐漸喪失了社會主義的基本內容，特別是社會主義的

政治思想和民主制度。在當時，不僅他的思想，也就是列寧晚期思想不能推行，布哈林本人也被誣陷以至悲慘地被處決。黨政軍大權集於一身的史達林大搞個人崇拜，總攬一切，濫用權力，破壞法制，終於出現了史達林主義和高度集權的蘇聯政權模式，實即史達林模式。法國著名歷史學家讓·艾倫斯坦在他的著作《史達林現象史》中說：「無所不管的國家同無所不管的黨合在一起，而無所不管的黨又同無所不管的史達林合在一起，這就出現了『史達林現象』。」真是一語道破。

史達林模式先後被戰後建立起來的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所承襲和搬用，布哈林所擔心的「新利維坦」現象不同程度地的出現，不但使社會主義優越性不能發揮，而且歷經曲折、失誤，乃至發生嚴重的危機。

在中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的十多年中，在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日益發展。個人專斷作風逐步損害黨的民主集中制，個人崇拜現象也逐步發展。在舊的體制中，黨中央未能糾正這些錯誤。越來越多和越來越過火的以左傾錯誤為主要標誌的運動、批判和鬥爭波及到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它使黨的工作在指導方針上有過嚴重的失誤，經歷了曲折和巨大的損失。這種愈來愈嚴重的左的偏差，最後發展成為「文化大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中，曾提出所謂「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把無產階級專政落實到每一個基層」，無法無天，法制蕩然，廣大的幹部和群眾甚至高級幹部受到批鬥和迫害。以「小紅書」（《毛主席語錄》）作為判斷一切是非的標準。這種「新利維坦」的情況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特別是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逐步地深入總結經驗教訓，開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鄧小平在一九八〇年說：「從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幹部制度方面來說，

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現象，家長制現象，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sup>57</sup>。又說：「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或少數人手裏，……必然造成官僚主義，必然要犯各種錯誤，必然要損害各級黨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制、個人分工負責制等等。」<sup>58</sup>趙紫陽在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報告中還指出：「長期形成的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問題還沒有從根本上解決。……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首先是黨政分開。」<sup>59</sup>所以，我們政治改革就是要克服黨政不分，以黨代政，權力過分集中，官僚主義嚴重，和封建專制主義的影響，通過改革使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一步一步走向制度化、法律化，防止「文化大革命」重演。改革的長遠目標，是開放民主、法制完備、富有效率，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徹底消除「新利維坦」現象。

今天蘇聯在戈巴契夫的領導下，進行全面改革，理所當然地把矛頭針對著「個人崇拜、三〇年代形成的行政命令管理體系、官僚主義的、教條主義的和唯意志論的反常現象、專斷以及七〇年代末、八〇年代初導致停滯無原則性和阻礙現象」<sup>60</sup>。戈巴契夫在慶祝十月革命七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說：「社會主義民主是改革的靈魂，民主化的程度如何將決定改革的成敗，也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將決定整個社會主義的未來。」<sup>61</sup>

改革和民主化是今天社會主義國家的主流。它能夠成功，關鍵在於消除產生「新利維坦」的根源。具體地說，在蘇聯就要消滅產生史達林主義的根源，在中國就要消除產生「文化大革命」的根源。布哈林對於「新利維坦」的看法雖然零碎而不全面，對它進行研究並有所發展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 註釋

- ① 見布哈林：〈致未來一代黨的領導人的信〉。
- ② Stephen F. Cohen: *Rethinking the Soviet Experi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85。
- ③ Ken Coates: *The Case of Nikolai Bukharin Spokesman* (1978) p.91。
- ④ 同上，九三頁。
- ⑤ N.I. Bukharin, *Selected Writings on the State and the Transition Socialism*, edited by Richard B. Day. Spokesman (1982) Stephen F. Cohen "Forward" p.xx1。
- ⑥ 戈巴契夫：《十月革命與改革：革命在繼續》。
- ⑦ 美聯社，斯德哥爾摩電，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 ⑧ 塔斯社，莫斯科二月五日電。
- ⑨ 《列寧選集》，中文版，第四卷，六八七頁。
- ⑩ 同上，五七四頁。
- ⑪ 同上，五七五頁。
- ⑫ 同上，六八四頁。
- ⑬ 同上。
- ⑭ 《列寧全集》，中文第一版，第三六卷，六一五頁。
- ⑮ 斯蒂芬·F·科恩：《布哈林和布爾什維克革命》，中文版，二二一、二二三頁。

- ⑯ Stephen F. Cohen, *Rethinking the Soviet Experience*, p. 77。
- ⑰ 參閱《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這兩篇文章對史達林的評價目前仍可代表官方的看法。
- ⑱ 《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第四一卷，二一一頁。
- ⑲ 薩穆利：《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最初模式》中文本，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第二章。
- ⑳ 《列寧選集》，中文版，第四卷，五一—七頁。
- ㉑ 《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第四一卷，五六頁。
- ㉒ 《列寧全集》，中文第一版，第三三卷，四三頁。
- ㉓ 同上，七〇頁。
- ㉔ 同上，六四頁。
- ㉕ 斯蒂芬·F·科恩：《布哈林和布爾什維克革命》中文版，二〇四頁。
- ㉖ 同上，二〇四頁。
- ㉗ 《到社會主義之路和工農聯盟》，《布哈林文選》（上冊）農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四五—三五頁。
- ㉘ 《論黨的工作缺點和消滅托洛茨基兩面派的辦法》，《史達林文選》中文版，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一二九頁。
- ㉙ 同上，一一二頁。
- ㉚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二〇頁。
- ㉛ 同上，二二頁。
- ㉜ 《史達林文選》中文版，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一一二頁。

- 36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莫斯科外文出版局（一九四八）中文版，三六一頁。
- 37 《布哈林文選》上冊，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二九五頁。
- 38 同上，四三〇頁。
- 39 《布哈林文選》中冊，二〇三頁。
- 40 見《論糧食稅》的幾個提綱，《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第四一卷，三二九頁。
- 41 《布哈林文選》上冊，六三頁。
- 42 《共產主義ABC》，三聯書店版（一九八二）七一頁。
- 43 布哈林：《世界經濟和帝國主義》，中國社科出版社（一九八三）一〇一頁。
- 44 《布哈林文選》下冊，二四八—二四九頁。
- 45 布哈林：《過渡時期經濟學》，三聯（一九八一），一一頁。
- 46 《列寧全集》，中文第一版，第三三卷，二二一、二七一頁。
- 47 《布哈林文選》上冊，四五二、四五四頁。
- 48 N.I. Bukharin, *Selected Writings on the State and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edited by Richard B. Day, Spokesman (1981) P.298.
- 49 戈巴契夫在二月中央全會上的報告，新華社，莫斯科二月十八日電（一九八八）。
- 50 《布哈林文選》下冊，四二—四三頁。
- 51 同上，四二—四三頁。
- 52 《一九二八年布哈林同加米涅夫的會晤》，《論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貴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一〇一頁。

- 50 《布哈林文選》，上冊，五八頁。
- 51 《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第四三卷，六四頁。
- 52 同上，一一一頁。
- 53 Istituto Gramsci - Bucharin Tra Rivoluzione e Riforme, (1981) P.149。
- 54 《布哈林文選》中冊，二九九頁。
- 55 同上，二九八頁。
- 56 同上，三五六頁。
- 57 〈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鄧小平文選》，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二八八頁。
- 58 同上，二八八頁。
- 59 趙紫陽：《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三六頁。
- 60 戈巴契夫在慶祝十月革命七〇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十月革命與改革：革命在繼續》。
- 61 戈巴契夫在二月蘇共中央全會上的報告，新華社，莫斯科二月十八日電（一九八八）。



## 誰有權判決誰是馬克思主義者？<sup>①</sup>

——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十週年理論討論會上的發言

我來參加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十週年理論討論會，因為我是三中全會精神的堅決擁護者和宣傳者，我還爲了實現理論界的團結。

### 關於汲取教訓和理論界的團結

十年前，我是參加理論務虛會<sup>②</sup>的。那次會是建國以來思想最解放、最活躍的一次會，今天被普遍接受的某些提法如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等就是那次會上提出來的。而小組長傳達說，領導小組強調討論要實一些，不要務虛，並要求「不要糾纏過去」。其實，歷史不應該割斷，也是割不斷的。總結過去是爲了汲取教訓，更好地走向未來。爲什麼不願意提十年前的理論務虛會呢？爲什麼不要務虛呢？不務虛，不總結三中全會以前，特別是三中全會以來的理論工作的經驗教訓，怎麼能前進？雙百方針在每次有關理論工作的會上都講，但經常違背，始終不能貫徹。在這方面的理論與實際的脫節，算得上是一個痼疾。新聞發布會上還說，對「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有

不同意見，不要糾纏過去。我認爲，「清污」和「反自由化」是十年來理論界最重大的問題，很多同志都要求澄清。其中涉及許多理論問題和學術問題，如人道主義、如異化、如布哈林、如社會主義發展的階段論，以及如反對封建主義遺毒等等。這些都是學術理論觀點問題，但是當時不但用一家之言，甚至用一人之言來定了學術理論的是非，而且還因學術理論問題而打了政治棍子，對許多學者做了不公正的政治處分。這是冤案，不是一句「不要糾纏過去」所能了結的。現在在黨的理論討論會上正應該把這些理論學術問題討論清楚，並就因學術理論問題而打政治棍子的痼疾總結經驗教訓。否則不利於學術自由的開展，不利於理論的向前發展，也不利於理論界的團結。

至於團結，我到會上一看，當然有不少思想解放的同志，也來了不少年輕的理論工作者，但是絕大多數在十年前理論務虛會上和十年間思想解放的先驅以及新湧現的青年學者沒有能夠出席。個中情況，我因回國不久，不大清楚。但間接聽了新聞發布會的講話，我甚爲驚異。發布新聞者說：「特邀代表五十人，……特別還包括理論學術上有不同觀點的同志，你們看看名單就知道了。」我又看到一份材料，關於特邀代表的說明中有這樣的話：「甚至曾經受到過批評和處理的同志。」我認爲這種說法及其指導思想是錯誤的。第一，理論學術上有不同觀點本來是正常的，是好事。是議論風生好？還是輿論一律好？是百家爭鳴好？還是定於一尊好？輿論尚且不應一律，理論難道應該要求一律嗎？一個國家如果理論一律，我看一定死氣沉沉了。今天我們開理論討論會，如果組織會議的指導思想原來要的是理論一律、學術觀點一律，不願意看到理論學術上有不同觀點，——很抱歉，我說這個話不是沒有根據的，因爲那份材料在說明評選論文時也說：「同時，在評選出的成果中，也包括了在理論學術上持不同觀點的論文。」好像允許在理論學術上持不同觀點的論文入選是

了不得的開恩！那不成笑了嗎？如果開理論討論會而只要求一種觀點，那麼我認爲這個會不如不開，開了也失去了意義，甚至有點辱沒了「理論討論會」這個名稱。又是「理論」，又是「討論」，卻認爲理論學術上有不同觀點是異端，這不是極大的諷刺嗎？

可是新聞發布會還是突出了這一點，再和「曾經受到過批評和處理的同志」的說法聯繫起來，這就出現第二個錯誤了。那就是，因理論學術上有不同意見而受到批評和處理，本身是違背雙方方針和學術自由的。新聞發布會還要讓大家看看名單！衆所周知，在這份特邀代表名單中，因「清污」和「反自由化」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有黎樹、於光遠和王若水。黎樹同志最近不幸逝世，我們深表哀悼。他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清污」以來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文件上又要邀請他，又要說他是受過批評和處理的，這已經夠令人寒心的了。而在他剛剛逝世，學人哀悼猶恐不及之時，新聞發布會竟還要教人看看名單，似乎唯恐人們不把他放入另冊。相煎如此之急，這難道是團結的態度嗎？這不是太殘酷了嗎？於光遠和王若水的理論觀點沒有錯，只不過不符合當時理論界領導人的口味罷了。退一萬步講，即使他們的學術觀點不對，因學術理論問題而受到處分，這種做法本身就是違背憲法關於學術自由的規定和違反百家爭鳴方針的。這次會議把他們以這樣的身份列爲特邀代表，他們不出席這個會是理所當然的了。個別理論界的領導人打着團結的招牌，行分裂理論界之實，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憤慨。

如果不敢面對現實，避免總結十年來的問題，不強調思想解放、理論創新，不是打破理論禁區，促進理論工作發展，而是步步設防，唯恐理論界越雷池一步。那便不符合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而是從三中全會的一個大倒退。

## 關於百家爭鳴

認真開展百家爭鳴，實行學術自由是學術理論界最關心的一個問題。我們必須以自我批評的精神，總結建國以來，特別是三中全會以來的教訓。

先講文革以前。雙百方針自從一九五六年提出以後，始終沒有認真實行。說這是「由於黨的指導思想上的『左』傾錯誤」固然是對的，但太抽象，不具體。我認爲，雙百方針之不能實行，主要表现在不尊重憲法所規定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也就是政治上的自由。憲法上沒有規定政治問題不能討論。按法學原則，凡是法律沒有規定不得實行的，實行就不算違法。如果認爲政治問題不能討論，任何鼓勵百家爭鳴的措施都無濟於事。事實正是如此，學術理論上的某些不同意見往往被某些領導人上升爲政治錯誤而給予處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鬥爭是一個鮮明的例子，幾乎黨內外的精英多被打倒。文革前，百家爭鳴的方針不能實行還在於以「階級鬥爭爲綱」的指導下，強調無產階級專政要落實到每一個基層，也包括思想理論界。於是掀起一個接著一個的運動，在各個領域大搞「學術大批判」。這種一擁而上、不容分說的「大批判」在文革中發展到極端，形成了文化專制主義。這種「大批判」完全違背學術自由的憲法規定和科學精神，給我們的理論、科學、文化造成了嚴重的破壞。據統計，我國建國以來自然科學界有三十四次「學術大批判」，沒有一次是對的。社會科學界遠不止此，不僅不少學者受到批判和處分，而且不少學科被扼殺，如心理學、政治學、社會學、乃至部分的法學。文件中必須寫明尊重憲法所規定的各種自由、政治問題可以討論，

還應制訂措施，使「學術大批判」的錯誤做法不致重複。

三中全會以來，百家爭鳴的方針比過去執行得較好。廣大知識分子汲取過去的教訓，掙脫精神枷鎖，增強獨立思考和辨別是非的能力。特別是由於文化專制主義、「學術大批判」、打棍子、戴帽子等等非常不得人心，於是跟隨權勢的指揮棒而轉的人大大減少，造成了百家爭鳴的客觀有利條件。但是，這十年來並不是一帆風順的。不叫運動的運動，不叫學術大批判的學術大批判還是有的。最大的兩次是「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些實質上還是「學術大批判」的翻版。實際上仍然是理論界少數領導人以黨的化身、以馬克思主義的純潔性自封，主觀判斷是非，憑藉行政的強制和「謊報軍情」，把不同的學術觀點說成是錯誤觀點（而他認為錯誤的，實際上往往是正確的）上綱為政治錯誤而給予處分。王若水的事件是一個明顯的例子。王若水提出人道主義和異化根本沒有錯誤，現在全世界進步人士都把人道主義看作社會主義的根本特徵之一；而異化，在中國、在現實社會主義國家無處不在。大家所深惡痛絕的種種腐敗現象和「官倒」特權之類不正是異化的典型嗎？退一萬步講，異化、人道主義，即使是錯誤的也是可以討論的學術問題。現在哪一個現實社會主義國家，哪一個共產黨不在討論這些問題？胡喬木卻認為這兩者是反對社會主義的。而胡喬木自己寫的《論人道主義和異化》卻宣布為教材。如果胡喬木以平等的地位，以理論界的一員參加討論，那麼其意見無論多麼尖銳，也是會受到歡迎的。但他卻宣布這兩個學術理論領域為禁區，並給王若水上綱為政治問題而一再給予處分，從撤職到勒令退黨，一次比一次升級。當然，胡喬木可以推託說是中紀委作出的決定。其實中紀委根本不應干預學術理論問題，而且當時中紀委的領導中，誰又懂人道主義和異化了？於光遠雖然沒有受到處分，但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中顧委組織了十

次所謂生活會，而且參加者並非都是中顧委成員，會上發言和一些做法無異於大批判，最後還給他定了十條錯誤。

奇怪的是，最近，個別領導人還說十年來沒有發生打棍子的事，說什麼要發生了人身迫害才算打棍子。照此說法，他不僅掩飾了十年來實質上的學術大批判，而且把文革前的許多學術大批判也都開脫了。其實，即使按照他的這種「苛刻」的標準，十年來也不是沒有這類事實存在的。大家想想，周揚同志何以一病至此？難道和一九八三年對他的不公正的批判沒有直接的關係嗎？倡導實事求是精神的三中全會已經過去十年，當此舉國紀念三中全會十週年之際，個別領導人居然不實事求是至於此極，怎能不叫理論界「心有餘悸」、「心有預悸」？

因此，我們應該以極大的熱情和充分的內容，來闡明應當保護理論工作者進行探索和創新的積極性，使他們有必要的自由度和安全感；應該充分闡明理論研究的探索如果得不到必要的保護，改革實踐的開拓就會受到極大的限制；應該保證堅決拋棄過去那種武斷粗暴，以勢壓人的「大批判」，而不應該相反地認為理論界是要以「反對打棍子」為藉口而堵塞批評。

### 關於馬克思主義

學術自由不能實現的原因之一是不能正確地認識馬克思主義。問題在於某些理論界的領導人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居，實際上用三、四十年代開始被簡單化、教條化、僵硬化和神聖化的對馬克思主義的看法來主觀地裁決是非。

一、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危機。應該坦率地承認當前馬克思主義處於「危機」，如果害怕「危機」一詞，用「處於轉折關頭」也無不可。實質上是要看到馬克思主義所處的嚴峻的現狀。由於長期以來馬克思主義被教條化和神聖化，受到權力的支持、滿足於教科書中那一套陳詞濫調、忽視研究新情況和新問題，其本身的活力、洞察力和批判力受到削弱。當代馬克思主義落後於現代資本主義和現代社會主義的現實，也落後於中國改革的現實。馬克思主義的某些觀念和信念已經在許多方面與現實發生矛盾，令人懷疑其是否有效。同時，馬克思主義也提不出有充分說服力的理論說明和足以應付挑戰的戰略措施，它作為一種以革命的方式改造世界的理論已無力向前發展。馬克思主義在我國和各國人民群眾乃至工人階級中失去了吸引力。

危機之所以存在，根本原因還在於過去左傾錯誤下理論工作的教條主義和主觀隨意性，抱住僵化的教條不放，既不能回答也不願乃至不許接觸現實發展中的新問題。更有甚者，往往唯上是從，把一些錯誤的理論觀點鼓吹為「新發展」、「里程碑」而無視其在實踐中造成的危害。這些都大大地敗壞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聲譽，從而使馬克思主義理論發生危機，並使人們對之產生冷淡。今天我們與其譴責別人不應對馬克思主義冷淡，何妨自己對危機進行深刻的反思，在反思和改革中重新振興馬克思主義。

二、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堅持和發展。在上述情況下，我們講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首先要強調發展。沒有發展談不上堅持。不宜採用三、四十年代的老提法：「馬克思主義是為實踐反覆證明了的科學真理」。難道馬克思主義已經窮盡真理了嗎？這樣提法，怎麼談得到發展？而且和十三大的說法不一致。十三大談到科學社會主義的提法是要拋棄帶有空想的因素、教條式理解和附加的錯誤

觀點。仍然帶有空想的因素實質上也就是說還沒有最終完成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沒有最終變成科學真理。應該根據十一屆三中全會、十二屆六中全會和十三大文件的精神，指出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研究的出發點和方法。它是隨著時代和實踐的發展而不斷發展的科學，它的真理性和它的論點哪些依然正確，哪些已經過時，哪些需要發展，都要在實踐中不斷接受檢驗，還要根據實踐的發展探索新情況、新問題，批判地吸收現代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的成果，得出新結論。只有堅持實踐、發展、創新，才能堅持馬克思主義。

三、關於馬克思主義內部和外部的不同學派。馬克思主義內部有沒有不同的學派，在學術領域中除馬克思主義之外，還有沒有其他學派，各學派之間能不能爭鳴？

根本問題是要承認馬克思主義的多元性。這不僅是理論的反映，也是具體實踐和對這種實踐的態度的反映，是反對史達林主義的大一統的法統思想和唯一模式的必然結果。馬克思本人的思想那樣博大精深，沒有人有權再像史達林那樣壟斷馬克思主義的全部思想，也沒有人有權裁決誰是誰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要承認馬克思主義內部有不同學派，學術領域除馬克思主義之外還有不同的學派。不能強迫學者接受馬克思主義而應該允許爭鳴，在爭鳴中追求真理。那種把與領導人意見不合的理論當作異端予以打擊的作法，不僅不科學，也是危險的。個人崇拜、個人專斷使我們吃盡了苦頭，也使馬克思主義停滯不前，乃至陷入危機。今後應該不再允許有這樣的情況出現了。

總之，要大力開展學術研究、繁榮學術、以理論指導和支持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必須反對一切思想上的偏見、官僚主義、宗派主義、日丹諾夫主義、文化專制主義，打破一切學術禁區。領導



人雖然肯定學術研究沒有禁區，但籠統的許諾我們已經聽得太多了，而事實上就是在目前，學術理論領域還是有許多禁區的。最近明文宣布的就有文化大革命不能寫、不能出版的問題，涉及領導人的報告文學要送審的問題。另外還有涉及黨史的一些問題、涉及國際共運史的一些問題、涉及國際關係的一些問題。過去宣布過不能探討、爭鳴而迄今沒有取消禁令的就有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農業社會主義問題、社會主義下的異化問題，……等等。對這些問題應該有所回答，回答應該具體。僅僅用「作為學術研究，沒有禁區」一句話，看來是不可能把那眾多的禁區一掃而光的。

我來參加會是出於團結的願望，我今天的發言也是為了團結。廣大理論工作者主流本來是團結的。問題在於過去理論界的個別領導人自封為馬克思主義者，排斥在理論學術上與他們有不同觀點的同志，按學術理論上的不同觀點，提高到政治上，把理論界劃分為哪些人是馬克思主義者，哪些人是非馬克思主義者，甚至哪些人是反馬克思主義者，人為地製造分裂，並且到處去做類似文化大革命中盛行的兩條路線鬥爭史那樣的報告。不安定團結的因素正在於這種做法，而不在於理論界存在在理論學術上的不同觀點。只有不斷清除這種不正當的做法，才能使理論界更加團結，才能使理論繁榮昌盛。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 註釋

① 本文係作者在「中共三中全會十週年理論討論會」上的發言。文題乃編輯本書時新加。

②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八日至四月三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理論工作務虛會。



	附錄



## 反社會主義反馬克思主義面目的大暴露

——評蘇紹智在海外的若干言論

馬理銘

去年六月北京地區平息反革命暴亂之後，海外極少數中國人追隨某些國際反動勢力，掀起反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鼓噪。其實他們就那麼幾個人，雜七雜八，沒有也絕不可能有什麼前途。但是既然他們提出了種種綱領、主張和觀點，把他們原來不便講明的話講了出來，這倒是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看清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實質，可以幫助我們在兩種根本對立的政治思想、政治主張的交鋒和分野十分明朗的背景下來思考我們應當堅持什麼，反對什麼，同什麼劃清界限、向什麼方向前進。

在這片鼓噪聲中，蘇紹智（原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研究員）是一個值得注意的角色。

蘇紹智出逃後，在海外的政治表演已有半年多了。他又是寫文章，又是發表談話，造謠誹謗，胡吹瞎說，把攻擊矛頭集中指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指向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旗幟的二十世紀社會主義運動。蘇紹智在海外的言論，是他長期以來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繼續和惡性發展，充分顯現了他的反動政治面目，也使他過去宣傳的許多錯誤觀點的實質和歸宿徹底暴露出

來。

這裏沒有必要把蘇紹智的種種攻擊和誹謗一一拿來加以答覆，而僅就他根本否定中國人民的社會主義事業和根本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若干言論略加剖析。

一

蘇紹智攻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社會主義制度，有一個基本的命題，就是認為我們這幾十年搞的不是社會主義，而是「封建專制主義加史達林主義」，「徒有社會主義之名而無社會主義之實」。另一方面，他又提出並鼓吹所謂「政治多元化」、「經濟私有化」、「思想自由化」，妄圖用這一套來改變和取代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

怎樣看待中國的社會主義？這是一個根本的問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進行了深刻的反思，思考的也就是這個根本的問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形成的新路線，集中體現了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再認識的新成果，這就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按照這條路線，一是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二是要推進社會主義改革，克服原來體制和觀念中僵化的東西，正是爲了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活力和優越性，爲了從中國的實際出發，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只有改革才能更好地堅持社會主義。在堅持社會主義的前提下，對於改革的由來和根據，對於以往社會主義進程中的成就和失誤、經驗和教訓，對於推進改革的途徑和方法，也會有種種不盡相同的判斷和估計、主張和方案。這裏當然也有是非問題，或者全面不全面、高明不高明的問題。

這些都是屬於堅持社會主義的人們之間的分歧和爭論。而另外一種分歧和爭論，則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那就是堅持社會主義同反對社會主義的根本對立。某些反對社會主義的人，在一些時候和一些場合也自稱「社會主義改革者」，甚至「最激進」的「改革者」，但是事物的發展進程，終究會使他們無可逃遁地現出原形。他們實際上是在「改革」的名義下，主張拋棄四項基本原則，從根本上改變社會主義制度，走資本主義道路。蘇紹智就是這樣。

蘇紹智認為我們這幾年搞的不是社會主義，「徒有社會主義之名而無社會主義之實」，他的這種觀點並不是什麼新東西。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在撥亂反正、總結歷史經驗的過程中，當我們黨認真揭露和分析建國以來我們工作中的錯誤和挫折，揭露和分析我們體制中存在的弊端和問題時，一股錯誤思想潮流由隱到顯地發展起來。那就是極端誇大這些失誤和問題，歪曲地分析它們的根源，藉以根本否定我國社會主義取得的基本成果，甚至根本否認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正是針對這股思想潮流，一九七九年初鄧小平同志發表了著名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講話。一九八一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又明確指出：「儘管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處於初級的階段，但是毫無疑問，我國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任何否認這個基本事實的觀點都是錯誤的。」一九八三年，鄧小平同志在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尖銳批評了當時思想理論界的混亂，也特別提到這個問題。爾後黨的十三大在進一步闡明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問題時，又強調指出了這個論斷的「兩層含義」：「第一，我國社會主義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我們必須堅持而不能離開社會主義。第二，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還處在初級階段。我們必須從這個實際出發，而不能超越這個階段。」我們黨的這個論斷之所以是科學的，因為它立

足於最基本的歷史事實。新中國建立之後，我們建立和發展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建立和發展了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基本完成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消滅了剝削制度和剝削階級，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已經居於指導地位。這就實實在在地表明，我國已經建立起了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正是依靠這個基本制度，幾十年來我們國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無論有過什麼失誤和挫折，也無論還存在什麼弊端和不足，這個基本的歷史事實是不能否定的。我們搞改革，正是從這個事實出發，爲着鞏固和發展已經取得的社會主義基本成果。承認還是不承認這個基本的歷史事實，維護還是抹殺社會主義基本成果，正是區分人們是搞社會主義改革，還是在「改革」名義下否定社會主義的一條根本的界限。十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幾次鬥爭，反覆說明了這一點。

蘇紹智誣衊我們搞的是「封建專制主義」，以爲這樣就可以把我們黨領導的社會主義事業罵倒。這完全是徒勞的。在中國，哪個階級、哪個政黨反對封建主義的立場最鮮明，鬥爭最堅決？資產階級及其政黨也反封建，但是他們太軟弱，沒有也不可能把這個歷史任務擔當起來。只有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中國共產黨才提出了明確的反帝反封建的綱領，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推翻了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政治統治；並在新中國成立後，經過在中國大陸幾億人口中進行的土地制度的改革，最終消滅了封建地主階級和封建剝削制度，鏟除了封建專制主義賴以統治和壓迫中國人民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這都是不能否定的基本歷史事實。當然，在推翻封建主義的反動統治，廢除封建土地制度之後，還必須在思想和政治領域繼續消除封建主義殘餘影響，這仍然是一個嚴重任務。這個任務，需要也能夠在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的過程中努力加以解決。這方面曾經注意不夠，



是一個嚴重的教訓。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黨強調地指出了這一點。一九八〇年八月，鄧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所作的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著名講話中，鄭重宣佈：「現在應該明確提出繼續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餘影響的任務，並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實的改革」，「肅清封建主義殘餘影響，重點是切實改革並完善黨和國家的制度，從制度上保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促進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順利發展。」在同一講話中，鄧小平同志還指出：「在思想政治方面肅清封建主義殘餘影響的同時，決不能絲毫放鬆和忽視對資產階級思想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批判，對極端個人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批判。」「由於要肅清封建主義殘餘影響，就認為可以去宣揚資本主義的思想，也是完全錯誤的。」可以看得清楚，我們黨中央在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革的進程中，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同時，嚴肅地提出和切實地來解決肅清封建主義殘餘影響的任務，這條路線是適合中國國情的馬克思主義路線。而蘇紹智之流，則是借「反封建主義」為題，做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文章。他們一是極端誇大封建主義的影響；二是把社會主義制度下共產黨的領導、人民民主專政、社會主義公有制和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都說成是「封建主義」來加以攻擊和反對；三是鼓吹只能靠發展資本主義來反對所謂「封建主義」。這樣的反對「封建專制主義」，只能是否定社會主義制度，走資本主義道路。

至於蘇紹智攻擊我們搞的是「史達林主義」，那也是別有用心和目標的。史達林問題，對於我們研究社會主義歷史經驗，研究社會主義改革，無疑是個重大問題。在這個問題上，需要的是分析的方法，歷史的態度，冷靜地面對歷史實際。史達林時期蘇聯黨和人民建設和捍衛社會主義的基本成

果必須肯定：而對於史達林時期那些敗壞社會主義聲譽、阻礙社會主義發展的東西，則必須否定，並從中得出應有的結論，以推進社會主義的改革。關於史達林對中國的影響，也應當從兩個方面來分析：既有積極的，也有消極的。同時要看到，早在民主革命時期，我們黨就反對了那種把蘇聯經驗和史達林意見神聖化的教條主義傾向，強調中國的革命有中國的特點。在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初期，理所當然地我們要吸取蘇聯的經驗，但也絕不能說我們是全盤照抄史達林。我們的社會主義改革，更是在總結國際國內社會主義歷史經驗和教訓包括史達林教訓的基礎上開展起來的。但蘇紹智把他所說的「史達林主義」說成是同封建專制主義類似的東西，又把我國四十年社會主義稱之為「封建專制主義加史達林主義」，並把這說成是什麼「壓在今日中國人民頭上的『兩座大山』」。他不顧基本歷史事實，編造危言聳聽的東西，用這種手段來醜化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絲毫無損於中國人民的社會主義事業，而只不過使他的仇視社會主義的面目更加暴露而已。

特別是看一看蘇紹智拿出什麼東西來代替他所謂的「封建專制主義加史達林主義」，問題就更加清楚。他的政治綱領、政治主張就是這麼幾條：一是在政治上，主張「廢除一黨專政」。他把中國共產黨在國家生活中的領導地位和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叫做「一黨專政」。二是在經濟上，鼓吹「說得更徹底一點，就是要私有化」。既然要「私有化」，那就不是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允許發展一部分私營企業作為補充，而是要把社會主義公有制「化」為資本主義私有制。三是在思想上，反對所謂把馬克思主義當成「官學」。他把馬克思主義在我國意識形態領域中的指導地位，稱之為「官學」。他的這一套，就是要從政治、經濟、思想三方面來實現整個社會的徹底資本主義化。

這裏我們要對蘇紹智反對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問題，多說幾句。蘇紹智竭力詆毀和否定馬克

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說什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在中國被當成了一種「官學」，「引起思想僵化」。中國要不要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地位？這種指導地位是不是必然導致僵化？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同蘇紹智有著根本分歧。大家知道，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絕不是自封的，而是在人民革命鬥爭的歷史中形成的，它對於保證我們事業的社會主義方向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取得這個指導地位，是靠真理的力量；堅持這個指導地位，仍然是靠真理的力量。當然，在革命勝利以後，我們一些同志容易只是依靠行政權力和黨的威信，不是通過辛勤努力，掌握大量材料，用分析的方法去說明馬克思主義真理同中國具體情況的統一，而是把馬克思主義當做教條。我們黨在五十年代中期，就指出過要警惕這種危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更是堅持實事求是、解放思想，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強調貫徹執行百家爭鳴的方針。十年來，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生機蓬勃地發展，也正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實現的。因此決不能說馬克思主義只要居於指導地位就注定會僵化，更不能藉口反對僵化而主張取消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反覆表明，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在國際國內複雜的鬥爭環境中，如果削弱以至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削弱以至放棄了黨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削弱以至放棄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那也會出現極大的危險。其結果，勢必導致各種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自由氾濫，使我們整個社會陷入極大混亂之中。這哪裏還談得上什麼四化建設，什麼安定團結、國家統一？哪裏還有什麼社會主義。蘇紹智之所以這樣起勁地反對什麼「官學」，要求取消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他的根本意圖就在這裏。

## 二

還必須指出在蘇紹智那裏，所謂反對「史達林主義」其矛頭所向，是要直接地公開地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尤其是集中反對列寧主義。這是他的思想發展邏輯的必然，也是他政治本質的進一步暴露。

蘇紹智對列寧主義的攻擊，主要是兩方面，一是否定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學說和黨的學說，二是否定列寧反對第二國際機會主義鬥爭的重大歷史意義。

蘇紹智把他所說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種種「災難」的原因，歸結為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學說，甚至胡說什麼「無產階級專政與法西斯專政只有一肩之差」。在這裏，蘇紹智完全不是什麼批評缺點、指出弊端，而是用最惡毒的語言來咒罵和根本否定無產階級專政。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學說，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重要貢獻，是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建立新社會的思想理論武器。我國的人民民主專政制度，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學說與我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人民民主專政，對廣大人民是民主的，對反對並企圖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敵人，則要實行專政。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對於人民是福音，對於社會主義的敵人無疑是災難。蘇紹智不是崇尚資本主義國家政治制度嗎？資本主義國家並不是沒有專政，它的專政是建立在資本剝削和壓迫的基礎上的。至於法西斯專政，則是資產階級專政的極端的赤裸裸的形式。蘇紹智竟用「法西斯專政」這樣的語言咒罵我們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只能表明他在政治上墮落到了何種地步！

蘇紹智還特別攻擊列寧的建黨學說，說什麼「問題出在列寧的建黨原則」，他認為這一原則過時了，「仍然按列寧建黨原則行事，這就會造成大的災難」。列寧的建黨原則是什麼？最主要的是民主集中制原則。大家知道，民主集中制原則，是要在民主的基礎上集中，這樣來把我們無產階級政黨的力量凝聚起來、組織起來，進而把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力量凝聚起來、組織起來。正是依靠這個武器，從組織上保證了無產階級政黨能夠鞏固，能夠成為強有力的先鋒隊組織，擔當起率領人民進行革命和建設偉大門爭的領導責任，而不致成為一盤散沙。這個原則，是列寧主義對於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發展，是無產階級政黨不可須臾離開的重要法寶。這對於我們這樣一個擁有四千多萬黨員的大黨來說，尤為重要。取消了它，就等於毀掉黨的戰鬥力，毀掉黨的組織，也就是毀掉黨所領導的社會主義事業。當然，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如何完善，如何發展，這是社會主義改革的一個重要課題，是需要根據社會主義實踐來不斷地加以研究和解決的長期任務。但是正反兩個方面的歷史經驗已經清清楚楚明白地告訴我們：社會主義建設進程中種種曲折乃至「災難」，其原因，絕不是什麼由於列寧的民主集中制，而恰恰相反，是由於民主集中制不完善，不健全，甚至遭到破壞的結果。

蘇紹智還說：「列寧過去反對修正主義（指伯恩施坦主義——引注），修正主義是在發達的資本主義條件下修改了馬克思主義，列寧是在沙俄專制的條件下修改了馬克思主義，兩者都修改了馬克思主義。」這就完全抹殺了列寧反對第二國際伯恩施坦主義的鬥爭的重大意義，是對列寧主義歷史地位的公然否定。大家知道，本世紀初社會主義運動中列寧同伯恩施坦主義鬥爭的實質，絕不是僅僅限於如何評價這個或那個國家發展進程的問題，而是在於如何看待當時整個資本帝國主義世界矛盾的發展，

如何對待正在來臨的社會主義革命這場人類歷史上具有嶄新內容的偉大革命。就在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的前夕，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閉眼不看資本帝國主義矛盾的空前激化。帝國主義戰爭來了，他們又擁護帝國主義戰爭，要「保衛」各自的帝國主義「祖國」。十月革命勝利了，工人農民建立起自己的社會主義國家，他們又竭力攻擊十月革命。歷史已經證明，反對社會主義革命，是第二國際伯恩施坦主義的要害所在。在同第二國際機會主義的鬥爭中，列寧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帝國主義時代的新特點以及俄國的具體情況相結合，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理論。通觀二十世紀歷史發展的基本線索，回過頭來看，列寧在本世紀初的關鍵時刻，他對當時資本帝國主義矛盾全局的基本分析是科學的，他提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聯合起來的基本戰略是正確的，他把社會主義從一種學說和運動變成創立新國家、建設新社會的巨大規模的實踐，並對社會主義建設進行了極其有益的探索，從而開闢了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新階段。正是由於列寧對伯恩施坦主義進行了堅決而有效的鬥爭，才有十月革命，也才有後來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旗幟的二十世紀空前壯闊的社會主義運動。沒有列寧主義的偉大勝利，沒有第二國際機會主義的破產，人類可能至今還在資本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一統江山的奴役和壓迫之下。總之，無論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旗幟下的社會主義運動經歷了和經歷著什麼樣的磨難和曲折，列寧主義的歷史地位、歷史成果及其對當代歷史發展的意義都是不容否定的。

關於馬克思主義，蘇紹智說：「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文化、思想方法和社會科學有它的地位」。他還說：馬克思對於未來社會「只是作了一些大的方法論的估計和一些帶有烏托邦色彩的空想」。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詆毀，是對馬克思主義革命靈魂的閹割。必須明確指出，首先，馬克思主義是無

產階級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是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推翻舊世界、建設新社會的最強有力的思想武器，決不能把馬克思主義的「地位」，僅僅歸結為「一種文化」而已。其次，馬克思恩格斯所創立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方法論，他們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分析以及由此提出的剩餘價值理論，他們所揭示的社會發展規律以及由此作出的共產主義必將代替資本主義的結論，都是科學的真理。他們在此基礎上對未來社會發展總趨勢的預見，絕非「只是」「一些帶有烏托邦色彩的空想」。第三，馬克思主義本來就是在實踐中不斷發展的科學。整個世界發生的巨大變化，要求馬克思主義者開拓新視野，發展新觀念，進入新境界。馬克思主義需要有新的大發展，這是現時代的大趨勢。當然，這種發展只能建立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已有的科學成果的基礎之上，而絕不能藉口世界的變化，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最基本的東西。列寧當年在揭露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閹割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革命靈魂時，一針見血地指出：「他們忘記、抹殺和歪曲這個學說的革命方面，革命精神，把資產階級可以接受或者似乎可以接受的東西放在第一位來加以頌揚。」蘇紹智今天採取的，不也正是這樣的手段嗎？

### 三

蘇紹智走到今天這個地步，不是偶然的，而是他在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上長期發展演變的必然結果。

早在一九七九年中共中央召開理論務虛會前後，蘇紹智就打著反「左」旗號，發表文章，提出

中國還處於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階段，懷疑並實際否認我國已經建了社會主義制度。對於蘇紹智的錯誤觀點，黨組織和理論界的同志們進行過批評和幫助，希望他能改正。一九八三年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提出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後，蘇紹智會對自己的錯誤觀點作過一點檢查。但是後來的事實表明，他言行不一，不但沒有汲取教訓，反而變本加厲。他擺出一副「改革者」的面孔，打著「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的旗號，攻擊社會主義社會「缺乏真正的民主」，「沒有自由」，要靠搞資本主義來「補課」，等等。他的這類言論，受到海外一些人的喝彩，說他是「持不同政見」的「理論家」。蘇紹智對此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這樣，蘇紹智的問題，就從局部的思想理論觀點錯誤，發展為系統的資產階級自由化觀點。

一九八七年初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開展以後，中國社會科學院撤銷了蘇紹智在馬列所的領導職務，並對他再三進行耐心的批評和幫助。而蘇紹智卻抗拒這種教育和挽救，頑固地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在這條道路上越走越遠。一九八八年底，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十週年理論討論會上，他攻擊和全盤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並把他的發言稿送到《世界經濟導報》和香港報刊發表。一九八九年春，他又非常活躍地參加了一系列政治活動，更加露骨地把矛頭指頭向黨和政府，妄圖在社會上掀起政治風波。這樣，蘇紹智的問題，就不僅是思想政治立場的錯誤，而且發展為直接在政治行動上煽動動亂。

動亂開始後，蘇紹智公然叫嚷從動亂中「看到了中國的前途和希望」，更加積極地參與煽動策劃。四月二十七日，他和嚴家其等人發出致上海市委的「公開信」，反對上海市委對《世界經濟導報》的處理決定。五月十三日，他和嚴家其、包遵信等人在北京大學貼出了《我們不能再沉默了》的大字



報，煽動知識分子參加聲援學生絕食的大遊行。五月十六日，他又和嚴家其、包遵信等人發出〈五一六聲明〉，揚言如不接受他們的政治要求，就要採取進一步行動，以此來要挾黨和政府。北京地區平息反革命暴亂後，蘇紹智出逃國外，積極參加了海外的反華反共活動，成爲國際反動勢力的應聲蟲。

從蘇紹智的演變過程，可以看到在世界風雲變幻和複雜的鬥爭環境中，我們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極端重要性。由於當前社會主義發展的曲折，社會主義的敵人興高采烈。他們叫囂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要滅亡，馬克思列寧主義要滅亡。但他們實在是高興得太早了。面對著資產階級自由化和西方反共主義的鼓噪，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以遠闊的歷史眼光來觀察眼前事變，我們的憂患意識是包容在馬克思主義的樂觀主義之中的。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四十年尤其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這十年的歷史發展，使我們堅信：社會主義制度是優越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正確的，改革開放是不會改變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正確路線和十年改革開放的成果，是我們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繼續前進的不可動搖的基礎。立足於這個基礎，我們集中精力把國內的事情辦好，埋頭苦幹，迎接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紀。一種新的社會制度的誕生和鞏固，往往是要以上百年以至幾百年來計算的。在這樣的過程中，磨難和挫折不可避免。資本主義建立的歷史是這樣，社會主義更會是這樣。因爲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這樣一種社會變革，較之以往的社會變革深刻得多，複雜得多。我們的事業，不可能是筆直簡單地從一個勝利到另一個勝利，而只能是既有來潮，又有退潮，既有勝利，又有挫折以至一時的局部的失敗。但在長期反覆中，來潮和勝

利終究是主導的東西，最後勝利必將屬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這個歷史發展的大趨勢，任何力量也改變不了。

《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七日

## 「還是老實些好」

拜讀《人民日報》（海外版）一月十三日以這個為題，署名「甘為」寫的文章，頗有所感。

文章中頗有警句：「最起碼的一條，要把事實，把真實的情況告訴讀者。」「說謊是一種最壞的品德，這無論如何也不能說是對的，更不能說是應該的，人如是，報也如是。」

我想作者也許不會反對，把它再伸延一些：「政府如是，黨如是，黨的領導人也更是。」

不知道《人民日報》對此反思了沒有，把《人民日報》當作喉舌的中國共產黨對此反思了沒有。要真老實，不要言而無行，更不要當手電筒，只照別人不照自己。

舉個例子：《人民日報》一九八九年七月七日刊登的國務委員、北京市市長陳希同的〈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就充滿了誣陷不實之詞，說穿了，就是造謠說謊。本來已不值得一提，但是最近看到北京出版的一些書，如國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編的《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等書就是拿陳希同的報告當作信史資料，豈不貽誤子孫！

戈揚去年八月在一本港刊上已經揭了幾處。

現在將涉及我的也揭出來，使大家可以看到，陳希同怎樣搜羅編造、深文密織，「是一種最壞的品德」之一斑，我這裏不說是非，只講事實，一個人事實都不講，遑論其他。

## 第一個例子：

陳希同報告說：「今年（按：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八日，蘇紹智（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研究員）、方勵之等人在北京『都樂書屋』搞了一個所謂『新啓蒙沙龍活動』。」按：七月六日的電視廣播用「組織」一詞，七月七日見報時改用「搞」字，大概他也有點心虛。）

事實是：《新啓蒙》叢書早已組織，我十一月中才回到北京，根本不知道叢書的事，一月二十八日為《新啓蒙》叢刊發行而在都樂書屋舉行的沙龍活動，不是我，也不是方勵之組織的，當時公開寄贈的請柬上組織者的署名明白無誤，開會時還當眾宣佈，我僅是在收到請柬時應邀參加而已。

## 第二個例子：

陳希同報告說：「五月十三日晚，嚴家其、蘇紹智、包遵信等人在北京大學貼出〈我們再也不能沉默了〉的大字報，動員知識分子參加他們發起的聲援學生絕食的大遊行。」

事實是：我早已應邀於五月十三日去長沙講學，因此在十二日以前致力於準備講稿，從來沒有人來與我議論所謂大字報和遊行之類的事；十三日中午我去長沙講學，自然無法分身去北大貼大字報；我十七日才回北京，自然未能參加遊行，直到我回到北京還不知道北京有知識界遊行之事。

一個向人民代表、向黨中央匯報，要他們相信的大報告居然事實也不講，我這裏只不過舉了兩個涉及我的例子而已，其他更嚴重的例子更多，其陰險的用心和造成的不良後果十分嚴重。

還是引用甘爲的文章的結論：

「造謠是政治上破產的先兆，  
「嘲弄了歷史的，必然被歷史嘲弄，歷史就是這樣的無情和公正。  
「謊言可以騙人於一時，但終究要被事實戳穿。我看還是放老實些的好。」

原載《爭鳴》，一九九〇年三月

## [蘇紹智]

滿族，北京市人，一九二三年生。

一九四九年畢業於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經濟學碩士）歷任復旦大學副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指導教授），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山東大學兼任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所長，人民日報社理論部經濟組組長，英國牛津大學、美國馬凱大學、哈佛大學訪問學者。

現任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訪問學者。

著有《中國的社會主義和民主》、《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民主化與改革》（英文本）、中外文論文散見於中外論文集和報刊雜誌。



ISBN 957-13-0449-2 (549)



成書業公司

100.00

BB11

NT\$250